

习仲勋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 1740 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6.625印张 390 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平） 1—800册（精）

ISBN 7-5073-0243-1/D·70 定价 30.00 元（平）
ISBN 7-5073-0311-X/D·88 定价 36.00 元（精）

出版说明

这本文选，收入习仲勋同志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报告、文章共 77 篇。其中大部分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习仲勋同志曾在中共关中分委、中共绥德地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在各个历史时期，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合他所在地区、部门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指导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对敌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广东的改革开放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

这本文选，是在中共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委的支持下，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习仲勋文选》编辑组征集、编辑的。

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仅对原文做了少量删改，对史实做了订正，并加了题解和注释。

《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六月

目 录

关于关中分区的反磨擦问题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1-5
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总策略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	6-8
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	9-11
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2-13
关于渭北苏区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	14-16
贯彻边区妇女运动的正确方针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	17-21
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	22-23
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	24-29
陕甘宁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 （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	30-34
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	35-37
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	38-41
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	42-45
关于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给毛泽东的复电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46-48
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	49-56
关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	
(一九四八年七月)	57-71
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若干领导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72-77
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78-88
加强保卫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89-94
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95-101
把企业管理与工会工作结合起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102-106
加强新解放区新老干部的团结和学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7-108
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	109-112

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	113-114
把妇女运动再提高一步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	115-119
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120-126
充分发挥民主效能, 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127-133
掌握情况 依法办事	
(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	134-136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	137-149
依靠和团结职工办好人民铁路	
(一九五一年二月)	150-152
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	153-156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问题	
(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	157-163
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164-172
动员一切力量, 为完成甘肃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173-183
文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184-192
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93-199
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200-201
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	202-207
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208-213
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214-228
为绿化西北而努力	
(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	229-235
关于西北地区的商业调整、人民生活状况和民族工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36-241
关于政务院文委分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日)	242-246
在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247-254
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	
(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	255-265
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266-269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	270-273
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	274-285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286-300
永远难忘的怀念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301-319
按照农轻重次序调整好广东国民经济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	320-327
要认真抓好农业教育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328-329
彭总在西北战场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330-355
继续解放思想, 进一步把经济搞活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356-360
在新华社建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	361-362
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363-365
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66-368
适应新的形势, 努力搞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	369-374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	375-383
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384-388
新的领导班子需要充实加强, 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必须抓紧	

抓好

-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 389-392
- 愿职工读书活动长久地开展下去
-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393-395
- 党的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
- (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 396-401
- 一定要把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这件事抓紧抓好
-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402-406
- 为做好秘书工作说几句话
-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407-409
- 千方百计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使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10-418
- 克服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419-422
- 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七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 423-426
- 交朋友的真谛
-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 427-428
- 在全国侨联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429-431
- 学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
-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 432-437
- 要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
-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438-442
- 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443-446
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447-456
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457-463
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	
(一九八八年四月)	464-475
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476-479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	480-484
注 释	485-521

关于关中分区的反磨擦问题^{*}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¹⁾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镇的，又在周围其他地方增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之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现已全部分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之永洛（一个中队）、张洪（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耀县新增一保安旅（一千五六百人），分驻小丘一个连（一百一十人）。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二百余保安队员和保甲⁽²⁾人员。靠新宁⁽³⁾之盘克一带仍为保安队据守。新宁县已遭保安队的两次袭击，第二区区政府驻地襄炉镇的合作社被抢劫。后在我三八五旅⁽⁴⁾警七团一营协助之下，已将早胜镇之反动武装、保甲全部摧毁。现双方相持。从表面上看，顽固派属防御，实际上是准备力量图作再次进攻，我当然亦从

• 这是习仲勋同志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

各方面准备。除上述军队增防调动外，对方在淳化、旬邑、宁县、正宁一带之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并督领保甲，严酷训练壮丁。民众稍富者或种地够五十亩者，即勒逼买枪支，增其所谓防共力量。这是对方近来军事上的情况。在政治上，则是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其军事上的进攻。第一是特务机关之增强扩大与到处密布。旬邑县国民党县政府最近新设了四个科（过去只有一个科），各科的工作人员均有五六名之多，较过去增加两倍，据悉这些人是专事反共之特务人员。在职田镇、太谷镇、张洪镇分设的官盐店、官膏局⁽⁵⁾、杂税局、民校里，安插的特务人员亦甚多，并实行具体的严密分工，多方进行破坏。有专门搜集材料，制造谣言的；有专门打入边区刺探情报的；还有的是专门在边区内做“点线”⁽⁶⁾工作的。他们中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受县特务机关的领导。在军队中（陕西保安第九团），亦同样地建立起了特务工作，他们专门瓦解我方部队，主要方式是收买利诱。第二，由于特务机关加强，因而一月来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亦大为活跃。除在马家堡对我独立一营进行破坏外，并在我内地，如新正县⁽⁷⁾的三区、四区，赤水县⁽⁸⁾的三区、四区，大肆建立“点线”，暗组保甲。最厉害的是谣言纷起，挑弄是非，如说“马家堡来队伍很多，马上要攻旬邑”，或讲“旬邑来了一个团，即日收复马家堡”。又云“边区拉兵征粮，拆庙伐树，无恶不作。”并以此呈请国民党彬县专署，要求收复关中地区。耀县县长到小丘镇演讲，叫嚣旧历年底收复耀县。小丘联保主任集中保甲，备好牲口，决定于一月四日进攻淳耀县⁽⁹⁾五区，抢劫仓库。后经某同情分子制止，遂致搁起。

观以上情形可知，关中分区目前处在对方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中。第三，加上我们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

(二)为什么在此种复杂紧张的环境中，对方还未大举进攻呢？这当然有其原因。首先是对方的军事部署还未就绪，仅以现在所有兵力尚不足一举而“荡平”关中分区，因此还需再作准备。其次是特务工作虽较前活跃，但仍未有根深蒂固之基础，所以在配合方面还不得力，这也是眼下还未进攻的原因之一。最后就是对方本身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士兵的逃跑，简直使其整天手忙脚乱。来耀县之保安旅及陕西保安第四支队每天都逃跑四五十人，班、排长相继逃跑。关中已临战争环境，而新宁县早已成战争局面。在目前，如对方再增兵，或再向前推进一步，那在淳耀、旬邑方面就会发生突然袭击，也可以说是双方游击战争大大展开的日子。因为在我关中地区，本身存在一些基本的弱点。首先在地理上是个突出部，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是隔离而无联系的，容易遭受包围。其次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在关中自有群众斗争以来，革命的发展老是沿山伸张，一些大据点，至今仍在对方手中。如我有马家堡，对方有职田镇，中间仅相隔半里，人声互可传闻。在赤水，我有马家庄，对方靠前有土桥，后有通润镇，一距五里，一隔二十里。在淳耀，我有安社，对方有方里镇，相距不过十五里，另外靠南有小丘，近东有柳林镇，北临照金镇。在新宁，有盘克、平子、早胜环抱相对。在新正，我有湫坡头，对方有太谷镇，我有底庙镇，对方有雨乐镇，我有湫头镇，对方有四村堡，我有刘家店，对

方有马栏镇。整个来看，大的据点完全在对方控制中，对方之一举一动，四下可响应。因此到万急之时，我有顾前恐后之虑。最后就是我方兵力单薄，工作还有弱点。而对方靠近彬县、长武、耀县、三原，交通便利，运输迅速。上述是我们坚持反磨擦斗争中的基本困难。

（三）根据上述情况，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我们的主要策略，还是依据下面三点：

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磨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目的。

第二、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本准绳。

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要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力量，以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根据上述原则，关中分区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

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

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

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我们也同样的要以内外部的力量粉碎反共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于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当地政府就跟着这部分队伍行动。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极广泛、极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起来。最后就是动员老百姓把一些必要的据点构筑坚固，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

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提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工作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

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总策略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

自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取田镇军事磨擦事件以后，封锁陕甘宁边区⁽¹⁰⁾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在目前，我们总的策略是，一方面发动全关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提高群众保卫关中分区、保卫家乡的热忱，另一方面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及其罪恶行为，以便孤立与打击之，完成保卫关中分区的总任务。

甲、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展开普遍的政治斗争。顽固派虽然在今天对我们是以军事进攻为主，虽然我们在军事上也加紧准备，采取坚决的自卫立场，但我们在自卫原则下的反磨擦的军事斗争仍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即为了团结进步，以便坚持抗战。所以对顽固派的斗争，仍是以政治为第一位。

1、深入反对公开的汪精卫及暗藏的汪精卫的宣传。说明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是想整个出卖中华民族予日寇作没世

• 这是习仲勋同志关于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情况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的一部分。

的牛马，其所谓“共同防共”正是达到这一罪恶目的的具体办法。因为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八路军⁽¹⁾、新四军⁽¹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等，都是最坚决抗日的；而国内顽固派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及所表现出的一切反动行为，正是做了敌寇和汉奸的应声虫，都是帮助了敌寇、汉奸，而这些顽固派的行动也就是他们自己准备投降的实际步骤。

2、揭露顽固分子的欺骗宣传。说明其取消关中分区的企图，即是取消抗战与团结，取消人民既得利益的阴谋，不只对我边区有害，而且对周围友区⁽¹²⁾的群众也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要求边区内的群众更加警觉与积极动员起来，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家乡。我们要求友区广大群众不仅消极地不满于这个战争，而且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举行请愿，要求停止这个战争。

3、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口号周围，使其现在能间接帮助我们，于某种情况下可直接帮助我们。对于其中的观望者、怀疑者、动摇者，则争取之，帮助之，教育之，至少使其守善意的中立。同时要利用顽固派内部存在的矛盾，促其行动难于一致。

4、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在我区域内就需要干部到乡下去，深入工作。在友区就需要印发大量的传单、标语，设法张贴与寄出。

5、一切这些政治的斗争与其他的各种斗争，都要求干部对环境的正确认识和对策略的正确掌握，才能做到胜利有保

证。这也是反对顽固派的政治上的一个必要的对策。

乙、加紧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

1、加强各县保安队的战斗教育，提高其战斗力；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其战斗情绪和坚定胜利的信心；加强纪律教育；提高其执行群众纪律的自觉性，以更加巩固部队与更加取得群众的帮助与密切联系。

2、加强整顿训练基干自卫军，并适当配备干部，以便于领导自卫战争。以区为单位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以乡为单位组织五至十五人的游击小组，现在就打下这个基础。应加强训练，一般的至少能扰乱敌人，侦探敌情，破坏交通，加紧盘查及帮助我们部队一切勤务工作等。

3、加强锄奸工作。深入动员锄奸组织与全体党员、干部与群众，严格注意这一工作。坚决肃清隐藏在边区内之特工“点线”⁽⁶⁾分子及土匪等，整顿已有哨所，增设必须之哨所。

4、进行边区人民的战争动员，教育克服其太平观念。

5、抓紧时间进行春耕运动。

丙、加强战时的组织与领导。

1、在顽固派军事直接进攻的区域，应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反磨擦斗争和各项工作。

2、在顽固派军队占领的地区，干部都要到游击队上去。

3、适当配备区、乡干部，以便领导反磨擦的军事斗争。各地干部在未有调动命令前不得擅离职守，应与当地游击队一起保卫当地的政权和人民既得利益。

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

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

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他们可以贪赃枉法，鱼肉人民，认熟人，认面子，认亲戚朋友；有钱有势的，囤积居奇，贩卖毒品，反而逍遥法外；万千无辜老百姓，却充满着监狱。与其说他们是解决纠纷，不如说他们是制造纠纷。这是旧司法的一套。这一套在我们这里吃不开。我们的司法工作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过去检讨警备区^[13]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14]，侵害过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的警惕。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习仲勋同志时任绥德地委书记。

二、不当“官”和“老爷”。

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官”和“老爷”也喜欢老百姓怕他们）。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如果说，要怕的话，就只能是对敌人汉奸是如此的，对于一般老百姓，我们是用和蔼的态度耐心地说服。当着一方有意见，有冤屈向你上诉时，应该细心地听，等到他讲完了，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慢慢地向他解释。绝不能未调查，未研究，在主观上首先对于某一方面，就存有了一种成见。这种存有成见的作法，往往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实质，会把案情搞错。所谓秉公处理，不仅限制于观点上，尤应孜孜讲求于对人的态度。

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司法工作，如果不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则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普及民间调解运动。我们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但这不是说到乡村去睡觉，而是从思想上工作上去深入）。必须如此，才能把我们的司法政策贯彻得好，才能使司法工作同人民取得密切联系，才能把像王德彪、郭维德、刘玉厚、马相明等调解模范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样就不会对司法工作有棘

手、忙迫或枯燥之感。千百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如果不发挥人民本身力量，孤独地依靠我们司法干部去处理，那就需些年月！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这次各县发现的十七位民间调解模范，他们的作风和调解艺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干部学习。

至于调解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是很好的。县、区、乡、行政村，都可成立，但必须是“民办公助”。“公办”和无工作内容的，非但不能组织，已组织起来的，亦应取消，以防流弊。

四、有出息和没出息。

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进步快慢，有出息没出息，不在于做什么工作，而在于自己。政治没有抽象的，任何工作都要经过脚踏实地的做。工作做好了，自己也就进步；自己拖着不前进，没有能把工作做好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花工夫，刻苦钻研。比如：对处理案件，应从历史上全面地分析，获得经验教训，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对于自己，那就是很好的锻炼。宋朝有位名法官包拯⁽¹⁵⁾，说会“过阴”⁽¹⁶⁾，其实还不是盖着被儿想问题。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间断地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

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今年办冬学要掌握如下方针：

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如果有同志提起办冬学，开头便是“经费困难、地址困难、教员困难、学生困难等”，总怪冬学不能如愿以偿，这是官办的强迫命令作风，势必办不好冬学，并会发生很多困难；或者认为要民办就不必管，让群众自己搞去，这是一种不加领导的自流现象，也必然会使冬学办不起来。上述两种认识都是不正确的，要知最大困难是没把群众发动起来，只要取得群众拥护，加上我们的正确领导，没有不能够克服的困难。

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今天边区的经济发展了，人民需要文化是事实，然而发展文化必须和发展生产相辅前进。特别在警备区^[13]今年谷多毁坏，收成不好，如果我们办冬学，忘记了群众冬季生产的问题，哪怕就是把其他问题都解决了，而这个冬学还是办不好，原因就是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推广子洲县周家圪塆冬学经验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节录。

发展生产比学习文化更为重要。我们不能以为“现在是在办冬学时期，生产可以暂时停顿一下”。群众不乐意，反说“群众落后”。这样下去，就会造成脱离群众或出力不讨好的情景。

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群众做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这不仅群众有兴趣，容易学，并能够学一下就会用，长期不会忘，同时还能够打下向前发展的基础，提高学习情绪，巩固学习信心。

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这样使得冬学会更有内容，人民可在冬学内学到更多更有用的实际知识，并用以进行边区各种长期建设。

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中参加冬学运动的一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农村内成千上万的文教干部，假如把他们统统提高一步，对于长期开展边区经济，巩固边区，建设边区，是一支骨干力量。

六、对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贯注式。教员到农村，尽可能由群众自愿聘请，不一定要由上面全派，实行民教民的方针。冬学课本，也应征求群众意见，愿意学什么就教什么。对于《千字文》、《百家姓》等书，如果群众要念，可以让群众去读。

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必须把计划放在群众力量、群众觉悟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地凭借于我们自己主观上的臆想。只要办好一处冬学，就可推广起来，办好许多处冬学。周家圪塔一揽子冬学就是我们今年开展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

关于渭北苏区^{*}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

渭北苏区处于三原北三十华里的武字区和心字区。大革命时期乔国桢⁽¹⁷⁾同志在这一地区作群众工作。

一九二八年，为了援助渭华暴动⁽¹⁸⁾，这里发生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一九三〇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隐蔽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其间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斗争，杀土豪反劣绅。是个“半红半白”⁽¹⁹⁾的环境。另一方面群众在斗争中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捕杀镇压。这就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这是渭北苏区的准备时期。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十月革命节⁽²⁰⁾时，是渭北苏区的成立和失败的时期。一九三二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关中二十四县农民围城斗争，这时红二十六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也开到渭北苏区。成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及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的一部分。

不但有雇农、中农、贫农，也有富农，而妇女联合会里的中农、富农家庭妇女更是屡见不鲜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21]、程建文^[22]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从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是渭北苏区的最后时期，亦即恢复渭北苏区与成立红四团的时期。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月余后，我与李豫章^[23]同志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24]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25]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26]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27]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28]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

敌人三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并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被证明是条失败的路线。

贯彻边区妇女运动的正确方针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

今天是“三八”节。今年这个“三八”节，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三八”节，又是国内和平⁽²⁹⁾取得后第一个“三八”节。大家很兴奋，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关于和平以后陕甘宁边区⁽¹⁰⁾妇女运动怎样做的问题。其实我也不能多讲些什么，前年“三八”节，高岗⁽³⁰⁾同志有一个很好的讲话，指出我们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发展经济，做到家家丰衣足食。这是一九四二年底高干会⁽³¹⁾所规定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路程才摸索到的。边区妇女运动曾经走过不少弯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边区妇女有过很大成绩，在为人民的解放战争里，女人和男人一样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每一斗争都有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时期，继续内战时期的基础，边区妇女工作也有成绩，在抗战动员上出了很大的力。但后来工作不前进了。为什么？短了一条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召开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方针，或者说这条方针提得不明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领导妇女生产这条方针。那时只满足于内战时期的那一套做法，加上城市观点也来作怪，边区妇女工作是吃了不少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亏的。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底高干会，才算把正确的方向摸到了。高干会规定了组织广大妇女发展生产是妇女工作的方针，这两三年边区妇女运动便有了一番新气象。几十万妇女和男人一道，在生产战线上努力，又有不少女同志在卫生、保育、治家、办学等等工作上努力，她们的精神和成绩都很好，出了好些女状元，大家叫劳动英雄，或者叫模范，有的已经是闻名全国，甚至外国人也知道了。这是大家都眼见的，不用我多讲。

现在，和平民主新时期来了，边区妇女工作的方向又是什么呢？还是组织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讲文化，讲卫生。边区在和平以后，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建设，就是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文化，注意卫生。

方向有了，而且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如何贯彻这个正确方针的问题。去年以来，我们在贯彻这个方针上没有做得很好，松劲了。其具体表现是：有些英雄不英雄，有些模范不模范了，就妇运本身来讲，是产生了一些比较普遍的自流主义现象。为什么？事情向前发展了，我们却还在原地站着。有些同志说，我们已经号召了妇女起来生产，我们选出了劳动英雄，还开了会，给戴了红花，并且给了奖，又组织了妇纺小组等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我们有的同志似乎有这样的脾气，只喜欢大叫大喊，不怎么高兴细针细线。我说，你们女同志不应有这样一种脾气呀。号

召是要的，但那不过是事情的开头，接下去就要具体组织，或者叫具体领导。人家已经起来生产了，你还在那里叫喊起来生产呀，起来生产呀，难怪又有些同志说，我们后来去了，群众反有点嫌麻烦。事情是很多的，而且事情越是向前发展，问题越是多，群众要求我们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就特别迫切。拿妇女纺织来说吧。一些纺织还不发展的地方，自然还要去推广；而许多已经搞起来纺织的地方，就应该提高技术了。怎样提高？都把城市的速织机器搬进来么？不是，办不到，行不通；都搞加速机或者搞平拉机么？有些地方可搞，有些地方一时还不能搞，有些地方只要去教会把纺车修理或改良一下，现时就够了。这就是说，要看某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看群众的需要和意愿，一步一步地去提高。又比如组织妇女纺织，不是要把所有纺织妇女都编起组来，那样行不通，大家都是知道的。有的可以多几个人组织在一起变工，有的只可以少几个人合起来，又有的用其他没有一定的形式联系起来搞。我们决不能只想步子迈得大，你步子大，跑得太快，群众就跟不上。也不要追求形式一致，都一般高，都一样齐；你硬要，就只有来个强迫命令。这是作风问题，又是思想问题、群众观点问题。我们有的同志还有一个不好的脾气，至今还没有完全去掉，就是作兴说自己是做大事的，不愿意做小事情。她们不懂得，有方向，还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实际工作，才能走到目的地。大事业是从小事情做起的，是许多小事情的集合成功的。我们天天喊群众观点，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把群众看做自己的亲人，一点一滴脚踏实地替群众做些事情，为群众服务。说到这里，还想提及一点，去年“三

八”节，《解放日报》社论上说要求妇女工作者学会一门本领，不论是纺织、医务、教学、办合作社及其他经济工作。这是很对的。我们在想，边区工作主要就是建设，区乡干部都得学会一门建设技术。妇女工作者更宜如此。你没有一门专长，首先就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不能给群众解决生产、卫生等问题。如果我们妇女工作者都有一门本领，分散在各个职业部门中，那我们就可以从各方面联系群众。

我们妇女工作同志先从思想上搞通，把作风转变过来，边区妇女工作的正确方针就好贯彻了。好好地把这几年的经验加以总结，学会正确的工作方法，把组织妇女生产、提高文化、注意卫生的方针坚持下去。

和平到来以后，边区妇女运动的具体内容，仍然是：一、把边区妇女组织起来，积极参加生产，纺线织布，喂猪养鸡，帮助男人种地和经营各种农村副业，提高技术，今年生产要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二、保养娃娃，提倡卫生，减少疾病死亡，财旺还要人旺。三、提倡妇女识字，宣传初步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提高文化。四、发展节约运动，学会治家，作到家家勤俭，家家和睦，边区人民经济才有切实的基础。

把上面的事办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妇女运动。如果没有广大妇女动员和组织起来，事情就会落空。这需要妇女工作同志努力，还要所有同志努力。不要以为这只是妇联会的工作，其他工作就不是妇女工作。其实，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各种经济文化工作，同样也是为了妇女解放而工作。妇女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大家有责任，妇女同志更有责任。

这里再对机关部队的女同志、工作人员家属讲几句话。前

两年我们提出了生产自给的方针。这个方针必须坚持下去。和平到来，我们机关部队准备还要精简一下，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不是统统把工作人员的家属甩出去不管了，而要把她们妥善安置，做到劳动自养。在革命队伍内不该有自己不劳动而要人家供养的观念，那是剥削阶级的东西。我们思想上要搞通，自食其力是光荣的，而那些不从事生产，坐在丈夫旁边，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是可耻的。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家属好好酝酿一下，大家出来都找个职业，做一件生产事情，组织领导上也应该帮助大家，替大家找事。我看，延安就可以把大家组织起来，纺织、做衣服及进行其他生产等。

边区妇女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创造了苏区；抗战时期，我们又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赢得了抗战胜利。今后同样还要和边区妇女一起，共同为进一步建设边区而努力。边区一百五十万人，里面就有七十五万妇女，离开妇女，边区建设不可能搞好。

我们把边区妇女工作做好，使边区妇女都组织起来，共同把边区建设得更好，作出榜样，这也就是援助了全国的妇女运动。

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

《边区群众报》^[32]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

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10]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干部和群众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

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33]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个更繁荣的、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这样。

报纸是什么？是一种工具。边区干部一定要明白，《边区群众报》是指导工作的工具，也是指导干部学习的工具。有些干部说：我们曾经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或者不知道怎样去

做，看罢群众报才知道的。我们干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要学会新的更多的本领、新的更多的知识，从哪里来学？《边区群众报》是很好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不论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好好重视这个报纸。经过它交换经验，哪里有新的好的工作方法，做好了的新的工作范例，就写出来登在报上，别的地方也就读到了，大家来学；哪里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作风，也写出来登在报上，批评一下，别的地方也就读到了，大家也就警惕了，不再犯同样的毛病。在这里，要提一句，我们要好好表扬工作做得好的，但也要批评工作做坏了的。我们革命同志是不怕而且要有自我批评的。

大家爱护《边区群众报》，大家替《边区群众报》写稿，继续把《边区群众报》办得更好更好。

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

一、发展陕甘宁边区^[10]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这个远景不是我们等待着就会到来，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现有的条件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我们的远景是什么呢？就是发展农业，加上边区若干工业建设，这就是将来边区的远景。过去我们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如果说不以发展农业为主，那就是错误的。因为边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以要以发展农业为主，但也要慢慢地发展工业，搞一些工业建设。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就没有出路。我们不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建设一点工业，那我们将来就不得了，就拼不过人家。你光有粮食，粮食很便宜，一切工业必需品要从外边来，那时我们就搞不过人家，所以方针还是过去的方针。

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现在边区的余粮还不是很多，去年一年有灾荒，今年春耕时的春荒就很严重。这说明我们的粮食还没有多余的，所以农业方面第一要增产粮食，第二是种棉花，争取棉花自给。同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的一部分。

时，由于今后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向，我们还要加上某些工业原料和能换得外汇^[34]的农产品。比如种一些蓖麻、芝麻，可榨成油食用，也可作为工业润滑油。拿能换取外汇的农产品换回必需品。农业生产应该有计划性，从各地的具体情形出发来计划，这样才能发展农业。我们的办法，我觉得不外乎这样几条：提高技术，掌握技术。我们许多干部都要有指导生产的知识，懂得生产技术，不然不好领导生产。比如改良农作法、修地、修水田、上粪、锄草、除害虫等等，要因时因地制宜。要改良农作法，不是一下提高很多，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提高，慢慢地来。光华农场^[35]所试验的一切，并不是要求全边区马上实行，那是很困难的。我们要贯彻群众路线，推广土生土长的好的农作法，先在村子里推广，然后推广到全乡全区，因地制宜。我们把土办法提高一步，在土的办法上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和指导，然后再去指导农业。这也就是说，要先向农民学习，再去指导农民。其次是组织劳动力。毛主席曾提倡“组织起来”。我们这几年取得的生产成绩，“组织起来”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所以组织劳动力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做。现在边区各地存在着很多变工队^[36]，它是在群众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确实生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搞形式主义，只有数目字而无实际活动的变工队，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再其次是农业生产也要加强具体领导。在我们同志中间有种说法，农民自己会做庄稼，不需要领导。历年生产的发展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还是要具体领导。固然一般号召能够动员群众开展生产热潮，但光有这一套不成，要加上具体领导和解决具体问题。今年从春耕

到现在，经过一般号召，具体解决问题，生产向前发展了一步。这种例子很多。

三、坚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穿衣自给是一件大事，发展家庭纺织业是实现“耕余”的依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农民耕几余几是空话，不会余多少粮食的。本来是有余粮的，但是一穿衣，这个余粮也就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展家庭纺织业。近几年来，警备区⁽¹³⁾内的家庭纺织有很大的成绩，现在差不多有十几万纺织妇女，有很多人家，三分之一或一半的生活依靠纺织解决。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西边几县，像志丹、吴旗等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吃饭倒不成问题，穿衣问题还没有解决。另外还可以看到，虽然抗战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但战后几年要一下恢复到战前状况还不可能。也不是外边工业品一下子都涌进来，所以农村纺织的家庭副业还要搞，甚至要坚持三五年，就是在七八年以后也还会有作用的。因为农民用闲余的劳动力，用自己的棉花，纺成线，织成布自己穿，虽然算起来比从外边买布吃亏，实际上还是赚了钱。贸易公司今后要调剂支持农民家庭的纺织业，而且可以提倡公家人穿土布或明令公家人必须穿自织布。外边的货即使进来了，但我们还是穿我们边区的布，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另外，我们的毛毯和造纸也要发展。佳县峪口的造纸也是家庭副业，那里许多家庭可以造纸，我们要扶持他们发展。还有三边⁽³⁷⁾的毛口袋、绥德的草帽也可以出口。我们要重视我们边区的手工业，我们就地取原料，就地搞成成品。我们要组织领导这些手工业，有计划地帮助民间手工业发展。

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今后我们能出口的东西，主要是牲口、皮毛，所以在这方面要发展。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牲口、皮毛向外出口，换回来外汇，换回来必需品。

五、合作社问题。南区合作社在延安的附近，靠近一个中心市场，来往的公家人很多，所以它的大规模是适宜的。如果把南区合作社这样大的规模搬到农村中办，到处这样办，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南区合作社方向”，是指它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不是把它的规模到处搬用，如果到处的合作社都要求和南区合作社一样，那就非犯错误不可。现在我们要有一个肯定的认识，就是合作社问题在边区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办的合作社，在日本投降以前垮了一部分，在日本投降以后又垮了一部分，现在留下的合作社办不办？搞不搞？回答是，还要搞，要继续地整顿发展，不是不去办，不整顿。我们应以小型合作社为主，以群众需要自己办起来的合作社为主。我想有这两条就差不多了。事实上，边区合作社的方向，应该搞小型合作社，搞群众需要的合作社。我看了边区政府建设厅调查合作社的材料，现在警备区内的合作社多一点。今天能够存在的合作社都是有基础的、小型的，和群众的生活结合得非常密切，从群众自己的需要办起的，资本也不大，他们没有多少脱离生产的人办合作社，或者是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去照顾合作社。同时，他们不是专门搞消费业务，而且还搞生产，比如开粉房等。这种合作社今天搞得更好，有经济基础，虽然小，但不会跌跟头。所以我觉得边区办合作社，应该是这样一个方针：以小型为主，以群众需要自己办起来的为主。还要整顿发展，还要办。

六、谈一些工业问题，就是发展工业，建设工业的问题。边区要逐渐发展工业，这是朱总司令讲的。事实如此。我们现在要积累资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上半年不能搞，下半年搞，今年不能搞，明年搞，现在只能以我们现有的基础与可能来办几样就对了。要继续办好我们现在的国营工厂。对我们现有的国营工厂，不是要它关门，而是要它继续办下去。比如火柴工厂、石油工厂、纺织工厂、皮革工厂、军工工厂等六个工厂，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把它办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合乎我们今天的方针的，也是合乎今天边区发展经济的趋势的。这些国营工厂我们要坚持办好。各分区也可以办一个工厂。现在边区的工厂都集中在延安，但从边区的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等情况看，各分区也应有办一个工厂的计划，按当地可能发展的条件确定办一个什么工厂。如果我们只是在延安计划搞这个工厂，搞那个工厂，我看将来是不大合算的。在各分区搞一个工厂，作一个基础，将来继续扩大。比如警备区，可以搞一个纺织厂，和那里老百姓的手工业纺织结合起来，老百姓纺线，我收你的线，收来就织布。我看这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研究，看可不可以。比如关中分区，那里有做纸的材料马兰草，很多，我们可以搞一些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那里搞一个纸厂。三边的皮毛很多，可以搞皮革工厂，肥皂也可以搞，那里有油和碱，可以就地取原料。各分区的党政领导机关要把这个事办好，就是说，全党的同志要有搞工业的思想。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讲，要把这个问题看得远一点，要坚持下去。要把国营工业搞好，就得改善企业的管理。我们现在不能到外面人家的工厂中去研究学习管理经验，我

们为什么不可以组织几个人，在延安研究我们的工厂企业搞得好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呢？应在研究中搞出一个方案来。同时现在边区的工厂要贯彻企业化的方向，改善劳资关系。也就是说劳资双方要合作，厂方和工人方面要合作，厂方和工会可以组织委员会，共同订出生产计划，共同为实现生产计划来奋斗。所以今后工会的工作主要是如何来发展生产。对于私营工厂，我们的一些工人，不能过分强调工资，如果把工资提得很高，工厂搞垮，就连少的工资也没有了。对私营工业，我们今后应大力地扶助，而不是不管。在工业这方面，我们要有远的眼光，我们要特别去注意节衣缩食，积累资本。应该使全党和全边区的人民认识到，这样做是与今后的经济大发展有益的。

陕甘宁边区形势及 加强备战问题

(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

(一) 要不要备战？

在全国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10]处在不打不和的局面下，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相对的和平局面。这里抗战以来就没有什么大变，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有利变化以及边区所处特殊环境所致。但今后这种情况就不一定原样不变，如果全国形势发生急骤的变化，蒋介石下了“讨伐令”^[38]，或者中原部队^[39]突围的影响牵连到边区，边区是可能发生战争的。

首先从内部来看。在群众中存在着普遍的对保卫边区无信心的现象。我来警备区^[13]后，一些老先生对我说：“群众中传说很多，说中共要走，要离开边区，由二十二军^[40]来接防。”这种传说很明显的是一种恶毒的谣言，却普遍地存在在群众心里。还有些群众（主要是地主阶级）盼望着国民党来，群众中“究竟依靠谁”的认识是糊涂的，这许多现象是非常危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险的。特务分子在政协会^[41]后，一周中曾徘徊不定，不知所措，过了这个时期即大搞了起来，配合着边区内部破坏分子，企图在机会到来时进行复辟。我们要胜利就要和边区一百六十万人民密切地结合起来。但在我们本身存在着很多弱点，发生许多脱离群众的思想 and 行为。军民关系上一般地说来比一九四二年时要强，可是在个别事情上如体罚群众，这是万分严重的。我们的广大的民兵，尚未普遍地健全地动员和整训。许多情况都说明我们本身存在很多空隙，利于敌人进攻，而不利于我方自卫。故全体人民和干部，应高度警惕起来，加强我们的认识和工作。

其次是外部情况。在军事上蒋介石在加强防御，调兵遣将，无论正规军、地方军、自卫军都这样做。在政治上发动反共宣传，在陇东举行各种各式反动的街头宣传，来造成进攻边区的社会舆论。在经济上则运输弹药，囤积粮草，在各地布置恢复补给囤粮区域。

在表面上看来是防御，而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我们针对敌人的进攻来作防御，就要有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并能够很快地把他们打出去。倘若我们不能深刻认识此点，就会吃大亏的。因之，“争取时间，积极备战”已成为当前我们的紧急任务。

（二）有没有时间备战？

根据现在边区外部情况，敌人还没有按其计划布置就绪，兵力不足，北线不巩固。北线曾要胡宗南^[42]增派军队，但胡始终抽不出队伍来，北线不巩固是他们重要的弱点。抗战以来北线曾数易长官，但均不得逞而走，而傅作义^[43]在今天还

没有力量增加实力。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全国内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前，敌人尚不可能冒险进攻。敌人知道陕甘宁边区是块难啃的骨头，搞不好，就会碰掉自己的牙齿的。因之，我觉得在两三个月内不致发生大规模战争，只要大家清楚认识到这些，紧急地动员起来，我们还是有时间来准备自卫的一切力量。今后的一时一刻，都是万分宝贵的，只要自己准备好了，什么严重情况到来都不怕。反之，睡两三个月的觉，那我们就会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失。所以今后的中心关键就在于不浪费一刻时间，在这两三个月内加强准备自卫。

（三）什么是当前的备战中心？

所谓备战决不是只限于准备后方，紧缩机关，轻便行装。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为加强准备巩固内部，具体工作如下：

（1）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后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一切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今年警备区收成很好，夏田平均在七八斗，主要的还是要靠秋田，看起来雨水均匀，有丰收预兆，如抓紧时间领导群众好好锄草，收成不会减少的。有了吃的，军队才能打仗，民食也解决了，可以使战争胜利。

（2）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练兵，更为重要。只有任务明确，纪律严明而与广大人民有联系的军队，才能百战百胜打垮敌人的任何进攻，达到胜利保卫边区的目的。

（3）加强整训民兵。为迎接新的形势，我们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中心动员和

精心的组织工作。不是一般地搞，而是要具体抓住中心，分别在城市与边境公路线组织一定数量的民兵，下功夫苦练。要挑选大批有军事知识坚强的干部到民兵中工作。各级民兵的指挥机关应迅速坚强地建立起来，装备民兵，扩充民兵武器，加强步枪、爆炸技术的训练，使人和武器结合起来，人和技术结合起来，并开展更为广泛的群众性运动。

尚有其他内部工作，但上述三项是最主要的，另外，要教育干部，克服悲观情绪，巩固党内团结，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要教育群众，使群众对目前时局和政治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在巩固的基础上开展国民党区的工作，提倡高树勋运动^[44]，曹又参运动^[45]，欢迎国民党部队中不愿意打内战的官兵起义参加革命。只有发展才能巩固自己。我们总的任务是巩固自己，保卫自己。

上述备战如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完成，即等于我们胜利地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见我们准备得好，就不敢轻举妄动。

（四）边区的前途。

陕甘宁是老根据地，是党中央所在地，有经济基础，群众有斗争经验，群众和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一块土地是不允许敌人占领的，也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在中国没有了八路军^[1]和共产党。只要我们还存在一人一枪，就要战斗到最后。这个道理要给全边区群众讲清楚。

我们有条件，有信心保卫边区，敌人的多少次进攻准备，都被我们压下去了，只要我们不失掉今后两三个月加强自己的准备，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边区。

边区是不会在敌人进攻之下越打越小的，而将是越打越

强，最坏的前途也不过是“得此失彼”，是小换防，而不是大换防。只要大家努力，边区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¹⁰⁾的自卫战争到现在不过两个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除了消灭胡宗南⁽⁴²⁾的三个旅之外，边区各地的人民自卫斗争、游击战争都大大小小地得到许多胜利。今天的祝捷大会，就是我们两个月胜利的总结大会。这两个月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

胡宗南进攻边区，妄想很快地就把边区侵占掉，把边区一百六十万人民踩在脚底下。他这个妄想已经被我们这两个月的坚决斗争打垮了，这两个月的胜利证明我们陕甘宁边区完全有力量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有力量消灭胡宗南。

卖国头子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到处失败之后，企图最后挣扎，便把胡宗南这最后一宝搬出来打陕甘宁边区。但是并不能吓倒我们，我们是吓不倒的，只是越发证明他们就要很

-
-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后，在四十五天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四千余人。五月十四日，边区军民五万余人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这是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的习仲勋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

快的崩溃，很快的完蛋。胡宗南匪军侵入边区，破坏了边区的和平生活，使边区人民遭到空前的磨难。胡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他们完全像禽兽一样，经过胡军蹂躏的地方，一片凄惨，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我们一定要很快地讨还这笔血债，消灭胡宗南！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

今天这个大会完全揭穿了两个月来敌人的造谣。他们说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边区政府也走了。”这只是敌人说梦话。边区人民离不开他们的民主政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已经是血肉相连。边区的党和政府统统始终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共同奋斗。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边区领导着我们。我们有着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我们更加信心百倍，更加勇气百倍，一定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干净。

边区部队同志们：更加发扬勇敢精神，更加提高作战技术，更加严整纪律，紧密团结群众，继续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从蒋介石军队中解放出来的士兵同志们：你们都是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参加人民解放军，热烈欢迎你们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手携手地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游击队民兵同志们：更加广大地开展敌人侧后游击战争，更加积极地袭击敌人，围困敌人，坚持和敌人斗争，保卫自己的土地、牛羊和家庭，配合主力军

歼灭敌人！后方工作的同志们：更加紧张地工作、生产，更好地完成每一个人承担的任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农民们：加紧春耕，抢耕抢种，多打粮食！工人们：加紧生产，多造军火，多造手榴弹、地雷！前后方一致努力，为消灭胡宗南而奋斗！全边区的青年壮年：踊跃参加军队！全边区人民都要向吴满有⁽⁴⁶⁾看齐，既做劳动英雄，又做保卫边区的英雄、参战英雄、民兵英雄、歼击敌人英雄、战斗英雄！边区共产党员们：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紧紧地团结人民，坚定地带领人民去和敌人斗争！

消灭胡宗南！

保卫边区！

西北人民解放军万岁！

边区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关于陕甘宁边区 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

(一)毛主席报告^[47]发表后，获得党内外热烈拥护。干部中正展开讨论，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48]的老区^[49]，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首先是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还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当然亦有特殊现象）。如再平分，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主席一月九日回复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民问题为有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得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可能在三种情况下发生错误：（1）把新升富农评成旧富农。（2）把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当真转化，并参加劳动最少在八年以上的，又订成地主、富农，再去斗争。（3）把富裕一点的农民，订成地主、富农。或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动力者，也订成地主、富农。如果再去斗争已经转化了的地主、富农，对农民的观感，就等于再动已分得土地的贫雇农。这在老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慎重处理。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光看表现，不一定合理。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老区的群众，就是发动起来后，也不会在运动的形式上有新区那样的轰轰烈烈，这是由于老区的许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如崔区⁽⁵⁰⁾有些乡村没有地主，硬去制造），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从几位同志的汇报中，知道陕甘宁边区⁽¹⁰⁾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三）绥属⁽⁵¹⁾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如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

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再就是普遍的冷淡中农。斗争地主不让中农参加。即贫农团的组织，亦缩小在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其风气，不是中农被坚决联合，而是到处给中农以精神上的很大威胁。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因此，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开展，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枣林坪四乡安沟村的马受材是一个贫农党员，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区军事部长，在全村贫农中威信很高，都要选他当贫农团团长。派去的工作团同志，只强调在运动初期不能让能说会道的人参加领导，便在评成份中故意把他评为下中农，连贫农团也不能参加。这是一种代替包办方式。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好党员，仍应坚决吸收其参加工作，否则，就易产生形式主义。又如在贫农团、农会中，要保证选谁负责，也不能包办代替，主要的，要在本人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条件上来保证。实际上就是该人本身，就应具备当选的条件。否则，就是包办代替作风。也就是形式主义。这是运动初期很普遍的现象。

（五）许多地方，发现群众自发运动。实际上，这是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的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大部是旧干部和地主、富农领导的），让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故对此种自发运动，应很快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领导，以至完全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而引向正确的发展。如无力顾及，就坚决制止。这种制止，十分必要。因是打击不良分子

的破坏，而不是给群众泼冷水。这对将来继续发动正确的群众运动，毫无妨碍。

要注意克服土地 改革中“左”的情绪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

（一）十四日晚回义合⁽⁵²⁾，十五、十六两日开西北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会议⁽⁵³⁾精神，求得领导上思想一致，并按陕甘宁边区⁽¹⁰⁾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规定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免得多走弯路。十七日召开边区级干部大会（六百四十人），传达毛主席报告，继即召集边区一级参加延安川⁽⁵⁴⁾、义合两区土改之九十名干部开检讨会三天，为的求得中央精神首先在这两区贯彻，再去推动警备区⁽¹³⁾其他各地。

（二）遵照九日指示，明芳⁽⁵⁵⁾去延属，文瑞⁽⁵⁶⁾去三边⁽³⁷⁾、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拟于日内动身。为更密切地指导各地土改和救灾，切实克服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特通知

-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于一月二十日转发习的来电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各分区和县负责同志经常分散下乡，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这种方法，既可提高领导，又可加强工作，为真正地树立一种踏实朴素的领导作风而努力。

(三)由于义合会议⁽⁵⁷⁾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⁵⁸⁾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今佳县）。有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⁵⁹⁾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葭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⁶⁰⁾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⁶¹⁾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现在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已经下达。各地正在转变。估计几日内就可全部走上轨道。

(四)我感到边区土改仍有下列问题值得注意：

(1)土地革命地区⁽⁶²⁾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但要改变成份那是很不容易的。此外，现在深入考察起来，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

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如不从坚持贯彻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的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2) 在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即减租地区⁽⁶³⁾，也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如不看到这个情况，必犯重大错误。如绥德的延、义两区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参加七年以上的劳动，其中有的还保留有多量底财或浮财。应该只将其保留的多量底财与浮财，分配给农民。其成份，应按现在情形改变，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3) 在老区⁽⁴⁹⁾，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是地、富成份下降但还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出的乱子就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因之，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4) 不应再算老帐（特别是政治上的）。过去党的政策，对这些坏人，只要他诚心悔过，不究既往。十年以来他们的确改好了，如把旧帐一齐翻起，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影响传播出去，更对我不利，故决定政治上不管重大或轻微旧帐，都一概不究，只对那些今天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或帮助胡匪⁽⁶⁴⁾作恶的，应发动群众严厉镇压。这才是正确地维

护党的政策。否则，会减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5) 只有死心塌地跟敌人走，做敌人忠实走狗的，才叫做投敌分子。否则均采用感化争取政策。

(6) 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真正霸占一方，欺压群众者是恶霸。不能把在乡村说话好强的，或曾砍倒别人一棵树，或做过其他一二坏事的，统按恶霸惩办。也不应该丈夫是恶霸，把妻子也当成恶霸，甚至连小孩也当成小恶霸去斗争。这都会造成许多恶果的。

(7) 老区因土地早经平分（有些地区甚至分过三四次），今天多数还是再加调剂问题。这些地区群众对民主与负担公平，要求更迫切。往往一开始便要斗干部。

(8) 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积极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诉苦斗争，也不应准备一套形式进行。把诉苦教育贯穿在土改的一切问题上，并把反对胡匪对边区人民利益的破坏和蹂躏与诉苦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这更有其真实意义。

(9) 救灾，各地已真正重视，且均采取细密组织与切实负责，由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这已开始产生了新的作风。救灾不至成为难事。

(五) 上述各项问题，连同以前报告，中央如无不同意见时，准备发一文字指示，把一些重大问题明确起来。

关于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 给毛泽东的复电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一) 二月六日指示悉。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我们已深感过去两月来土改与组织贫农团、农会，不仅收效不大，反而增加麻烦甚多。陕甘宁边区^[10]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的老区^[49]，在去年十二月义合会议^[57]前，土地都大体上平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土地革命地区^[62]，地主、富农过去漏网的是极少数)，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大部或全部中农的土地，甚至还要动百分之十贫农(户数)的土地。要分给的是一部分很少或无地的移民，或倒给地主、富农补进不足

-
-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泽东主席将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三种不同情况的地区，在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的初步意见电告李井泉、习仲勋等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习仲勋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复电。

的土地。这会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我们虽于月前开始转变，但工作还未全部走上轨道。农民虽已开始注意生产，但还不是思想上最后解决问题。其原因，就是有些地区工作团同志，仍坚持组织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事实上，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因为贫农团本身很复杂。有的因为过去分的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不能发展；有的因为偶遭灾祸下降；有的是地、富还未转化；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中农“欢迎地”^{〔65〕}，贫农不要地。在运动中犯“左”的错误的地方，甚至贫农也恐慌。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借贷、买卖、租佃、雇佣等关系，都停止了。土地再平分，农民都感到把农村圈死啦。真正劳动的贫雇农，也抱怨我们给他们造好多困难。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于生产，在农村，那倒是中农领导贫农。至于起领导作用，那又会变成少数不纯分子把持村、乡政权。因此，我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平补，再不能实行平分。贫农少的地方（在陕甘宁边区老区，有很多乡村，就很少有贫雇农），不组织贫农团。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农村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在中农同意下，吸收其当选农会会长。政府村乡长，主要的吸收中农中公正积极分子做这些工作（因有很多中农就是以前

的贫雇农)。老区的农会及政府委员会中，必须有贫农地位，以其占三分之一为适宜。老区的农村支部，经整党后，仍应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否则，将会发生农村工作混乱现象。

(二) 边区的老区，地主、富农可一般的不扫地出门（其过去分配彻底者，后由自己真正参加劳动者，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应不因其过去是地主、富农而再动其一部或大部）。没有这一条，下面同志就可作出许多麻烦。一是乞丐增加。二是实际等于肉体消灭，逼得一些人铤而走险。

(三) 在老区，群众不论贫、雇、中农，普遍要求的是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支部包办，负担不公平，故民主与土改生产结合，此是边区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一年来战争频繁，负担奇重，如义合一乡，去年交公粮将近五百石^[66]（比往年多两三倍）。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请中央注意。我拟再作研究后，发一关于农村合理负担指示，改正这一偏向。详情后告。

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

在老区^[49]我们已有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领导上只要能抓紧组织，注意改变作风，全党同志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则各项工作，便能逐步向前进展。但在新区，则情形完全两样。五月以后，西北局便以很大力量注视新区的工作，我们虽然派出了大批干部去新区，领导上也很密切地注意，但执行政策上所产生的毛病仍然不少。基本原因是陕甘宁边区^[10]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现拟提出以下问题，请示。

(一) 蒋管区广大人民，不论任何阶层，在去年八月以后，对我党我军态度，比以往好得多了，就是一些中上层分子，虽仍有议论，但这些议论已不像过去以和反动分子特务一样的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报告。中共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并于七月二十四日将这个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

口气，中伤我们。有批评我方缺点者，都是愿望我少犯错误，迅速推进革命胜利。甘肃情况亦大变。陇东甘边一带，听说是共产党八路军^[1]，百姓都争着来掩护，甚至一些过去反共的分子，也多极力表示好感，或帮助掩护我方人员，这确是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特别是甘肃如此。又如上月我路东四支队^[67]在白水被围，两次突围未果，后发现城西北敌方士兵朝天放枪，又有数人挥臂西指，乃由此突出得脱。这些均是我军力量壮大的影响，而最主要的，是我党各项正确政策实行的结果，也就说明坚决贯彻中央政策的重要。蒋管区群众普遍的顾虑是我们能不能照宣布的政策办事到底，怕中途改变。这主要由于老区过去政策上犯的严重错误影响所致。西府（即泾渭^[68]间）距边区较远，群众情绪一般安稳，对我军热情欢迎。黄龙则较差。中农以上，都怕我们以后斗争动刑，传言共产党要组织石头队、杠子队，要搞清算斗争。其中固然有特务故意散布，但老区出了“左”倾错误确给了口实。故求得老区再不犯政策错误，是顺利建设新区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蒋管区另一情况，为我们长期忽视者，即农民生活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无法活下去。黄龙、西府农村中，一般小农经济，都很发展。洛川中农户数，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民生活据我初步了解，甚至比之边区战前的水平不差上下。这并不是说那里人民就不需要革命了。他们对蒋、马^[69]抓丁、要粮、派款和贪污、特务统治，仍是恨得很，只要我之政策对头，就可以在解放后建立起很好的民主根据地，但我们思想上要去掉过高依靠客观条件的错觉。抗战期间，敌寇没有打进潼关，陕甘两省农村生产未遭大的破坏，壮丁也

出的不多，这次内战一年多又是在边区打，对蒋管区的破坏也不大。这较之十年烽火不息的中原和晋绥^[58]等区是不相同的。故我军进出这些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此次麟宝战役^[70]，我军这方面做得好，凡安置在民家的伤病员，简直无损失，西府人民仍盼我军麦收后再去。

（三）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趁敌人混乱，用大力清查特务，肃清土匪（但不是乱捕，而是经政府与群众结合瓦解分化，以至肃清之），力求缩短社会混乱时间，迅速安定人心，然后才在较巩固的条件下，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如果我们不分先后缓急，没有步骤乱忙一通，就会把混乱时期拖长。黄龙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混乱时期长，人民损失便大，对我今后经营这一地区，也增加了困难。新区人民要求很快转入安定，盼我们指示出一套办法。兹就黄龙这时期工作中几个问题一述所见：

（1）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毛主席致邓电^[71]已指出不利之处。韩城解放之初，即提出“快定快分”，结果真正贫雇农并未得到若干果实，而乱打、乱斗、扫地出门十几家，弄得许多人逃走，恶果不小。因无充分准备，群众未觉悟，党的力量又不强，特别急于搞土改，反易为流氓分子所乘。现在新区以至蒋管区地富不是怕分地，而是怕乱打、乱杀、乱扫地出门。许多地主愿将土地拿出来，只望不乱斗，不打死。黄龙已决定一两年内，仍实行减租减息。就是靠边区的地区，也要看大多数群众觉悟程度如何，再定土改与否。群众反映

“停租废债”口号，把农村搞死了，需要取消。黄龙区有大量荒地，规定公荒谁开归谁，私荒开垦三年不出租。经此番改变，社会人心安定了许多。但仍有地主要献出土地者，我意可由政府接收，调剂给无地农民，否则地主不安。等到将来再去斗争也不策略。是否这就是恩赐观点呢？我以为不然。既能如此，有何不好。过去对这些问题认识上有缺点，党不能从群众全面长久利益的观点去了解问题，总以为形式上的斗争都是革命的，其实是极不策略。

(2) 黄龙共解放九个县城，一般进城政策都还搞得不坏，洛川尤为成功。洛川长久为敌特据点，敌退走时，全城居民逃避一空，我军进城当天，城内只有三个市民。我入城即组织进城委员会，统一管理城市，宣传纪律，设立纠察队维持秩序，城门封三留一，只准城内人回去，不准乡间或其他人进来。商号如无人看管者，均由政府封起，非本店人不得出入。公共物资收集交政府，民间寄藏的敌方物资暂时不动。同时进行必要的救济慰问工作。结果秩序良好，商民无损失，三日后城市开放，全城商人居民不几天均陆续返回。这种办法是对的。目前问题是每城均有数百小摊小铺要失业，纸烟无人买，饭馆少人去，每日所赚不足糊口。黄龙等九个县城的摊贩，共约三千多人，基本办法是：组织这批人转业生产。一般的大商号，连收复后的延安市在内，亦均日趋萧条。主要原因是：敌军在时，购用消费品多，我军到后，要向市场购买者少，加之乡村灾荒，农民购买力不强，消费品销不了。现在方针，应是如何加强发展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其繁荣的基础就会真正地稳固起来。

(3) 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过早地搞选举，好人不出来，坏人反易乘机混入，如此等于把政权交给一批坏人，给坏人合法地位。黄龙乡村政府中有的地方百分之六十是旧保甲⁽²⁾人员，现在注意改造。故新区建政，有党组织的地方，可发动党组织的力量，召开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无党组织的地方，一律暂行指派，俟半年之后，再实行普选。至如西府等地我军过后不能巩固者，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

(4) 黄龙敌保安警察土匪武装共六千余，先后经我军事消灭，政治瓦解，现已进至肃清阶段。剿匪若不配合发动群众，单纯军事清剿，越剿越多。我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处理，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等政策，匪势便形单薄，不久即全部消灭。民间枪支，在解放初期，仍应由政府协助收存，此为最妥办法，等群众组织起来后，再交回武装群众。原规定只登记的办法是不完备的，仍给特务活动留一便利条件。

(5) 新区财政工作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黄龙解放后，三个月未收税。合阳十个市镇，每日可收二千万敌币⁽⁷²⁾。韩城进口税，每日可收一亿农币⁽⁷³⁾。白水六个煤矿公司，其中一家每天可收六百万敌币。这笔损失很大。最近方派人办理。韩城县即月收三十亿农币（主要是出入口货税，营业税已免）。今后新区解放后，税收一律维持原状，由原税收机关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俟我有力管理时，再去接收，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征收公粮实行合理负担，其办法已有电报中

央，甚为群众欢迎。

(6) 新区学校教育政策，开始时注意不够。一切都想由我们另行办起。但又办不起，只好拖延置之，这对内外影响都不佳，以为共产党只会破坏，不会建设。故对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教职员除其中职业特务外，均应一律争取仍旧供职。我则先办好一处或几处，逐渐做到全部改造，不应多增加公费生，但也不要减低教职员薪金，尽量维持过去标准。黄龙完小以上学生，大部还是农民子弟，改造好了就是将来的后备干部。对他们的改造，思想上要严肃，方式上绝对禁用整风坦白一套，他们也最怕这一套。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⁷⁴⁾员，不规定登记手续，如此更容易从思想上争取改造。他们无顾虑，就减少了抗拒性。这种方针，已在黄龙各县短训班（已有千余学员受训）经验中，证明是正确的。

(7) 对统一战线方针，许多地方忽视了，把中上层分子不加分别一概不理，使新区工作中阻力很大。像洛川士绅有三派，一为蒋党党团派，党政军权全在这批人手里，应是坚决的打击对象，打击他们可得全县人民同情；一为地方派，他们只要能混饭吃就行了，群众对之尚无十分恶感；一为在野派，当然无职位，又受党团派的压迫，对我解放洛川表示赞助。后两派和党团派矛盾很大，统可争取与之合作，只对其中个别为群众痛恨的恶霸，才可发动群众斗争。其中的公正人士，尚可吸收参加工作。这样就会更加孤立坏人，和特务作斗争，就更有力量。但党的这一总方针，偏为今天新区同志所忽视。在今天，我党不断胜利的形势下，敌人阵营内发生

很大分化，确有很多过去反对我们的人，今天都表示愿向我靠近，我们如不主动地吸取过去经验，做好这个工作，这简直是错误。另一方面，黄龙地委不敢放手让群众斗争最坏的乡保长，结果群众自发去斗，反使人心不安。这又是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另一偏向。

总之，从上述问题中，我总感觉到新区执行各项政策上仍犯有“左”的错误，如能在党内思想上彻底克服此点，那么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去战胜敌人。

(四) 今年来，前后派出新区和蒋管区干部近千名。其优点，是都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其缺点，则是作风简单，好凭感想代政策。尤其是在今天胜利的局面下，深感这批同志理论水平惊人薄弱。老边区出去的，大都背有自满包袱，往往阻碍自己进步，在新区新的复杂的事物面前，显示一切不足，但他们却骄傲，表现为执行政策严重的不谨慎。老区干部出去，不仅错误的作风应该改掉，即是那些在老区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能完全搬去照办。前者易纠正，后者即所谓新区工作中的老区作风，不容易说服同志注意。总之，不创造一套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要贯彻党在新区的正确政策是不可能的。现正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来克服上述缺点。

(五) 义合会议⁽⁵⁷⁾后，党的队伍，是比以前整齐了，党内思想，已不像以往那样庞杂了，党的政策，已被各级党委重视。如不久前，延安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以及三边⁽³⁷⁾、陇东对敌占区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的加强，都因端正了政策，而工作也都转变了。过去由于乱捕、乱没收，把这些地区造成

赤白对立，武工队、游击队出去活动，不是受打击，就是遭歼灭，形势十分危殆。现经转变，虽仍旧是敌占区，但群众人心向我，游击队也显得神通广大，没有主力也可把敌严密地制服住。这给各地领导同志的教育是深刻的。也有个别同志尚不觉悟，还不知道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仍有在一些方针问题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甚至执行自以为是的的东西，向党闹磨擦的事情。新区这种情形更严重。如黄龙一些错误措施，西北局事前不知道，不是他们自决自行，便是做了再报。黄龙各县随便颁发宣布施政方针的布告，甚至擅自更改上级的决定，任意捕人，自由决定土改方针和制定各种政策。此种极恶劣的自以为是、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是严重的，决以大力克服，拟在七月十七日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上展开讨论，力求转变。

以上意见有无错误，请示。

关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的 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

(一九四八年七月)

—

在最近半年内，陕甘宁边区^[10]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是：党内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整顿，完全改变了战争初期那些混乱状态；在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和开展新区工作上，均有显著成绩，因而有效地帮助了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并继续将战争推进到蒋管区去。同时，在基本区六十万人口的地区，发动了群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这是与去年十一月间召开的义合会议⁽⁵⁷⁾分不开的。这个会议之前，在战争与土地改革工作中，已经逐渐暴露出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着若干严重现象：许多地方，经过十年和平生活，满足于现状，阶级观点模糊，长时期群众工作薄弱，对敌斗争思想准备不足，党和政府组织内存在着作风不纯和某种程度上成份不纯，许多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军队中尚有军阀主义残余，使党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的政策和统一领导不能很好贯彻，以致造成了工作中的不少损失。在这个会议上，彻底地将这些离开党的路线政策的严重现象和右倾思想揭发出来，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依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决定了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认真进行整党工作的方针，并在各地坚决执行，使党在思想上、工作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陕甘宁边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如果没有这个会议，会妨害争取战争胜利。这个会议的缺点是，在土地改革工作问题上，没有按老区^[49]、半老区^[75]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的工作方针，以及没有提醒大家防止“左”的倾向。这些缺点曾使以后工作中走了一些弯路。各地在土地改革工作初期都犯了若干“左”的错误。但不久我们便在中央指示下，依据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规定出具体工作方针和若干具体政策，改正了义合会议的缺点。不过一个多月，各地“左”的偏向都得到纠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上纳入正轨。而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对于解决老区、半老区的土地问题，便获得丰富的经验。正因为我们有了这些进步，今天就有更便利的条件，正确执行党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的指示^[76]，在基本区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普遍进行整顿农村支部，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加强新区工作，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二

陕甘宁边区有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三种地区。接敌区

和新区应以对敌作军事斗争为中心任务，今年不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区包括老区、半老区的大部分（老区、半老区尚有一部分如三边^[37]的定边、盐池、安边，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等尚为敌人占据），或者经过一九三七年以前分地，封建的土地制度早经消灭；或者经过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77]以后的土地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亦已基本消灭。不论今春经过调剂土地与否，均应不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而在今年秋冬两季，以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中心；今春调剂土地中“左”倾错误尚未全部改正的则必须认真改正，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则配合调剂土地，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农村党的支部组织，建立乡、市、县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府委员会，以及调整农业税负担和加强支援前线工作，迅速将工作方向转入团结农村一切人民，准备和发动明年大生产运动这个基本任务上去。按照基本区内不同的情况，解决土地问题时应采取不同步骤进行工作。

（甲）经过今春调剂土地的地区，即绥德分区的大部和延属、陇东、三边分区各一部，土地问题已彻底解决，但今春工作中错误处理的问题尚未全部改正。此类地区，在继续改正错误后，即应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改正错误必须认真，哪怕只余个别问题也不应马虎过去。一切被错定成份和因之错受打击者，其成份应立即订正；其被错误没收的土地、财物应予退还或适当补偿。工商业被错误侵犯的，同样应予补偿。被错误打死或逼死或弄成残废者的家庭，应由政府适当抚恤。某些地主、富农留给土地、财产过少的，亦应调整补足其应得的一份，或者从其他方面解决其生活和生产上的问题。退

还或补偿错误没收的财物时，一方面要照顾被错斗户的利益，一方面又要照顾贫雇农的实际情况，决不可硬从贫雇农那里，硬要退回所有分配了的财物。如果被错斗户生活确有困难，还可以从负担和农贷以及其他方面适当照顾，如分年减征公粮或多借一部分农贷等。至于今春调剂土地中抽动中农的土地，已经取得本人同意且未因抽动结果致其土地不足自力耕种的，即不变更，否则应酌予退还。因退还错误处理的土地致分配上需作调整的，自应进行必要的调整。个别村、乡打乱平分动及很多中农甚至贫农的土地致多数人不满意的，还应按照正确政策重新调剂。进行改正错误时，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召集他们开会，讲清政策，并展开适当的自我批评与批评，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消除隔阂、加强农村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商量解决办法，避免片面处理，并防止少数人挑拨报复。

(乙)经过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以后的土地改革但未经今春调剂土地的地区，即绥德分区的小部分和延属分区的富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在去春分配土地时，地主、富农留了较多较好的土地，或者分配不公，某些干部党员或其他人得了较多较好的土地。此类地区，应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适当抽补调剂后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抽补调剂的重点，应放到抽出地主、旧富农所留多出人口平均数以外的土地和改正去春分地不公现象上面，并应从公地、黑地等着眼。对于一部分中农多余的土地，必须在取得本人同意和不损害其原有经济地位的条件下方能抽动，决不可勉强。对于由贫苦农民在民主政权建立后上升为新富农的，待遇和中农相同。对于由地主、

旧富农转为新式富农的，可抽出其自力耕种以外多余的土地，但不要动其其他财产。调剂土地时，实行先抽后补，依据抽集土地多少、好坏、远近，按照贫苦程度，搭配补给地少、地坏或地远的农民。对于二流子，应在分给土地时，经过群众给以批评教育，监督生产，并不准其任意出卖土地。凡过去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充分地发动群众，使尚存在的土地问题获得使群众认为满意的解决。至如镇川^[78]、横山和葭县的一部分地区，灾荒尚未完全过去，今年则不进行调剂土地和发土地证等工作，而集中力量去救灾和恢复生产。

(丙)经过一九三七年以前分地但未经今春调剂土地的地区，其中延属、陇东、三边和关中分区各一部地区，地广人稀，一般过去分地比较粗糙，公地荒地很多，分地后移去的移民约占户口百分之三十上下，多数未得土地。此类地区，应注意给移民调剂土地，并重新登记土地，发给土地证。这里调剂土地主要应从公地、荒地着手，此外还可从清查旧日地主、富农分地不彻底和过去老户登记土地以多报少的土地中，抽出长余土地，解决移民的土地问题。在抽动老户长余土地时，必须照顾其现有人口和耕种能力，并按当地耕作条件留给足够轮种的土地，长余很多的才去抽动，否则不动。对于从某些农民中抽出的土地，还可由政府或得地人付以适当代价。这些地区内的大荒山、大森林，原则上应收归公有，并应由政府加以很好管理。但有某些林地，曾为当地农民占有，费工保护培修，且为数不大的，可承认其所有权。至于绥德分区一小部和延属分区的子长、延川、延长等县地区，地狭

人稠，过去分地比较彻底，公地、荒地极少，只有少数人或者是分地时不在或者是以后把分得的土地卖了，或者是后来移去的移民缺地或无地。这些地区，则只应在重新登记土地发土地证中，以公地、黑地、绝户地等，作个别调剂。其仍有少数人和移民土地问题不能解决的，则应组织移垦或经营副业等多方面去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此外某些地区过去分地后，窑房的分配长时期未确定所有权的，可依实际情况登记确定之。又如延安、甘泉等地，敌占期间有某些旧日地主、富农非法夺去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应发动群众无条件地收回。对过去出外现在归来愿守法安居的地主、富农，则应另行调剂给和农民同等一份土地，使之获得生活和生产上的出路。

以上确定地权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认真发动群众，经过群众充分讨论，取得绝大多数人同意，不能由少数人包办。关于登记土地和发土地证各项事务，可由农会协同当地政府和上级派去的干部组织土地登记委员会办理之。原有农会应首先进行整理充实，原无农会的即组织之。农会委员会中，在老区一般的中农和其他劳动分子应占三分之二，贫雇农占三分之一；在半老区，则贫雇农应占三分之二。

为了正确解决土地工作上的问题，对于各阶级的划分和待遇，应一律以中央公布的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和弼时^[79]同志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为准。这里并就陕甘宁边区具体情况补充作下列一些问题的规定：（子）民主政权成立以后雇用长工或短工，地广人稀地区的安庄稼^[80]或伙种，劳动分子（包括新富农在内）以当时当地通常利息放帐，

均不要作封建剥削论。因为这些在一定条件下的雇工、安庄稼、借贷等，即在现在的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如果加以打击，反于群众不利。（丑）西地区的份喂牛羊，在现在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畜牧，也一般不要当作封建剥削去打击，只对份喂条件过于苛刻的进行合理调处。但在土地剥削上构成地主或富农成份的人，其牛羊牲畜则依地主、旧富农财产处理。（寅）确定地权后，所有人民中间雇用长工或短工、租佃土地、安庄稼和伙种、份喂牛羊以及互相借贷，在政府法令所规定的原则下，允许继续存在，并受到法律保护。（卯）新、旧富农的区别：富农中间，仅有雇工剥削或其他非封建性剥削而没有或很少封建剥削（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等）的，是新富农；反之，封建剥削很重，占其剥削收入一半以上的，则是旧富农。

三

农村整党工作，去年以来仅在少数地方试办，未曾普遍进行。依据各地了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过去工作中，一般都完成了任务。但由于领导机关长时期对支部工作缺少检查和具体指导，对党员在实际行动中的思想教育异常薄弱，许多干部和党员发展了强迫命令作风和自私自利思想，党内生长了和混入了一些坏分子，存在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今年秋冬两季，必须在基本区内完成支部整理工作，以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整理支部组织的重要步骤，是采取党员

和党外群众代表结合开会的方法，审查干部和党员。其过程如下：事前在党内外说明整党意义、政策和方法，公开党的组织；先由党内开会，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支部和每个人的工作，彻底揭发各种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使大家认识错误何在和如何改正错误；然后请群众选派代表参加党的会议，尽量提出批评意见；再依据群众意见，在党内作进一步的检讨，决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办法；最后又和群众代表共同开会，由干部和党员作自我批评，并宣布对犯有错误的人的处理办法，征求群众意见，同时表扬好的同志和吸收新党员入党。此项审查工作应由区委和上级党委的代表直接领导，但需经过原有支部进行。工作一开始，便必须首先注意团结支部内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作为骨干，经过他们把其他党员和一切可以教育改造的犯错误分子都团结起来。同时严格防止农村党内外那些旧有的宗派纠纷利用整党来作无原则斗争。在检讨工作中，上级领导机关代表应作必要的自我批评，说明领导方面的责任。对干部和党员所犯错误，亦应把那些属于领导方面负责的和那些应由犯错误者自己负责的问题区别清楚。如此才能使自我批评精神确实贯彻下去，使党内外群众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在处理干部和党员的问题时，必须采取谨慎严肃态度。对于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应当坚决清除出党。对于个别作风极坏、为大多数群众憎恨的分子，亦应开除党籍。犯有重大罪恶的，还应送交法庭审判。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和党员都应给以应有和公平的处理，但一般则不要处罚过多和过重。如果群众激于一时气愤，要求过多或过重的处罚一

切犯错误分子，也应向群众作适当解释。总之，这样整党的结果，务使所有干部和党员的问题都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迅速提高觉悟，真正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党外群众受到教育，加强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团结。支部经过和党外群众共同开会审查之后，即实行支部改选，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应该指出，以上支部整理工作，只是给今后农村党的工作的继续提高打下一个必要的基础。为了保证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区以上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支部的经常领导和教育。还应该指出，现有农村党的组织长时期未曾有大的发展，党员数量仍小，许多村庄尚无党员，这种情况也使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受到影响。今年至明年计划在基本区发展一倍党员，但吸收党员必须严格注意阶级成份，主要对象应是劳动群众中优秀的积极分子，并着重在没有党员和党员过少的村庄及城镇中发展。此外，今年决定在基本区内配合确定地权和整党工作，普遍建立乡、市、县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乡、市、县政府委员会，以便巩固乡村民主秩序。其选举法和组织法由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之。

四

在基本区进行确定地权等等工作，为的都是组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这个生产、支前任务，就是基本区的基本任务。明年要在基本区内发动大生产运动，其目标，首先是恢复战前的耕地面积，并继续恢复农村各项副业、家庭纺织和其他家庭手工业，同时在此基础上继续恢复城镇工

商业、运输业等，力求在今后几年内使基本区生产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提高一步。今年秋冬两季，必须充分完成对明年大生产运动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甲）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标准。在土地问题彻底解决后，一律改用无累进率的比例税收制，按土地常年平均产量减除一定的免征点后计算征收，征收公粮数量一般不要超过常年总产量百分之十五，以鼓励农民的生产情绪。今年灾重地区还应减征。并改善战勤和优待军属工属制度，使之更加合理。

（乙）灾荒和病疫尚未完全过去的地区，继续认真救灾治病。所有地区，在秋季组织农村人民多种冬麦，做好秋收，并争取秋翻一部分土地；在冬季，除组织农村人民拾粪、打柴等外，更要组织他们进行赶脚、驮盐、拉炭、熬硝和纺织等副业生产，使他们赚得一部分口粮和补充生产工具的资本。这些工作对明年春耕有极重要的关系。政府应组织公私商贩，帮助解决农村副业生产的原料，贩运种籽、粮食、农具、耕畜等，供给农村人民生活和生产上的需要品，并发放可能的和必要的农业贷款。

（丙）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基础上的变工队^[36]和各种互助合作。这不但是发展生产所必需，尤为解决战争和灾荒之后农村人力、畜力和生产资料不足问题的必要办法。在今年秋冬两季生产中，应将现有互助合作组织，加以检查、改进并推广起来，准备开展明年的春耕运动。互助合作办法，不但在劳动上采用，而且要推广到朋伙购用牲口、农具、合作运销副业生产品等方面。此外，发动妇女参加农

业生产，以补救劳动力之不足，也是应该重视的。

(丁) 绥德地区继续组织移民到地广人稀地区开荒生产，移民区则应切实安置移民。这项移民工作应在今年冬季便组织好，并开始移去。生产工作必须有具体领导。这个具体领导方法已经提出很早，但仍未做好，必须领导干部亲自下去，具体帮助区、乡干部切实学会。基本区内的各地党委和政府应在今冬细心准备，依据实际情况，拟好明年生产计划，循此努力，求其实现。此后，务以一半以上的精力放到领导生产方面，并把工业生产摆在适当位置上，加以重视。

五

上述从土地工作和整党、建政到准备发动生产运动，是互相结合的工作过程。必须依照中央指示的程序，不失时机地在明年春耕前全部完成，并避免工作的片面性。所有直接从事土地工作和整党工作干部，必须在九月下半月到达乡村。每一个进行工作的乡，都要有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和掌握政策能力，相当区的主要干部的人去直接领导。如果干部不足，各县可以把全县工作分为两期或三期，先作好一小半乡村工作，并取得经验，带出徒弟，建立领导核心；然后把前半乡村的干部抽出，去做好其余乡村的工作。为了做好今年秋冬两季各项工作，除各分区应在八月下旬开好地委扩大会议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外，各县必须在九月上半月以十天到半个月时间开好干部会议。这种会议应是训练班性质，各区主要干部和各乡支部书记或乡长都应到会，由县委精心准备好报

告，按照本县实际工作上的问题，详细讲解明白，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各种对土地工作和整党工作不正确的看法，使所有干部认识一致和透彻了解党的政策。在工作开始后，领导方面最主要的责任，便是经常检查下面工作进行的情况，密切掌握工作动态，及时地发现问题，加以分析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向上报告，向下指示，纠正错误，推广经验。必须认真按照中央指示所说的方法，克服过去工作进行中间领导机关和实际工作脱节现象，使工作正确地按步前进。

六

现在我们已有的新区，民主政权已经建立，内部反动武装已经大体肃清，大部地方社会秩序已经安定，但国民党军队还可能作挣扎性的进攻。因此，在这些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目前新区不进行分土地、分浮财，而把打击目标只限于反动武装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即是为此，这里减租减息，仍然应当在地区比较巩固，环境比较安定的条件下才去实行。如果当地还会有多次反复或接近敌人，则还不要操之过急。但当那些地区一经获得相对的巩固和安定，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并配合反对反革命大恶霸、清查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使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新区更加巩固起来。今年秋冬两季，现有新区的中心地区和其他较稳

定的地区，均应在准备战争中进行此项工作。那些只是在战勤行政工作的圈子里乱忙而放弃进行群众工作的现象，必须改变。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实行合理负担中，还必须注意改造那些草率推选而成立的乡村政权，清除混进来的坏分子，并建立民兵等人民自卫武装。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基本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关于新区政策，中央和西北局已有很多指示。所有新区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新区中间有可能巩固地占领的地区和不可能巩固地占领的地区，有农村和城市，必须把这些不同地区区别开来对待；并且各个地区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和社会情况，这些不同的情况也应在执行政策时仔细加以分析。每个干部必须随时随地留心了解和研究当地各种情况，总结经验。做好现有新区工作，使之成为执行党的政策的示范，对于解放大西北事业上，尤有重大意义。为了准备今后继续发展新区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的大批培养干部上去。共产党员应把到新区工作作为自己光荣的岗位。同时新区各级领导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劳动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和教育改造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建立新区工作的有力基础。

七

七月一日，西北局依据中央指示，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央文件。这是在义合会

议后干部思想作风已获得进步的基础上，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学习运动。其目的在于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贯彻党的统一领导，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坚决地、正确地、毫无保留地执行党中央的全部路线和政策，争取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目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主要有以下的事实表现：疲沓散漫作风极普遍，该办的事不办，可以快办的事办得很慢，能够办好的事办不好，把自己应负责任的当作没有责任；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随意修改政策，制定政策，发表布告；对自己管理的地区内很多破坏政策的严重现象，既不检讨原因，又不坚决纠正；将我们解放的新区和战争中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看成好像是独立国；个人不服从组织调动，不愿去新区工作。这些现象，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而除了少数有意向党闹独立性、故意歪曲党的政策原则以遂其个人主义目的者外，经验主义常常是产生这些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思想基础。边区党虽有不少实际工作经验，但党内缺乏认真总结经验的风气，领导人很少亲自参加调查情况与研究问题，报告大半是数字堆砌，现象罗列，没有做到正确地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很多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自己不认真研究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更不领导干部学习；不注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在政治上团结干部与提高干部；不善于依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而盲目搬用过时了的或其他地方的零碎经验；尤其不善于将本地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联系党的总政策、党的全盘任务去负责地考虑自己的工作，因而在工作中发展了和正在发展着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

的倾向。由此可见，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学习运动，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这个运动必须在领导干部负责、理论与实际结合、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方针下，正确地开展起来。一切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都要亲自参加，并带领干部一同学习。提倡认真读书，反复钻研文件，多思考问题的风气。而最重要的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文件精神，检讨工作，检讨思想作风，把那些不遵守党的统一领导，经验主义工作方法，以及那些不坚决维护党的纪律的自由主义现象，认真地揭发出来，让大家认识清楚，然后实事求是地定出积极改正的办法。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明白：虚心冷静，勇于改正错误，才能进步；骄傲自满，就是落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保证学习成功的主要条件。我们的党现在正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的胜利已经不远了。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全党干部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迅速地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以迎接解放大西北的胜利，争取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关于土地改革和 整党工作中的若干领导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大家已经知道，目前革命形势正飞速地发展着。我们做工作必须看清局势的发展，一切都要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必要的准备。否则，我们就会落后，变成机会主义者，犯大错误。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都是为此。时局发展得如此迅速，几个月等于过去多少年，我们要一天做几天的事，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做好许多实际工作，才能赶得上。有些人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面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到千百万人的大事情。他们好像无事可做，而不知道等着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大很多。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来什么做什么，甚至老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这样下去就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在刊登这个讲话稿的新华社的《电讯清样》上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

会永远堕落在事务主义的泥坑里，老是踏不上形势的脚步。现在我们党的许多的领导机关，老是跟在事务后面跑，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就是去教育劳动人民的各种组织和积极分子，把党的政策变为人民大众的意志，给他们指出方向，带领和组织他们斗争，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工作能力。但我们许多党的领导组织往往不善于这样做。地委、县委的同志下到乡里，如果不是具体领导当地的组织和干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有困难便和他们设法解决，有错误便给他们指拨过来，充分发挥当地的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教育他们提高一步，并拿那里的经验去推广指导其他各地，而是事事包办代替，那不就是降低了自己的领导职责么？工作团下去，代替了农会甚至农民积极分子的工作，也不就是减弱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么？这就是现在我们一切事情中最大的弱点。既然如此，结果就一定是乱忙，甚至迷失了方向。好些地方的领导同志都大叫“今年工作繁忙，干部能力有限，做不过来”，关中分区的领导同志们就是这样说的。因而提出老区^[49]也不能全部办好结束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只能说完成山地那一小部分。有些分区也都不打算在明年三月前完成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试问，今年工作繁忙，到什么时候我们工作才不繁忙呢？如果我们不争取时间把老区这些工作做好，打下老区农村工作和明年大生产运动的基础，把农民群众确实发动起来，加强团结，并培养大批新的干部，又有什么可能抽出更大的力量去加强新区工作呢？我们必须不迷失方向，工作做得准

确，以便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

今冬要结束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开始将近三个月，为什么各地一直没有或者很少反映情况？现在有的只是一些如何布置工作的报告，或者只是提出如何计算剥削分量、土地等级之类的问题，究竟运动进行得如何？中间有什么问题？群众动态如何？却还反映得很少。我看，基本问题还是没有搞起一个真正群众性的运动。毛病何在？直到现在，各地都还停滞在小范围的“试办”里。好些地方怕完不成任务就把今年秋冬工作分成许多期，一期只在一部分地区进行。没有把结束土地改革、整党，召开乡、县人民代表大会，调整负担以及准备生产等项工作，看作是今年秋冬两季的一系列互相联结的工作，并且是要在基本区内普遍完成的。西北局七月会议上曾经照顾干部力量不足，同意了分作两期进行。但如果以为分期就是完成工作的主要办法，那就不恰当了。比如分三期甚至四期，从今年十月到明年三月六个月时间，分起来每期只有两个月甚至四十多天。这样短促的时间，如何能把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即使工作完成了，也只是形式上完成。分期越多就越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固然，土地改革、整党工作必须有确实懂得政策的坚强的干部去掌握，但并不等于由这些少数派去的干部大包办。只有少数干部去做，把其他大多数乡村干部（更不用说群众了）搁在一旁，又如何能打好农村工作的基础？重要的是把政策向所有干部讲清楚，领导机关适当地配合和密切地联系各地的运动，随时教给办法，并作具体的指导。开始从一部分地方做开之后，便应把运动普遍展开。领导机关可以有重点地亲自指导几处地

方，作为典型，得出经验，随时用来指导其他地方。其实群众运动必须是也必然是通过群众亲身的经验，通过群众自己去展开。像延安县一里铺，运动搞开了，周围的乡村看见都想照办，那我们就应放手让运动展开，派人去领导。只要有正确领导，是不会出乱子的。但是有的同志却不那样做，而是硬要等一部分地方做完了再开始到其他地方去做，硬把自己在屋里想出来的死板计划，去代替活泼的群众运动。这次第一期“试办”，又叫典型“试办”，都是孤立地在那里做，可说是为典型而典型，使典型失掉了作用。米脂县委书记试办一个乡，副县长也试办一个乡，好几十天谁也不知道谁做得怎样，互不联系。这种不联系的情形，到处都有。有的把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分割开来，延安县第一期办十个乡，就有七个乡只办土改工作不做整党工作。有的把土改及整党工作和其他工作分割开来，像小炉匠一样，一件一件地零做。有些县一律规定宣传几天；调查几天，然后什么什么几天等等，看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并不是从群众实际要求出发的。他们机械地分开阶段做工作，在宣传阶段，群众提出要讨论干部问题，他们说“等一等，到整党时再提”，硬要群众等他们那个主观订好的计划，于是到后来群众的热情就凉了。这里不是说，我们工作不要有个计划，相反，我们要求各地要把今年秋冬有哪些工作，这些工作中间的关系如何，向所有干部讲清楚，各个乡村分别按当地实际情况，把要执行的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中心工作与次要工作密切配合进行，这样才不至于没有中心地乱做。但“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办事”这点必须注意。每一乡村每一时期群众当前迫切要求的问题都

不一样，绝不能拿一个计划到处去套，必须从解决当地群众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同时按照群众运动发展随时修改已定的计划，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去完成所有工作。现在许多地方干部所做的，不是发动群众，形成群众运动，而是包办代替，为了在形式上完成任务而工作。这就是基本错误的所在。延安李家渠开整党会议时，支部书记在一旁打瞌睡，并不晓得整党和他有什么关系，反说：“这一向工作都耽搁了。”这样不但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连党员和乡村干部都没有发动起来。各地工作进度很慢，简直有点裹足不前，正是领导方法错误的结果。产生这些错误领导方法的原因，主要是对土改、整党、建政和准备明年大生产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间的联系缺乏确切的了解。今年秋冬两季进行这一个工作为的是什么？一句话，发动和团结农村劳动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比如整党，其目的在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在农村群众中的领导工作。就是说，整党是为了有力地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发展生产问题、支援战争问题、扩大农村民主问题、增加农村团结问题。不整党，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也就是说，如果不从这些问题上发动党内外群众，结合开展整党运动，整党也整不好。一里铺群众开始要求解决干部问题，我们就从这上面入手，结果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提出一百八十多个问题，并由群众自己把它统统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好。群众的觉悟和热情大大提高，出现了不少积极分子，形成了核心。接着征粮、调剂土地、改造二流子、准备生产等等工作都进行得很好。这样就是既有中心又有配合。前面说的错误的领导方

法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种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只孤立看问题，没有找出各种问题中间的联系；只看见现在，没有看见将来；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为工作前进打好基础。其根源又是经验主义在作怪。

很明显地，我们必须迅速扭转上述的领导思想，加强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各地必须认真深刻检讨一番，改善工作的领导，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从现在起到明年三月约有四个月时间，必须普遍开展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不要再分期，要教会每个干部都会进行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要发动党内外广大群众起来办。依据老区情况，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运动，是做好土改、整党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根本关键。检查工作应以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农民群众中各种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为准绳。我们要从彻底地解决农村群众的一切问题中，改变农村的面貌，并提拔大批新的干部。所有工作都必须紧紧和恢复并发展生产工作结合。忽视生产，工作就会失去方向。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动前进。

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这次第一野战军^[81]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

去年以来，我军解放了不少的小城市，并曾经解放过个别较大的城市。随着革命战争胜利发展，我军此后将继续解放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若干中等城市和较大的城市。我们必须准备接管这些城市。过去我们在接管新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了中央关于城市的各项政策和去年一月前委扩大会议^[82]决议，一般均获得成功。如迅速建立了秩序，正确处理敌方人员和物资设备，保护了工商业，在短期内恢复市面营业和工业生产，保护了学校，及早地依据可能和需要继续开学，妥善地对待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各种职员，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等等，因而团结了广大工人、学生和其他城市人民，并得到许多工商业者、公教人员的赞同，在陕甘许多城市和广大地区中扩大我党政策的影响和威信。但我们也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宝鸡不分公私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习仲勋同志时任第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地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瓷碗，在凤翔乱动教堂的罐头、咖啡等等，这些在经验缺少和准备不足的当时也是难免的。虽然如此，毕竟我们从此学到了接管城市的一些经验，如像前委⁽⁸³⁾所总结的，必须有统一的接管机构，由部队上级指挥机关指派专人协同城防部队首长和当地党政负责干部组织之，统一管理接管城市的一切工作；其下配备各项必要工作的干部和组织，分别办理各项事情；这个组织应事先组织好，随同攻城部队进城，从准备攻城到入城都要有周密的准备和布置；战斗结束后，除城防部队外，其余部队均应迅即撤到城外，并禁止游击队、民兵和民夫等进入城市；凡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完全接受统一接管机构的管理和执行其一切命令；缴获的武器、物资，均应由统一接管机构接收、封存、转运或分配；严禁各部队机关入城抢购物资，由指定的组织统一采办……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现在我们又得到中央关于城市政策的许多指示和规定以及其他解放区接管城市的许多经验介绍，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以便正确掌握和执行中央这些政策。以下，我依据中央指示，提出接管城市的一些问题。

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等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其人员除首恶分子、破坏分子，必须惩办外，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

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但在接管初期，先禁止其属于反动的课程教材，撤换其中反动特务分子，而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不能破坏，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要它继续生产。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到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不妨慢一点，必须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地合理地去改革。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我们入城之初，主要有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这时发动组织群众，仍是为的更好地接收和建立秩序，不要急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斗争。在秩序未很好稳定，情况未很好弄清之前，鲁莽地发动群众斗争，就会搞糟，反而被反革命分子钻进来利用。对某些人民生活改善问题，只有秩序已经稳定，群众组织已经有相当基础，经过调查研究，确须解决而又有妥善解决办法时，才可以按情况酌量解决。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等都要逐渐组织起来，要防止被暗藏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钻入操纵。但对工人、职员、学生、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和其他城市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尤其是对工人，必须无限关心，很好地确实地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工

人是我们的本队，不能忘掉本队。职工是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发动和组织他们认识自己的主人地位，协助接收国家财产，保护工厂商店，并继续加紧生产和恢复城市各项经济生活的工作。我们要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各種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等等的干部。同时，对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等，也要进行宣传，向他们说明、解释我党政策，要他们安心继续从事各自的业务，不要停顿或破坏生产，遵守法令，协助建设城市。只注意在资本家和上层人士中做工作，忘了或疏忽了在工人群众中工作，那就是轻重倒置。

接收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个“各按系统”，是按人家原来的系统，不是我们各单位“各按系统”大家乱抓，必须由统一组织接收，原封接过来再说分配。接收第一步是点收武器、弹药、资产、机器、设备、档案、卷宗等，第二步才是整理人事。我们一入城即应命令原有一切机构、旧有人员均照旧按原职上班，负责保管所有档案、卷宗、资产、设备，开列清册，办理点交，一切不准移走或破坏，听候我方派人接收处理。这样就有可能有秩序而完整地接收，并且来得快。接收后，旧有政治机关即宣布解散，由我们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关进行工作，旧有敌方国家机关人员则分别处理。至于经济机构，如工矿、铁路、邮电等，还可先派军事代表进去监督，领导生产继续进行，防止怠工和破坏，其他一切（组织、人员、制度、待遇等）暂

时一律照旧，继续开工。原来的负责人如非破坏分子应令其继续负责，受军代表监督，发布命令要有军事代表共同签署。如原来的负责人已跑掉或不愿继续服务或不能令其继续负责，则由原来职工中挑选适当的人员代理职务，使企业能继续生产或营业。重说一句，不要急于改组和改革，这是为了生产、交通和各项经济活动不至停顿，使已中止的也迅速恢复起来，经济活动停顿一分钟都是人民的损失。以上指的是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但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则不要去没收，而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对于有官僚资本股份的企业，接收其官股归为人民政府所有，承认私人股本的所有权。这些企业接收之初，不要一般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但必须保障职工原来的实际工资水准，不能降低，企业中原有对职工有利的一切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必须照旧保持，不得取消。这点对于一般私营企业也是适用的。

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迅速建立秩序，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有了秩序，一切才好办。建立城市秩序首要一项是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市面治安和防空警戒，清理战时工事障碍物。公共机关以及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和所有公共建筑设备都要派部队看守。俘虏散兵要迅速集中。战斗结束后，非卫戍部队迅速撤出城外。卫戍部队应依城市大小和情况需要，配备足够的兵力，这个部队短期内不要调动，并须事先经过挑选训练。城

市治安机关亦须迅即建立起来。在我们力量还不及时，原有普通警察尤其是交通警察，仍可暂时令其徒手服务，维护交通秩序，但必须一律收缴武器。消防队等亦各守原职，听从指挥。其他所有警察均不宜过早遣散，先集中整训，然后分别处理。敌方人员，除武装抵抗或有破坏行动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须立即逮捕，战争罪犯和首要特务分子必须紧急逮捕外，余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静候处理，不可多捉人。国民党、三青团^[74]、青年党^[84]、民社党^[85]等反动党派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第二厅所属的一切反动特务组织；和其他反动党派、团体的组织和机关以及其他特务组织，应一律解散、封闭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文件。一切反动党派和特务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呈缴证件，但普通党员、团员则免做登记手续，而由其所属组织负责人交出全部名单，送由人民政府审查，不得隐瞒。对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的重要人员，还须规定办法加以管制。但这些办法在秩序未安定前不要忙于宣布，只在秩序已定，情况大体明了和我们已有相当准备时，才由军管会或市政府宣布之。肃清反动特务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要有准备，要有公开治安工作和秘密侦察工作结合，要抓紧时间，又不可性急，草率从事是有害的。对敌方监狱中的犯人，除先将革命的政治犯接出安置外，其余不要立即一律释放，待秩序安定后再分别处理。一般民事犯和普通刑事犯那时可以释放，惯匪却必须改造后才能放，汉奸尤不得宽赦。否则会増加治安上的困难和引起人民不满。

建立城市秩序另一要项是迅速恢复电力供应以及邮电、铁路、汽车交通，尤其是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这些供应停了，城市人民一切生产和生活都难维持。前者，在保护利用原来机构继续开工外，还要很好发动和组织职工，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加紧修复机器，迅速开工。后者，则采取组织运输、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组织农村粮食、准备煤炭等办法，务使供应不断。这里，事前准备是十分重要的。

在恢复城市经济生活的同时，必须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先要准备足够的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即禁止敌币使用。在初期，可依据情况规定适当牌价，限期收兑市民小量的敌币⁽⁷²⁾，并组织商人的大批敌币出口换回必需品。对私营银钱业，暂准其存在，但应严格管理，只准经营存款、放款、内地汇兑等正当营业，不准买卖金银、外汇和作投机买卖。入城后可通过原有商会和行业会召集商人开会，宣布我们的政策，通告速即开市。国家贸易机关和公营商店要起带头和组织调剂市场、稳定物价的作用。必须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

对学校必须一律保护，使其继续开学。公立学校，除确有证据的反动特务分子应加撤换外，其教职员一律欢迎照旧供职，照发原薪。私立学校则查明其政治背景，如确系反动党派团体所办，可接收过来，其余学校均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遵守法令，继续开办，其教职员也依上述办法处理。反共反人民的课程应禁止讲授，一般课程暂仍可用旧教材，其中反共反人民部分则须删去。先继续开学，然后逐渐改造。

对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事业，应分别处理。属于反动政府和其下各机关、反动军队各级组织以及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机关所办的，一律查封接收。属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民团体所办的，则要保护，令其向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属于私人经营的，要以反动的、进步的和中间性的几种情况分别处理：进步的，保护登记；有反动背景的，没收；一时无法查明的，查明后经法庭判处；中间性的，令其依法申请登记听候审查。所有报刊都必须实行登记和事后审查制度。外国通讯社和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发稿和出版。对全国性的报刊、通讯社、出版机关的处理也要请示中央。对旧有新闻工作者，撤换其反动者和特务分子，其余均采取争取改造方针，但不轻易使其担任编辑和外勤记者工作。最主要的还是办好我们自己的报纸、通讯社。我们要在入城前就准备好人员和入城后几天的稿件，一进城即可在一两天或两三天内发稿出报、广播。

对与外国有关系的问题，中央已有方针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凡处理这类问题必须向中央请示。谨慎，守纪律，是最重要的。在西北各城市还必须严格注意少数民族问题，严格尊重其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喇嘛寺等。

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其目的是在军事情况下有效地达成上述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军区或野战军司令部委派之，其下可成立临时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或城防司令部，并在会内依据情况需要分设若干处，在军管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办理各项接收、处理、管理等事务。这个军管会就

是军事管制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

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理，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不妥者则以军管会命令修改或取消之，这样就能适应新接管的复杂的城市情况。此种军管时期愈到大城市愈因其复杂愈要延长。一般军管时期的长短，主要看实行军管的各项目的的是否达到而定，不要以为取消得愈早愈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和前线附近城市取消军事管制必须经中央批准。一些小县城，接管初期也还应实行军事管制，但组织形式可依据当时当地具体条件而定。比如当地原有党的组织基础较强，县政府便可即入城办公，可以不另组军管会，但开始仍是军事管制性质。

军管会必须在入城前及早组织好，周密准备，配备必要的各项工作干部，调查研究城内情况和工作办法。入城前还要广泛张贴、散发和连续广播我方的约法八章（野战军布告），并由军管会出布告宣告就职开始工作，宣布必要的措施，使城市各界人民及敌方人员明了我方政策，安守秩序和遵从命令，保护设备，准备移交。但入城后，我们的布告和宣传，必须谨慎，不可在条件未成熟前即宣布各种处理办法，也不可空喊各种在当时当地无实际意义的口号，尤不可轻发一时不可能实现的诺言，致陷自己于被动地位。

为了广泛联系群众，除组织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外，在军管时期内，还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军管会和临时市政府出面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成为联系群众、传达政策的协议机关。这些代表应具有团体代表性，并应以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占多数；要多请原来

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但拒绝反动分子参加。代表会每月开会一两次，军管会和市政府可向它作各项施政报告，请代表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作出最后决定。各界代表会的职权是军管会和市政府赋予的。这是正式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前的过渡形式。不过，在城市解放之初，情况尚未了解清楚，群众对我们也未有相当具体认识和初步组织起来之前，还不可能即行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时只能召集工人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各界座谈会等等，宣传解释政策，联系群众，协助群众组织起来，并物色可以邀请参加各界代表会的代表。

以上说的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一些必需遵守执行的政策和工作的，这些，前委已写出系统的详细的草案。但是，这里还只提到接管城市初期的一些问题，至于管理和建设城市中的许多政策和工作的则不能详及，仍有待我们今后在工作中不断研究和补充。在此，学习精神与谨慎态度又是最要紧的。

最后，我们提到干部问题，这是对政策贯彻与否的有决定性的问题。党的有关城市的政策，必须向所有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干部深入传达，组织他们讨论，使他们充分明了。对所有部队战士，也须作必要的教育。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所发的入城纪律守则十七条，必须为一切入城部队机关人员无例外地严格遵守。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向各个方面学习，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系人民

群众。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十分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侵蚀，十分警惕和击破人民敌人的各种阴谋蛊惑，严格保持严肃、切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

加强保卫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一

自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¹⁰⁾以来，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了。这期间，保卫工作是有成绩的。配合军事的胜利进攻，肃清或打击了后方的特务、土匪和坏人，保障了支前工作。在黄龙新区，摸索出一些经验，给今后新区保卫工作打下了基础，如肃匪工作，必须先军事上给予痛击，然后才能谈到政治上的争取。没有前者，不能镇压下去；没有后者，就不能最后肃清。清查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应发动群众配合，先登记主要分子，然后再到次要的一般分子。对一贯道⁽⁸⁶⁾问题，我们的政策很慎重，先搞清了它的性质，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带有反动性的迷信组织，其中有特务，但并非所有的成员都是特务。其所以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特务分子的从中鼓动；另一方面，主要是反映了一部分农民在长期残酷斗争中的情绪，没有科学知识，再加上灾荒、没有饭吃，把希望寄托在迷信上。我们应使这些人有饭吃、有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公安分处处长联席会上的讲话。

衣穿，应着重宣传，揭露特务分子的活动，对其首恶分子可以镇压几个，但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我们处理不慎，就会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与不满。在边沿区，最近一年来，到敌区去做隐蔽斗争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取得了战略、战役性的情报，同时又团结了进步人士，争取了一些中立分子，孤立了许多反动分子，打下了向大西北进军的基础。这一方面，关中、西府做得较好。一年来，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保卫干部，因为我们接触的环境复杂了，干部从掌握政策到技术，一般地也都提高了一步。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年来，敌人是有计划的溃退，并在各方面事先作了准备，如布置电台、潜伏人员等。

总的说来，敌人是防御的，我们是进攻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缺点，是没有把成绩做得更大，还不能根据敌人的具体行动，一步紧接一步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具体工作中，还有左右摇摆的现象。但在发现后，随即得到了纠正。

二

正由于我们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大西北将要全部解放，今后保卫工作不是减弱，而应是加强。敌人的统治虽然濒于死亡，但不等于反动阶级的死亡。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越失败，特务的破坏就越嚣张。军队被打完了，它还会派遣其特务分子钻到我们各部门来。因此，军事战争缩小或完结之后，应当从另一方面与敌人展开大规模的隐蔽斗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我们只有从这方面取得胜利，才能巩固胜利，保

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和平建设。我们的准备工作往往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到六月以后，将有数十万野战军在西北作战，陕、甘、宁、青、新等省的大块地区和西安、宝鸡、天水、平凉、兰州等城市，将迅速解放。这些城市，人口集中，情况复杂，我们在这些城市中，要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将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从这一点看，保卫工作，毫无疑问，是应该加强的。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个榆林方式⁽⁸⁷⁾（这与北平、绥远方式⁽⁸⁸⁾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在这种和平解决方式中，每一协议，都有斗争，麻烦很多。因此，保卫工作的任务也就更重大，工作也就更多。这种情况，也就要求我们加强保卫工作，而非减弱。

全国形势变了，保卫工作今后的任务与组织形式也都要变，但总的方针，即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方针是不改变的。这一点，必须向干部们说清楚，以免思想模糊。

老区⁽⁴⁹⁾过去是战争环境，一切为了打仗。今天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百分之九十的力量要放在发展生产工作上，这就是一个转变。但是建设还是为了支援战争胜利，这是基本情况。具体情况是外回分子⁽⁸⁹⁾加多了，其中有些是流亡回来的地主、富农分子，有些与敌人还吊有一根线，还有敌特人员、国民党军队的遣散人员等，这些人回来后不能都关起来，都需要我们进行甄别和安置工作。这说明今后老区情况仍很复杂。但在领导上、干部配备上，我们是着重新区，老区干部又大都是新提拔的，经验与警惕性不够，力量也就减弱，这

就给坏人以更大的活动机会。因此，老区工作，应该好好研究。一般地说，在老区，除搞暴动及重大犯罪者外，一般地可从生产中改造，不必逮捕。关于哨站⁽⁹⁰⁾，应是逐渐减少的方针，因为它是适应战时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在今天情况下，交通要道、群众集会等地还应该建立哨站或临时哨站。治安小组的工作可放在党支部身上，所有党员、民兵均有维持治安的任务，因此，治安小组可以取消，但乡的治安委员会还是必要的，不能取消。总之，要根据新的斗争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组织形式与制度来。

在新区，有中心区与边沿区之别，有城市与乡村之别。方针、步骤均因之有所不同。在这些新区，要展开隐蔽斗争，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配合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政权，支援与保证战争的胜利。解放之初，必须乘敌混乱时期，有准备地连续发动几个攻势，不断地打击，使其一挫再挫，给我们以后工作打下基础，这就叫“大刀阔斧”，而不是“细吹细打”。新区的特点是敌人多，而我们的基础弱、工作忙、干部少，因此工作方针、步骤、方式与组织形式，和老区都不一样。如治安小组就一定要成立，给以一定任务，这种组织形式起码要存在两三年。工作要集中力量搞重点，这就是发动群众的具体内容之一。新区的反特工作，一定要有政策、有策略、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去进行，一方面防止搞乱，另一方面也不要停下不动。对敌情的估计，既不夸大，又不缩小，不慌不忙，按政策办事，反对幼稚行动。任何带有政策性的问题，都要请示（关于请示制度应有明确规定）。对敌情应有详细清楚的认识分析，夸大敌情，我们就会

慌手慌脚，打不中敌人要害。这就叫“心中有数”。没有这个数，会同土改一样，造成恶果。逮捕人也应有数。第一次打西府，在彬县、旬邑捉的人就多了一些，造成人心惶惶。小桥畔的教堂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群众就很反对。总之，一切按政策办事，不懂政策，就要赶快请示。

反特斗争，不仅是全党的工作，而且也是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这就是专门机关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也就是反特与其他工作密切配合。关于如何配合的问题，各级党委要进行讨论。过去我们没有把反特斗争作为全党的工作来做，是不对的。各地的反特斗争，从当地解放第一天起到将来，都是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经过这个斗争，才能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与巩固政权。对地主阶级的当权派要斗争，但对一些罪轻的敌伪人员亦应适当地及时处理，否则更会引起不安。黄龙就发生过群众拿斧头砍这些人的现象。

部队保卫工作与地方保卫工作分不开。各级地方党的保卫部门，如何把部队保卫工作（地方部队、警卫部队等）搞好，就成为业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今后广大新区将成立很多地方部队，并将逐渐上升为正规军，应对他们加强管理审查，特别是地委社会部更应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领导，把这项工作提到地委议事日程上来，使在大发展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问题。

三

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从新的情况发展看，我

们的任务将更大。但我们的水平还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这些不是为了钻书本，而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领导应对此加以督促检查。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事情就好办。培养干部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职干部，可在工作中培养提高，老干部带新干部，多设副职，做一件，教一件；另是从青年知识分子中选拔一批阶级成份好的及地下党的力量、积极分子等，来做保卫工作。现在干部数量绝不能适应今后形势，公安厅要提出计划，各公安分处也要有计划。过去一般地说保卫部门的领导很好，但上下关系不密切，还要改进。自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后，虽已有改进，但还勉强，说明思想上并未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像这样三五天的会议，某一工作、某些人员的会议，可多召开，时刻了解下情，给下边讲清一些道理。今后要及时抓住好坏典型、经验，随时宣传，提起全党注意。一件事，一点事，只要有其教育意义，都是应该这样做的。

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由于我军英勇善战大量歼敌的结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将关中四十二个县全部解放。这样广大城乡的接管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尚在进行中。这种迅速解放大块大块地区的情况在西北还是空前的。为了支援数十万大军继续胜利前进，更迅速、更健全地开展广大新区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工作，要求我们在新解放地区的接管初期，把工作方向集中到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安定秩序，恢复生产，支援前线这几项主要目标上面去。要做好这几件事，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我们到达新区工作的第一步。

两个多月来，我们在关中地区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任务。第一，迅速和比较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接管了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保护了铁路、邮电和工厂等国家财产，积极努力地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第二，消灭和收编了地方反动团队和土匪将近两万人枪，初步开展了肃特工作，使境内成股的反动武装已近绝迹，零散土匪和潜伏敌特更加孤立。与此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西关中新解放区中共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同时，各地积极努力地建立人民地方武装。这样，使整个关中地区在新解放初期就保持了大体安定的社会秩序。第三，因此，就有可能筹借军粮一百三十万石⁽⁶⁶⁾，发动做军鞋五十万双，动员大车二万七千辆、担架四千余副、运输牲口数千头等，支援我野战军取得扶眉战役⁽⁹¹⁾的胜利和迅速西进，造成解放整个西北的有利形势。这些成绩，是由于党在关中地区有长时期的工作和影响，在当前大革命胜利形势下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空前高涨，再加上全体干部党员的积极努力而得来的。各分区、各县工作的发展，都充分证明：我们一到新区，必须掌稳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第一步不是不适当地、过早地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改革，这样做，就会脱离实际，增加自己的困难。而是首先力求大块大块的地区迅速稳定下来，以安定人心，团结群众，支援战争。然后再去稳当地迈出第二步和第三步。这样做，于解放战争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有利。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经验。这个经验，对关中适用，对其他地方也会适用的。当然，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如：负担中的“抓大头”或平均摊派；收编反动地方武装未抓紧教育改造；有些地方存在坏人进入人民政权的现象，以及城市工作中未用最大力量去进行恢复与发展生产等。这些，都必须在今后工作中切实纠正。

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对新区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首先关中地区，除西安、宝鸡有些现代工业外，余均为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分微小。其次，关中农村土地不很集中，地主占农村总户口不到百分

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查，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同时剿匪还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并与发动广大群众的反霸反匪反特的斗争结合起来。

(三) 开展普遍的群众斗争，反对恶霸，反对土匪，反对特务。与特务、团队、土匪相结合的恶霸分子，仍然是农村的土皇帝，即地主阶级的当权派。而布置特务活动，繁殖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骚动，又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一种重要阴谋。这样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就组成了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亦即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打倒这一恶势力，才能建立农村人民优势力量。反霸、反匪、反特斗争，可能而且必须组成农村中广泛的统一战线，依靠贫雇农，团结全体中农，争取和中立一切可能争取和中立的社会力量，有步骤、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这一斗争。必须分别具体对象，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应当把那些政治上坚决依附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和那些愿意向人民低头的分子区别开来，以及其他各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关键在于，必须动员全体干部党员，深入到农村中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有重点地波浪式地开展斗争，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由点到面，面面生根。这是改变新区封建农村的第一个主要战斗，必须准备好，组织好，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四) 摧毁保甲⁽²⁾，清理国民党人员，初步建立乡村人民

政权，就是让农民当政。在关中地区利用旧保甲阶段，应很快结束。在发动群众反霸、反匪、反特斗争中，配合进行清理敌方人员，初步建政。这样做，不是要把目标搞乱，把打击面放宽，而正是为了把那些在敌人统治时期，被强迫服役，或劣迹较小，愿向人民悔过自新的分子，经过群众适当处理，以安其心，而使少数怙恶不悛的罪大恶极分子更加孤立。如果硬把这一工作与反霸、反匪、反特斗争分开，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使反霸、反匪、反特斗争没有力量。农村敌方人员在清理后，一般令其回家生产，将农民群众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大批地选举到政权机关中来，并加强教育，使整个农村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县级政权，可先采取召开各界代表会的形式，加强与群众的联系。

（五）组织农会，建党、建团。各县自上而下地组织农会筹备会，发动各地成立农会。乡村农会要先有重点地组织，逐步发展，然后按发展情况及农民群众觉悟程度召开乡、区、县各级农民代表会，并在农会中注意培养贫雇农领导骨干，以加强领导。青年妇女群众都要组织在农会里边。地下党和青年团的组织要进行整理，加强阶级教育。老区^[49]派去的干部要积极主动地与地方干部很好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各地都要把党、团的工作委员会建立起来，有计划地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六）以上各项工作，都要在发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去完成。八九两月正值农忙，必须积极领导群众种冬麦，收棉花，完成夏征和必要的支前任务。十月后，转入以反霸、反匪、反特的群众运动为中心，配合进行建军、建政、建党及其他工

作。依此精神，各地再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

从现在起的一定时期内，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但要同时兼顾城市工作。城市党委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城市工作。在城市工作中，必须清醒地掌握工作方向，在一定时期内努力做好下列工作：（1）继续团结全体职工，恢复与发展生产，并以此为一切工作的中心。（2）加强肃特、清匪工作，巩固革命秩序。（3）用大力解决失业问题，抓紧改造与适当安置原有公教人员，组织无业劳动人民参加各种生产或到农村垦荒。（4）发展交通，稳定金融，发展合作事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5）动员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学生、进步分子到农村去，加强农村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目前时期有力地配合农村完成民主改革和进行支前，并使城市生产事业得到恢复，还争取再有一些发展，逐渐治疗城市中旧有的懒惰臃肿的病态现象，为下一步全力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的生产和新城市打好基础。

把企业管理与工会 工作结合起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战争快要打完了，全西北快要解放了，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一面是要继续支援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一面是要准备开展西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何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推进我们的建设事业，就是这次两个会议所要共同解决的主要问题。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现在是走第一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使现在有利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企业，迅速恢复生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产，在现有基础上求得发展，并在干部培养、经验积累等等 方面，给下一步准备条件。现在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很好。为什么现在工厂、企业中继续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和许多不合理现象呢？就是管理不好。我们工厂的产品成本高，如布匹就地取棉，还不如上海运来的便宜，除我们的技术装备较陈旧外，管理得不好也是重要原因。为什么在有些工厂职工运动还表现消沉，有些工厂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单纯强调工人福利等而影响劳资两利政策的贯彻呢？这就是我们对工人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广泛深入地发动工人群众，没有把多数工人觉悟提高起来，使他们懂得应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打算，而不要光为眼前的一点利益，闹得企业倒闭，资本家关了门，生产停顿，工人自己的饭碗也就没有了。这些马列主义基本道理没有对工人很好地去进行教育，因此，工人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也是很少一部分。今后我们务必要把两方面的工作都搞好，我们才可以顺利地走上恢复与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公私企业中，行政管理、工会工作、党的工作以及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为生产服务的。我们为什么要把工人组织起来，为什么要教育工人？因为工人是生产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自觉性，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使整个社会经济以最大速度向前发展。

目前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关门主义。如西安解放已四个多月，工人群众大部分还没有组织起来，就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的也仅占十分之一。工会领导的许多活动，如宣传教育活动，还仅仅是吸收一小部分群众

参加，而不敢放手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等等。这种现象是很严重的。我们光口喊“依靠工人阶级”，但工人都没有参加工会，没有成为有组织的队伍，怎样依靠呢？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纠正这种偏向。产生这种关门主义现象的原因，就是许多同志对当前工人群众觉悟程度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有充分了解，今天是大革命时期，是革命高潮。这样大革命的形势，把一切人物迅速推向前进了。广大群众每日每时在从革命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受到教育，在从亲身体验的政治事变中受到教育。他们进步的速度，现在的几十天，顶上过去平时的几年、十几年。必须善于了解这种日新月异的群众政治觉悟飞速提高的情况，不要把昨天的事情当作今天的事情。有些同志从形式上看问题，看到工人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74]员的数量，就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而不去分析他们过去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时，多数是被迫的，而这个国民党、三青团今天早已解体，其中多数人的思想状态、政治倾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已向前进步了。真正的潜伏特务分子是极少数，是个别的人。有些同志过去在老区^[49]已习惯了那种精雕细刻的、但是小脚小手的工作方式，这在彼时彼地，当然是对的，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大大不同了，我们还是采取过去的那种工作方式，那就不对。今天我们要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才能迅速地与当地群众建立联系，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各种工作，比如有些工厂在我们没有去之前，里边就有积极分子，进行护厂、复工等，我们就召集这些积极分子，开临时工人代表会，成立工会筹备会，把党的政策向这些积极分子讲清楚，让他们到工人里头去工作，

收效既快，干部问题也解决了。但有些同志却总希望上边派干部，而不积极地去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提拔当地的新干部，事实上这些干部有时比我们派去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力量还更大。我们应该按照全国总工会的章程办事，把绝大多数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使工会成为大体上包括全体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经过工会去教育和提高工人群众。有些工人在思想意识上有毛病，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大多数是从农村家庭出来，又长期处在反动派的欺骗统治之下，当然带有许许多多的落后意识，只有把他们组织在工会里边，在积极生产和各种活动中，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才能够去旧换新，使广大工人群众具有自觉的领导阶级的思想，这就是党的职工运动部门、全体工运干部所要担负起来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争取在明年的“五一”前后，把全西北的工人群众基本上组织起来，召开全西北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北总工会。这样，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起积极领导作用。只有生产发展了，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人福利才有了可靠的基础。

职工运动部门的干部，都要加紧学习，做好工作。各地党委应切实按照中央指示，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给工运干部以各种必要的帮助。我们的任务很重大，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做好工运工作。而工运工作是有远大前途的，因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发展着的阶级，和一个人一样，要由小孩子成长到壮年，也就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工人的组织也要逐渐地扩大，工会将来会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组织，成为国家政权最主要的支柱。为了担负起这个任务，必

须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工运干部。主要办法是从提高现有干部和在工运中大量提拔新干部这两个方面去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要克服光靠上边派干部的消极思想。我们的眼睛要常常往前看，望着那些新的发展着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就永远是胜利的。

加强新解放区 新老干部的团结和学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农村中，我们已明确规定的政策往往不能贯彻下去，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干部不懂政策，办法少，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多，甚至有曲解政策、各自为政的。这一点各地早已深切地感觉到了。这乃是不奇怪的。现在新区的干部情况是，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环境中，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缺乏革命的锻炼，所以留有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教育，才能改造和提高。老干部只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现都很好，但因这一时期领导上没有抓紧教育工作，有些人没有起老干部的骨干作用，个别还有为旧社会思想作风所同化的，产生了腐化堕落行为。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来的党员与当地地下党员之间，各个根据地来的党员之间，还存在有不团结现象，有的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西关中新解放区中共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一部分。

团结起来，努力学习。每个地区的一切工作干部，都首先要主动地互相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做好工作。在这个干部互相关系的问题上，根据地来的老干部要负主要责任，要主动地去团结地下党员和一切新干部。首先要对地下党的新老党员、干部采取正确态度，对他们的工作成绩要有足够估计。关中地区因解放以前有六七千地下党党员的活动，有长时期的地下工作影响，解放后的工作进展才能有如此顺利和如此迅速，否则是不可能的。要看到他们的缺点，又要看到他们的优点，特别是对他们的缺点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解形成那些缺点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采取与人为善，热情帮助的态度。要反对对新干部盛气凌人、独断独行的粗鲁态度。对一切新干部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学习问题是党、政、军全体干部共同的迫切问题，明年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干部学习，一般说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实际工作中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当先生，每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乡，主持一区一乡的工作，或每做完某项工作或发现新问题，召集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提出办法，教育全体干部。对干部中突出的好坏典型，要及时处理，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对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应予洗刷。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这对于新干部特别重要。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作为思想武器，有系统地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明年各分区的干部学校都要以轮训现有干部为主，好好进行干部教育工作。

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 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西北已迅速全部解放，即将由战争稳步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在陕西全境解放后，亟需成立全省的政权机关——陕西省人民政府。今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了。这是一件大事，它对统一领导陕西人民加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生产等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现在西北各省的省人民政府都已先后成立了。各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各地方的事情，我们是有信心办好的。有《共同纲领》^[94]，有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有毛主席经常的密切指导，就把许多重大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现在留待我们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个地方加强并巩固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以便将共同纲领和中央所规定的任务、政策，与我们这个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并贯彻下去。我们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一样，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少数人的包办把持，就必然办不好。所以我们共产党就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今天统一战线的基础，非常广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有各民族人民和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到各地各级政府中来，分担负责工作，这就是统一战线政权或联合政权。陕西省人民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人物。这就使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确立起来了。今年我们还要召开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样陕西各阶层、各党派的团结就更加完备和巩固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困难也很大，但是依靠我们的团结，就完全有办法做好我们所担负的工作，克服一切的困难。由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责任，共产党员对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和作风，就对这个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事业，做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¹⁰⁾ 参议会的演说中，就向我们明确指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我们不仅是在政府工作中，而且还经过其他许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去和广大党外人士合作。我们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在于

我们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保持谦虚和老实态度，工作在前，享受在后。并以此去和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密切地互相团结起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为贯彻共同纲领和建设大西北的事业奋斗。特别在西北地区，共产党员的数量很少，干部中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各种专业知识很缺乏，这就需要很好地学习和提高。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看别人什么都不好，不积极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不虚心学习，那就不管出自怎样的“好心肠”，其结果都是违背了党的政策，把革命的事业办不好。毛主席又曾谆谆告诫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讲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克服自己的缺点，做到与党外人士的恳切合作。各位非党的委员先生们，各位各界人士们，大家都知道目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除开特务、反动分子以外的一切人，我们都应当团结起来，实行民主合作，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在西北，在各省，在各地，我们同广大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不过刚开始。我们经验不足，过去时期与各方面的联系不多，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陷。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切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建议，我们都热烈欢迎，诚恳采纳。我们大家都站在为人民办事的立场上，抱一样的态度，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好。

陕西是西北人口最多、革命斗争历史最长久的地区，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过极其重大的贡献，在今后西北的建设事业

中更应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今天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盛会，庆祝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并预祝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成功！

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

诸位委员先生们，诸位来宾先生们：今天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全西北人民历史上空前的一件大事。我们热烈庆祝西北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热烈庆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热烈庆祝西北人民革命大团结的成功！

西北人民已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了自己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深深感谢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感谢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和努力！感谢各友邻地区兄弟般的援助！特别要感谢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英明而亲切的领导！

西北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藏、蒙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有广大的农、牧业和一定的工矿业基础，有丰富的地下蕴藏，这些都是建设新西北的极好条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难也很大，但依靠我们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依靠我们艰苦奋斗，我们就完全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入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就职讲话。

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在一切工作中，我们必须完全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⁹⁴⁾，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切决议。特别是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要善于坚持真理和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善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本会彭主席⁽⁹⁵⁾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副主席⁽⁹⁶⁾以及全体委员共同努力，我们深信建设新的大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

西北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西北人民大团结万岁！

把妇女运动再提高一步^{*}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

各位妇女代表先生，各位同志：今天欣逢西安市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同时恰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第四十一周年纪念日，这样的双重意义，促使我们每个与会者的心情，都是十分兴奋和愉快的。我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祝贺大会遵循国际劳动妇女所走的道路，坚决执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决议，密切联系妇女群众，针对妇女群众呼声，解除妇女群众痛苦，吸收她们积极从事经济文化建设，逐步走向彻底解放！

西安自解放到现在已经九个多月了，九个多月来，西安各界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在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正确指导和帮助下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是非常切合时宜的。大会的召开，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各方面已逐渐开展的标志，特别是妇女群众已初步地组织起来了，这是很大的成果，这个成果是由于妇女群众觉悟的提高和许多妇女工作干部的努力所获得的。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安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曾经讲过：“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过任何一次被压迫群众的伟大运动，没有劳动妇女的参加竟而获得成功的。”又说：“劳动妇女，是被压迫群众中的最受压迫者，从来未曾而且也不可能徘徊在解放运动的大路之外。”是的，我们任何一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均离不开妇女群众的参加。就拿支前一项来说，西安市妇女在去年九月后，帮助军队做军袜五十万双、军被近三十万床、棉衣二十五万套、大衣六百件，假如没有她们积极热情的参加和工作，军队过冬就有困难，击败敌人就没有保证。因此，做好妇女工作是做好一切群众工作绝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些同志，忽视妇女运动，认为做妇女工作没有意思，这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另外，在我们现存生活中，还有两种不正常现象必须纠正：一种是有些领导机关对妇女工作部门帮助不够。从工作到日常生活，以前是关心的少了一点，以后要关心的多一点。一种是有的机关，不愿意容纳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干部。这些人似乎不懂得女同志就是要结婚生孩子的，问题在于如何帮助她们，多组织几处托儿所，使工作与照应孩子的时间合理地调剂开来，只简单的拒绝是不行的。今后妇女们参加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不是一天一天地少，而是一天一天地多。我们看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们所起的作用，就会懂得这个道理了。

由于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劳动妇女们除同全体劳动人民一样受着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以外，又多了一层：从很久很久以前，妇女即被排挤出社会生产事业的主要岗位，而处于家庭中的附属地位。这样使得妇女们遭遇的痛苦比起男

子来更为深重：她们受到不平等的看待，被剥夺了应该受到教育的机会，为的是尽量造成她们的愚昧无知和盲目的驯服；她们平时不能走出家庭一步，厨房与生育消磨了她们的整个生命。这样就给了人们一种错觉，好像妇女生来就不如男子有用，应该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实际并不应该是这样，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现在虽是人民当政的新时代，但由于全国解放伊始，妇女们要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务须配合国家建设长期奋斗！因此，需要我们各位代表先生们和所有做妇女工作的同志们，做更多的艰苦工作。

我认为西安市妇女运动在目前的任务应该是：

（一）开展妇女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目前一切群众运动，都是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而妇女工作，更应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如西安市这次妇女代表大会，就不仅有女工、女学生、女教师、女职员的代表，还包括有妇女界民主人士、家庭妇女、女艺人等等方面的代表，这样，就与西安市各界各阶层二十万妇女群众建立起了广泛联系，这就是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非常之宝贵与必要的，今后这样的会议是应定期召开的，经过这种会议，把广大妇女动员和组织起来，商量自己的问题，教育和提高妇女参加到祖国经济的文化的社会改革的各种伟大运动中去。只有把广大的妇女群众在各种运动中组织起来，妇女群众有了自己的组织，就有了力量，就能够为着自己的共同要求而奋斗。

（二）发动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地参加各项生产建设。现在西安市有女工一千三百余人，虽然占全市妇女人口的比例数不大，但她们是生产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应该成为妇女群

众中的领导成份。对女工们的工作，必须重视，以她们参加劳动的光荣模范事迹，号召全市各界妇女，从鄙视劳动的不正确观点，转变为崇尚劳动鄙视懒惰的正确观点，教育她们懂得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懂得只有妇女们在生产方面有了重要位置，社会地位就自然提高了，否则只能是空谈妇女解放。应该倡导家庭和睦、劳动致富的风气，帮助一些无正当职业的妇女群众们，同样能获得参加生产的机会，找到正常的生活出路。有些家有男劳动力而仍然无法在城市生活者，可鼓励其向政府登记移到垦区生产安家。劳动是每个人的天职，只有每个妇女都能参加劳动生产工作，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为妇女彻底解放打下坚固的根基。

（三）组织妇女群众学文化、学科学。妇女群众们的彻底解放，第一要参加生产，第二就要和愚昧作斗争。西安市妇女知识分子较乡村为多，但仍是占总人数的极少数，科学知识更感不足，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有的说，妇女可以不关心政治，这是很不对的。市妇联筹委会在这一时期曾经协助政府举办过几期教员座谈会、青训班，进行了妇女冬学识字运动和一次妇女卫生讲座，是很好的。今后应该继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广这样的学习运动。对妇女知识分子，仍应着重思想改造，扫除国民党时代的封建殖民地文化的残余影响，确定新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关于演戏、说书的旧艺人，对社会教育影响颇大，对她们的改造，也是不能忽视的，应该帮助其取缔封建迷信的内容，逐渐做到演新剧、说新书。

（四）城市妇女运动必须同乡村妇女运动密切结合。没有

广大农村劳动妇女的翻身，城市妇女将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今年秋后，西北好些地区要进行土地改革，目前正在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号召城市妇女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村劳动妇女反封建分土地，农村劳动妇女一定会热情地接待大家的。到农村去的城市妇女知识分子，开始或许会感到生活有隔阂，不惯相处，过些时间，就慢慢体会到劳动人民真正是可钦可爱的。同样在经过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会把妇女知识分子本身锻炼得更坚强起来，她们将会感到群众运动对她们的改造比起读书本是更进一步了。妇联会经常关心的干部问题，也将会有新的改观。

(五) 上述工作的完成，必须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和正确的工作作风。一切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和群众的自觉基础出发。热情是要的，但如果没有调查，没有计划，盲目地依靠热情去办事，就会犯错误。例如，不管在城市做工作或者去乡村做工作，不可能一次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同样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内，不分地区环境、不分群众觉悟程度只做一般的动员，必须先从一个工厂，一个街道或者一个农村做起。又如关于婚姻问题，不能一进农村就大喊婚姻自由，那会脱离群众的，必须在土改后，群众觉悟提高了，婚姻纠纷自然不难处理。这些说明我们不仅要有明确的工作方针，还要有比较细致的工作步骤，否则方针虽然有了，仍不能解决问题。

各位代表先生，各位同志：积极地动员起来，从开好这次代表会起，把西安市妇女运动提高一步，为建设新西安而奋斗！

为统一国家财政 经济工作而斗争^{*}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的西北财政会议，正是讨论这个决定。这就是说，方针已经有了，问题就在于如何贯彻这个方针，如何把政务院的决定，在西北地区全部实现。“祭东风”要做准备工作，我们今天必须首先整顿自己，搞通思想，然后才能扫除一切障碍，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而斗争。

西安财政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贾拓夫^[97]主任讲得很清楚。的确，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事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环境中，收入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在那个时候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财政会议上的讲话。

的胜利，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我再重复一句，统一国家财政经济，不仅是财政经济本身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应该引起大家警惕！因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十条决定，不迟不早，恰是今年，这个时机之恰当，是异常英明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如何在西北地区贯彻这个决定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领会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为此在西北目前具体情况下，必须坚决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现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已经建立了编制委员会，初步开始进行整编各个部门的机构和核实各个部门的人数。国民党官僚机构臃肿重叠，只管搜刮人民，不管人民死活，所以人民闹革命，推翻了它。我们就不能那样，我们要依照人民意志，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一定人员。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最近切实进行整编机构与核实人数的结果看，在人员的配备上，已较各个部门的初步编制意见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起码对于他们的物质待遇、思想教育，还得设一批人专做此项工作，又增加了一层浪费。过去各单位在核实人数上普遍有错误，增加人员向上报告，减少人员不见报告。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减人员不报告，不能不叫做贪污。这是集体贪污，但个人不能没有责任。这是本位主义思想在作怪，只图单位享受，不管国家大公吃亏，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

面，是要起好大作用的。每一个人都长一张口，天天要吃东西，因此必须首先从核实人数着手。

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清理调查工作。现在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已经建立了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凡是国家的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清理车辆的经验，只要我们真正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深入到各个角落去，定会做出很大成绩。拿仓库来说，多检查，就可防止雨淋、发霉和盗窃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检查各个部门的管理经营制度与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我们的清理检查工作才能深入和彻底，收到真正的效果。

第三，必须厉行节约，省人省钱。最近我们西北地区已经开展了这一运动，有些部门已经获得了初步成绩。根据几个部门的材料来看，虽非贪污，总有浪费，不是过去没有问题，而是熟视无睹。仅就某团一个营来说，进入西安以后，陆续打坏七十多只灯泡。一个灯泡如果能用一年，这就浪费了好多倍。此外人也要节约，有些机关的卫生所，有医生，有护士，又有司机，结果病员仍需去医院治病，而卫生所却又闲着无事。每个人都有“二尺半”^[98]和“斤半米”，五个人的供给等于一户富家的收入。拿浪费时间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不珍惜大家的时间，等于不珍惜大家的生命。过去开会，少数人总是迟到。进入城市以后，这种现象虽然有所改进，但还没有做得很好，有些会议时间拖延太长，有些会议空洞没有内容，假如把这些时间用在工作和生产上，就能创造工作成绩和社会财富，而这种浪费之大，往往是无法计算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厉行节约要从许多方面着手。贪污要反对，浪

费更要反对，因为浪费往往是看不见的、不知不觉的。我们要从领导上展开思想斗争，严惩贪污，厉行节约，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

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在进行税收工作中，我们要反对单纯的片面的“仁政”观点和轻视税收工作的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政府的税收是“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的，这和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剥削广大人民血汗，中饱四大家族⁽⁹⁹⁾私囊的税收政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引导人民走向康乐社会，首先必须克服目前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必须向广大人民征收部分生产盈余作为国家税收，以此积累资金来建设国家工业和从事人民的福利事业，目的在于帮助人民大众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政府向农民征粮、向工商业者征税是十分合理和必要的。征收公粮已有经验，征收工商业税经验还不多。甚至还有人认为征收各种货物税就是“苛捐杂税”，这完全是种糊涂的错误思想。这些人看不见国家建设的光明远景，他们不懂得交税就是公民的一种义务，必须提高他们对于国家责任与公民义务的认识，从而整顿国家的一切税收，做到凡是应该收税的，概不放弃，以增加国家收入，减少国家的困难。只有一切从国家建设出发，国家财政经济繁荣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财富才能增加；否则，国家财政经济崩溃了，任何个人、集团、阶层、党派的利益也都无法保证。

第五，必须遵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我想，要保证上述工作的实现，首先必须在思想上解决问题，这就是：一、树立巩固胜利的观念。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统一财政经济是巩固胜利的头等重要工作。换句话说，财政经济真正做到全部统一，就是巩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并给将来的第二步、第三步铺平了前进大道。二、要认识到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有些糊涂的同志说：“全国财政经济统一不统一，是中央的事，与我个人无关。”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不是无关于己，而是有关于己，难道我们能够像小说里幻想的鲁滨逊一样，漂流到没有人烟的荒岛上，脱离社会的经济生活吗？不能的。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是少了，而是加重了，否则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三、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地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的特殊，不要强调本单位的特殊。强调自己，强调本单位，结果是没有自己，没有本单位，因为全国财政经济不统一，省、大行政区就不能存在，哪里还有你自己和你的单位呢？四、长痛不如短痛，忍受暂时困难，争取长远利益。今天有困难，但比之过去的困难要小得多，统一之后有困难，但比不统一的困难小得多，其后果也轻得多。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有计划、有重点地集中使用力量，否则，就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结果什么也搞不好。有些人觉得习惯不来，不懂得没有重点的恢复和发展，

就没有全面的恢复和发展。有些共产党员还在闹情绪，这是不应该的，要从自己的党性上检讨，检讨自己在这时期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比过去在延安时做得多还是做得少？可以肯定说，有些同志做的工作并不比过去多，生活反而腐化起来，更应该好好检讨自己。五、反对一切不合实际的设施。有些人孤立地强调正规化，而与当前政治生活脱节，是很危险的。他们说：“要适应城市生活。”这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错误说法。城市有多种多样的生活，究竟要适应哪一种？应该说，要适应城市工作情况，但城市的工作情况正是要定员定额，严密分工，更不许可有所浪费。他们所谓的“适应城市生活”，却是指适应旧时代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这样的人，如果不立即“悬崖勒马”，那就可能被这种所谓的“城市生活”腐蚀，而陷入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的泥坑里去。六、必须重视并学会精打细算，管理家务。管家务就是管税收，管银行，管工厂，管合作社，我们会管家务的同志不是没有，而是太少。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做财经工作是“十一门干部”，他们不懂得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大家都要有从头学起的精神，提高政治水平，提高业务水平。

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就是新的环境下，将我们的工作作风纳入正轨的具体表现。我们要毫不留恋地丢掉过去那种不能适应今天工作需要的工作作风，创造出完全适合今天的新的现实情况的工作作风。过去的经验，只能当参考，不能当公式乱搬，乱搬就会出毛病的。

今天到会的同志，有党外人士，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应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举我们过去财政经济工作中的弊病。不管自己的，别人的，以及领导上的缺点，都应大胆地予以揭发，严肃地进行批评。以求得财政经济工作干部思想行动上的统一，拟定新的工作制度和办法，把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我们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全西北各地区迅速地贯彻下去，把这方面的各项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充分发挥民主效能， 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解放后已经十一个多月的今天开幕，这是非常切合时宜的。这次会议，即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即实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七条所规定的：听取与审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等五项职权。这就开始实现了我们国家政权的根本制度。《共同纲领》^{〔94〕}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现在，西安这样实行了，而且实行得好，对西北各地都有影响，他们就要跟这里学习，向这里看齐。这就是有力地推动了全西北人民的民主高潮。所以，开好这个会议，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回顾西安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从去年五月西安解放到八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第一阶段。那时情况严重，外有敌军反扑，内则秩序混乱，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以全力安定秩序，动员群众进行支前和接管工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是第二阶段。这时情况已有改变：敌军被打垮，特务遭受致命打击，接管完成，秩序稳定，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逐步提高。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这些工作成绩的总和，就是开始改变了西安市的面貌：城市秩序由稳定走向巩固；人民群众已基本上组织起来；作为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行之有效且日趋完善，以及随着全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而出现的币值巩固和物价稳定。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有可能从现在起将西安市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恢复和改进生产事业，办好财政经济工作，逐步地将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其他各种必须举办的事情都要兼顾，但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

为负担起新的任务，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力求进步。以人

民代表大会为根本制度的民主政治，必须健全地发展起来，并充分发挥其效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依规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如果事情多，又准备得好，可以多开，一般不能超过三个月不开。休会期间的协商委员会，依规定每月召开一次，必要时也可多开，一般不能超过一个月不开。每次会议要有充分的准备，准备政府工作报告，要开门见山，简明扼要，有情况，有分析，有检讨，有方针和办法。那种繁杂琐碎、包罗万象、冗长沉闷的报告是不好的。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准备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这要大家去做，各位代表均有责任。而关键在于倾听群众的意见。要认定我们的工作，除担负国家交付的任务外，就是要解决群众中间的问题，要在每个时期满足各阶层人民大众一定的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大家都是生活在群众中间，要经常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见，经过协商委员会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分析，抓住一两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再经过代表们拿到群众中去，反复酝酿，反复集中群众的意见，力求作出研究成熟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在开会时要很好地掌握领导，领导好的关键，第一是明确提出问题，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讨论；第二是掌握政策，引导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出正确决议。每次会议只讨论一两个问题，不要太多。讨论问题不怕争论。代表们既然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争论是一定会有的。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欢迎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代表们以主人翁的资格来行使自己的职权，有检查政府

工作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工作有成绩，他们要表扬；有缺点错误，他们应当批评，这种批评正是对群众负责的表现，是应当欢迎的。这正是每个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任何限制和压制批评的行为，是不允许的。问题在于会议领导者要善于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的原则，去分析各种不同意见，正确的必予采用，有偏差的须加修正，向会议进行耐心地解释说服工作，引导大家做出正确可行的决议案。此外，应该去掉那些陈旧的、无内容的、束缚与阻碍我们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一套形式主义。对于会议所做的决议，必须认真地组织传达与贯彻执行。市人民政府所属各局、处，应积极进行传达、讨论并坚决执行。要知道，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市政府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把会议的决议看作是与上级政府所给予的任务或命令同样重要，只有努力完成，不许束之高阁。不执行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就是严重的违法渎职行为。当然，决议的贯彻，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工作人员去做，还有全体代表和协商委员会的协助。不是学旧衙门作风，发下一纸命令，叫群众照此行事，而是要和群众商量。就是将集中起来的群众的意见，又向群众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群众中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只要我们把群众动员起来了，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功的。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正确领导方法。只有真正学会这种方法，才能有保证地做好我们的工作，才能不断地教育和提高群众，使之觉悟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自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正确指导西安的工业生产，度过目前的困难，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西北的工业还会有很大发展，眼前的困难是带暂时性的。克服的办法，首先与主要的是改进企业管理。因为现有的这些工业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与沿海各地交通隔绝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当时较大的公私企业差不多都处于垄断地位，享有高额利润，因而发展了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表现在：人员多，浪费大，生产效率低。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要在今天全国统一、和平建设的环境中继续存在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只要认真改变这种情况，大部分企业还是可以站住脚、并进而再求发展的。改换更进步的机器装备好不好？很好。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工厂自己没有力量去办，只有从现有基础上努力生产，积累资金，将来才会有新机器，否则空喊改良设备，是无用的。而先改良设备，不改进管理，还是要赔钱的。改进企业管理，需要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的共同努力，还须加上人民政府的有力指导。告诉资本家们，要认识发挥工人在协助生产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和遵守劳动纪律的自觉性，改变旧的陈腐的生产管理方法，代之以新的真正有群众作依靠的生产管理方法，这是搞好生产，克服困难的主要环节。告诉工人群众们，要认识搞好生产也是私营工厂中工人的责任，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劳资两利。对于改进管理，工人们应积极地提出意见，和资本家协商解决，但不要因此去干涉资本家的行政权与用人权。总的来说，经过劳资协议，改进企业管理制度，并采取签订集体合同的办法，将新的劳资双方的正常关系固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这就是我们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方针

和办法。国营企业的改进管理工作，更应积极进行。要从登记资财，清理仓库，进行反浪费斗争，开展创新纪录运动做起，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应该而且必须比私营企业做得更快、更好，以发挥国营企业的领导作用。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英明措施，从三月份起全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实现了币值巩固，物价稳定。这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和正当的工商业者是福音，但对于靠做投机生意过活的人则是噩耗。最近时期，有不少的人吃了亏，到处喊叫“生意不能做了”，其实生意还是可以做的，而且向前发展的希望是很大的，但投机生意是不能做了。旧中国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了，要迎接新的时期，改变旧的作法，不是去做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追求高额利润，供养奢侈生活，而是要做正常状态下的流通物资，老老实实，勤俭朴素，获取社会通常利润的报酬。我们工商业的前途是光明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还要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中央号召我们反对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大家口头上都拥护，但实际行动中反掉的却很少。有这类毛病的人，表面上是成天开会、谈话、会客、看报告，跑的腿很多，讲话也不少，累得睡眠不足，身体衰弱，甚至星期天也不休息，确确实实是很辛苦的。但他们或是由于死记老经验，看不见新事物，学习不努力，用旧办法对待新问题，担子越担越重，困难越来越多；或是不善于与别人合作共事，喜欢包揽一切大小事情，自己忙碌不堪，别人闲得难受；或者是漫无方向，盲目乱干，碰见怎样做哪样，陷入事务主义泥坑，还有其他等等。以致当检查他们工作的

结果时，发现他们总是把最主要的事情放弃或放松了。这就表明这些同志的群众观点不足，马列主义不多，实际也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不强。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与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实质上并无区别，其对革命事业同样是有危害的，这不是很明显的么？我们不要常常想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原谅工作中的缺点，而是要常常检查工作，看看工作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反掉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列宁教导我们说：“多谈些经济”。这句话的意味是多么深长！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离开经济，离开群众生产活动的抽象政治，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谈得太多了。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祝会议胜利成功。加强团结，力求进步，迎接和平建设时期的新任务。

掌握情况 依法办事

(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

在司法工作中掌握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掌握情况的前提是了解情况，只有把情况搞清楚才能掌握，掌握了情况才能依法办事，否则事情是不可能办好的。

法律要用到具体环境里，必须与具体事物相结合。我们国家制定的法令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比如要公粮，有的人说：“你们还不是和国民党一样的要！”对这种说法，我们就要分析：同样的都是征公粮，但是目的根本不同，国民党要的粮是用以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剥削压迫全国人民；而我们要的粮，是用以为人民搞建设、谋福利，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我们穷困的国家建设成富强的国家。国民党征粮是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而我们征公粮力求公平合理，有的就出，没的不出，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和国民党是根本不同的。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偏差。有些同志虽然懂得公平合理的原则，但因为不善于掌握情况，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强迫命令、强迫摊派偏向。还有土改订成份问题，本来人家是富农错订成地主，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司法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本来是中农错订成富农。所以说了解情况、掌握情况是极其重要的，只有掌握了情况才能依法办事，不掌握情况，任何事情都很难做好。

掌握了情况，还要依法办事。现在我们依什么法呢？我看我们现在的法，就是《共同纲领》⁽⁹⁴⁾。《共同纲领》就是国家大法，是我们司法工作将来制定具体条例的根据。不管民事刑事，都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以《共同纲领》作为根本法，来订立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好好学习、认真研究《共同纲领》。中央号召我们学习《共同纲领》、开国文件，我们有的同志还没有学好。比如做经济工作的一些同志，对公私关系问题，认为“先公后私”，这话听起来很好听，公家救不下，私人还能救下吗？其实这样讲是不对的，违背了《共同纲领》，如果照这样办，必然对私人资本家限制太大，太厉害，资本家无利可图，工商业就要关门，这样连公家也救不了多久，反而会引起社会的混乱。所以《共同纲领》中只规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并没有说“先公后私”。为什么举这样的例子，提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不仅一般干部，甚至有些高级干部也存在这个倾向。所以，对《共同纲领》我们只能说学了一点，学得还不够，希望同志们再把它好好地研究一下。

司法工作并不是“找岔子”，也不是专为别人犯了法去处罚，那是不对的、消极的。我们不是惩办主义者，最积极的意义在于通过执法（当然也包括处罚）来教育广大人民，扫除各种障碍，以保证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畅通无阻地实施执行。

现在我们党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共产党员犯了法，是一定要用党纪和国法双重来惩处他的。政府也有了监察委员会，看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工作是不是搞好了，是不是尽了责任，是不是遵守政府的法令。我们的司法部门对于违法的行为要依法进行严肃处理，我们要给人民当个青天，绝不要当个昏天，不能因为犯法者是干部、是共产党员，就可以逍遥法外，只要有人控告和检举，又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要依法处理。问题再说回来，就是要有调查研究，分别是非轻重，依法处理案子。这样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

同志们：今天是西安解放的周年纪念日。正当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年来的工作，分析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提起全党同志注意，是有意义的。今天要讲的，就是反对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

一 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自去年进入新区以来，我们的工作情况究竟起了什么变化？这首先是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放了西北五省，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并开始进行各项工作。这个胜利的到来，是迅速的、顺利的。但这个迅速、顺利到来的伟大胜利，也有其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而领导进行这些工作的主观力量却不够坚强。我们地方工作中，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教育和改造，其中不少人仍在用国民党时期的旧作风、旧办法来对待工作；老干部数量很少，又大部分不善于掌握新区情况，许多人在胜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利情况下生长着骄傲情绪，以至沾染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使我们领导工作中发展了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作风，下边执行工作中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其结果，当然是损害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这就成为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自三月间，彭德怀^[95]主席号召反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本位主义等不良倾向后，两月多以来，此间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单位均开展了群众性的反不良倾向运动。各省各地也都积极响应。凡这个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都有很大成绩，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铺张浪费显著减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并开始改进工作。而最重要的，是从一般的反不良倾向，进到深入检查各专业部门、企业单位的领导工作，这才击中了要害，照到了我们工作中的最深处。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将反对不良倾向运动，继续普遍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并引导运动向着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向发展。有两种偏向，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一种是领导者对反不良倾向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对群众运动不作研究，不加引导，将已经揭发出来的事件，搁置起来，不去经过处理这些具体事件教育和提高群众，并吸取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有的甚至将“反铺

张”作为拒绝改进工作的挡箭牌，使下边感到“不顶事”，“没办法”，消沉下去。一种是群众中的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情绪，无休止地追究生活细节。这样会使运动迷失方向，看不见前途，对工作没有好处。正确的原则，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凡非必办的事，哪怕是花一个钱，也是浪费；而必须办的事，即使需花百万千万，也是应当的。所以在群众运动发展过程中，必须密切注视群众思想动态，掌握方向，引导群众循着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以达到联系群众，建立各项必须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二 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官僚主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是忠心耿耿地为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也只有动员千百万群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我们才会有胜利，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如果我们的思想作风不对头，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政治微生物将我们腐蚀，再不加警惕，不谋纠正，就会使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做不好，就会丧失群众的爱戴，甚至会使群众离开我们，使已经获得的伟大胜利不能巩固，甚至遭受失败。

可惜，我们领导工作中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正是很多很多的。

看一看贷放优良棉种的问题吧！今年西北区农林部在关中地区贷放棉籽二百六十余万斤，共可播种十七万余亩。这是一项重大工作，也是关系百万群众生活的重大事件。可是

我们没有做好，大部分地区的出苗情况很不好，最坏的只有一成苗，必须补种或翻种。据估计国家投资损失三十多亿元⁽¹⁰⁰⁾，群众的损失更大，直接影响增产棉花的计划。人民政府在领导生产事业中的政治威信的伤害更是不可计算。仔细研究一下这件事，可以说，从收购到储藏、试验、发放，都有一连串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去年收购时，检验不认真，将新、陈、好、坏参差不齐的棉籽收了进来。储藏又不注意，不顾秋雨多、棉籽湿，大堆积放，致使棉籽受潮发霉。这些情况，领导机关都没有好好检查过。今春各推广站试验，有的出苗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但不上报；有的报告百分之五十，便信以为真，作为一般标准，采取加倍播种方法，向下布置发放。又不去和有经验的农民群众研究，针对各地储藏棉籽霉坏的程度，及今春雨多地凉等实际情况，给农民以切合具体情况的技术指导。结果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又如汉中整修滑、褒、汉三渠水利工程，预算庞大，报告不实，水利部门没有好好审查便批准拨款。后经计划局发现漏洞，派人实地调查，才查出：原预算四百五十万斤小麦，实际最多二百几十万斤即够；滑惠渠拦河大坝坝基不坚固，刚修起又发生新的裂缝；工程方面的包工剥削，派别斗争，弊端重重。类似的事件还很多。这些事件说明，一些旧的技术人员仍然用国民党时代的旧作风、旧办法来对待我们的工作。他们不是将技术与政治结合、与群众结合，而是脱离政治，自以为是，瞧不起群众，结果也就必然使技术脱离实际，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工作自然做不好。而我们担负领导责任的老干部，由于自己的知识不足，外行，不熟悉业务，却又盲目地崇拜旧的技术

人员，思想上当了他们的俘虏，以致把事情弄坏。这可以说是一种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努力学习，尽快消灭自己的落后与无知，熟悉本身业务，逐渐地由外行变成内行、专门家，担负起全部领导责任。对于旧技术人员，我们要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这没有错误，今后还要这样做。但所谓学习，是指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吸取别人所具有而自己所缺少的具体知识，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对旧技术人员都不要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负责帮助他们改造思想，引导他们走上与政治结合、与群众结合的正确道路。

再看看粮食问题。最近财政部门认真检查了关中地区的公粮状况，暴露出我们对情况了解的不确实是极其惊人的。原来关中地区去年年底依据各地报告，计算下来，要吃到今年夏征，尚差七个月口粮。今年二月检查一次，多出三个月口粮，尚差四个月。三月份又检查一次，可以吃到夏征。最近财经工作会议后，因怕存粮发霉，责成各地实报，结果是吃到七月底还余四十余万石⁽⁶⁶⁾。这是何等严重的官僚主义！由于对情况了解不确实，就大大影响我们掌握市场，调配物资的工作。去冬过份估计缺粮的程度，形成公私囤粮，粮价猛涨，还请求中央从河南运来两千万斤小麦；今春物价稳定后，大量存粮外吐，又形成粮价猛跌，至今西安还是全国各大城市中粮价的“盆地”，这是自己的错误加重了自己的困难。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常表现有“只管数字，不问政策”的错误观点，但他们的数字，还是这样的不可靠，这就不能怪知识不够，而是对人民事业的负责精神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强。不

深入下层，不接触实际，光向下面要报告，靠报告了解情况，又靠发指示决定去布置工作，这样就弄坏了我们的事业，使领导工作变成纸上空谈。报告为什么不可靠？这是因为我们党内说真话的人还少，说假话的人多。这又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专门报告“坏消息”的人，他们对上级常是唉声叹气，困难重重，生怕加重自己的负担，粮食问题即其一例；另一种人是专门报告“好消息”的，他看着一切事情都容易，爱放空炮，沉溺在盲目乐观的情绪中。看到下边的“好消息”，都信以为真，赶紧上报；看到下边的“坏消息”，则表示怀疑，压下不管。

专门听“好消息”而弄坏事情的，可以举出贸易部门的典型例子。贸易公司从去年九月起，在关中各地采买粮食五百七十余万斤，棉花四十余万斤，本为供给市场，调节物价。但在最近切实检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一宗庞大的后备物资，原来多半是空中楼阁，钱放了出去，东西没有全部收回来，其中还有种种舞弊。如果不是迷信下面的报告，如何能让这种情况隐藏达半年之久呢？

要克服这种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首先不要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做领导工作。特别在目前情况下，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员，只须有一部分人在家主持日常事情就行了，必须有一部分人员（甚至是大部）经常轮流到下边去，到县上、区上、乡上去，到工厂、学校去，认真检查工作执行情况，深入群众，钻研实际，帮助下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下去，并成为一种制度，说假话人的货色，就没有市场了，就会改变做法。这对于我们的事业和干部本身，都是有很大益

处的。

我们特别要提到这样一种人。他有长久斗争历史，做工作也并非外行，不可说他无能，他在办公室里也坐不住，甚至成天不在家，也常到群众中去问长问短，作报告，讲演，解决问题，说他是空谈家，也冤枉。他成天忙得要命，但工作确实没有做好。毛病在哪里？在于不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他谨小慎微，不放心别人，任何事情都管，爱做寺院里的忙和尚，每天起来，开门闭户，扫地打水，烧茶煮饭，敲罄撞钟，送往迎来，拜佛念经，忙个不停，把有限的精力，消耗到应付事务细故中去，工作推不动，进步很慢，愈来愈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实在是太多了。要知道领导工作是一种艺术，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办法。像打仗一样，光靠勇敢不行，要讲究战略、战术，要学会集中力量去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每一时期只能有一个中心，为了抓住这个中心，就要将别的事丢开一些，放松一些，只要真正抓住这个中心问题，给以透彻解决，其他次要问题也会连带解决，或造成容易解决的条件。同时要善于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体力量，使自己的工作部门成为一套完整的动作合拍的机器，这样才能使工作不断进步。

还有一些人，官僚主义的气味极其浓厚。他做的工作别人不能过问，墙堵得很厚，神圣不可侵犯。一听到批评，就疾言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或是专爱自吹自擂，自作聪明，满足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不求工作的实际效果。他们都是以雷厉风行的外表，掩盖无组织、无纪律恶劣思想的实质，把许多事情弄坏了，自己还不知道。如西北局统战部最近收集

到一些对税收方面的意见，派一位同志去西北区税务总局查对事实，看有无出入，但该局某负责人竟对这个同志大摆官僚架子，胡乱批评一顿，碰回来了。试想：这位同志对我们的干部尚且如此蛮横，群众还敢上门吗？又如陇海路郑州管理局西安分局，工作中发生不少严重问题，但那里党的组织，从不向西北局报告和请示。对于这些同志，首先要帮助他们丢掉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思想，然后才可以谈得到去帮助他们改变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

那种纯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确实不多，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工作，环境对于这种人是很不利的。但我们工作中确实有一批标准的思想懒汉，他们对工作是一味消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因奉此，照例行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从来没有主动办好应办的事情；对陈旧腐朽的东西，恋恋不舍；对新鲜有益的意见，关在门外，避免麻烦；对各种恶劣现象，能有最大的容忍；对同志间的关系，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党内的重大争论，都抱“好好先生”态度；而对自己私人的事情，却往往打算得很周到。不难想象，他领导下的工作是糟糕到极点的。对这种思想懒汉，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也不应忘记，应该帮助他们打通脑筋，开动机器，好好学习，改正错误，向前进步，否则他们是会从领导岗位上跌下来的。

以上，就是我们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些主要的表现形态，至于下边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作风，那就更普遍了。

征粮、收税，是我们进入新区后第一项大规模的群众动

员工作，任务大体完成了，但缺点、错误很多，群众对工作人员有很多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强迫命令作风。干部不做深入宣传解释工作，靠简单命令行事，由少数人把数目分派好，不让大家讲话，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开会也是形式，只许人家赞成干部的意见，不许反对。没有实际的民主，弊端也就发生了，耍私情，包庇亲朋，挤大户，造成畸轻畸重现象。在城市中税收手续只顾工作人员便利，不管群众麻烦。按季征收的税款，要一次缴纳。验货要等几天。更恶劣的，是用打骂、处罚、威胁、拘押等办法推动工作，这是绝对错误的。要知道：除现行犯外，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任何工作人员没有捕人权。特别是区、乡政府、税收机关，绝对没有因催收粮、款而逮捕人的权力。真正破坏征粮税收工作的坏分子，可以上告，由司法机关判处。依照税收条例规定给予处罚的人，应该是那极少数故意违抗税款负担的分子，而不是因我们工作没做到，尚有疑虑，或真有实际困难的人。西安市处罚了八百户工商业者和一千一百辆自行车的持有者，显然是个很大的错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在接收国民党留下的破烂家务时，很多留用人员将那种恶劣的官僚习气、保甲⁽²⁾作风也带过来了；有些老干部、新学生也受了这种作风的传染。群众批评我们说：“宣传政策太少了！”很对。在新区多开些有准备的群众会议，结合布置工作，讲解各种具体政策，是非常需要的。其实很多工作人员自己对于政策就糊里糊涂。我们的税收与国民党税收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国民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形式上我们也是向人民要东西，但目的是为人民办一些

大事情，办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大事，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我们的征粮、征税是能够获得群众自觉拥护的。这些道理，很多工作人员都不了解，脑子里装满了旧思想：“向群众要东西非强迫不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当然也不能全怪下边，领导机关没有好好向他们做教育工作，任务催得紧，政策又没有讲清楚，是有责任的。

领导群众生产，是确实注意了。从各地许多具体措施来看，都真正做到了以生产为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生产任务进行。但工作方法仍然是命令主义多。华阴县有一家农民，没有种政府发的棉籽，而种了自己的棉籽（实际比政府发的棉籽出苗好），干部借口他没有采用优良品种，强迫他铲掉棉苗，处罚一年不准种棉花，真是岂有此理。宝鸡某地为防治畜瘟，命令群众登记鸡、猪数目，引起坏人造谣说：“喂鸡出税，鸡蛋贴印花。”关中各县组织劳动力，有不少形式主义。如渭南某乡共有十一种生产组织：变工队、卖工队、打柴组、互助组、纺织组、编草帽组、卖凉粉组、卖粽子组、卖豆腐组、卖馍组、收鸡蛋组等，一看就知道是形式主义。有些干部是不懂实际，不懂农村，毫无生产知识，自己糊涂，还要把群众也弄糊涂。有些干部是不顾群众的觉悟水平，自己跑得太前了，把自己了解的东西误认为群众也了解。不知道农民是最实际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的亲身体验才会相信。现在的技术改良，将来的集体化，都要经过深入宣传，典型示范，再逐步推广。任何急躁情绪，简单办法，都必定要失败的。

为着克服群众工作中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必须普遍实

行干部整训，改造思想，加强工作中的具体指导，并进行长期不断的教育工作。

三 克服缺点，向胜利前途迈进

在过去一年的具体工作环境中，上述种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恶劣现象，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参加工作的，未经很好教育改造；少数老干部，很难迅速地与各地广大群众相结合，这样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发生上述各种恶劣现象。问题在于这些现象，绝对不能代表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而是我们革命事业前进发展中的缺点，是需要加以反对和克服的。现在到了提起全党警惕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有一切必要条件来着手清除这些现象了！而且不能再迟了！

我们有无把握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呢？是有把握的。

第一、有党的坚强领导。党中央已做了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决定。西北局已经做出具体计划，要开展一个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运动。这就是说，我们党已经及时地提起了警觉。这次整顿思想作风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必须首先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才能有效地纠正底下的命令主义，二者要相互结合。我们这种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全面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应与过去反不良倾向互相脱节，而是将过去已经揭发出来的事件，逐一具体处理，引导群众去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同时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斗争

中，更深入地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等等恶劣现象，加以彻底纠正。

第二、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我们已经选定了一些文件，经过学习文件，教育广大新、老干部迅速提高思想觉悟，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丢掉那些不适合人民利益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丢掉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气、坏思想，建立起正确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要做到学习文件与实际结合，必须开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干部批评自己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容易击中要害，推动全局。但少数人的眼光是有限性的。必须听取下边被领导者的批评，他们能够反映更丰富的生动事实，能够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好比打开窗子才可以放进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们是非常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的。

第三、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一年来党内、党外均有很大进步，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已大大提高，敢于批评我们的缺点，要求我们改进。这是极好的现象。我们对群众的批评，要采取热诚欢迎的态度。经过报纸、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种群众代表会议等等方式，吸引广大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来检查和监督我们的工作。在整顿思想作风运动中，要积极吸收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倾听他们的意见，同时又帮助他们学习，共同进步，办好人民的事业。

第四、我们已经取得许多新的历史经验。无论在统一战线、民族团结、恢复生产、民主改革等等方面，我们工作中都有许多好的范例。这些范例，都是贯穿着群众路线的工作

方法，充满创造性的活动，是真正代表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真正代表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的，也是真正代表着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光明前途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范例，总结经验，教育全党，使之成为改进思想作风的榜样。随着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将这些好的经验，正确的思想作风，推广开来，逐步地普及到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去。

我们和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国民党是代表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它本身就是一具腐朽的肌体，它身上长的脓疮是生了根的，只有溃烂扩展，直到死亡。我们则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本身是个健康的肌体，我们有毛病，也有脓疮，但这是比较轻微的，而且是外界（国民党、旧社会）传染来的，是容易治疗的。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内正常思想斗争是推动我们党前进的动力。每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斗争或学习运动，都必然会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党和人民事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同志们：只要我们认真开展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运动，治好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病害，我们就可以和全西北各族、各界人民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增加无数倍的力量，有保证地做好当前要做的工作。这些意见，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一致行动起来。

依靠和团结职工 办好人民铁路

(一九五一年二月)

西安铁路分局在这一年来，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进步，有成绩。不仅完成了一般任务，而且有很多新创造、新纪录，涌现出了很多新的模范人物。这些成绩，是由于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提高和积极努力所得来的。这是必须肯定的。不肯定这一条，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前途，我们做事就没有信心。

现在来看，依靠职工办好铁路工作的思想，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我们对职工的教育，利用一切机会去提高职工的觉悟，都还做得不好。重视职工的意见、重视职工的创造和智慧，也还都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对于职工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哪怕是很小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去关心，只要现时条件可能办到的，均应设法解决。我们固然有权力要求职工做好工作，但也有义务去为职工服务，这就是我所感觉到的，我们还没有把依靠职工的思想，贯彻到一切问题中去。

现在要求我们领导上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郑州铁路管理局西安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多做群众工作，要学会更科学、更细致的领导方法。一切问题都不能够用“大概”、“一般”去解决，都必须有研究、有分析和采取一系列的有效办法去解决。原因就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向着复杂和高级的方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去掌握更高的领导艺术，这就需要我们z从领导的各个环节上，首先求得改进，去掉官僚主义。

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就是以生产为内容的群众运动。我们不能光在劳动的强度上去要求，而必须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术上去改进，也就是在职工的劳动热情的基础上再加智慧，才会有更多的创造。必须注意启发多数职工的觉悟，才不至于发生模范孤立、光荣孤立、积极分子孤立和领导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过去的缺点，就在于只靠领导上的觉悟和积极分子的觉悟去办事。技术人员在今天更为重要，技术就是本钱，没有技术，就不能很好地去建设。那些有技术的职工，就是今天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对他们，不仅要尊重和爱护，而且要向他们学习。每个人都要掌握一定的技术，特别是从别的岗位调来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条。要提高政治觉悟，与政治相结合的技术，才是最有价值的技术，才能成为有创造性的技术，才能发挥高度的作用，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这又是一切已经掌握一定技术的职工所应注意的问题。

要教育职工有高度的警觉性。因为国内还有阶级敌人，国外还有帝国主义。要有敌情观念，要时刻同隐蔽的进行暗地破坏的敌人作斗争。没有这一点，一个革命的人员就等于放下了武器。但这只是和敌人作斗争，绝不能与改造职工中的

落后思想和错误思想相混淆。在职工中有加入帮会^[101]或一贯道^[86]的，也有过去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74]而今天已经没有联系、没有活动的，这些都只是历史问题或思想上的毛病，仍然是我们的职工同志，而不是反革命分子。对自己人和对敌人必须有两种态度：对敌人是坚决斗争；对自己人是团结和帮助进步。共产党要向广大的优秀职工开门，要向那些虽然过去落后而现在思想进步了的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分子开门，只要他们愿意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均应采取欢迎的态度。

党和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工作，应该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而不是相互掣肘，平分秋色，否则就会造成纠缠不清和步调不一。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一个，就是把生产搞好，把铁路工作做好，一切相互掣肘、步调不一的现象，都是不应该有的。

最后，再讲一下团结问题。西安铁路分局的同志基本上是团结的，新干部和老干部是团结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是团结的，有了这个团结，我们才有上述的成绩。我们还要更好地团结，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成绩。这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都学习，都进步，都提高，这样团结才有保证。这里，特别是共产党员在团结非党员同志时，更要大力克服简单急躁作风，虚心倾听和考虑党外同志每一个意见，每一个有益的建议，积极热情地帮助党外同志进步，并诚恳坦率地接受党外同志的批评，严格改正自己的缺点。

只要我们注意了这些问题，我想西安铁路分局的工作，会有很快很大的进步。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

西北的报纸工作和新闻工作，自去年四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以来有着显著进步，主要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事宣传，联系群众，结合党政中心工作进行宣传等方面。但各地各报的进步不平衡，还赶不上客观要求。目前存在的共同缺点，主要的是群众性不够。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强调提出增强报纸群众性的基本精神。

怎样实现报纸的群众化呢？会议中研究了很多办法。最重要的，就是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为此，特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为干部办报？还是为群众办报？”这个认识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乔木⁽¹⁰²⁾同志说：“任何报纸都应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问题是过去我们贯彻不力，思想上对满足群众要求与满足干部要求的一致性认识不清。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情况；群众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减租、清匪、反特、生产建设、学习等等活动，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得群众化了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

思想上明确之后，要使报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不少缺点，应当认真改进。

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是比工会、青年团、妇联、农会等更加广泛，更多方面的群众工作。

为要忠实地反映群众生产、群众运动、就必须深入群众，去了解群众，熟悉群众。编辑人员要轮流到群众中去，记者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要有一定的阵地，在某些农村、工厂、学校中多联系，多了解，多熟悉。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慢慢熟悉起来，地方多了，朋友多了，记者和编辑就成为社会活动家了。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也只有这样的记者和编辑，才能团结更多的写稿积极分子。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

读者来信、通讯网办好了，可以求得稿件来源的面广、量多，而且更可以系统地、深刻地反映群众运动。读者来信和通讯网是报纸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所以要使报纸群众化，除了主要地依靠新闻工作者本身多努力，积极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外，还要大力开展读者来信和通讯网工作。

反映群众的活动和群众的创造，其作用就在于教育群众。群众运动中一点一滴的新创造，都要及时反映；不要一下求全面、求系统，积累多了，就会形成全面的、系统的东西。

大的运动，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报道，不要繁琐，不要中断。要不断发现和报道新的动态、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推动运动前进。报纸的指导作用，决定于文章的内容。凡真正写出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热情，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创造，群众的要求，群众运动的经验……那么，不论是通讯还是评论，都具有真实的指导性。新闻工作者应当主要依靠通讯、报道典型事例实现指导工作。这方面，现在还做得太少。真正写得好的典型报道还不多。评论要有，如材料不充实，就不必写得太长。目前应先求多写好的通讯。因为评论是群众运动的总结，是把群众的创造集中起来的更提高一步的东西。我们要提倡大家都动手写，并且要推动别人写。但是，写文章也要提倡对群众负责任的作风，要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多研究研究，然后再写。有多写多，有少写少。在新闻工作中，容易产生“走马观花”的作品，但这种作品，决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毛主席说过，认识要深化，写东西是要影响别人的，总要求写得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一点，力求写得好些，要不断进步。每篇文章都应有一定的作用，写前要估计这个作用，写后要检查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就要研究、改进。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写任何文章，只能遵循党的统一方针，违背党的统一方针，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必须牢记。

目前，我们领导方法中的经验主义的东西还多。领导很粗糙，喜欢罗列现象，不加分析，满足一星一点，不求甚解。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多加注意，推动大家逐渐改掉这个毛病。

工作方面，工作作风获得正确解决之后，群众的、通俗的语言、文字就是重要问题了。有人说，我们的报纸，“群众看了面目生疏，很难亲近”。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认真学习，学习群众中、干部中那些富有智慧的生动的语言，来充实我们的作品。也就是说，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东西，群众的报纸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去办，那样群众就会欢迎了。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 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问题^{*}

(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

我想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问题，讲一点意见，和大家商量。

这次会议，大家着重讨论区域自治问题，我认为很必要。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是《共同纲领》^[94]规定的政策，我们已经把积极地推行这个政策作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并且已经在一些地区着手办起来。但是这方面的经验还待总结，尤其是今后具体应当怎样办，更要好好地研究，希望多听到各兄弟民族同志的意见。

解放以来，我们在各民族杂居的地区，陆续召开了各民族人民代表会议，各民族都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经过这个会议建立由各民族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大批地吸收当地各民族的人员参加政府机关工作。各省和许多民族杂居的县份都普遍这样做了。这是一种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是这样性质的机构。大家都已经看到，这是十分合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理而适当的政策和方式。应当指出，这个政策和方式还不是所有地方都实行得很好了，有些地方还做得不够，有些地方对当地民族干部培养提拔得还少，少数地方还未曾能够组织正式的各民族人民代表会议。做好这些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但是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力求早日做得更好。

去年，我们还在甘肃的夏河（拉卜楞）、东乡、卓尼、武坪^[103]、天祝、肃北等县和宁夏的阿拉善旗^[104]、额济纳旗^[105]等蒙、藏和东乡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青海等省某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区、乡也这样做了，情形都很好。现在的问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准备，一定的步骤？这个步骤应当是怎样的？

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又是负责的，要办就办妥善，反对草率。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要有一些什么准备呢？一个是干部准备，一个是群众准备。经验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应当采取由下而上，由小到大的步骤。再则，自治区域的地理界线，必须按各族人民的分布情况，由当地民族人民自己依照经济生活等条件来决定。应当承认，过去留下来的行政区划有不少是不合理的。但是，大家也曾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大多数地区仍然是几个民族杂居的，虽然某些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分别聚居，而居住的情形却又是很复杂的。这些情形，也使我们不得不先采取由下而上、由小到大这样的步骤。

像新疆，有十几个民族，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自然应当在省上组织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那里省以下的各级人民政府也是各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政府既然实行各

民族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发动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加管理自己的事务，吸收当地各民族的积极分子参加行政机关和各种建设事业的工作，就实际替那里的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条件。我们现在就积极着手，求得在两三年内，在各个民族聚居的大多数乡、大多数区和大多数县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那里的某些民族聚居地区，如果是联成一片的，还可以联结成更大的范围的自治区域，建立相当于专区以至行署范围的自治机关。如果在这个自治区内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居住，这个自治区的各族人民代表会议和自治机关又应当有其他少数民族相当名额的代表，并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仍然分别建立各自的自治机关。由此可见，民族的区域自治和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方式，而是互相结合的。这个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和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在我们西北多民族地区是完全合适的，它最能够促进各民族团结，最能够适应民族复杂的情况，充分便利各民族自由发展而又合乎各民族的共同意志，取得各民族共同协助，并且是各民族人民和中央人民政府保持巩固关系的一种最好方式。

大家都明白，民族团结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为在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确立一种真正平等和巩固团结的关系。因此，巩固各民族团结便成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则。历史和当前大势都已经证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和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分不开。各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只有在巩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内紧密团结合作，方能够实现。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整体利益，更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各民族联合的

大家庭的巩固和统一。

今天中国这个国家，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大不相同。民族压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内地和边疆各民族人民，曾经在解放战争中互相支援，赢得胜利，因而已经结成血肉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我们共同斗争，打倒了压迫边疆也压迫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反动统治，我们已经走上了边疆和内地互相帮助、亲密合作的新道路。一年多以来，内地在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今后还要这样做，并且要做得更多更好，努力使各兄弟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渐地赶上内地。这是民族平等团结确实的保证。一年以来，内地曾不断派遣大批干部到各兄弟民族地区工作，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帮助当地开展工作和培养本地的干部，这也是有显著成绩的。新解放地区，一般都需要有比较有经验的老干部去帮助去带领当地干部，几年之后，当地干部就可以很快地在工作中得到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就可以愉快地担负起主要的领导工作了。这是中国革命一条重要的经验，在各少数民族区域也是必然适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毫无疑问，更加密切各民族人民的友爱合作和互相帮助，又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条件和目的。

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保障，就在于我们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祖国大陆的全部领土，巩固了边防，消灭了多年危害各民族人民的外国间谍和土匪，使我们各民族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人民解放军又积极参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协助地方建设，各

民族人民都认识到人民解放军是自己最忠实的武装保卫者。

我想，弄清以上的几个问题，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明确了道路。我们有一个共同基本准则，就是《共同纲领》。一切工作都必须拿《共同纲领》做依据，努力实现，不许打折扣，也不许歪曲。离开《共同纲领》，就必须遭到反对。我们必须取得共同一致的认识，否则就会被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希望我们边疆各民族分裂，和中央人民政府隔离、和内地隔离，制造什么“独立”口号。这是因为他们企图打散中国革命的力量，使边疆各兄弟民族地区从祖国大家庭脱离出来，以便恢复他们的统治，继续实行剥削压迫。我们能够同意这样做吗？当然不能，凡是站在各民族人民利益立场的人都不能够同意这样做。我们的敌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正在实行这种阴谋，到处活动。所谓“大土耳其主义”^[106]，就是敌人阴谋活动之一。对敌人这个阴谋，必须坚决打击，严厉镇压。但是对我们内部一时思想糊涂的人，就要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耐心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清醒过来。我们要把同志和敌人分清，绝对不可以混淆起来，不然就会犯很大的错误。

总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不注意总结已有经验，不积极订出推行的计划；另一种是无准备地盲目去工作。我们不应当“为办区域自治而办区域自治”，而是要把各民族人民发动起来，挑起担子，把当地事情办好，使一切工作都得到改善。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又必须在逐渐改善和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推行，才能够确实办好。盲目去办，就会光有形式，没有真实内容，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我就说这些。以下是对兄弟民族地区工作的意见。

一年多来，各民族的干部、广大群众以及民主人士，都在不断地进步、提高。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以及内地去的干部协力合作，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多，工作也只能做个开头，需要我们更加积极，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

目前在兄弟民族地区到底还有哪些重大任务呢？我认为有以下三件：

第一，深入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开展镇压反革命工作。只有把抗美援朝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才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政治认识，打下友爱合作的思想基础。只有把反革命分子和土匪严厉镇压下去，各民族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进行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的改革，做好这些，各地区的情况就会大大改变，我们才能沿着这条铺平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第二，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力量，发展兄弟民族地区的贸易和医疗工作。这些工作，是有关兄弟民族人旺、财旺两件最迫切、最重要的大事。做好了，就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充实了真正的内容。在兄弟民族的农业地区，只要有条件，就应该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但是，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勉强去办。这个改革是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基本一环，没有这一步，群众不满，人心不安，其他工作也很难开展，早办比迟办好。

第三，有计划地培养兄弟民族的干部，培养各种人才。现

在是有事无人办，或者人手很不够。要用最大决心在几年之内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还得几年。因此，现在兄弟民族地区还十分需要党从内地派去的干部的帮助。他们不但是做好当地工作的有力帮手，而且是各兄弟民族培养自己的干部的最好帮手。内地去的干部必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积极向兄弟民族人民学习，各兄弟民族同志也要和他们亲密团结。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完成各民族人民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

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我们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热烈庆祝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经过三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现在这样的伟大胜利，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它创造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典型。自从有了这个理论，中国革命便大放光彩，中国人民革命的车轮便一直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这个理论，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教育了中国人民。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中间就开始了。起初，是由少数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在关中、陕北等地的学校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和发展了共产党。有了这个条件，就使一九二六年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所写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群众日报》。

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期间，西北革命运动以西安为中心，有了很大发展。当时，我们曾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队、政权、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党员发展到几千人。但是，当时的领导者，不懂得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郑州会议^[107]一开，西北的国民党公开反革命了，对共产党人杀的杀、赶的赶，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共产党人并不灰心丧气，重新集合起来与敌人战斗。而且以刘志丹^[108]、谢子长^[109]为首，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与敌人斗争，主要的是要采用什么方式？我们制定了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拿起枪杆子。为着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又必须是在乡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开始是在陕、甘边的桥山中段建立了一处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获得高度的回旋余地，便在陕北、关中建立了几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了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的出租土地，加以分配；发动了农民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即民兵），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胜利。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做法，

认为打游击战是“逃跑上山”，认为创造游击根据地是“梢山主义”⁽¹¹⁰⁾，要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出击，把陕、甘根据地和四川、青海、新疆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打通国际路线。这在当时红军只有几千人，显然占劣势的情况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¹¹¹⁾、西北军⁽¹¹²⁾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来往。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¹⁰¹⁾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都很有成效。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说这是“勾结军阀”。连在根据地内分配土地时，对待地主与富农加以区别的政策，也被他们认作是“富农路线”。他们是何等愚蠢，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斗争。其结果，是聚集了革命力量，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可是当时是紧张的战斗环境，还没有可能把这些经验都系统地总结起来，并用以教育全党。这就使“左”倾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几度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并采取极端宗派主义的作风，给了革命事业极严重的损害。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了陕北，立即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活动，挽救了西北的革命，并领导着我们继续胜利前进，扩大了陕甘宁边区⁽¹⁰⁾革命根据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再次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原来的

“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们不仅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根据地的许多边沿地区劫去，而且提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即一切经过国民党、蒋介石，把自己束缚起来。毛泽东早就指出这个错误，领导我们把它彻底纠正了。随后毛泽东总结了全国的也包括西北的革命经验，在一九三九年给《共产党人》^[113]写了一篇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实现了三三制^[114]的民主政权，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中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的施政纲领。此后，经过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于一九四二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过去的历史，做出了系统的结论。做得对的，给西北人民立了功的，当然是由刘志丹所领导的正确路线。而反对这个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会议，把西北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从一九三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八年春季，这十三个年头内，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驻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着我们，在这不足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教育人民，依靠人民，打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人民的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获得发展，支援了全国的革命。延安，成为世界闻名的民主圣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又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那些丰富的理论著作，关于政治的、军事的、财政经济的、文化思想的以及哲学问题的，其大部分是在这里写出的。毛泽东热

爱边区人民，当胡、马匪军^[115]进攻边区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常是在行军转移中指挥西北和全国的战争。这是当时全体军民经常有着旺盛斗志和胜利信心的源泉。直到一九四八年延安光复，胡、马匪军全线溃退之后，毛泽东才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离开了陕北。毛泽东给我们西北地区党和人民的教育，真是太广阔了，太深刻了。

我国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胡、马匪军进攻延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疆和平解放，共两年半的时间，是由彭德怀^[95]同志领导的，是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其中大部分的战役，如青化砭^[116]、羊马河^[117]、蟠龙^[118]、沙家店^[119]、清涧^[120]、瓦子街^[121]、荔北^[122]等战役，都是在陕甘宁边区内部或边沿打的。进入西安后，打了一个扶眉战役^[91]，再一个兰州战役^[123]，便基本上解决了西北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主持，在兰州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扩大会议，对西北的胜利，是这样估计的：“西北五省已基本解放。西北战场经过两年多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已基本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81]前委^[83]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英勇顽强，后方支前工作的努力，战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以及各解放区部队的配合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样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没有十大军事原则^[124]，没有历次重大战役中毛泽东的亲切指导，我们能

够胜利吗？是绝对不能的。我们曾有个别的一部分、个别的战役打得不好，不就是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会不深，掌握不紧的缘故吗？

解放后，我们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按照《共同纲领》^[94]，在西北地区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以及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他们一道，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人民政权建设方面，推行各项民主改革方面，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方面，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方面，都开展了切实的有效的的工作，巩固了人民的胜利。今天，西北地区团结、进步的气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西北的面貌是大大的改变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和各方面的人们都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的确，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群众起来了，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一经和群众结合，掌握了群众，就必然变成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任何工作，凡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把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任务拿到群众中去，广泛宣传，细心听取群众的呼声，相信群众力量，动员群众一块去做的，都胜利了，而和上面所说相反，采取强迫命令办法的，十个就有十个都走了弯路，跌了跟头。这些经验，教育了我们许多工作干部，思想作风有了进步。现在，工作向前发展，群众进步很快，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求我们解决。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了。但是，我们大

多数干部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思想方法上，经验主义倾向极为普遍。工作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毛病时常出现。此种状态，是与客观工作的需要十分不相称的。并不是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做好了，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好，有很多重要问题没有及时地加以解决。

最重要的，首先，是城市工人工作方面。毛泽东一再指示我们，要重视城市工作，要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也做过不少工作，但成绩不大，主要的就是没有经过一个扎实的民主改革运动。现在必须补上这一课，才有可能在工厂企业管理工作中，在工会工作中，贯彻民主作风，逐步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不断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搞好生产，并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适当改善工人生活。

其次，是乡村农民工作方面。要领导农民获得解放，就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全西北的一切农业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区在内），都要在一二年内，完成土地改革。这是确定的。但是，农村的工作，决不止于土地改革。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立即转到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上，以保证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并改善农民自己的生活。这就要做好一系列的复杂的细致的具体工作。同时，也要一刻不停止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一个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一点也放松不得。陕北老区^[49]，我们进步慢了，群众就批评了我们。

只有切实做好团结和教育工人、农民的工作，不断提高

工人阶级觉悟，领导农民继续前进；同时，又切实做好其他工作，才能使我们的工农联盟获得前进，从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前进。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是有其特点的。这就是，必须大量培养当地干部，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教育和发动本民族的人民；一切的工作，都要采用适合当地环境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要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一切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都要团结，不能轻易脱离一个不应脱离的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最基本的工作，在城市及有工业经济的地区，必须是做好工人工作，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在农业经济地区，必须是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在游牧区，也要积极改善牧民生活，向劳动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工作。经过这些工作，才能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这都是很明白的。

要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前进和提高，时刻认清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就必须努力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的办法，就是学习，就是组织全党干部和所有革命积极分子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敌人是自满，首先要认真清除党内已经存在的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唤醒大家，认识学习的重要性。按照中央的规定，动员大家开始有计划地学习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和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要大力提倡具体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解决实际问题，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要针对工作中的缺点，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

我批准。领导机关必须重视总结工作。要勤于总结，善于总结，经常用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生动经验教育和提高全体党员。各级党委应立即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规定制度，指示办法，勤督促，勤检查，多多研究和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迅速高涨起来。

我们相信，只要全党政治理论水平不断地提高起来，党的干部和其他的革命积极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会程度不断地加深起来，就一定能够团结西北各族人民，继续做好西北地区的工作，与全国人民一起，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向我们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甘肃 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今年甘肃全省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很重大，是今年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的重心。这是解决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并连带着解决许多问题，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打好基础。是既有经济内容，又有政治内容的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今年甘肃土地改革的基本特点和优点，是经过两年的工作，经过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减租反恶霸运动，我们对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总任务，是完全有信心的，对消灭地主阶级，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对完成每一地区的土地改革，斗倒每一具体的敌人，则不可轻视。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配合，充分准备，紧张努力地去进行战斗。我们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今天的路线、政策和策略，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备，并且已经为我们的领导机关牢牢地掌握住了。历史上土地改革斗争中所曾犯过的领导工作上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的错误，肯定地说，是不会再发生了。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又善于在斗争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领导全省的群众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

首先一个问题，是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于领导群众运动，过去是放手的，今后还要继续放手。过去是削弱封建，今天是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更加放手。是要领导群众起来自己分地，不是干部去分地。土地改革后，还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生产建设。

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要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就是依靠有了阶级觉悟的和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力量，作为进行一切民主改革和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力量。

放手就是放正确之手，是在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指导之下的放手。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和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指针和轨道。只有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和政策的指导下，才能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

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凡属错误的东西，都不能发动群众去干。农民要用“打人”的办法对付地主，这确实表现了农民的义愤，并且那些“打人”的办法，也不是农民发明的，而是向地主阶级过去压迫农民的办法中学来的。但是，必须劝告农民以不采取乱打乱斗争为有利。要向农民做宣传，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天下也永远是人民的。对于那些违法的和罪恶重大的地主，可以不用少数人动手乱打的办法，而采

取经过人民法庭解决的办法，给以严厉的制裁。究竟哪个办法更能显示人民的威力，对地主阶级打击得更狠呢？当然是人民法庭更有威力、更狠。农民是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的。这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说服教育农民。

领导干部要有防止和纠正偏向的观点。不论“左”的或右的，有偏必纠。什么时候发生了偏向就什么时候去纠正，哪里发生了偏向就到哪里去纠正。运动未开展时，需注意纠正不放手之偏；运动开展了之后，就要很好地掌握，注意纠正其他可能发生的偏向。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放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着两旁堤岸，随时随地堵塞漏洞，勿使决口，才能保证河水向着正确的方向奔流。纠偏是教育和提高干部，而不是打击干部。

其次，贯彻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不能加以割裂，如同一条链子，中间不能丢开任何一个环结，也不可以使某些环结联系不紧，不然便不能成为一条完整的链子。

怎样依靠贫农、雇农？并不是找见了贫农、雇农，就等于依靠了他们。最根本的，是要多做教育工作，提高贫农、雇农思想觉悟，才可以依靠上，并须紧接着就去团结中农。满足贫农、雇农的要求，不能只有一般的标准，还须依据各地具体情况，仔细研究，定出可能的、适当的界限，这是十分必要的。

不团结中农，便不能组成反封建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不

能形成农民的优势。这是极其明显的。

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不仅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保护中农。保护中农的积极生产情绪，使中农的生产情绪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体农民的生产情绪都因经过土地改革而提高。

必须注意联合农村中其他一切反封建分子（如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知识分子等），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阵线是越扩大越好，不是越纯粹越好。

对地主斗争，也要区别对待。看他们的罪恶大小，民愤大小，守法和违法，恰当地加以区别，不加区别是不对的。斗争方式，最基本的是说理斗争，并须与人民法庭的判处相结合。这种方式，是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并最有利于启发和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对地主阶级打得狠，打得准，反得彻底。但不要抄袭那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因为那时还不是人民政权，而今天是人民政权，这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必须有领导地、有组织地作战。不乱打、乱杀、乱斗争，不伤害中农，不侵犯工商业和保存富农经济等，是必须严格执行的。

再次，要开好三级干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把政策交代清楚，动员群众，训练干部。在进入土地改革之前，整顿和教育干部，作用很大，必须重视。但又不可企求在进入土地改革前，把干部完全整顿好、教育好。更好地整顿和教育干部是在进入土地改革之后，在实际斗争

中，考验、锻炼和培养干部是最有效的。

还有一个问题，要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路线、政策、策略，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群众斗争的经验，用以指导今天的群众斗争。而今天的群众斗争不是完全重复过去的群众斗争，必定有许多新的经验，新的创造。领导机关要善于发现它、总结它、推广它，用以更好地指导今天的群众斗争。我们是群众的先生，又是群众的学生，要善于当群众的学生，才能更好地给群众当先生。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重视这一条，否则就会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

土地改革运动必须与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相结合，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征粮、生产等工作相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会推动其他的工作。其他工作做好了，也会推动土地改革运动。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125]，必须认真推行，但要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偏向。爱国公约应加以检查。捐献运动也要加以整理。游牧区，除富有者和寺院自动捐献外，牧民中可不普遍动员捐献。农村中的摊派捐献的现象要停止，已摊派者要纠正之。各地捐献运动中，必须坚持增产、自愿原则，掌握确实数目，免得伤害群众情绪或放空炮。

镇压反革命运动，应当正确地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定。最主要的，是努力巩固已有的成绩，继续坚决地打击反革命活动，并加强向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以继续

深入镇压反革命运动。

土地改革最后一步，就是生产建设。土地改革中，领导上时刻都要看到这一步，处处照顾到这一步。

总之，反对“单打一”的工作方法，反对做完一样再做一样的方法。提倡抓住中心，而又看到周围，看到下一步，照顾下一步的做法。本来做好这一步，也就是为的做好下一步，下一步是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发展的。

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今冬明春全省都要进行土地改革，其他回、汉杂居地区也要进行土地改革，这就必然会影响和推动临夏地区的农民群众起来要求土地改革。我们必须有准备地及时地领导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如果拖延下去，会脱离群众，并且明年甘肃还得再来一次土地改革，于群众、于领导均不利。另外，临夏已分了战犯马步芳⁽¹²⁶⁾、马鸿逵⁽¹²⁷⁾的地，开展了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民族关系改进了，秩序安定了。虽有困难，但可以进行土地改革，和全省一起做完，于群众、于领导均有利。

但是，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因为这是回、汉杂居地区，又不是一般的回、汉杂居地区，而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

怎样区别呢？就是在进行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加以区别。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每一区、乡，都要耐心地做好教育

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要区别不同情况，提高群众斗争的策略性，切忌乱斗一气，而是要集中力量斗倒群众最痛恨的、并已完全孤立了的恶霸地主。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才能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必须教育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只要农民觉悟到要分地，这就是提高，就要领导农民实现这个要求。分了土地以后，再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农民的觉悟便会很快的提高，回、汉人民也会更加团结。

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就其全过程说，仍然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这是不能变的。又必须是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前提的，这也是不能变的。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凡与此相违反的政策和办法，都不能采用。

在土地改革中继续作好 政府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当然也是进行土地改革的统一战线。

在政府机关中，一切非共产党员干部，包括一般的公务人员，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干部、专家、各民主党

派的人士、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和各民族的代表人士等等，都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我们党对广大非党干部负有责任，即和人家团结好，并帮助人家进步的责任。这个工作要全党都去做。有些同志，把统一战线工作认作只是对少数人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党员要做的工作，是不对的。

一切工作，尤其是目前的土地改革工作，光靠共产党员干部是做不了的。必须和广大的非党干部团结好，鼓励他们过关，和他们一起进入土地改革运动，才能做得好。非党干部有些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本人还是地主成份，要进行教育，依本人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凡拥护土地改革，赞助土地改革，出于真心诚意，确有事实表现者，一律欢迎，不得拒绝，不得排斥。党外人士要求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运动者，必须热烈欢迎，诚恳帮助。只有对于那一种人，即屡经教育、毫不悔改、坚决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反对和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人，才得以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对待之。估计这种人在我们政府机关中，将是很少很少的。

目前非党干部抱作客思想、马马虎虎态度的，已经大大减少，甚至已经没有了。大家都要求做事；要求多做事，要求做出成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有的共产党员干部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把持包办作风虽然克服了许多，又仍然保存了许多，不给予非党干部以履行其职务相当的权力，少给或不给工作做，或给工作做又不加帮助，使人家做不出应有的成绩。这些现象，还是普遍存在，还是主要偏向。

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应当检查一下统一战线工作，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放手地给予非党干部以履行其职务相当

的权力，给人家工作做，并积极帮助人家做出成绩来。

领导人民政府的工作，我们共产党有整套的经验。而很多非党干部却没有这一套经验。他们需要学习，需要长时期地学习，才能学会这新的一套。非党干部愿意学习的，是普遍现象；不愿学习或拒绝学习的，已经很少或没有了。而党员干部注意积极帮助非党干部学习的，还很少，不注意帮助非党干部学习的还是普遍现象。

要知道，在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干部光埋头做好自己本身的工作，只算完成了一半任务，必须帮助非党干部也都把工作做好，才算完成了全部任务。是否帮助非党干部做好工作，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标准了。在这个方面，必须有切实的改进。

共产党员干部在政府机关中的工作，是靠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靠正确的指导方针，采取说服方法，实现党的领导。而不是靠职位，靠权力，或实行命令主义的办法。这一条原则，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

共产党员干部要和非党干部团结好，采取说服方法，帮助人家做好工作和不断进步。这是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正确关系。在土地改革中应当如此，在一切工作中都应当如此。

改善领导工作

中心一点，是要善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做好这一条才能使干部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经常保持饱满的情

绪。

现在简单急躁、强迫命令的作风，确实存在，并且不少。其主要原因，就是任务多、办法少。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情况，是上边决定任务、中间要任务、下边交任务。有的说：上边做决定的时候，条条都是政治任务，下边做工作的时候，就光有任务，没有政治了。这确实是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偏向。

根源还是在领导上。现在各级党的领导骨干的思想状态，是经验主义倾向普遍存在，保持老一套，不注意研究和吸收新的东西，不会向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另外有一些同志，又离开了实际工作，去做没有对象的空洞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很好地解决不断发展着的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不能有效地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

注意解决工作方法问题，是领导机关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提得多么尖锐啊！

完成任何任务，都不仅是把任务交给下边，而且要给干部讲道理、教方法。不仅开始时讲、要教，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不断地讲、不断地教。这就是实际的政策、策略教育，就是最有效能的政治思想工作。这里，基本一环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克服经验主义思想，多多研究和吸收新的东西，才有东西讲、有东西教。新的东西不仅是有了，而且很多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出来，加以提炼，用

以丰富自己的领导经验。这是要下苦功夫的，认真地开动思想机器，克服懒惰习气，才能做到的。取得知识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

向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会有思想斗争。有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这次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不怕会上有争论，而是要正确地引导和发展争论。真理是愈辩愈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愈开展，我们进步愈快。会上争议多一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会少一点；会议中麻烦多一些，工作中的麻烦会少一些。

对待思想斗争的正确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服从真理。批评别人，必须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注意分寸，不乱戴帽子，勿早作结论。要提高思想斗争中的思想性，时刻警惕着、不要以错误对错误，不要以自己的这一片面道理去反对别人的另一片面道理。否则思想斗争本身就缺乏思想性，就不会有很好的收获。一切问题，凡从实际出发，就有准则，离开了实际，就没有准则，去掉个人成见，就容易是非分明；反之，就会走弯路。

领导和掌握党内思想斗争，是一种艺术。要解决问题，又要保持干部的饱满情绪。现在有些干部怕纠偏，就是因为过去纠偏中某些工作方法不当之故。今后还是有偏必纠，但要注意方法，要和风细雨，具体分析，以理服人，做得好了，干部会得到提高，就不会害怕。

领导机关重视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十分之九了。

文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这次西北地区文化行政会议，是解放后开的第一次文化会议。这样的会议，和我们动员进行土地改革的会议、动员进行工业建设的会议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次会议，中心是要弄清西北文化工作的任务，弄清文化工作应该如何配合我们今冬明春在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和在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减租反恶霸的运动。我们应当在整个斗争里，把这支文化大军也配合上去，共同为取得这些斗争的胜利而努力。两年来，西北地区的文化艺术运动有很多进步和创造，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重要的是今后，是今冬明春我们的文化艺术运动怎样去开展，我这里简要地讲几个问题。

第一，要重视文化工作。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已解释得很清楚了，不需要我再多讲。现在我们西北要发展农业，发展工业，进行经济建设。我们为了要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以及经济建设的任务，必须把文化工作加强起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为新民主主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区第一次文化行政会议上的讲话。

义的政治、经济服务，并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去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同时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断地从精神上武装广大人民，才能保证我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和前进。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缺少了文化事业的推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第二，解放以来文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行政组织上来看，像刚才成部长⁽¹²⁸⁾所讲的是有教无文或者重教轻文了。上边有个文化部，到省上叫个文教厅，把文削了一半，到了下边就根本不文了。但在实际运动里，有文无文呢？我们的文很多。两年来文艺运动有很大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文化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电影、戏剧、曲艺、秧歌、黑板报、音乐、小说、诗歌以及说书等等方面，都是我们文化运动的内容。科学普及工作在广阔的领域里，也都开始了活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文化工作在许多方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广阔领域里，配合着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生产运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有很多很好的创造，并且已经形成了一支较大的文化工作队伍。今天这个队伍，比我们一九四九年发展了好几倍。那时我们只有几个“团”，今天我们就有几十个“团”，等于十几个“师”，过去我们柯老⁽¹²⁹⁾领导一个民众剧团，把它叫做“野战兵团”，叫得很对。过去我们只有那一个“野战兵团”，现在我们有几十个这样的“野战兵团”，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支队伍。有了这个根基，就给我们将来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要掀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离开经济这个基础，文化是

不可能发展的。

第三，文化行政部门到底要做什么？旧的反动政权，是不重视提高人民文化的。他们不想叫老百姓有知识，不想叫老百姓懂得道理。群众越不懂道理越愚昧，越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我们呢？和他们相反。我们的一切制度和措施，都是为了如何使群众聪明，使群众有智慧，掌握科学知识。人民的文化水平越高，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就越快。所以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文化行政机构，作为人民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央有，大区有，省上有，地县也有。这是一个新的政府工作部门。如何开展推动工作，我们缺少经验，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创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各级的文化工作领导机关应该经常给各方面的文化活动指出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一条，文化部就不成为一个思想领导部门了，它的水平就降低到一个文工团或一个文工队的水平，而不能够起领导思想、领导文化运动的作用了。现在大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用一切方法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生产、民族团结等等，通过戏剧、音乐、诗歌、绘画、电影、说书、大鼓等形式去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启发人民的觉悟，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水平，使他们了解更多的问题。要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伟大成就，要歌唱人民的胜利，引导人民热爱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热爱劳动，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总括起来，就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广大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不断高涨，必然会推动经济建设更快地发展。

我们检验文化工作成绩的大小，就看他们是否与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服务，只有这一个标准，不能有别的标准。具体地说，就是你写的剧本、演出的戏、举办的秧歌队，群众爱不爱看？受没受到教育？不在你演出的多，也不在你写的剧本多，如果对群众毫无影响，毫不起作用，就是写得演得再多，也是一文钱不值，也无成绩可言。因为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原则，不管你讲得再好，文章写得再长，剧本写得再好，不管技巧如何，你这东西都是失败的，没有用处的，没有价值的，也许还是有害的。我们应当对好的表扬，对不好的给予批评，只有这一个标准，不能有别的标准。文学艺术工作、电影工作、科学普及工作都是如此，毫无例外。比如科学普及工作，决不是在房子里研究得很好，材料档案很多、很厚，就行了，而应当看给群众做了些什么事情？解决了些什么实际问题？起了多大作用？这次我们到兰州看了一下，科学馆的幻灯就搞得很好。三四十万元^{〔100〕}的成本就可以搞出一部幻灯片子来，拿到农村里去演。这个土电影好得很，像这样就与我们当前的工作结合起来了。今天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离开当前群众的实际，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不能离开今天的现实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要很好地注意。

各民族的文化，要共同发展，要互相交流，特别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维吾尔族的文化、蒙古族的文化、藏族的文化、回族的文化，以及很多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应该帮助他们发展。少数民族也应该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叫共同发展，互相发

展，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原盘端过来，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把原有的水平加以提高和发挥，这就是创造。一个民族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批判地吸收精华，去掉糟粕，这样才对。

西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因之在西北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有着重大的意义。比起外地来说，西安的文物古迹可以说非常丰富。另外，延安是全中国的民主圣地，革命文物也非常丰富，我们要用很大力量做保护文物古迹的工作。当然现在工作中存在许多困难，人力不足，经费不够，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很快地克服这些困难，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如果过几年再抓，那个损失就大了。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应该好好地保护、爱护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宝物。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很快地抓起来。西北军政委员会已做出保护文物的决定，各地都要重视这一工作。文物搜集在我们西北各地都应该有个组织，组织个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今后在修铁路、修工厂时从地下挖出的东西，以及流散在民间的东西，都要想办法搜集起来，很好地加以管理。现在我们的军队还住在文庙^[130]里，住在大雁塔^[131]里，把有古迹的地方占用啦，要赶快往出搬！决定一出，马上就要兑现！因为你占在那里，别人连门都进不去！这样的事情，是不文明、没有文化的表现。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宣传，进行教育，加强管理。

第四，关于文化统一战线问题。西北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在组织上有了“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了这个组织，西北文艺工作者，无论他们从事何种形式的文艺工作，搞戏

剧、搞曲艺、搞马戏、搞秧歌、搞自乐班，等等，都联合起来了，结成了一个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但实际工作，我觉得做得还不够，应当引起我们各地同志的注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团结改造和提高旧有的文化界、文艺界的一切人物和文化工作者。这些人物今天在各地都大量存在着，在人民群众中影响也很大。我们必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前进，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对这些文化工作者、艺人，要耐心地给予帮助，教育提高他们。他们有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只要在思想上帮助他们进步，就可以使他们做出贡献。像我们的民间艺人，过去延安的韩起祥^[132]，关中的谢茂恭^[133]、王老九^[134]等等，他们生活丰富，整天在群众中，与群众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歌，写出来的词非常有内容，他们需要的就是在思想上不断地提高。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在思想上进步，搞清楚今天工作是为什么人服务，也就是立场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他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对旧的艺术形式，如像眉户啦，秦腔啦，河南戏啦，京戏啦，山西梆子啦，农村中的很多秧歌啦，都不能够取否定的态度，而是要研究，要改进，我看可以用竞赛的办法，看见他有缺点，要提出来，请他改正，他如果不改的话，别的好的艺术形式就会跑到头里去，群众都看人家的，不看你的，你不关门到哪里去？不用我们去强迫取消。用这样的办法，达到逐步提高的目的。现在我们对旧的戏剧指责太多，这也有毛病，那也有毛病，一切都不要演，那是错误的。对于旧艺人来说，这就是把他们的馍笼子挂到二梁上去了。他就靠这个生活，靠

这个吃饭，你不让他去干，他不是没有职业啦？这就等于把他的伙食停止了！就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随便做个决定，这个戏不要演，那个戏不要演，在他们就是天大的事情，就牵扯他们的生活问题，能吃饭不能吃饭的问题！对有些老作家，包括各方面的作家（西安市就有这样一批人），一些老先生，比如西安这些秦腔老剧作家，应当引导他们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去看待事物，改进作品，不能叫人家都转业。你想这些老先生搞了几十年了，今天叫他们从这个事业转到别的方面去，能不能办好，老先生们都没有信心啦！就是要帮助他们。同时我们不一定要求这些老先生都写现代的戏，他们写现代的戏很困难，因为现代的生活他们知道得少。他们可以写历史剧，只要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加以修改提高，这样的剧作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些老先生一下子创作不出来，也应该给他们的生活以保障，应该叫他们吃饭。听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写出好作品的要奖励，写不出来的也要养活他们。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思想批评，不是只在搞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中开展思想批评；应当在我们整个文化战线里开展思想批评。凡是一切不利于人民民主事业的思想，不利于人民民主事业的创作，都必须开展批评。批评为的是去掉不利于人民的部分，使得我们的文艺更加有利于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爱国主义的觉悟，否则我们便不能前进。批评就是思想斗争，我们不要怕批评、怕斗争。任何事物都是在批评中、斗争中、矛盾中不断前进的。在批评中改正了缺点，发扬了优点，就把事情做好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批评，要欢迎批评。批评不是整人，是帮助人，教育人。

批评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就像毛泽东同志说的：“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生活里要是没有批评，就没有朝气，就会暮气沉沉。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对于文艺作品方面的批评和对书画的批评，很好，有成绩。批评也要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提高，使之更能起积极作用，更能推动我们的工作前进。要总结经验，提高批评的思想性，使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更大的成绩。批评要有分析，要区别被批评事情的性质，哪些是属于反动的，哪些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对每一个批评对象全面的去看，具体的分析，力戒草率。批评要使人人家心悦诚服，乐于接受，鼓励人家勇气，不是打击人家情绪。批评是要引导人家应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对待问题，而不是要求别人个个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有些同志老是习惯于提出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对人家的一切都看不上眼，而不善于作具体分析。这些同志如果要使自己的批评得到更好的效果，就应该研究改进批评的方法。

最后一点就是学习问题。我们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队伍首先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我们不高，怎么去把人民提高？今天我们对人民要拿出一套本领来服务，不然为人民服务就成为空谈了。对群众要有东西服务，而且要服务得更好。经过我们一连串、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真正把群众觉悟提高，推动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目前，首先要在文化工作队伍内部普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必须解决好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立场、观点的

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条才能有坚固的团结，才能使文化工作获得迅速的发展和进步，才能改进我们文化战线今天的状况，这支队伍才能够更有力量。中心问题，就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希望大家加以研究，采取各种适宜方式解决好这个中心问题。

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自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来，这八个月期间，我们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在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地区普及了，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展了。经过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严重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135]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地方治安业已巩固。在今年春季完成了关中、关东等处八百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之后，我们就积极准备并已在陕、甘、宁、青四省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减租。这次会议批准了各省的计划。已经土地改革的地区，正集中力量进一步组织和教育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六七月间，我们开始在一些工厂、矿山及企业进行民主改革运动，现在正向公、私工厂、矿山和交通部门等企业及某些行业继续推行这个运动，要在明年内在全区普遍做好此项工作。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已普遍恢复，并且有了发展。广大的知识分子一般地都有进步。此外，我们在推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一部分。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方面，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在各项财政经济工作方面，均有成绩，也都有进步。今年的粮食、棉花产量已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工业生产也一般地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畜牧业也大体接近恢复解放前的水平。在铁路交通方面，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开始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和浪费现象，大大节约了国家资财，缩短了工程时限，在全体员工积极努力之下确定了争取明年通车兰州的任务。总之，这八个月的工作，是繁重的、紧张的。现在已经可以看明白，大体上再经过明年一年的工作，到后年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了。

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我们热烈响应这个号召，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运动开展了，必将给国家积累大量财富，增加国防力量，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也必然会大大推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增产和节约都是积极的。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是为了增产。我们要建设工业，就必须不断地积累大量的资金，资金的来源，主要的依靠全体人民用增产节约的办法来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依靠别的办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增产节约并不是解决某种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我们国家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国家建设中一个经常性重要性的政策。有人说：“西北经济落后，增产可能性不大。”“西北地方穷，节约不出多少东西。”“西北浪费不严重，贪污少，没有反头。”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这是表现了一种带有自满情绪的保守观点。西北机械工业系统的设备利用率只有百分

之二十九点三，这不是说明还有提高设备利用率的很大可能性吗？西北石油管理局所属单位，从七月到十月的四个月期间，已经给国家增产节约了三百零一亿六千万元^[100]。西北电业管理总局及西安各直属单位，已经提出保证年底前增产节约粮食七百吨的计划。这些岂不都是很大的成绩吗？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经过反复检查，发现各项工程预算平均剩余百分之十以上，有的重点工程竟还剩余百分之五十，并已从修改计划和预算中给国家节约几千亿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在检查和处理贪污蜕化案件中，涉及到的共产党员已达千余人；而在国家机关中，有一部分从旧的军政机关转来的带有浓厚的国民党作风又尚未认真改造的人员，在他们中间存在的贪污渎职现象，要比共产党员中发现的还更多些，更严重些。虽然去年我们曾开展了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也有很大成效，但房子是要时常打扫的，脸是天天要洗的，今天提出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以清除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障碍，岂不是同样很切合时宜吗？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出发，应当得出结论说：正因为我们落后，就更要努力增产节约，尽快发展我们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向全国其他先进地区看齐。从西北地区经济工作还比较落后的情况出发，应当得出结论说：正因为我们做经济工作经验还少，对工业、农业和畜牧业都还管得不多，我们工作中的漏洞还很多，增产节约的可能性就还很大很大，我们就更要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样的估计和结论，岂不是更正确些吗！岂不是更合乎实际，更合乎人民的利益吗！

关于在西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方向和办法，贾拓夫⁽⁹⁷⁾副主任已有详细的报告，又经过大会讨论和分组讨论，大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最主要的就是实行以下六条：

一、各省人民政府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领导工业生产及经济事业上，管好现有企业，努力学习。各国营工厂、矿山及地方企业，都要在现有设备及原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从提高设备利用率，推广先进经验，改进操作方法，清理资财，节约资金、原料，减少管理费用，充分发挥一切潜在力量，提高生产数量和质量，减少废品和损耗等方面，加以研究，订出明年全年的增产节约计划，至迟于十二月中旬报告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并发动和依靠全体职工为完成计划而奋斗。新建矿厂及原有矿厂的增加设备，须保证按期开工，并同样地推行增产节约运动。私营企业中也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鼓励私人投资工、矿业，并给以指导。对地方企业应持积极发展的方针，但须防止盲目性，订出计划，然后去做。我们国家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很快就要到来了。西北将是国家经济建设重要基地之一，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加强西北区的资源勘察、调查统计并切实做好计划工作，以便有充分准备和有精确计划地开始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工作。

二、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林业生产，仍然是我们长期努力的重要方面。在农业上，一般不再增开荒地，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争取明年增产粮食十亿斤、棉花六十万担。各级主管部门应即做出具体计划，并从指导群众的变工队⁽³⁶⁾互助，积肥施肥，防治病虫害，改进和发展水利等几个方面，多做工作，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畜牧业方

面，明年争取增殖役畜三十五万头，羊子二百五十万只。林业方面，明年计划造林二十一万亩，封山育林二百万亩。均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各主管部门做出具体计划，指导并协助各地实行。并须注意在农业地区，提倡农户养羊养猪积肥，种植护田林，使农、牧、林业生产互相结合。

三、金融贸易工作必须紧紧地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特别是国营贸易系统，为适应公、私经济发展的需要，须保证明年收购总值较今年完成数增加百分之五十，销货总值增加一倍。应与各地供销合作社经营业务相结合，并大力扶助其发展，使明年合作社能达到发展社员两倍，扩大股金一倍。收购和推销的对象，主要的应是广大农村和游牧区人民的主副产品、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应当总结今年交流土产的经验，并根据新的情况，给各地群众的副业生产以正确指导，使之与市场需要相结合，克服盲目性。加强对私营商业的指导，并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更有力地稳定物价。

四、加强财政工作，保证公粮、税收任务完成。严格管理各种仓库，力求减少以至消灭损失。认真执行预算决算和各项财务制度。保证国防建设，稳定市场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必需费用，其他各项事业则量力举办，凡可不办或缓办的事，即应不办或缓办。坚决克服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的平均主义思想。

五、调整机构，提高工作效能。依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必须实行合理调整，精简上层，加强下层的原则。经过适当地调整和精简，大区可以缩减五分之一的人员，各省、市可以缩减十分之一的人员，专区一级也应按照全国编制规定加

以缩减，但县以下则一般不应减少，而应合理调整并加强之。应减少层次，简化办事规程，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提高工作效能。这样，不但将大大减少由于机构重叠、臃肿所形成的人力、财力的浪费，而且对于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将从组织上给以抵制。必须缩减下来的人员，必须尽量充实到基层组织，并保证陆续抽调足够的干部，切实加强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

六、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首先是管好基本建设。学习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的经验，分派干部深入下层，亲到工地，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团结工程技术人员，反复检查，发扬民主，奖励创造，打破保守观点，揭发并克服贪污、浪费现象，为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约国家资财而斗争。其次，是加强各事业机关的财务管理工作。一方面是合理用钱，保证将现有的钱用到最必需的事业上去；另一方面是节约开支，提倡以最小限度的钱，办最大限度的事。对于那种浪费金钱又办不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开展批评并加以纠正。再次，是除对供给制、薪金制人员的生活给予必要的关注不使下降外，机关生活、办公费用力求节约，发扬我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停止修建和购买住房，精减会议，废除不必要的请客、送礼等繁礼俗仪，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并大力提倡爱护公物。对于各个方面发现的贪污案件，必须彻底查清，严肃处理，开展必要的斗争，用以教育干部。对于严重损害国家财产分子，必须给以严厉惩处。

我们这次会议后，各地都应进行一次以继续反对官僚主

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结合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纠正缺点，解决突出的问题，以提高干部思想，严肃国家法纪，改进作风，推动工作。这次整风，各地都应在短时期内集中力量进行，最多不超过一个月。时间大体可选择在今年十二月到明年一月之内，不可再拖。

在这个整风运动中间，并在这个整风运动的思想基础上，积极地、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领导机关必须抓住几个重点方面，深入发动群众，经常检查、指导，做出显著的成绩，取得经验。但又必须逐渐地将这个运动推广到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内容，成为新的社会风气。这样，这个运动才能够热烈地、紧张地、持久地发展下去。我们相信：这个运动开展起来，我们一定能够获得很大的成绩，我们也一定能够学会很多东西，我们将得到新的更大的胜利。

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二、西藏目前主要应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¹³⁶⁾与班禅⁽¹³⁷⁾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西藏反封建目前还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点要在干部中讲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则下边会出毛病（如不尊重风俗习惯，急欲改革，不愿与封建势力接近等）。

• 这是习仲勋同志对西北区护送班禅进藏工作干部的谈话要点。中共西藏工委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将这个要点印发西藏各地。

三、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办法。在西藏目前做工作不要分工太细，每个同志都应了解全面的及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是说“去粗取精”吗？粗是精的基础，无粗就没有精。

四、开始一个时期，我们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干部下到“宗”^[138]上去。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军政委员会^[139]成立以后，多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名义，组织各方面的人下到各地去，搞完工作以后回来，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

五、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多扶植，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班禅他们在西藏是被压迫的，他们不靠我们是不可能的，会和我们长期合作的，我们应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今天他们在大的方面和我们联合在一起，这就对了，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六、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随班禅进藏的青海藏民同志还要注意，你们到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藏民团结一致，应该谦虚，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的印象。

发动群众，深入开展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已在西北地区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情况，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运动还只能说是处在初期状态中，不仅发展得不平衡，而且是不深，不广，劲头不大。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箭，还没有射中要害。

从西北区各地、各部门和各机关中情况来看，正如《群众日报》一月五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基本标志，就是看群众发动的深度如何。有的单位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运动就开展得健康而有力。但是，这种情况在目前还只是少数。有的单位，还只是一般地发动了群众，运动不是那样具有声势，而是缺乏内容，这种情况在目前还是多数。有的单位，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起来，那里的领导还在睡觉，群众没有人去领导，好像“世外桃源”，用军事术语来说，这是一些“死角”，这是最不好的情况，在目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区区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前还有不少单位是这样。为了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今后，凡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必须坚持正确的领导，使运动继续深入，以求得迅速而彻底地解决这场战斗。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必须决心扫除障碍，端正态度，向好的榜样看齐。第三种情况，是很糟糕、很不好的情况，如果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势必大大妨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如果不立即加以改变，就将使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在一切党的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私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部门，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面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业中，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使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并且有内容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

从前一个时期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西北地区是非常严重的，先就贪污来说，查出来的问题已经是很惊人的了。不进行这个运动，谁能知道在我们的干部中间，竟有这么一些人作了盗贼。他们穿着革命的服装，竟做盗窃国家财产的勾当。这些分子不仅可耻，而且有罪，他们的罪名就是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犯。他们已经是陷在污泥之中，失去战斗意志，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污毒，成了人民的敌人、革命的破坏分子了。我们不能对这种人采取容忍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从现在发现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大贪污不少，小贪污更多。许多大贪

污都是从小贪污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队伍里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被阶级敌人所征服。我们必须挽救这些人，这是我们应有的革命意志，也是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所必须具有的革命职责。

铺张浪费现象较之贪污盗窃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并且不为一般人所重视。有些浪费分子，甚至认为：“贪污有罪、浪费无妨”，“为了完成任务，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浪费对国家财富的损害远远超过贪污和盗窃。铺张浪费分子常常以为没有将国家的财产窃为私有而自得，这是很坏的思想。要知道，人民和国家是要我们用一个钱办一个钱的事，而不是让我们花费很多的钱而办很少的事，如果花费大笔款项而办坏了人民和国家的事业，难道也应该问心自安吗？这一种对国家财富的损害，比之于贪污和盗窃又有什么不同呢？因而，贪污可耻，浪费也可耻；贪污有罪，浪费也有罪，只不过后者的罪名是浪费罢了。

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官僚主义分子，常常就是浪费行为的倡导者、批准者，是贪污行为的掩护者、纵容者。没有官僚主义，贪污浪费就不会滋长起来，或不会很多地滋长起来。官僚主义者，又常常以自己身上“干净”而自豪，殊不知正是由于官僚主义者这样整天闭着眼睛，才给敌人的侵袭开了大门。官僚主义者是受敌人的称道与拥护的，没有官僚主义者存在，万恶的“苍蝇”就会消灭。难道能说官僚主义者是正确的吗？他们对人民和国家的危害很难说会小于贪污、浪费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认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官僚主义的特点。官僚主义分子，首先是骄傲自满，无是

非观念，没有明朗的态度，含糊其词，在新事物面前昏头昏脑，别人作得正确的，他们总看不到眼里，既不掌握材料，又不调查研究，手脚忙碌，头脑休息，感觉迟钝。他们是歪风邪气的保护伞。他们满足于事物形式上的平静，不去发掘事物的本质，或者陶醉于若干点滴的改革，反而对于阶级敌人变换方式的猛烈进攻丧失警惕，放任贪污、浪费，不积极设防和根本清除。其中，有些人自己手上就不干净，就有贪污腐化行为，因而，对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斗争消极怠工，阳奉阴违。这样的官僚主义当然与我们战斗的马列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因此，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痛击官僚主义。这是我们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增产节约”号召，首先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思想上、领导上的基本要求。必须认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如何进一步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呢？这个运动必须在全区党政军民、内外上下、城市乡村以及全体人民中同时开展起来，我们必须普遍动员，并实行重点检查。普遍动员为的是发动群众，大家都在思想上洗个澡；重点检查为的是深入揭发，根治我们的创伤。因此，我们应当以财政经济机关和事业部门为重点，在一般机关则以掌管财务的部门为重点。司法、公安机关，也要着重检查工

作人员有无受贿、敲诈现象。各机关负责的干部也应检查自己个人的开支，以身作则，不但做到自己不浪费，而且使自己左右的人员也不浪费，以改变风气。斗争的锋芒应针对大的和一贯的贪污、浪费、腐化分子。对中、小贪污、浪费腐化分子，则经过教育改造，叫他们彻底坦白、反省，一次坦白清楚。对中、小贪污、浪费、腐化分子或一次坦白清楚的人，在处理上应该是有区别的。我们应根据他们的错误大小、悔改程度来分别处理。

鉴于许多机关干部中的贪污行为都是勾结奸商进行的或受奸商引诱的，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在工商界开展这个运动，帮助工商联去推动这个运动，鼓励工商业者坦白行贿、漏税行为。对他们中间的犯罪行为也应该按情节轻重、悔改程度去分别处理。机关的坦白运动，将推动工商界的坦白运动；而工商界的坦白运动的开展，又会反过来推动机关的坦白运动。许多有贪污、受贿行为的人，害怕商人检举，因此，在开展坦白运动中，必须打击抗拒坦白的贪污分子，揭露他们以威胁利诱的手段阻碍他人坦白的行为。

但是问题的重要关键还是在于领导。根据一般情况了解，有的地方群众发动不起来，主要是领导上有问题。一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他们没有认识到反对贪污、反对浪费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它，而是畏首畏尾，拖泥带水；不是积极主动地采取战斗姿态，亲自“上前线”，而是委托别人去做，自己高高在上。这种人必须把态度改变过来，不然，国家的法律就会找到他们的头上。另一种，是领导干部自己手上不干净，不敢正视这

场斗争。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手上不干净，已经是错误的了，如果现在还不主动地坦白，积极地检讨，那就是一错再错，就会成为运动的阻碍者，就会变成群众斗争的对象。因此，对那些顽强抵抗、消极怠工的分子，我们必须坚决把他从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撤下来，给以纪律制裁。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的正确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改正错误，赶上运动，领导运动。任何别的道路，都是错误的，都将使国家利益遭受到损失并且葬送自己的前途。

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全体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体干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共产党各级党委的领导，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斗争中可以看出，谁是坚定地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完全忠于党和国家的利益，谁是自由主义分子或自私自利分子。只要我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个运动贯彻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我们身体里的病菌——即严重的贪污腐化分子，诊断出来，清除出去。同志们：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让我们大家努力，把革命的队伍整顿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

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 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关于土地改革

西北地区关内四省的土地改革现已基本完成。去冬今春计划进行土改的地区，除陕西有九十八个乡，甘肃有三十八个乡要待麦收后再办外，其余陕西（主要是陕南）二千一百一十七个乡，甘肃三千一百八十六个乡，宁夏三百二十八个乡，青海二百三十一个乡，共五千八百六十二个乡，分含于一百零六个县、八个市，人口一千五百万，五月中即可全部做好土改工作。青海化隆、循化、贵德、门源四县有六十九个乡已经过减租，原拟今年五月继续进行土改，现推迟秋收后去办，年内即可办好。新疆减租斗争也已按计划完成，决定于今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土改，计有六十二个县、二百八十三区、一千六百个乡，总计人口约四百万。这样办了，到明年全西北土改就全部完成了。

* 这是习仲勋同志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的第三、四部分。

去冬今春土改最大的成就，乃是成功地少数民族多的地区进行了这样一个大改革。这也是去冬今春的特点。约有半数土改地区是有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的。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使我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了，更丰富了。摘其要有以下三点：

一、在民族团结基础上去进行土改。它包含五个方面的意思。第一，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第二，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第三，要由其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向少数民族地主进行斗争；第四，要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第五，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民族问题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就在这些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可以说是那里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部分封建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我们“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某些方面来换取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换是什么也得不着的。一切可以争取来帮助土改（至少不反对土改）的力量，都务必争取联合过来。用各种办法，如开代表会、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成果等，讲明政策，给以出路，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改，至少保持中立。这是甘、宁、青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

二、一定要严格控制。必须筑几道防线：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牧区暂不土改，靠近牧

区的小块农业区也不土改以至不减租；严格保护牧畜业，牲畜一定不动，分别不清的也都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也不提减租，极力避免牧区震动，两面都动是很不利的；清真寺、拱北^[140]、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甘肃坚决保护了马辅臣^[141]等人，作用都很好。只要今天确实靠拢过来的都要照顾、保护，集中打击那些现在还搞反革命活动的，其余都不算旧帐。那些有代表性而又和我们合作的人，即使历史上有恶迹，有血债，都不要去算。只要按照土地改革法把土地拿出来分了就好，不要硬性去搞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办法同样可以发动群众。上层高级人物甚至不必叫他写检讨书。不但各省要有大名单，各分区、各县还要有小名单。甘肃省上有了几十个人的保护名单，平凉下面却没有，便出了漏洞。

三、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甘肃临夏和青海很多地方，当群众提起民族间历史问题时，引导他们去找阶级根子，诉统治阶级之苦，结果很好，回、汉农民互相打招呼共同参与本庄分地。民族团结更好了，这是成功的。凡经过土改的地方，都团结了各民族群众，巩固了民族团结。但是，这些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必须作为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准备多少年时间去逐步深入。以为一经土改便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领导上必须不为群众一时的表现（特别是少数积极分子的过激意见）所迷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回族地区，“男女一齐发动”的口号不要提，宗教问题不要干涉。暂时行不通的事情都不要勉强去做，无益之举办了就是有害。这点

在群众发动起来时十分重要。在汉族地区，同样也是如此，群众起来了，乱斗、乱算、报复、多搞点东西等倾向都必然要发生，凡是领导思想上不够清醒的都走了些弯路。

从整体来看，去冬今春各地土改一开始都强调了发动群众，并且是在去年减租、反恶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基础上衔接进行的，群众发动都较深。但是，地区大了，干部情况也复杂，领导力量往往兼顾不过来，初期经验不足，后期又有赶急图快的情绪，工作粗糙的不在少数，还有空白点，某些地方工作组一走地主便反攻了。今年秋后复查，还要花大的力量去办好。

新疆今年土改计划，分局已有报告，并在积极准备中。当地与内地情况有很大不同，有很多的特殊问题，已请分局具体研究，订出必要的实施办法。并借张邦英^[142]在西安之便，西北局专门讨论了一次，把一些具体方针明确肯定了下来，并报中央审查。

关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

西北解放后，许多工作都是依据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基础进行的。没有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就，今年的工作情况是很难设想的。一个“镇反”，一个“土改”，又来一个“三反”、“五反”^[143]，加上两年来工作有了某些成绩，就在某些同志中出现了“统一战线可有可无”的幼稚想法。前两年是斗争少了一些，后一年来又是团结少了一些。这两种情形都是缺点。凡我们合作了的人，就力争长期同他合作下去，丢掉一个合

作了的人比之原来未曾团结那一个人的不良影响还大。陕西订出了一个对待民主人士、起义将领的办法，中央统战部批复规定得更明确了，各省都要这样办。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和敌人竞争。在许多地方，例如青海等，原来就只有马步芳^[126]留下的一摊子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人大部分分化和争取过来。如果看不到这点，不这样做，就要犯错误。因此，我们还必须有意识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再团结一批，把一切必须争取和安置的人争取和适当安置下来。各省、市将在五六月开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把县以上各方面人物来一次排队，确定具体对策。这次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就改变了一下党外人士中间的紧张空气，听大家的意见，彼此通一通气。四天会议开得很好。各地同志对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等组织是不大重视的，长期不开会，即使开也是形式地敷衍了事，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重要的政权形式去团结和推动各方面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大缺点。党外人士也多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意见，有人说我们只要政府不要政权。现已初步决定今年十一月先由陕西省召开一次县长会议，专门讨论民主建设问题，各省也来人参加。明年召开一次西北区的县长会议。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也正在开会。这次会议范围更扩大了，牧区各部落都有人来，情绪都很积极。青海、甘肃几处办了民族区域自治，影响很大。今年在关内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并做出显著成绩，明年在新疆办。游牧区还有好些地方如青海黄河南四旗^[144]、曲麻莱^[145]、岗察^[146]等，尚未开展工作。今年必须派工作干部进去，先求站住脚。果洛区已配好了干部，日内出

发。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两年来摸到一条可贵经验，就是保持谨慎，稳步前进。任何疏忽大意或鲁莽蛮干，就必然出乱子。这教训是不少的。解放以来，经过几个大的运动，工作上确也有很大成绩。我们同志往往因而发生急躁情绪，要求过急，过高地估计所处条件，按不住步子。这在各方面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多，也是最有害的。我们虽然做了许多工作，毕竟还不是已经确实巩固的，有些则甚至是很不巩固的。我们必须看出这一点，事事力求谨慎，力求做得实在，不冒进。这次会议特别提出了克服这种急躁情绪，各省同志也都有了深刻的体会。

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西北地区关内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了。新疆从去年冬天起普遍进行了减租，今年秋后也要实行土地改革。解放以来农民不断提高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之后，越发高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表现在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方面。今年西北地区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发展很大。据西北五省一市的二百一十三个县的统计，已经有六十二万多个互助组织（其中生产合作社一百二十九个），有六百多万劳动力组织到互助组里来。陕西省关中地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有所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个别地方，像高陵县，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都组织到互助组里来了。甘肃、宁夏两省一般也是如此。青海省多些，一般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新区农村的劳动互助运动，主要是去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年和今年发展起来的。今年发展更大，各省比去年都发展一倍以上。

这个趋势是很自然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是并未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全部问题。这里有一个材料，据长安县高家湾村调查，全村一百六十七户农民，土地改革后，八户雇农还全无牲口；一百零七户贫农只有三十六户有牲口，还有七十一户没有牲口；五十二户中农也有五户缺少牲口。大车、水车都很缺，雇农两样都没有；贫农一百零七户只有两辆大车、三辆水车；中农也有缺的。很明白，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了。

再举一些例子。陕西白水县魏家村高三进互助组八个人，九天时间锄了一百九十四点六亩麦田，平均每人每天锄二亩七。同村未组织起来的十六个人，十天只锄了一百七十四亩，每人每天只锄一亩一。互助组的劳动效率一个人就顶两个多人。朝邑县^[147]三区五乡三千多亩棉田去年种了十一天，今年组织起九十六个互助组，四天半就种完了。淳化县高家村赵建台等九个互助组，组织起来余出一部分劳动力搞副业生产，两个月赚了十二石^[66]粮食。许多地方打水井、修水渠都因为组织了互助组，很快便成功了。还有使用新式农具和农药器械，也都是组织起来才好办。这足以证明，组织起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并使之不断提高，较快摆脱落后的状态。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发展，是农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的结果。农民们一听说是毛主席号召他们组织起

来，都积极响应，说：“毛主席的话没错。”农民群众是充分相信党的领导的。但是，我们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在领导农民的过程中，在领导农村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运动过程中，却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对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都有很大的损害，并且将会严重地损害党的威信。

这种盲目性使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一些混乱和自流现象。如“好搭好，赖搭赖”，“拉撒合拉撒”^[148]。许多互助组还缺少领导，发生问题没人解决，一些互助组甚至被富农以至地主分子把持。我们已经组织起来的这六十多万个互助组织并不都是牢靠的。有不少是形式的、凑数的，“硬编组”，“抄名单”，一个命令下来，一个村里一个早上就搞起十几个互助组，“出门是互助组，到地里都不见互助组了”。有些互助组确实组织在一起劳动了，但是，一不计工，二不算帐，“吃亏的吃亏，占便宜的占便宜”。总之，问题很多。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改变这些混乱现象，消除运动的盲目状态的时候了。

土地改革后，我们在农村，一方面应当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引导个体经济经过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逐步走向集体化。这是我们党确定的方针。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一篇题目叫做《组织起来》的讲话里就说过：“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

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他在同年另一次题目叫做《论合作社》的讲话里又说：“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他说：“这样的改革……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他把这个改革叫做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之后的“第二个革命”。《共同纲领》⁽⁹⁴⁾也在第三十四条上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和《共同纲领》这个规定，都是说得十分明白的。

解放后三年，农村变化很大，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经济更是从根本上起了变化。再从上面举过的长安县高家湾村调查材料看，那里是去年春天才完成土地改革的，今年一百零七户贫农中间有一百零四户都上升了，只有三户因为孤老或者有人害病未曾上升。土地改革才过了一年，贫农内有百分之三十现在上升成了中农了。估计今年两季庄稼都收了之后，贫农的总收入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比土地改革前增加百分之四十。相当多的贫农将有力量在今年夏季或秋收后买牲口和添置农具。还有好几个调查材料，所说情况也大致相仿。到高家湾村调查的同志估计，今年秋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将要达到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个估计可能太高。大致像陕西关中地区，即完成土地改革有

一年以上的地区再有两三年，其他今年刚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再有三五年，中农要变成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这点倒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领导，任由农村经济自发地发展下去，那么还会有另外的情况，就是农村阶级重新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而大多数人又再行破产，农业生产依旧长期停在落后状态下难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十分迟缓而且痛苦。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富农经济虽然可以允许保存，但是它绝不是我们农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要受到限制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什么“许穷不许富”，我们正是要求所有的农民都富裕起来，比富农更富裕。土地改革后，农民中间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也固然还不可以完全避免，但是，只要采取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办法，加上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大多数农民就可能保持中农地位，避免重新破产，而且一天天富裕起来。事情就是这样。

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本书上说：“在我们国家里，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按什么道路发展呢？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而小商品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要发生的情况那样。”他又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列宁在他《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指出，我们俄国的农业应当按新道路去发展，即经过合作社吸收多数农民来参加社

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将集体制原则灌输于农业，最初灌输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灌输于农产品生产方面的道路去发展。”发展农村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就是“将集体制原则灌输于农业”的一个重要办法（另一个办法即发展供销合作社，我们准备以后再讨论它），前途是农业经济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如果任由农民经济自流发展，前途则是资本主义，对于大多数农民和国家人民又是苦难重重。后者就是放弃工人阶级领导，是右的倾向。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上的自流现象，其错误就在这里。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里也说过：“但是为要经过新经济政策做到使全体农民个个都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花一二十年的工夫来通过这一历史时代。”那些不愿花“工夫”，不愿做“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的时间”，不准备“逐步地”去“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的，必然脱离农民群众。群众哪里是可以去命令的呢？农民们说：“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己切身的经验。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这里我也暂且不去说其他条件等等的了。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无论如何终归是由个体走向集体的一种过渡形式。这就是说，它们都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渡到集体化去。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

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然是错误的。

以上就是西北地区目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情况。

二

今后计划呢？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经验，今后要求如何？采取什么方针呢？

按比较恰当的估算，去年，即一九五一年，我们西北全区农业生产总值，大约比解放前增加十分之一左右。我们要求，今后四五年内，争取全区农业生产总值比现在再增加二分之一左右。条件较好的地区，例如陕西关中等地区，还争取更高些。在现有条件下，这个要求大体是恰当的。到明年，西北五省农业地区土地改革就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我们无疑地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面。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是很落后的，某些条件短期内还难有大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去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使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尽可能的提高，并使自身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只要确实把我们农村的全副精力用到这方面，四五年内使西北农业生产水平在大体上提高百分之五十，完全是可能的。

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我们计划，今后首先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都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地组织起来；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每县都试办一个到两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期望依据这个基础，到五年后做到有一半以上农户组织在常年互助组内，每个乡都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经验，这个要求也大体是恰当的。

目前我们组织起来的六十多万万个互助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小型的、临时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即一般叫做“变工”或“换工”之类。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在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仍然必须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这种互助组，并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成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

常年互助组在陕北地区⁽⁴⁹⁾已经占到所有互助组的百分之三四十。它比一般临时的和季节性的简单变工好处更大，可以进一步提高技术以及与经营某些副业结合，可以置办某些单个农户置不起或不能充分使用的新式农具或大牲口，可以办到某些农户办不到的事情，例如打坝、修渠等等。经过这种比较定型的互助组，就将把农民群众的集体劳动习惯逐渐巩固起来。目前这种互助组，在陕西多些，一般约占互助组

数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但是还不稳固；其他各省都很少。四五年后，它应当成为互助组中的多数，否则不能适应农村生产的发展。但是，两年内，在一般新解放区组织这种常年互助组还是以稳步发展为宜。因为它内容较丰富，组织性较大，所以问题也较复杂、较多，它的成立和巩固，需要经过不断解决内部许多问题，并需要其中有一定的核心分子，要短时间内发展很多是不可能的。这种互助组仍然不宜太大，一般地以小型为好。其内容有较简单的和较复杂的，也一般地应当由简渐繁。长安县王莽村互助联组是一个新发展，目前还只宜试办。各地领导机关目前应当着重研究这种互助组的经验，密切帮助巩固已有的，带动其他。各地委、县委都要亲自指导一两个这种互助组，深入地、有系统地进行研究。

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则一个时期还应当控制在试办范围内。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地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若干年后，它无疑地将是那时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形式。我们必须看到这点，必须作此准备。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而且，要普遍推广，还需要一定相适应的其他经济上技术上的条件。我们应当准备用三五年的时间，有领导地、依据条件有计划地加以试办。最好今年和明年各省委、各地委先直接试办一两处，然后指导各县都来试办。西北地区今年已办起一百二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少数是有某些基础的，或有计划试办的，大多数则是盲目办起的，缺少必要的基础和条件。米脂县今年一个春

天就“发展”六十三个社，子洲县也是一办便是二十三个。这是盲目追求多，还有盲目追求大的。这一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应分别整顿。有相当基础和条件的，列入试办计划内，加强领导，确实办好。无基础、无条件、勉强办起来又无力领导的，说服群众改成其他类型的互助组。

我们今后的计划、步骤、方针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就着手，首先把现有的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加以整顿，在今年种麦、秋收中努力帮助它们办好。这是给今后运动前进取得可靠阵地，必须认真去做。

依据可能条件，依据可靠阵地，有准备地、有领导地稳步前进，才是正确的。

三

在组织互助合作中，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 组织互助合作，必须坚决巩固贫农、雇农和中农以及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的紧密团结。在互助组内，不得排挤贫农、雇农，也不得挤压中农，应当切实帮助贫农、雇农解决各种生产困难，同时必须坚决保护中农利益。对互助组外的个体农民，不得歧视，更不得打击，应当教育互助组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分得了土地的贫农、雇农，无疑地是互助合作运动的最积极的部分。但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中农将逐渐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坚持团结中农，无论何时都是我们党在考虑农村政策上最重要的一点。

(二) 不计工算帐就不能保证农民间的互利。畜工和人工

交换比例以及使用其他牲口、农具的报酬，在目前许多地方缺少牲口、农具的情况下，不可定得低了，以免伤害农民照管和添置牲口、农具的积极性；也不可提得过高，使贫农、雇农吃亏。计算办法要适合当地农民习惯，简便易行，不要太繁太难。

(三) 互助组一定要首先搞好生产，使参加者的收入比一般农户多。是否做到这点，是检查互助组工作好坏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样，如何能够把互助组巩固下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周围农民都组织起来呢？互助组又一定要首先搞好农业生产，好种多收。多余的劳动力，第一，用到土地加工上，如改进农作法、改良土壤以及修渠、打坝、增加水地和种果树、造林等等，这些事情是很多的。第二，按当地条件，进行拦羊、养猪、看牲口、打山货，搞手工业以至赶车、赶脚等各种副业，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但是，互助组不要经营商业，不许进行雇佣劳动剥削（必要时雇短工和技术人员则是可以的），防止资本主义成分滋长。

(四) 为了扩大生产需要，在互助组内，置备一些农具和牲口作为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但主要应当是添置一些单个农户办不起的大型农具、新式农具或大的牲口。有些互助组把各家自有的一般农具都去折价归公，则是不对的。某些农户原有的牲口、大车等，如果使用上或计工上有问题，应当先去合理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要轻易地收买做公有。不论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收获应当首先“归私”，其公共财产必须在增加了“私人财产”之后，经过全体成员的自愿，逐渐地聚积起来。过早地追求过多的公共财产，有害无益。

(五) 在新区，原则上不应当吸收富农加入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现在已经入组入社的富农分子，如果是带雇工加入或者借机取巧剥削他人劳动的，必须坚决清洗出去；如果并未带雇工而且确实守规矩，计算换工和找补工资都还合理，群众也愿意，组内社内领导骨干又较坚强，也可不令其退出，但不得担任领导职务。在老区中经过平分土地而现在已经不再有雇工剥削的富农分子，也确实守规矩，经过群众同意，可以允许他加入互助组或合作社，但同样不得担任领导职务。在互助组和合作社内，任何人都不得带雇工入组入社。互助组或合作社也不得雇长工耕种或做工。

(六) 地主分子在未经群众同意改变成份时，一律不许加入互助组。至于农村中的自新了的土匪、伪军士兵、下级军官、伪职员、伪保长等，如果原是劳动人民出身，又不是管制对象，以及一般流氓和其他游民分子，只要他们愿意劳动生产，经过群众同意，可以允许他们加入互助组（但不能当领导人），以便帮助和监督他们劳动改造。

(七) 对劳动力较弱的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互助组应当接收他们入组，积极帮助他们劳动生产改善生活条件。至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军属要代耕的，则按照人民政府规定的办法办理；但是如果互助组的成员和烈属、军属双方都愿意用参加互助组的办法解决代耕问题，也是可以的。对孤、寡家户，也适用这个原则。此外，小土地出租者（或小土地经营者），如果有劳动力转入农业劳动的，可以允许他们加入互助组；但是如果无人参加农业劳动只出土地的，则不能加入。在互助组内，对妇女劳动力，应依据男女同工同酬原则，按

其实际劳动情况，评工记分。有些地方把妇女一律按半劳动力计工是不对的。

(八) 乡村干部在互助组内不应当要求任何特殊权利。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应当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并成为积极劳动、遵守纪律、办事公道的模范。

(九) 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应当联系起来，可以采取订立“结合合同”办法，互相保证按计划进行供应和推销。这样，互助组可以经过供销社取得国家经济更有计划的帮助，并可以逐渐使自己的生产和国家计划相结合。

(十) 现有国营农场应当进行整顿，办得很坏的立即彻底改造。明年每县都要办起一个国营农场，作为示范。各省需要增设农具工厂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目前在解决农具问题上应当先以大量地增补当地通用的农具为主，逐步地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新式农具。在推广农业技术上，也必须采取科学指导和群众经验相结合的方针。

(十一) 关于农村教育方面，反对不向群众宣传或很少宣传，也反对只是抽象地、空洞地讲社会主义而不和实际联系、不具体解释党的目前政策。农村里开会太多，不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会议太多，应当改变。我们准备明年或后年，在西北农村中普遍开展识字运动，并期望在若干年内获得成功，使广大农民得以提高文化水平。

最后讲讲领导问题。一个互助组要办好，第一要有一个有力的、正确的核心；第二要有经常的政治工作，就是说，要有共产党和青年团进去工作。离开党的领导不行，那样互助组要起变化，走错路，以至瓦解。如果党不去领导，富农、地

主和坏分子就要跑进去捣鬼的。党必须办好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各个互助合作组织内，不断地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加以培养，作为骨干，并把他们中间一些优秀人物吸收作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一件是对各地互助合作运动实行具体指导，经常深入群众，了解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只坐在机关指手画脚是不成的。开互助组代表会议也是训练干部、指导运动的一个办法，各县每年都要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各区各乡最好每个季度都开一次，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办法，叫做抓典型、推广开去。我们规定各地委、各县委都要亲自指导一两个互助组，就是这个意思。

在土地改革以后，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了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组织互助合作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我们目前正在通过互助合作组织来发展一个热烈的爱国丰产运动。许多工作都可以通过这个运动去解决。例如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政权问题，离开生产和互助合作这样和群众关系最大的事情，建设民主政治又有什么内容呢？农村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进行。我们各项工作都要按照这个新情况，使自己变得适合于这个新任务。做农村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会组织互助合作运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这门知识，并且到群众中间认真地工作起来。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有一段话，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

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现在在西安的文艺战线上的同志们正在进行整风。为什么我们有些作家很久写不出东西呢？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见世面”，和群众斗争和群众的实际生活隔离了，哪里会有什么“新鲜事物的感觉”，哪里会写得出好作品来呢？我想，大家应当好好读一读上面毛主席那段话。全党同志都应当时刻记住这段话。

为绿化西北而努力

(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

在我们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的今天，林业工作，应该是我们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过去西北林业工作已经取得的显著成绩，虽然按工作规模和人民的需要来说还差得很远，但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没人管，到现在有人管而且管出一些成绩来，就不能不说这是西北人民对绿化山河的重视。

今后林业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绿化西北。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办到呢？我们应该办到，也一定能办到。新中国的一切都在鼓舞着我们，三年来的成就使我们的信心大大增加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创造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可办成的事情。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用它来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作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绿化西北，就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西北林业工作者的理想、愿望和方向！

林业工作是全国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风沙之害来源于西北，而甘肃、陕西的风沙又来源西北的西北。西北是黄河之源，也是黄灾之源。过去的西北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这些水旱风沙的灾害为什么会这样逞凶呢？难道缺乏森林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吗？千百万劳动人民正盼望我们去领导他们征服这些凶恶的敌人。过去我们是向统治我们的阶级敌人进行革命，今后我们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向自然灾害进行革命了。据说，流沙逐年向内地侵袭，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宁夏阿拉善旗^[104]东部的流沙穿过贺兰山和狼山的缺口，正向东侵犯到平罗、磴口、中卫等地。风沙越过贺兰山、穿过长城，甚至侵犯到甘肃的景泰、民勤、武威、永登等县。那里每年都有上千亩的良田被埋没。绥远^[149]伊克昭盟的大流沙，直到陕北榆林，成为“八百里金沙滩”。现在流沙已侵袭到内地，神木、府谷、横山、靖边一带，每年被风沙埋没的土地也是惊人的。榆林市的周围全部被沙包围着，甚至侵袭到米脂、绥德。在新疆和甘肃西部都有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每年自黄河上游流下去的泥土就有四亿七千九百万立方米。上游在流出这样多的泥土后，农田就要被冲坏；下游带来了这样的泥土，就要沉积、泛滥，农田就被淹没。所以征服黄灾不仅是西北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都注视着我们的西北。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我们现在就要订出计划，不仅是一个五年计划，还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

要治理黄河，对于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其次，在风沙的直接影响下，伴随而来的就是恶劣的气候，西北地区霜雹的灾害，也是十分严重的。

考查上述一切灾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经验证明：哪里植树造林哪里就能制服风沙的侵袭，同时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工作者应该多动脑筋考虑这个重要问题，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我们应该在三年来“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的基础上，结合西北情况，把造林和护林并重起来。什么时候能造，就什么时候造；什么地方能造，就什么地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从毛主席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国实在是可爱。

我们的劳动祖先创造了沙漠中的绿洲，创造了青山绿水。我们的老先人从来是很喜欢种树的。据说：汉中有汉桂，相传是汉朝萧何种植的桂树，其他如唐槐汉柏，好些地方都有。这些树木是由于人民的爱护，经历了千百年才被保留下来的。所以林业工作的同志就要懂得我们祖先优秀的传统，在应该造林的地方都培植森林，并且让森林充分发挥它重大积极的作用。这一重任，首先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做林业工作的人员身上了。

三年来，同志们在祖国西北的边疆，在流沙线上，在河流两岸，在风沙漫天的原野，在深山密林之中，为战胜自然灾害，为建设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联系群众，努力工作，是很辛苦的。在此，我特向大家致以慰问之意。

现在我只谈一谈关于林业工作今后发展中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是贯彻林业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西北林业工作已如上面所讲的那样重要，那样广阔，如果说仅仅依靠我们上千个林业干部去做，是不是能行呢？那是绝对不行的。因此，林业工作者就必须把群众路线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必须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依靠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开展林业工作。

我们要教育群众懂得植树造林的利益及林业技术，通过群众造成声势，把林业建设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如果说，林业工作者能够发动群众，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发动群众开展一个“自采、自育、自栽、自护”运动，那么育苗造林工作，就

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打下百年大计的基础了。因为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一定需要强劳力，男女老少不分劳力强弱都可动手，又可以到处种植，不论房院周围，山坡沟渠，撒下种、栽下苗就能生长出来。为此，在目前农村中正日益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里，也可以增加采种育苗、植树造林这一项任务。

我们要做到，发动群众负责管理山林，严禁滥伐，防止山火，广泛建立护林组织，明确权利义务，增强群众护林的信心，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真正做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村村防火”，“人人护林”。因此，林业工作者也有责任经常建议、督促各级人民政府订出具体办法，制止破坏森林的行为。如果林业工作者在这方面采取自由主义态度，那就会给人民带来灾害。

我们也可以做到，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由群众出主意，弄清哪些山林宜封或不宜封，哪些山林先封或后封，分别指定封山育林和打柴放牧的地区，民主订立“封山育林公约”，纠正“机械死封”、“明封暗不封”等偏向。

我们还应该做到，从群众中找能手，从西北的群众中找西北的米丘林⁽¹⁵⁰⁾，把科学知识和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结合起来，研究各种土壤和不同的气候，研究各种栽培方法加以总结推广。无论几小时的经验介绍，无论临时的短期训练班，都是从群众中培养干部、提高群众的好方法。要在配合农村各项工作特别是生产工作中，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积极宣传各项林业政策，从植树造林工作中同样也可以培养劳动人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优良品质和美德。

第二，林业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任务。林业工作所以是一个政治任务，不仅因为它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就西北来说，又特别是由于森林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通过林业工作，来进一步密切民族团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林业工作，正像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医疗工作一样，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少数民族对于森林和他们生活上的相依关系，就必须重视他们在森林上的利益。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森林不是破坏而是爱护。在新疆许多农民家庭都有花园果木园，他们是很重视栽培树木的。青海贵德县以上的黄河水流是清纯的，因为那里的蒙、藏牧民不滥伐树木，所以山沟河畔都有苍翠的森林。如何才能民族地区开展林业建设呢？如何才能使那里的森林对国家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呢？在民族地区的林业工作者都应该很好考虑。为此，在那里的林业工作者必须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团结和培养少数民族中的林业干部，这是西北林业工作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林业工作以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进而开展林业建设的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第三，是林业工作者的思想建设问题。在经过各种社会改革，经过“三反”、“五反”^[143]运动，在一次接一次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再加上这次林业会议上受到的教育，大家的思想觉悟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三年来在造林护林方面的成绩，说明了大家是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够以革命者的立场，抱着人类征服自然的精神，在那里艰苦奋斗。但是也有少数林业工作者不能安心工作，他们因为暂时的困难而犹豫，甚至有人说：“林业有前途，个人没前途。”这种说法当

然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正确理解什么是个人的前途。艰苦并不是断送个人前途的地方，反而正是创造个人前途最好的环境。整个革命的胜利，就是从艰苦中奋斗得来的，不跟随革命奋斗前进的人，还能设想什么个人前途呢？现在我们能若能把森林护好造好，绿化西北，不仅对目前有利，而且也造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难道人民事业有了前途而个人能没有前途吗？道理是很明白的。陕北靖边县是沙漠地区，碱性土壤，从前没有树木，在一九二〇年有个姓丁的县长，提倡种树，竟发展了很多大块森林，打破老百姓“此地不能种树”的保守观点，现在那里老百姓已深深感到种树的好处。不管那个丁县长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也许当时他是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来栽树，但老百姓总认为丁县长替靖边县的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事业家，只要在一件事上对人民有了贡献，人民就称颂他、爱戴他、拥护他。只要你对人民事业有贡献，人民就不会忘记你，个人的前途才真正能大放光明。应该认识到，革命事业胜利了，林业工作发展了，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胜利与发展。基本的问题，是要在思想上端正起来，要建立为新中国的人民林业服务的观点。我们不仅要关心林业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关心同志们的思想政治生活，要使大家成为身心健康的人民林业工作者。

同志们回去以后，应该传达这个意见，督促各级人民政府把林业工作重视起来，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召集有关方面进行座谈，订出这方面的计划，交有关上级审批。今年把计划订好，明年就开展一个广泛的群众造林运动。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进一步地发展我们西北的林业。

关于西北地区的商业调整、人民生活状况和民族工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于十二月十六日回到北京。在西安期间，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西北地区的工作，在这两个会议上已作了通盘部署。兹将其中主要情况再报告如下：

第一，两个会议主要讨论了调整商业问题和改变大行政区机构与任务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就讨论以上问题而概括地总结了三年准备工作，并着重研究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领导作风问题，这对各省、市的领导同志来讲，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全党三年来着重完成社会改革任务，一般地习惯于“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而不习惯于“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领导思想上必须来个转变。三年来的工作成绩很大，缺点也很多，尤其是在过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漏洞百出，特别在党内有一部分人满足于过去的成绩，看不见工作的缺点，更意识不到今后建设任务的繁重和艰苦，这是很危险的。

• 这是习仲勋同志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报告。

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形式主义很多，追求数量，不讲质量，计划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办事，形成到处紧张，疲惫不堪，浪费很大。例如西安的中学学生水平，一般地不及解放前的程度，这是很惊人的。虽然经过三反运动⁽¹⁴³⁾，但下边的官僚主义现象仍相当严重。这种情况如不加改变，就将造成今后发展中的很大困难。

为此，今后必须明确中心任务，不是进入建设时期什么都办，而是要有重点，有主要次要，有先后缓急地去办。今后一个最基本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即城市以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为主，农村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为主，并须稳步前进，讲究质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明年的计划必须根据可能与需要，务求切实，不能太大，要有控制，做了一步再前进一步，不要平均主义地事事都办，齐头并进，而要集中主要力量使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在这次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感到计划经济对于我们完全是个新课题，也是个大转变，要求领导的思想必须提高一步。会议虽然开得长了些（十天），但像这样比较深刻而认真地讨论财经工作问题，还是第一次，给予省、市领导同志的启示很大。

第二，关于调整商业问题，前面已有报告，这里再补充以下情况。首先是公私比重在一年内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北全区营业额如以去年第三季度为一百，则今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二六，其中公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四（其中国家贸易增加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合作社

增加百分之六百二十六点五),而私营则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零点四。公私比重即由去年第三季度公二私八,变为今年第三季度的公四私六,这是全区平均起来的情况。这种趋势,在西北比较大的中心城市(西安、兰州、迪化^[151])和经济作物区(如关中产棉区)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西安市今年第三季度私商营业额为四千五百五十九亿元^[100],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九。公私比重也由去年第三季度的公四私六,变为今年第三季度的公六私四。又如关中产棉区的长安县新筑镇公私商业比重,公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三,私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临潼县雨金镇公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五,私占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五。

从西安市三十五个行业营业额的增减变化来看,凡是公营商业插手经营的行业,私营营业额即显著下降,反之,私商即有发展。当然,其中有关国计民生作用最大的如棉花、粮食、建筑器材、五金等行业,国家贸易和合作社是必须掌握与控制的(其中也可以留下一定的余地,让私商经营),但如绸布、百货、医药等行业,公营比重占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确是太多了。

至于在批零差价、地区差价以及批发起点等方面的规定,许多地方是不合理的,以致私商无利可图。好些地方利用工商行政管理职权,无理干涉私商经营,甚至禁止私商下乡收购小宗土产。有的地方老乡买了私商的货,回去后区乡干部还要叫作检讨。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私商经营的积极性是不会起来的,随之而来会给我们增加很多困难。

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导精神，结合西北情况，提出了调整商业的办法和步骤，主要是合理调整地区差价、批零差价、批发起点、经营范围，取缔某些地方对私商不适当的限制，并鼓励和组织私商经营工业品，特别是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在调整商业中过分加重消费者、特别是农民消费者的负担，否则也会影响城乡、工农关系，也会妨碍生产的发展，我们在纠正“盲目冒进”的倾向时，也须防止“盲目冒退”，该退的就退，该退几步就退几步，必须有计划地撤退，退到一定阵地，必须巩固起来。今后公营的发展必须给予适当控制，特别是零售营业额的比重，明年内，在西北的主要城市，一般地不突破百分之二十五，这在西北地区是很合适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续稳步前进。

第三，关于人民生活 and 公粮负担问题。西北地区自解放后，经过减租，特别自土地改革以后，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所以农民生活改善了。但是这种改善是有限度的，还只是保证在灾荒年中不致饿死人，还只是把人民过去不稳定的生活，稳定在今天的水平上。就是说，人民的生活在今后只有逐年上升，而不会再下降了。至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状态，在土改后仅一二年的今天，是不可能有很大改变的。特别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山地多（约占全部耕地的半数），土壤贫瘠，生产工具和技术均较落后，产量低，副业也少，又加今年大部分地区收成不如去年，占全区公粮比重最大的陕西关中地区灾情较重，减产约二成以上；而部分地区又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粮价

低廉，工农产品剪刀差很大，农民虽有余粮，但经济情况很困难。比如新疆的南疆，陕西的陕南山区和甘肃的陇东山区，都是这种情况。因此，目前西北地区的农民富力实在有限，明年除增加公债负担外，农业税收计划，拟将公粮任务稳定在十八亿四千五百四十八万八千斤，比今年（十七亿八千五百万斤）增加不了多少。如能这样确定下来，对西北农民生产是有好处的。

至于工商各税，计划任务为二万二千六百亿元，比今年增加约六千亿元，根据调整商业以后的情况估计，是没有多大问题而能够完成的。公债二千四百亿元，是根据全国八万亿元中西北占百分之三（全国公粮任务中西北所占比重）计算的，估计亦无问题。

第四，关于民族工作问题。三年来，西北民族工作成绩很大，各民族间的团结更加亲密了，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正确贯彻了中央民族政策，而顺利地解决了新疆问题^[152]，甘肃平凉西吉事件^[153]，阿木企河事件^[154]，特别是青海昂拉武装叛乱^[155]，因而大大丰富了民族工作的经验。甘、青藏区今年也都派去访问团、工作团，做了很大的争取团结的工作，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明年民族工作的中心即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运动为主。对于居住在柴达木盆地之哈萨克民族（约千余人），由于我们在政策上坚持争取团结，及帮助其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他们已敢与我往来，也停止了抢劫，近数月相安无事。目前威胁最大，最感麻烦的是骚乱于甘南藏区的马家股匪^[156]，由于台湾空投已聚集千余人，自派出以黄正清^[157]为首的甘南访问团进入该区访问后，大部藏族部落已

向我投靠，少数仍和匪特纠缠在一起，准备继续争取分化。该匪枪弹充足，人、粮缺乏。我之方针应是军事上积极防御，使之不致分股窜入内地，用一切办法把它封锁在藏区内。如果今冬明春能够这样做到，就胜利了一半，到了明年五月间再大举围歼。该匪在甘、青境内之回民区，由于民族宗教关系尚有一定社会基础，如让其分股流窜出来，势必壮大了敌人，增加我们的困难。这一股土匪是土生土长的，比之外来之傅秉勋股匪^[158]就麻烦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严密注意，务求彻底肃清为止。

第五，经过三年来各项工作以后，西北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也更加巩固和扩大了。这次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虽然只开了两天，但收获很大。党外人士经过重新安排，除个别人尚需调整外，基本上使得大家都很满意，真正是皆大欢喜。这些人在今天确实在当家作主，都愿多做实际工作，所以完全安置在西北是比较容易的，张治中本人也极安于在西北工作。

关于政务院文委分党组布置 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遵照毛主席的号召，已于二月九日至十日两次党的会议上，具体布置了如何在中央一级各文教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并于近几天进行了初步检查。

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在最近几个月来，特别是经过大区文委主任会议和在制订本年文教计划过程中，各单位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摸底”，工作情况已有转变。过去大家对文教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缺点是有共同感觉的，但关键在哪里不十分明确。经毛主席号召反对官僚主义以后，不论党内、党外干部，大家的头脑都很快清醒过来了，认识一致了。教育部部长张奚若⁽¹⁵⁹⁾说：“毛主席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铮铮有声，发人深省。”党内高级干部说：“要赶快检查工作，不检查就不得了！”有的说：“官僚主义不反掉，今后工作就难以做下去。”

-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一九五三年三月二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批转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参考。习仲勋同志时任政务院秘书长。

这都是好现象。我们要珍惜大家这股热劲，好好地引导，把文教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彻底翻一翻，整一整，这对于逐步收拢文教摊子，改进文教工作，争取完成今年文教计划，将会有决定的意义，官僚主义作风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是极为普遍而严重。去年“三反”⁽¹⁴³⁾时也反了一下，但不彻底。从近几天的检查材料中，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把我们过去的许多决议和指示审查一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都是关系全国文教工作的问题。以扫除文盲工作为例，我们曾经希望在几年之内，完成全国扫盲任务，这个意图一传下去，好些地方计划很高，在教学方法上，把部队的一套搬进工厂，搬到农村，固定四十人编一班，以二百五十至三百个小时为突击完成阶段，这样便发现有假编班的，有假毕业的，有患神经病的，有自杀的。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方面，要求过急，有好多学校试图以四年时间，学完苏联五年制课程，这就形成在许多高等学校普遍紧张，翻译力量赶不及，教授支持不了，学生消化不了，每星期学生学习和教授工作时间有多至七十到九十个小时的，影响教授、学生健康，大家哇哇叫。对小学校，不管主观力量如何，就急于全部包揽起来；对实行“五年一贯制”也未正确估计现实条件，即全面推行；对小学教员薪资，去年八月前偏低，八月后又一次增加过高。在戏剧改革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简单急躁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现在来看，过去发出的决议和指示，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做得对的；一类是完全弄错的；另一类是主观愿望很好，办法也对，就是目前不易办，不能办，需要再等一年或几年之后才可以办，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发

生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由于领导机关不重视了解全面的真实的情况，不是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往往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仅布置多，检查少，而且很多事情只有布置，没有检查，只交待任务不交办法，只问完成多少数目，不问这些数目是如何完成的。这样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许多方面贪多、图快，到处铺摊子，好大喜功，不讲究实际工作效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迫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甚至把许多好事办成坏事。所有以上情形，均须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变。当然，在改变过程中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防止以急躁反急躁。对整顿文教摊子，必须先有妥善解决办法，然后再办，以免发生新的偏差。

其次，有些地方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急需调整。在文委直接领导下有几个委员会，如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等，多是形同虚设，长期没有工作，领导上觉得是负担，党外人士意见又多得很，亦应逐渐加以整顿。

再次，各机关内工作忙乱、效率很低的现象是普遍的。一般真正“饱食终日”、一事不做的人，还是很少见的；多半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或是糊糊涂涂的官僚主义。为什么大家都感到工作很紧张，很忙累，而工作效率又确实很低呢？主要原因有三：

（一）领导人不善于“打开脑筋”组织大家做事。形成上忙下闲；少数人忙，多数人闲；这些少数“忙人”又往往不是忙大事，而是忙于琐碎小事。大事没抓紧，不钻研，小事挤到手边就办，这样就不断出偏差，而机关内部事务也没办

好。

(二)好些人陷在文牍主义圈子内拔不出来。常常有些事，只须跑几步路或者打一个电话，多联系，多商量，就可以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好，可是总习惯于公文往还（必要的公文一定要有，但今天确有一些公文是不必要的），经过好多手续，浪费好多人力和时间，事情还办不好。

(三)机关内有些应该减少的会议没有减少。会前应有的准备没有准备，会议时间应该短，可是开得很长，同样浪费好多人力和时间。这些落后的工作方法，绝不能适应今天这样任务繁重的局面，急需加以改变，才能使我们抽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力，帮助下面工作和钻研更大的问题。

最后，文教机关党外人士特别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重要问题。这些人近来对于文委经常召集他们开会，要他们真正参与工作，表示很满意。但是新的意见还是有的。各部部长多是党外人士，党员副部长一般都很努力工作，这是好的，但有的光自己积极，而让党外人士坐冷板凳，这就是缺点。今后党员干部不仅要自己负起责任，而且要帮助党外干部担起担子，否则，人家就会感到有职无权。对于机关统一战线工作，今后各机关党员负责干部需要经常检查改善。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具体做法应该是：

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除对个别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必须严肃处理外，对一般的官僚主义作风，都采取检查工作，教育提高的办法。方法应是自

上而下，先从领导上检查起，再自下而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时间要抓紧，但不作硬性规定，也不需天天开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即可。争取三月二十日前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内把检查官僚主义告一段落，然后抽出力量分批到下面检查和帮助工作。

第二，要正确认识官僚主义的实际，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避免轰轰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乱戴帽子、乱找岔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这样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重点放在党内。党员干部应多做检讨，不要将做错事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党外人士听其自愿，只学习文件，不作当众检讨，特别不去组织他们进行检讨。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能够参加学习就好了。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要求进行自我检讨，亦表示欢迎，并帮助其提高认识。

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提倡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实行合理分工，树立领导核心，建立必要的和考虑成熟的工作制度等。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缺乏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科学的工作制度，是决然做不好的。

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内应是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提出很多口号，提出很多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办不到的。如卫生部反对官僚主义走在前面，有些经验也是好的，但他们要把反对自由主义与检查医疗事故和反官僚主义并列提出，则是不妥当的。

在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次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讨论了很多问题，开得很好。

会议总的精神是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提高认识是最根本的问题。所谓提高认识，就是解决没有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疾苦和群众利益的思想问题。在整风运动中间，我们是边整边改，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是必须首先改，而且也能够马上改。我们在最近开这个会，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置若罔闻，不当一回事，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工作中缺点错误很多。因此，党内外对我们这项工作意见很多，人大常委会每次开会都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了解的只是几个专门案子，不了解很多情况，但是那个批评已经很严厉了。所以这个问题在整风中光讲不行，能改的问题就马上改，能够解决的问题就马上解决。

要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

* 习仲勋同志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义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管得少，只是少数人动手，多数人不动手。其次是照抄照转，错转、错办，处理草率，互相推诿的现象很严重。如把江苏的事情转到山东，有的信不仔细看内容，填个单子也填错了。上海崔兴国关于发明“阻声器”的来信，先后给周总理写了十几次信（这些信均未转给总理，是信访工作部门处理的），历时两年多没有结果，最后两次来信不写内容，只在信纸上划个大“？”号，表示不满。另外有一些是遗失了。这样对待人民来信，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尖锐了。我看这些情况，主要是因为过去没有一个负责人来管，只交给那些专职做具体工作的人去办。这里我还要说一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官僚主义是主要的，但绝不只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是严重存在着的。老百姓写信给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是有很多困难的。就是机关干部写批评领导的信，也要再三斟酌和经过思想斗争的。遗憾的是，我们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办理群众来信的事，是太少了；而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采取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办法的具体事例，却是不胜枚举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就是全国胜利，领导机关进城后，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一定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我想凡是参加革命时间稍微久一点的同志，都懂得过去群众为什么欢迎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很懂得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们，因此，群众对我们非常拥护和爱戴。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最近中央指示，提出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国务院前些日子，一百多人去农业社参加搭西红柿架子，本来是个很简单的劳动，搞了四个小时，我的腰腿痛了好几天，你不劳动就不会尝到劳动的滋味。最近还常常听说有些人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害怕接近群众，就是他们的语言也同群众不一样了，他们现在说的话官腔多了，群众语言少了。所以慢慢地有些人不愿意到乡下工作，愿意进城，光坐办公室，不深入了解下情。他们认为来信来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没有好人”等。还有人顾虑来信来访工作做得好了，信访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要紧，只要我们很好地、认真地去处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成一大堆，好像一大河水。当然将来也有，那叫做细水长流。

在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以前，人民内部矛盾还处在从属地位。但三大改造胜利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了。社会改造本身就是矛盾，再加上我们工作上有些过失，矛盾就更加尖锐、明显。人民内部矛盾过去就是存在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都阐明了这个问题，也提出解决的方针。现在矛盾多了，主要是官僚主义把问题积成了堆和我们工作中的过失造成的。拿农业合作社来说，有灾歉收的社有矛盾，丰收的社如果分配得不好也有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揭发矛盾，解决问题。揭发出来，真正处理了，矛盾就会

减少或缓和。但矛盾不会完全消灭。怕麻烦，或者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都是不实际的。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大家听了杨尚昆^[160]同志的报告，又经过会议讨论，思想上都明确了。这件工作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据大家在会上反映的情况，全国各级机关，一年总会接到二三百万件信，这些信几乎全部是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虽然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他认为他那个建议总是比你那个进步，比你那个好。所以，来信来访的内容，就是反映矛盾，暴露矛盾，当然也反映出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各阶层的动态，领导机关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很多情况，解决很多问题。比如一个运动来了，就集中反映了这个运动各方面的情况；政府的指示一下去，执行中出了什么偏差，马上就有反映。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随时知道社会上和群众的思想动态，以及发生了些什么问题。但是这一点过去没有被我们很好利用，人家花了钱，买了邮票，送上门的材料，我们不重视，愿意走弯路。这表现了我們是最蠢笨的官僚主义。

现在人民来信来访是一个什么形势呢？我看形势是越来越紧张，究竟会紧张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现在的形势，是矛盾大量涌现的时候，而且来信来访也起了一些变化，特别是来访。现在来的不光是一个一个的人了，经常有几个或者几十个人一齐来。形势所迫，不改进这项工作不行，领导上不管也不行了。有的人他就是要见省长，你说我不见，他仍旧要进你的办公室。因此，就不允许你再官僚

主义。这是新的变化，要看清这一点，要有这方面的准备，加强思想领导，挺身而出，负责解决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日子过不下去。今天要根据整风精神，在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恢复和发扬我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真正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同时我们也不要以为有了正确的领导，开了会，全国各机关都会重视起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一切就容易了。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还要靠我们努力做很多思想工作和采取许多组织措施。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第一，以整风文件为武器，教育我们的干部；第二，发现了缺点和错误，要立即改正，发现了问题，能解决的要立即解决；第三，领导人和老干部要带头。我们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其中不少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或完全没有群众工作经验。这次整风运动就是一次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我们领导人和老干部有很大责任，要带动他们，使他们懂得什么叫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什么好处。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不脱离群众的党，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群众里面的党。我看这几精神，不仅在来信来访工作方面可用，也适用于其他各项工作。

上面讲的就是对杨尚昆同志报告的一些补充。下面就会会议讨论的问题，提几点意见：

一、来信来访工作，党委必须有一位书记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必须有一位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管。这一条讨论时大家都同意，那就算这次会议的决定，把

它肯定下来。大家回去做传达，将来就不另行文了，只在报上发个消息。并希望在六月底把名单分别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

二、处理问题要争取主动，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如何争取主动呢？最主要是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要很好掌握政策，按原则办事，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要随便答应；要求不合理的，应该讲清楚。同时，必须加强综合研究工作，及时发现突出的或带普遍性的问题，研究出解决办法，并从中找出规律。

三、实行专职机构、专人负责与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光有专职机构和专人还不行，必须结合业务贯彻大家动手的精神，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负有责任，这样问题就容易处理。有关方面互相配合、协作，也很重要。前天有些工人到国务院请愿，总工会派北京市工会副主席来帮助处理，解决得很好。专职人员要增加，可以多配些干部，具体人数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决定。并要重视干部质量，调配些强的干部，不要经常调动，使他们安心工作。专职机构的任务，除处理一部分来信来访外，主要应加强督促检查，总结交流经验。

四、转办方法。凡是应该中央机关处理的，而且中央机关容易处理的，一律由中央直接处理，不要下转；应该由地方处理的，转省、自治区、直辖市，转错了可以退回；少数的也可以直接转到县，并应分别情况抄告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实行层层负责的办法，避免一律照抄照转。同时要提高效率，需要转办的信件，一般地必须要在三至七日内转出。

五、清理积案。积案有两方面，一个是没有转办的积案；另一个是已经转出但没有办结的积案。现在正在整编过程中，可以临时抽调一些人，突击一下这项工作。清理积案要先摸底，然后采取排队分别处理的办法。

六、控告干部案件的处理，应按管理干部名单范围的原则办理。就是归哪一级管理的干部的案件，就归哪一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来管。控告县以下的党员干部，由县监委处理；控告非党干部，有监察机构的由监察部门处理，没有监察机构的由县人民委员会处理。

七、会议文件的处理。国务院的指示，准备根据会上提的意见进行补充、修改，经过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草拟的暂行办法，也要再作修改。希望大家把文件带回去提意见，在六月三十日前把意见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

八、这次会议对中央各部门提出的批评意见，有一些，但不多。主要是各地同志客气，没有讲，或者没有时间讲。实际上意见并不少。已提出的意见，有些事情很值得中央各部门注意。准备把所提出的意见整理一下，分别送各部门参考。我们中央机关已注意到在整风中解决这些问题，也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对中央各部门有意见及时向主管部门提出。必要时抄告国务院或党中央。

最后，对做来信来访工作的同志说几句话。过去这项工作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重视，上上下下做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很辛苦。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不应由他们负责，主要应由领导上负责，这样才公道。今后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在于领导。

但对专职干部也要加强教育,因为他们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他们的言行对群众影响很大。因此,必须教育他们热情地、积极地、细致地、耐心地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成为一个很好的、模范的群众工作者,才能配合领导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状态。

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

(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

一 四月二十三日的报告

我们下乡的头十几天，只是一般地了解情况，着重调查了食堂问题。

河南长葛县的和尚桥公社，是一个二类社。全社共有九千一百五十八户，四万零八百一十人。现将十几天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一)农村形势。中央十二条指示^[161]下达以来，形势急骤好转。群众歌颂十二条指示说：“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盗走的财宝。”外流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都积极起来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自留地普遍感到满意，种得特别好。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干部害怕群众的这种积

• 这是习仲勋同志带领中央调查组在河南长葛县调查期间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习仲勋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极性，这不对。在最近几年之内，有意识地让群众在“小自由”方面多生产些东西，只有好处，并无害处，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民主空气开始发扬。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群众议论一些政策问题，批评起“五风”^[152]来，话更长。

但是，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度过，夏荒接踵又来。从长葛情况来看，整风搞得比较粗糙，十二条指示的贯彻也还不够深入，两个平均主义^[163]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怕政策再变”，加上人的体力很弱，牲口减少，农具缺乏等等，因之群众的热情还不稳定，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无论社员和干部，听了《六十条》^[164]都异常兴奋。一个老大娘说：“开这样的会，一点也不瞌睡，赶明天再开，俺和俺老汉都去。”有的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这一下下了决心了。”樊楼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干部自动讨论分配方法上的“三七开”^[165]、“二八开”^[166]，直到深夜两点钟。可以预料，《六十条》实施以后，群众的生产情绪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只要你们不变，不再出点子，老老实实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缓过气来，明年就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好光景。”

(二)公共食堂问题。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了解，长葛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察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

会停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有些干部耽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过去吃食堂，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些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七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

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保户”^[167]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人种菜，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一千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

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三）劳动保护问题。最近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归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共外流了三百多人，已回来了一百五十多人，从县、社企业中也压回来了一部分。农业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和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也都半日或短期放假回家生产。目前农村劳动力，从数量上说，已经基本上够用了。问题是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由于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的恢复很慢。

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却非常紧张，抗旱浇麦，春播种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牲口大量死亡（一般死掉百分之五十），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十几个人拉一辆大车，五六个人推一辆水车，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春忙以来，有些社、队得浮肿病的多是壮年劳力，与去冬是老年的情况不同。因此，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必须坚持劳逸结合，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四）多劳多吃问题。长葛县最近普遍搞多劳多吃，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储备粮的社、队，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工分带粮”，多增加了群众的口粮。有些社、队采取以劳动底分为标准，超过者才能多得的做法，缺点很大。实际上多数人超不过劳动底分，只有少数劳力强的才能多吃，而且人们为了超过劳动底分，就过分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第二种是没有储备粮的社、队，从有劳动能力的人（老、幼、残疾除外）的口粮标准中，扣出百分之十，做为多劳多吃的奖励粮食，这样做实在不好。更不好是，按人口扣出百分之

五或百分之十的口粮，作为奖励粮。这种办法，实际上是降低了一般有劳力和无劳力的口粮标准，挖他们的口粮，去奖励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群众对此非常反感。有的生产队连讨论也没有讨论，并且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扣了百分之十的粮食，引起群众很大波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十五天为一期，有的户就被扣了六斤多，有的户三四斤、二三斤不等。在实行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再扣几斤，群众哪能不慌？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在电话上商得吴芝圃^[168]同志的同意，已经作了纠正。

通过十几天的调查了解，除了食堂和粮食问题外，还有“三七开”、评工记分、“三包一奖”^[169]、“三定”^[170]、调整社队规模、经营管理和一、二类社队整风等几个问题，都是群众和干部最关心的，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几个重要问题。我们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情况以后再报。

二 五月九日的报告

从四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结合划队工作，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这些问题都有专门材料，正在整理。现在先就一些重要情况和问题，简述如下：

（一）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观察，凡是党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群众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我们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都是有说有笑，十分亲切。村子里

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人，能够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参加了生产。社员白天在地里生产，晚上还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这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多种些地、多打些粮食的一种反映。这种情绪是好的，如果群众连这点兴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了。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好的情况，如果今后再把《六十条》坚决地贯彻下去，把干部的工作作风好好转变一下，农村的情况将会更好，群众和干部的心情就会更加舒畅，生产积极性将会更加高涨。这种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二)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这里退赔工作搞得很不彻底，如县直机关、工厂、学校和公社、生产队都占了许多土地和房屋，尚有一部分没有退，有的退了小部分，留了大部分。退赔的现金多，实物少。王庄大队一共退赔了三次，在退赔总额中，现金占百分之九十五点三，实物占百分之四点七。作价也不合理。三间草房实际价值一百四十五元，退赔时只作价三十到四十五元，低于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七十。

退赔所以不彻底，首先是因为干部对退赔的决心不大，公社以上机关更差，他们就是舍不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王庄大队最近发动群众大搞了一下退赔，效果很好，两三天内从社办工厂和附近的机关、学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调实物，退给了群众，群众情绪大为振奋。前几天召集群众开会，是干部等群众，现在开会群众叫干部，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退

赔工作肯定要搞彻底，但是目前夏收即将到来，普遍搞有困难，可以在夏收之后，结合整风整社抓紧进行，一、二类社、队要把退赔作为主要内容。这对贯彻《六十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定了生产队的种植权，可是由于现在包产包工的办法，是按农作物逐项逐亩的包，麦子种多少，谷子、高粱、大豆等种多少，一一都规定死了，所以生产队的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在研究“三包一奖”时，干部和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作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的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在讨论“四固定”⁽¹⁷¹⁾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把牲畜所有权下放给生产队。过去牲畜归生产队使用，可是又归大队所有，还规定了保本保质等一套清规戒律。有些牲口老了，生产队无权处理，想用骡子换几头牛也不准，生下幼畜大队还要提成。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心里很不踏实，常怕大队把好的牲口调走，这一切都影响了对牲畜的爱护和使用，影响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不利于生产。有的社员说得好：“牛是种地用，地要俺种，工要俺派，牛归俺使，倒说不归俺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至少有四条好处：（1）可以促进干部和社员爱畜保畜的积极性；（2）对繁殖幼畜有利；（3）可以鼓励生产队多买牲畜；（4）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调换牲畜。从调查情况看来，把牲畜归生产队所有是必要的，这对迅速发展牲

畜有很大好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对粮食保管和分配之权也有很大意见。过去在食堂吃饭，口粮不归群众自己支配，非常憋气。最近食堂已经散伙，群众要求：口粮不出队，指标分到户，大队、小队两把锁，群众监督，一月一发。对于超产粮的分配，干部和群众都主张：除了大队提成部分，余下的全部归生产队保管，一部分发给社员做口粮，一部分以工分带粮实行多劳多吃，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储备。

群众还要求休假权利得到保证。随着“三包一奖”的实行，生产队的“三权”⁽¹⁷²⁾落实，最近群众要求把休假权利交给生产队掌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种植计划，农活安排由生产队作主后，只有生产队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放假的时间。再过一二年，‘经营管理制度搞好、生产秩序正常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忙有闲，成了十分自然的规律，劳逸结合的问题也就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总之，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就可以更加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会影响大队所有制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四) 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

做十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指每月总工分值）”。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五）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73]在过去大刮“五风”的情况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都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一百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大跃进以来，在水利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消化它。要下决心在今后

一定时期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是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抓到底，就给农业生产打下了牢靠的物质基础。

(六) 干部作风问题。从这里的情况来看，经过整风整社，“五风”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干部的作风确有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很不彻底，很不巩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目前公社实行的派干部驻队、分片包干的办法，看来很有问题。一个驻队干部权力很大，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都被他破坏了，队干部也难以提高，学不下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在一、二类社、队的问题反比三类社、队的问题多，群众的情绪也较差。对这两类社、队的整风绝不能忽视，而且越早进行越有利。在过去的“民主补课”^{〔174〕}和整风整社当中，有一批干部被撤掉了，换上来的一批干部多数未经过整风教育，工作作风也不够纯，有的甚至很坏，至今社、队领导核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从而把我们的工作大大推向前进。

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自从去年九月中央批转了《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以后，中央各部门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精简。在人员方面，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原有二十四万余人，至今已经精简了八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即每三个工作人员减少一个。其中行政部门原有六万四千余人，精简了一万五千余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超过原定精简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要求；事业单位原有十七万六千余人，精简了六万五千余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达到了原定精减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要求。由于各部门的实际情况不同，精简的比例有高有低。如农林口各部门精简了百分之四十八，工业交通口各部门精简了百分之三十七，外事口各部门精简了百分之八点五。

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八十九个，精简了百分之十五。事业机构（包括科学研究、勘察设计机构和出版社、印刷厂、文工团等）合并了一百一十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八日转发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

一个，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六。中央各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除了少数已经撤销、合并或下放的以外，多数尚未定案，由于科学研究机构的全面调整问题比较复杂，牵涉面比较广，现正由以科委为主的专门小组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中央各部门的精简工作虽然还没有全部结束，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由于人员减少，公文、表报、会议及其他行政事务也大大减少，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能够摆脱事务，集中精力考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人少了，更发挥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如冶金部地质矿山司过去有些干部有力无处使，长期闲着，精简后留下的人都有事做了。铁道部金属化学研究所过去辅助人员过多，有些人作用不大，工作不安心，领导干部和研究人员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辅助人员大量减少以后，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都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建筑工程部北京设计院人员精减了百分之四十，但完成的设计任务，比精简前还多。

二、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生产第一线。目前已经分配处理了干部三万八千余人，公勤人员和工人二万五千余人，这些人员主要是下放到农村基层和中央各部门直属的厂矿企业单位。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干部中，有七千八百余名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下去以后，绝大多数担任了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职务。

三、纯洁了组织。由于清理了队伍，对防止泄露国家机密和发生政治事故，更加有了保证。

为了更好地完成精简工作任务，目前急需抓紧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是中央各部门设在外地机构的精简工作。各部门在外地的机构共有十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科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十二万五千余人，约占百分之七十，物资供应办事机构和黄河、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五万余人，约占百分之三十，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没有进行精简。经我们对各部门驻上海、南京的若干单位的调查，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不纯的情况，较在京单位更为严重，亟需大力精简。过去由于中央部门迟迟不表示态度，地方党委不好抓这些单位的精简工作，现在应该以省、市、区党委为主，商同中央部门彻底进行精简。

其次是精简人员的处理。到目前为止，在精简的八万余人中，还有一万七千余人（干部一万一千余人、公勤人员和工人六千余人）尚待分配处理。其中比较难以处理的约五千余人，主要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年老病弱不能坚持工作的、照顾夫妇关系难以调离北京的人员。对这些人员，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妥善处理。凡能工作的干部，都尽量分配工作，一时不能分配工作的、能够搞体力劳动的，可以组织起来到机关生产基地或农村公社参加劳动生产。至于公勤人员和工人，绝大部分应该动员回乡生产。精简人员的家属虽然不占机关的编制，但是长期留在北京则增加了城市人口的比重。因此，凡是调离北京的人员及其家属都应该分期分批地迁到地方安置。

最后，根据中央关于大力压缩城市人口的精神，对中央

各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再做适当的精简，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目前中央各部门的机构编制虽经过一次精简，但一般的还是偏多偏大，特别是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可以精简的更多。如有些业务不多，或者研究人员不多的科学研究机构，完全可以撤掉或者合并，非研究人员应该尽量减少。为了坚持贯彻中央的精简方针，可以考虑规定中央各部门的编制，在这次精简后，三五年内，只能减少，不许增加。个别需要增加的，也必须经过国务院编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

现在讲讲教育战线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首先要抓紧专案复查工作。我们广东过去搞“两退一插”^{〔175〕}，把很多教师弄回家了，到目前仍有五千三百多人尚未复查处理，还在一边摆着。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严重违背党的政策的。现在首先要落实人家的工作，然后再复查。现在有的人有了工作，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家属子女问题。有些人本来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硬要找些理由，给人家安个钉子。这很不好，不要这样搞。我们要落实政策，把一些同志很快解放出来，安排他们工作。我觉得只要是过去做了几年工作，有一定锻炼，有一定经验，思想作风还好的，就要安排工作。要使大家心情舒畅，他能干什么工作，就给什么工作做，能做多少工作就给多少工作做，不要把一些人在那里摆着。现在这也浪费，那也浪费，但最大的浪费还是人才的浪费。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单位发生的案件一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宗宗、一件件查清落实，凡是那些诬陷不实之词，都要统统加以推倒，错案、假案、冤案要坚决纠正，公开平反，彻底昭雪。同志们！搞“两退一插”已十一二年了，人家没有工作干，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这五千多人，连家属子女，就是好多人呀！有关各部门必须抓紧复查，力争在今年年底前落实。

其次要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根据工作的需要，教师的听报告、看文件必须给予照顾。教师不光是埋头教书，还要关心政治。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要建立革命的尊师爱生关系，不但学生应当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四人帮”^{〔176〕}以反“师道尊严”为名，打着消灭差别的旗号，大搞形而上学，排斥迫害教师，把教师的职称都取消了。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恢复教师的业务职称，建立教师提升的正常制度。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指示，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鼓励，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中小学教师可评为特级教师。对这个工作，各地区都要做好调查研究，发现典型，实事求是地选好典型，为迎接明年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在抓好落实政策的同时，必须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当前教师队伍的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十分严重。当然，这种状况是“四人帮”造成的，是和当前要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很不相适应的。各级领导要切实创造条件，特别要加强党的领导，通过整风学习，积极帮助教师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省委决定今年内复办省教育学

院，各地区也要恢复或新办教师进修学校，培训教学骨干。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抓好。

再强调一下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问题。

毛主席对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指示我们，省、地、县三级党委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毛主席还建议我们省、地、县委书记到一个工厂、学校去兼任党委书记，指示我们当领导的要深入基层，取得经验，指导全盘。毛主席的教导，对我们每个领导干部在新时期转变领导作风是有很现实意义的。现在，党中央对教育工作也极其重视。邓副主席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当后勤部长，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都要重视教育，一年抓它几次，帮助教育部门和学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些认为“生产是硬任务，教学是软任务”，或认为教育与自己无关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教育工作，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各行各业都有教育的问题，也都要抓，都要重视，对发展教育事业给予积极的支持。当前，学校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校舍的问题，大、中、小学都很紧张。有关校舍问题，我接到很多人民来信。这是被林彪^[177]、“四人帮”搞乱的，问题成了堆，只能分别缓急先后去办，不能慢，也急不得，这就是辩证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占用了的那一部分校舍，凡未退还的应坚决按照中央文件指示的精神迅速退还。一时退还有困难的，也要作出计划限期退还；退房确实有困难的单位，也允许退钱，或给基建材料。此外，基本建设单位，

应把教育战线的基建纳入国家计划，保证施工力量和三大材料，尽快扩建一批校舍，以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又如，教育经费和教师编制问题，有的地区和单位随便挪用教育经费和占用教师编制，这是一种恶劣现象，必须坚决纠正。把教师借去搞别的工作，也是不应该的。总之，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离开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支持，教育工作就很难搞好。教育工作搞不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党同志都要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主动帮助教育部门解决困难，共同努力办好教育事业。

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

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我们认为，中心问题是把农业搞上去。只有把农业问题解决好，四个现代化才有扎实可靠的基础。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吃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首先是农民，其次是工人和各行各业的人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个沉痛的教训和现实，使我们深深感到，农业这个基础还很不牢靠，一定要抓紧抓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因此，广东搞建设，我们打定主意集中力量抓农业，包括支农工业，其他各行各业也要搞，但是必须以促进农业大干快上，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为前提。经过六月省委整风会议，九月地委书记会议，对于纠正被林彪⁽¹⁷⁷⁾、“四人帮”⁽¹⁷⁶⁾搞乱了的全党大办农业的思想，给予重视和重新安排“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作布局，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认识也比较一致了。在这里，一般的情况和问题不多说，着重讲讲我们省委的一些想法。

第一，重新认识农业问题。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广东工作情况的汇报的一部分。

首先，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本来，农、林、牧、副、渔五业，统称农业，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多年来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把“农”看得狭窄了，至今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不解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而食物的生产首先的和基本的是依靠农业。过去，省委的主要精力就是抓农业，重点又是抓锄头，抓种植，希望多搞点粮食。这样做是必要的，今后还是要下功夫抓粮食。但是，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粮食和多种经营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从搞食物来说，路子本来宽得很。如果只注意抓粮食，而对畜牧业、渔业、副业、经济作物和林业注意不够，安排不当，势必影响整个农业，影响包括粮食在内的食物生产。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吃饭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工作越来越被动，路子越来越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生产布局安排不当。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的原则；按照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制定好规划，特别要狠抓薄弱环节，把畜牧业、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争取尽快做出成效，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适宜于发展甘蔗、橡胶、黄麻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海岸线长达四千七百多公里，南海海产资源丰富，渔业可以大发展。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农副产品加工和各

种轻工业很有基础。此外，这里又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可以成为建设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我们认为，广东农业的发展，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作出妥善安排，只要对国家建设全局有利的东西，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多搞快搞。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前两年，群众批评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你们连命也不要了。”这个批评很深刻。我想，政策可以有千条万条，但一切政策都要有利于动员千军万马，有利于发挥九亿人民的智慧，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农业要大干快上，主要的是政策问题，离开政策谈农业大干快上，必然流于空谈。讲政策，要抓大政策。从广东的情况来看，从办起人民公社到现在，农业生产力还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绝大部分生产队还没有具备向大队核算过渡的经济条件。我们不赞成急急忙忙搞过渡。从长远点看，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究竟怎么过渡，也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省委认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还是要发展生产队一级经济，维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公社、大队经济的发展，都不应损害生产队一级经济。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的负担，中央对此已有专门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还有，关于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关于实行

基本工分加奖励，严格生产责任制，关于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中央都讲得很清楚，这是有章可循，并且又是有过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总之，凡是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维护其严肃性，取信于民，长期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

四是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现在搞的统收统支和靠“长官意志”、单纯用行政办法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看来，省委对各级有这个问题，中央对地方也有这个问题，非改不可，否则就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要克服这些困难，主要靠我们省委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靠调动广东各级的积极性。省委已作出决定，今后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每年从地方财政收入中拿出百分之七十用于农业和支农工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机具制造缺少钢材的问题，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这对缺动力、缺钢铁的广东来说，农业机

械化的问题也就可以比较迅速地得到解决。

第二，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广东的农业，过去有比较好的基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全党抓农业，政策比较落实，农民有积极性，“八字宪法”^{〔178〕}贯彻得较好，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很有成绩。但是，在经过林彪、“四人帮”的一场大浩劫之后，农业元气大伤，各项政策遭到破坏，加上原有底子毕竟还相当薄弱，经不起大的自然灾害的折磨，以至在现在还是年年为农业能不能增产而伤脑筋。比如今年晚稻，本来长势很好，可望丰收，谁料到十月中旬和下旬，连续受到两次强寒潮的袭击，给我们当头一棒，晚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见，农业还是处在受老天爷摆布，离不开靠天吃饭的地步，问题还相当严重。我们工作的着眼点，必须面对现实，用最大的努力，扎扎实实工作，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早日恢复元气。这样，我们就能争取主动权，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首要的还是抓粮食，把发展农业的底子填高、培厚、加固，使群众的口粮能够逐年有所提高。最根本的一条，是靠党的政策，把农业劳动力组织好，有效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还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主要措施：一是要有计划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全省来讲，要尽快把珠江三角洲二十七个县（市），近一千二百万亩农田建成稳定高产的商品粮基地。二是要切实保证农民所必需的生产资料。首先是要多搞些化肥，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条，是见效最快的措施。机械化，我们意见要集中武装重点。从面上

来说，目前很重要的是充实、改进“常规武器”的供应。在广东，不少地方犁、耙、锄头等生产资料数量少、质量低、价钱又贵，农民很有意见。沙田地区翻泥用的小艇年久失修，木材却很少得到计划供应，在市场一斤木料高达一块钱。我到汕头地区的普宁县，还看到人拉犁。“常规武器”的供应尚且如此艰难，现代化、机械化就更不容易了。三是大力提倡探索和掌握自然规律，把科学种田的水平提高一步。在五十年代，广东从培育“矮脚南特”开始，培育了一系列早稻矮秆良种，改变了“早四晚六”的历史，使早造高产，超过了晚造。这些年来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晚造一直不稳定，经常受到台风、寒露风的侵袭，一遇灾害就大幅度减产。说到底，还是我们未能正确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要努力在培育晚稻良种、适当改革耕作制度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使水稻生产能顺应自然，确保增产。广东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去年粮食亩产全省平均才九百一十斤，而且各地很不平衡，只要措施扎实，下定决心切实抓紧，增产的潜力一定能够发挥出来。全省五千五百多万人口，四千八百五十多万亩耕地（其中水田三千六百五十多万亩），每人平均不到一亩，人多地少是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因此，今后几年内还是要积极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广东的大片荒地主要在海南岛，约七百万亩；在广东大陆上，雷州半岛有荒地七十万亩，珠江口一带可围垦造田约六十万亩。开发这些地方，都要修水利，改土质，搞机械化，需要大量投资。特别是海南岛，那里是干旱地带，要下力气建设才能种植作物。希望国家大力支持广东，给一定的财力、物力，分期开发，以解决人多地少的

矛盾。

在挖掘生产潜力，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畜牧业、渔业，多搞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从各方面开辟门路，增加财富，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能调动港澳、华侨的积极性，引进机械、设备、技术，集中使用，重点经营，畜牧业、渔业等生产很快就可以发展起来。下面分别谈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畜牧业。广东四季常青，青饲料容易搞，群众有饲养习惯，出口又比较方便，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很好，应该大搞特搞。香港九龙那个地方，有的人为了养牛赚钱，在石头缝里种牧草，而在广东各地，特别是海南岛、雷州半岛一带，漫山遍野都可以放牧养牛。养牛是一件少费粮食又多出肉的办法。条件这样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大养其牛呢？发展畜牧业，除了养牛，可以尽快大量发展的是养猪、养羊、养兔、养“三鸟”^{〔179〕}。关键是要解决精饲料。在五十年代，广东粮食比较充裕，畜牧业兴旺一时，一九五七年养的鸭子，在有的县简直多得成“灾”。为了争取在二三年内使畜牧业有个较大发展，我们打算引进必要的装备、技术和良种，重点经营几十个猪、鸡饲养场和菜牛牧场；需要的饲料（玉米），采取以进养出的办法解决。养一头猪需要玉米五百斤，约值二十二美元（每吨八十七美元），而出口活猪每头平均可得六十到七十美元，一进一出，不光赚了外汇，增加了收入，还可以增加人民的肉食，又能多得肥料。除重点经营一批饲养基地以

外，还要发动群众普遍饲养，奖售玉米，养牛的政策必须研究调整，现在菜牛、耕牛不分，一律不让社员个人养牛，集体饲养又不准宰杀，这个政策应该改变。

关于经济作物。发展经济作物也要两条腿走路。凡是有种植习惯的公社、大队，都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以经济作物促进粮食生产，使群众增加收入。光种粮食，收入很低，群众没有积极性，土地越种越瘦，粮食也保不住。广东有个黄厝尾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多地，他们实行水旱轮作和经济作物轮作，全年粮食亩产达二千六百多斤，经济作物也获得高产。还要有计划地建设各种类型的经济作物基地，逐步做到从整地、种植、收割到运输、加工，搞一条龙作业，实现机械化，把经济作物的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广东，蔗糖生产一定要加速发展。吃糖要立足国内，尽快做到不吃进口糖，我们广东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广东现有甘蔗面积三百六十万亩，占地不算少，问题是亩产低，去年全省平均只有二吨半。只要从化肥、水利、机械等方面给予帮助，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即使不扩大种植面积，甘蔗产量也可以成倍增加。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甘蔗的综合利用问题。江门甘化厂去年总产值七千二百七十多万元，其中利用“三废”⁽¹⁸⁰⁾搞的“副产品”达到三千八百二十万元，副产品的产值超过作为主要产品的蔗糖。“三废”中有的还是生产饲料的好原料。希望国家在综合利用上搞点投资，帮助解决煤、电不足的困难，把“三废”充分利用起来。

关于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渔业。广东过去对渔业重视不

够，财力、物力也不足，对海洋渔业资源没有很好利用开发，海洋捕捞量多年在五十万吨至七十万吨之间徘徊。这种落后面貌要尽快改变。要建设几个现代化的海水养殖基地。广东沿海有一百七十多万亩滩涂，是养蚝、鱼、虾、蟹、珍珠和贝藻类的好地方。这些东西经济价值高，出口销路好。但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产品收购价格又低，群众没有积极性。有的县盲目搞围海造田，全省共搞掉二十一万多亩养殖场，结果粮食没有增产多少，却把养殖业破坏了，实在得不偿失。恢复和发展海水养殖业，必须提高养殖业技术，革新养殖工具。据说日本养蚝采用先进技术，亩产八吨至十吨，而目前广东亩产不到一吨。建议下决心派人到日本考察学习，引进技术和某些设备，在广东迅速建立十个左右的现代化养殖场，通过试点，训练人材，尽快实现海水养殖业现代化。这是多快好省增加外贸出口，增加人民副食品的重要门路。出口一吨蚝值七千五百美元，相当于出口一百一十八头猪，或三十三吨大米，多投点资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还要建设几支具有先进水平的捕捞船队，走深海、远洋作业的道路。目前广东渔业机械化程度低于全国水平，渔港建设落后，这些问题都有待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实现渔业的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投资、设备，一条渔船投资要上百万元。目前国家投资有限，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开展补偿贸易。近几个月来，日本、法国、香港等一些厂商，都主动提出用补偿贸易办法，为我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目前正在和日本丸红公司谈判，签订合同。我们觉得，这是加快我省渔业现代化的重大措施，我们决心办好这件事。

关于城市副食品供应的问题。广东市场供应特别是副食品供应一直比较紧张，主要原因是农业没有搞上去，但是确实也有不少实际问题。港澳市场鲜活副食品的供应，使广东负担很重；出口农副产品的收入和每年几亿美元的侨汇，也转变为对市场的压力；华侨、港澳同胞每年都有一百多万人回来探亲访友，这也给供应增加了负担。中央已尽量照顾到广东的困难，从外省调来副食品，这点恐怕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尽管如此，由于旅游事业的发展，进进出出的人还会增多，市场紧张局面还很难彻底扭转。我们意见，应该尽快在广东建设一批鲜活产品基地，除了猪、鸡饲养场外，要搞淡水鱼基地、蔬菜基地、水果基地等。港澳市场每天需要大量的新鲜塘鱼，大部分从广东供应。靠近港澳一带我们有鱼塘五十多万亩，产量一直停留在亩产三百五十斤左右，只要有充足的饲料，立即可以成倍增加（一吨玉米可以增产一吨鱼，而出口一吨鲩鱼值三千美元，可以换回三十多吨玉米）。所以，只要饲料有保障，就可以增加新鲜塘鱼出口和满足广州人民的需要。

第三，开发海南。

海南岛的面积三万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比台湾才少三千平方公里，人口不及台湾三分之一，自然条件比台湾要好，又是革命老根据地，但目前经济建设落后，市场紧张，群众生活贫困，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建议国家把海南的开发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但是，从解放以来，由于海南的粮食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大规模开发海南确有困难。海南东方、昌江一带（即海南的西南部）有连片

荒地约一百万亩，长年无霜，日照好，不受台风侵袭，只要解决了水利问题，是个非常好的谷物和热带作物产区。当前压在海南头上的粮食账，每年约两亿斤。所以，我们设想：在今后几年内请国家专门调拨一些粮食给海南，在这个期间内，尽快把大广坝水库修建起来，把西南部那片荒地办成谷物和热带作物农场。那里草很多，头几年一面养牛，一面建场。建场后，如果用四十万亩种水稻，每亩如收获八百斤稻谷，总共就是三亿多斤粮食，海南今后无论是建设用粮或战备用粮，都可以解决。这样放手开发海南，有朝一日打起仗来也好，就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农场一动手就搞现代化的，不能再用移民的办法，最好是国家投资，也可以由海外华侨投一部分资，用以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一着棋走活了，开发海南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第四，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在初步展开。到九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一百种产品，金额三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积极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但是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省委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业务。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

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业以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州、汕头、肇庆等地搞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在侨乡县修建华侨学校，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有些人打算投资盖住宅，在广州提出申请的已有八百多户；还有的提出要从香港、澳门修建高速公路直达广州、佛山等地。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研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资金统一筹措，单独核算，计划安排，合理使用。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现在看来，建筑业落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我们在这方面要下点本钱，下点功夫。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的。

上面这些，都是着重从农业方面来讲的，大部分是设想，有一些已经开始在办，看来都是应该办也可能办到的。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¹⁸¹⁾到达陕北。从这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一共十三个年头，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¹⁰⁾。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我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党政军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光明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党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当时，我作为陕甘宁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诞生八十五周年，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如在目前，倍感亲切。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八十五诞辰写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挽救了革命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182]路线失败后保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108]、谢子长^[109]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和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24]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28]（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梢山主义”^[110]、“土匪路线”，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致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一九三三年八月，我们在照金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183]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到一九三四年冬一九三五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工农政权。陕北根据地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工农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

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西省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中共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⁵⁵⁾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一九三五年五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¹⁸⁴⁾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

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185]、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186]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187]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188]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

“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缔造者

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¹⁸⁹⁾，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¹⁹⁰⁾、高桂滋⁽¹⁹¹⁾，西有甘、宁白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²⁾制度，实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根据地，在取得东征⁽¹⁹²⁾的胜利之后，毛主席命令红军打退西面和北面的敌人。我也随军西征⁽¹⁹³⁾，在李富春⁽¹⁹⁴⁾同志为首的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主席在保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

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¹⁹⁵⁾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¹⁹⁶⁾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¹⁹⁷⁾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苏区新设的新宁⁽³⁾、新正⁽⁷⁾和赤水⁽⁸⁾、淳耀⁽⁹⁾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

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198]，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有的地方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

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封锁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次年一月，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这样，从一九四一年毛主席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民主建政，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和民主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党政军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做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文化教育也发展了。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是严师又是同志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特别是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常说：地方干部熟悉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毛主席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十分关怀，非常爱护。毛主席把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后，安排他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春，刘志丹同志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主席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副主席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主席、周副主席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

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一九四三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³⁹⁾，在李先念⁽¹⁹⁹⁾、王震⁽²⁰⁰⁾等同志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

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毛主席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找我和王世泰^[201]同志去谈话，向我们介绍了粟裕^[202]、谭震林^[203]同志率华东解放军十八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事例，教育我们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九四七年春边区集团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一个方案，毛主席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指示。后来，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宗南^[42]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提起了这一仗，然后说：一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又说：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那次会议期间，毛主席找到他住处，他让我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询问我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最后勉励我要认真学习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他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领袖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在陕北期间，一贯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这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地方的同志对中央的同志，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都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革命队伍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²⁰⁴⁾同志主持会议。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长刘彩云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霹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市斤）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

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³¹⁾上，抽空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篇文章，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开展全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整风和生产两件大事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主席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主席还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上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蓬勃发展。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边区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全边区耕地面积比一九三八年扩大了七成多，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有的部队还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粮。全边区的公粮任务，又由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减至十二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领袖群众心相连”、“军民团结齐奋战”的情景十分动人。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集中二十五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主席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三月十八日，前委⁽⁸³⁾成立了，毛主席给彭德怀⁽⁹⁵⁾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延安郊区，毛主席还没走。十九日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大家着急地催促道：主席，您走吧！毛主席连声说：走呀！？现在就走！？我说：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毛主席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延安。敌人占领延安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有弼时⁽⁷⁹⁾同志，指挥保卫边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使群众受到极大鼓舞。毛主席原来预见三年打回延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组织指挥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夜间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收复延安，只用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主席离去？当天上午，晴空万里，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

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领袖和群众心心相印。群众说：主席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您走吧！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别。黄河的滔滔激浪，倾诉着人民同领袖离别的衷情。

毛主席离开了陕北，心中仍装着边区一百八十万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和边区人民给毛主席发来贺函。毛主席及时复电，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复电，一直在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老根据地的人民。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在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永远难忘的怀念^①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建树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络腮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①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周年写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

第一次和周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205]书记。周恩来同志在瓦窑堡找我和张仲良^[26]同志谈话，从整个形势对我们讲了敌情，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周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订战略部署，他那种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195]和杨虎城^[184]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198]，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首席代表和叶剑英^[206]同志等一道，经过辛勤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全国解放以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共同纲领》^[94]，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具体筹备和主持起草的，为新中国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国以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总理职务，虽然肩负着领导党和国家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仍旧长期主管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中央统战部许多重要文件报告，周恩来同志都亲自审阅修改，遇到重要情况，便亲自报送中央、毛主席审阅。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务院设立第八办公室主管其事，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

维汉^[207]同志兼主任。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工商界人士有了进步，就得到他的表扬和鼓励；工商界人士中发生了问题，他马上给予批评和帮助，并且经常向八办的同志敲起警钟：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你们忘记了吗？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周恩来同志善于在统战工作中执行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引导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道。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实行公私合营，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十分注意发挥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遇到重大问题，他事先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或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再在国务院例会上讨论通过。他要我以国务院秘书长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保持联系，像张治中^[96]、傅作义^[43]、邵力子^[208]、马叙伦^[209]、朱学范^[210]、李烛尘^[211]、蒋光鼐^[212]、史良^[213]、许德珩^[214]、章乃器^[215]、刘文辉^[216]、龙云^[217]、张奚若^[159]和屈武^[218]等先生，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随时报告周恩来同志，并且根据他的指示及时和他们交换意见。

周恩来同志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方面著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尤其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周恩来同志经常用他的亲身经历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要过好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和社会五关，不要恋旧，犯了错误就要忍痛割瘤子。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谈起：“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

科学文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时还必须注意在团结、使用中继续改造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在他亲切的教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程砚秋⁽²¹⁹⁾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日本侵占时期，他保持民族气节，留须停演；解放后，政治上不断进步。周恩来同志经常和程砚秋同志交往，不止一次到程砚秋同志家里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在他提出入党要求时，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有的同志认为身为总理，国家大事那么繁忙，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呢？周恩来同志认为程砚秋同志是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的影响，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周恩来同志为程砚秋入党而写的那封语重心长的信，陈列在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厅里，这不仅是对程砚秋同志和文化界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鼓励和鞭策。

周恩来同志对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注意，和平解放西藏地区就是他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解决的。一九五八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他立即想到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地区，派我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了解那些地区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这些地方，基本上执行了民族政策，但有的地方执行得不好，甚至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够，有的寺院遭到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扰，还有少数地方不按法律程序捕人、杀人，造成恶劣的后果，破坏了党

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我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他极其重视，让我打电话给有关地区，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左”的偏向，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周恩来同志自己还经常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一九六二年班禅^[137]大师写了一份意见书，周恩来同志让我研究后，找班禅大师先谈一次再向他汇报。以后，又要我陪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班禅大师。班禅大师在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时，感情冲动，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向班禅大师做解释教育工作，指出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是可以很快解决的，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遇到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班禅大师当即表示同意和拥护总理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不仅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问题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原来是敌我问题，也善于做转化工作，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对于曾经是战犯的特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特赦释放时，他亲自接见，给予鼓励。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前夕，我陪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被特赦释放的杜聿明^[220]、陈长捷^[221]、宋希濂^[222]等人。当时他们都很拘谨，还有些畏惧情绪。周恩来同志为了缓和他们的紧张心情，指着我对杜聿明先生讲：“他是你的老乡！”（我和杜聿明先生都是陕西人）他一句话就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问杜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回答已经五十五岁，身体健康。周恩来同志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先生听到总理的勉励，态度自然一点了，谈起自己对人民犯有罪行，深

感内疚。恩来同志接上去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²²³⁾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一条路。”说得杜聿明先生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陈长捷先生是在我军解放天津时曾和我们激战数十小时，然后被俘的。他的神情比杜聿明先生更显得紧张，他讲自己罪恶重大，受到中共宽大释放，十分羞愧。恩来同志指出：“你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的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陈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恩来同志立即表示同意，说：“可以嘛！主要根据你自己的意愿。”他对所有在座的特赦人员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恩来同志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一下祖国十年来的新变化。

对特赦释放前的末代皇帝溥仪⁽²²⁴⁾，恩来同志曾让他在公安部的一个小楼上观看国庆游行，使他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在特赦释放时，又接见了她，他衣着朴素，彬彬有礼，见到总理很拘谨，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再作检讨。恩来同志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溥仪的情绪松弛下来了。讲起他释放回家时，他的家属和旧部下还给他跪拜，举行朝礼，他就讲：“你们的思想还是老样子，还不如我呢。”溥仪的思想改造是比较好的，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熟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后来

日本朋友就曾经赞叹说：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连皇帝都能改造过来。

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同志坚持原则。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他主要看人们的长处和成绩，只要一技之长，在某一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对于个别坚持反动立场，肆意攻击我党和政府政策的人，则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周恩来同志直到身患重病，仍然非常关心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在被监护期间，看到《人民日报》刊载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林彪^[177]、“四人帮”^[176]肆意破坏革命统一战线，严重干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全国人民正忧心忡忡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令人钦佩和感动。我反复读那份《政府工作报告》，好像听到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的亲切声音，仿佛又回到他身边工作一样。

二

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在全国夺取政权以后，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九五六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为此，党中央、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恩来同志不仅参与了这项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且具体组织和指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

一九五五年，恩来同志和毛泽东、陈云^[225]、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共同听了国务院所属三十多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耐心听取各单位负责同志的意见，提出问题和大家一同研究，教育大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指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定下了“农、轻、重”的投资顺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在具体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恩来同志热情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冲天干劲，又密切注意大跃进的发展，调查研究大跃进中的经验和问题。他除亲自到一些省、市视察工厂和农村，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外，一九五八年八月，让我带领一批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和智慧，看到许多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那年本来是大丰收，由于把劳动力分散去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粮

食和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浮夸现象严重。兴办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炼钢铁，盲目性更大，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有的根本炼不出铁，即使炼出铁来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费。我们回到北京后，向恩来同志如实汇报，还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有步骤地实现一定目标。他还让我到北京市的怀柔水库去介绍在外地看到兴修水利中的经验教训。

经恩来等同志提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炼钢铁等工作进行整顿。一九五九年六月，恩来、小平同志派出五个工作组，到一些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派我带一个组到河南去。他们指示要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又有发展前途的，就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劳动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还让我们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状况。恩来同志指出，群众的积极性越高，就越应加以保护，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发挥。

以赫鲁晓夫^[226]为首的苏共中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人民生活颇为困难。一九六〇年秋，恩来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小型会议，陈云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报告，恩来同志完全赞同。

面对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造成的严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根据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时，有许多企业要下马，有一些事要停办，大批职工要精简回乡，思想抵触是很大的，阻力也是不小的。恩来同志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重大项目亲自逐个落实，对基建战线过长的项目坚决压缩，正是由于他坚定不移地做了细致的调整巩固工作，实事求是地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才得以渡过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又顺利发展了。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恩来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力争发展得更好一些，更省一些，更多一些，更快一些，又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五风”^[162]，提倡科学精神，教导干部和群众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

从一九五二年由西北局调到国务院工作起，我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了十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获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

恩来同志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和群众在一起，血肉相连，所以能够正确反映群众的情绪和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一九五八年，他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去十三陵水库^[227]工地。我和恩来同志一起劳动，运送石头和泥土。我在后面推车，他在前面拉车。我想走快点，怕累了他，可

是，他的步子比我还快，车绳老是绷得紧紧的。在十三陵五天，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劳动，劳动以后，亲切地和群众谈话，关心他们生活。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同到国务院机关食堂吃饭。他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我们与干部一道吃。他边吃边问干部食堂伙食的情况，还注意大家的脸色和健康情况。回来以后，他对我说：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机关食堂搞了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生活很快得到改善。这个办法，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渡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在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228]中，筹建部门曾经计划盖国务院办公厅大楼，周恩来同志看到设计图纸，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229]、段祺瑞^[230]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厅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同志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厅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一九六一年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当时那个负责主持公安部工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的人，借口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不足，提出在火车上吃饭要收粮票。在

会上我和那个人激烈争论，我说：“中国自有火车历史以来，在火车上吃饭从来不收粮票，现在群众生活很艰苦，我们的票已经够多了，如果坐火车吃饭收粮票，会闹得更紧张，我们不能收。”经过讨论，恩来同志决定不收。

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处理问题都是从群众利益出发，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做，有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即使有什么困难，也要下决心去做，并且在处理重大问题之前，多方听取意见，不管是负责干部的还是一般干部的意见，他都十分重视。我常听他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

恩来同志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深深感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面前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特别不高兴听这样的话：“总理的意见很正确，我完全拥护。”这时，他便说：“谈话、开会就是要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要老讲赞成、拥护的话。”他就是这样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于争论问题的风气，发扬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然后处理问题，做出决定。恩来同志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最好榜样。

恩来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从不居功，他经常对我们说：我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一切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他处处突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和作用。在工作中，如果发生什

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缺点错误，他自己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上推下卸。在他领导下，工作放手让我们去做，既有原则指示又有具体帮助，即使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都可以及时得到克服和纠正。因此，我们都感到心情舒畅，敢于负责，勇往直前。

我经常听到恩来同志讲他自己过去的缺点错误，他不仅同别人谈话时讲，而且在会议上也进行自我批评，解剖自己，讲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亲身经历，以此帮助干部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常常对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恩来同志这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的美德，使他在党和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作自我批评，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伟大形象，恰恰相反，正说明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因而使得他们的光辉形象更加伟大。

恩来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执行和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他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他始终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即使有时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或被误解，他也服从组织决定，坚决执行。

建国以来，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政府总理职务，可是他一直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从西柏坡进北平城后，他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旧平房里办公。

恩来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照例应该有一顿晚餐，但他不要，肚子饿了，有时只有一杯清茶，几块饼干，这就是我们总理的晚餐！恩来同志胸怀全国人民，面向世界，时时刻刻关心干部和群众，唯独忘记他自己，直到他临危的时候，还让给他治病的医生去照顾别的病人，不要管自己。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总理啊！

四

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是说不完的，使我终生难忘。恩来同志日夜工作，从不知道休息，却不让我跟他一道熬夜。每逢假日，他自己照样工作，却总让我休息，有个星期天，我正在北京郊外团河农场，恩来同志来电话叫我回去，抱歉地说：星期天也不能让你好好休息，因为有急件要处理，又把你找了回来。我说：我应该回来和总理一道工作。

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我留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恩来同志让我开完会到北戴河去休息。我去休息两天，便回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108]的弟弟刘景范^[231]同志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30]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那个“理论权威”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一下那个条子，那个“理论权

威”后来就把这句话强加在毛主席头上，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之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正在我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232]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

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毛泽东同志、恩来同志的关怀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深信我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你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就在那些时候，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给我创造了学习环境，让我刻苦学习马列著作，还给我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一九六五年，党安排我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我每日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半天，拜工人为师，从工人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对我世界观的改造有很大的帮助。

不久，“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这时那个“理论权威”已经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窃踞高位。他当然不会忘记我，又向我下毒手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我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被揪到西安批斗。二月十七日，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大意说：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曾经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几十年戎马生活的老战士，横遭林彪一伙的摧残，百般凌辱，甚至朝不保夕，我不能不讲出心

里话。

毛主席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后来，听张仲良同志说，毛主席曾经讲过：“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可是那个文革小组“顾问”和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我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大肆株连，因此而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那就更多了。他们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多少元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233]和江青^[234]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惦念总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恩来同志的处境虽然非常困难，但对我十分关怀，想方设法保护我。他看到我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拿着照片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当西安的群众代表问起对我怎样处理时，恩来同志很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恩来同志语义双关的意思我是领会的。接着，恩来同志下令把我军事管制起来，实际上是把我保护起来。但是，那个“顾问”仍然不肯放过我，

阴谋把我揪到延安、兰州去批斗，被周恩来同志制止了。

我的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四月五日，不得不给周恩来同志写信，告诉他，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别人挨批挨斗。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来同志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把我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监护中的悠长岁月也是不容易过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不放过我，想方设法折磨我。我独处斗室，断绝了和一切人往来，连直系亲属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边的真实情况。一天，专案组的人忽然把我带到城内一个地方，猛地看见齐心和孩子们坐在那里，一个孩子亲热地叫我爸爸，我一时愣住了。齐心给我说后，我才认出是最小的儿子。我离家的时候，他还是八岁的孩子，现在已是十六岁的青年了。我想起青年时候读过的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是描述老人回家的变化，这回是因为孩子长大而不认识了。当齐心告诉我，这次批准家属前来探望我的是周恩来同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泪珠。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日理万机，还要和那些魑魅魍魉斗，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在监护中的革命老干部，让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见。齐心带着孩子在外边处境十分困难，连住处也成了问题。她向总理提出了一点要求和希望，马上就批示解决，而且超出她的要求。周恩来同志不仅关心革命老干部，也爱护年青一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这对在监护中的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当然，周恩来同志对革命老干部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个人

的感情，而主要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分清敌我，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那个“理论权威”、林彪、“四人帮”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挽救和保护了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革命老干部。正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保护了党的一部分精华，维系了亿万人心，才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力挽狂澜，使我们党和国家免于崩溃，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毛泽东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

在周恩来同志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歌颂不已，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勇前进！

按照农轻重次序 调整好广东国民经济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

党中央提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发展的轨道。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一定要打好。

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是一个积极的方针，鼓劲的方针。这个方针的重点是调整。要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调整好，就局部来说，有进有退，有上有下；就全局来说，要通过调整稳步前进。要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在调整中前进。这一仗打好了，国民经济才能够持续地按比例地高速发展，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才能够加快前进。

从广东的情况来看，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农业同工业的状况很严重。农业发展缓慢，使吃饭成了问题。粮食上不去，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也受到限制，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遭到破坏，抗灾能力薄弱。森林砍伐过量，破坏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和三级干部会上的总结发言的一部分。

严重，有的林区资源已临枯竭。由于乱砍滥伐林木，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沿海渔盐地区，困难很多，几乎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有的已濒于破产的边缘。农业发展缓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国民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林彪^[177]、“四人帮”^[176]十年干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恶果，已经越来越暴露出来。过去我们确实是对农民这个大头考虑得太少，没有根据农业的迫切需要来安排我们的经济工作，往往是就事论事，修修补补。有的部门甚至总想少给多拿，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业的困难。口头上是农、轻、重，行动上却是重、轻、农。在工作上没有想农业之所想，急农业之所急，千方百计地支援农业，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不少挤农、伤农、坑农的事情。这次会上，大家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充分揭露，但是有少数同志对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还认识不够。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自觉地贯彻农轻重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把农业放在首位，现在是到了觉悟的时候了！如果现在还不把农轻重这个比例关系处理好，再拖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上下左右，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来个大转变，在实际行动上真正把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好，同时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

首先要全党动员，大办农业，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

（一）要真正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摆正农业的位置。全党都要从思想上、组织上、领导精力上、作风上和财力、物力的分配上，真正体现以农业为重点，上下左右扭成一股劲，把农业促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贯彻后，广大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很高。现在的问题是，农业要上去还有许多实际困难，如果不全党动员，大办农业，真正把农业放到基础的位置上，从领导、政策、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农业要真正上去是不容易的。农业的问题，不能单纯看成是农业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单纯看成是下面的问题，关键在于省委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抓农业。现在我们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省委要摆正农业的位置，各部门、各行业都要把支农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

要从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广东农业的特点。我已多次讲了广东经济的长处、优势和它的短处、弱点，这个问题今后还要继续注意，结合总结经验，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发挥长处，克服短处，全面权衡利弊，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我们在战天斗地、发展经济中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工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所要求的。单以广东农业的生产条件来说，确有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四季长青等得天独厚的一面，但也有人口多、耕地少、灾害多等不利的一面。过去，这个不利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今后，我们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是保证对农业实行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

(二)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和政策。农业要搞上去，主要还是要靠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再加上国家的支援，就可以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有效地改天换地，丰产增收。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235]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今后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农村工作方针的纲领性文件，要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农业具体方针的制定，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看准了就要采取一切有力措施，坚决实行，一抓到底；处理农村的经济政策，要十分慎重。这些年我们确实对农民要得多，支援少，今后一定要十分注意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亏损负担转嫁给农民，不得随意提价或压价。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也不能马虎从事。同时也要教育农民，已经确定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粮食、生猪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必须保证完成。

(三) 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的财力、物力支援。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要真正体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要充分发挥工业支援农业的作用。省上掌握的地方财力、物力要坚决按农、轻、重次序进行安排。虽然目前我们的财力、物力还有困难，但要尽一切可能多支援农业。省机动财力今年投放于农业的仍按五千五百万元不变（不包括支农工业），并安排必要的物资、器材。如果中央批准我省实行大包干的财政体制，明、后两年合计，要安排一亿八千多万元用于农业（不包括支农工业），其中明年至少要增加二千万以上。外汇也要优先用于农业，中央批准广东实行新的管理体制后，明、后两年安排一亿美元，用于进口化肥和饲料。如果明年一下子达不到，先拿出八千万美元，不足部分后年补上。关于外汇留成问题，中央已初步决定，赡家侨汇地方留成部分分给市、县三分之一，待中央决定后，坚决照办。其他外汇收入的留成办法，待中央批准我省实行新的管理体制后再同各地商量决定。在这方面也要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为了夺取今年晚造丰收，省委决定在今年外贸出口分成外汇中，安排一千万美元进口十二万吨标准肥，同时，努力增产本省地方生产的化肥（包括氨水）。争取进口加上本省增产的化肥，一共增加二十万吨标准肥。这些肥料原则上作为生产肥，归农委分配。各部门掌握的肥料都要及时分配下去，不要误了季节。电力、油料也要尽量多安排一些用于农业。特别是抗旱、排涝所需的电力和油料，要确保供应。同志们对调整小化肥的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应当肯定，省上和各地想方设法办小化肥，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小化肥是有功劳的。我们应当从当前肥料严重不足的实际出发，对小化肥采取积极的态度。小化肥所需的电、油和造气用煤，要积极安排；特别是六、七、八月，一定要保证供应，使之开足马力正常生产，力争多产化肥，以应晚造生产所急需。小化肥厂也要千方百计挖潜、改造、革新，降低消耗，夺取高产。总的来说，要采取保、促、改造的方针，只有个别确实布点不合理而又难于改造的，才分别情况考虑关、停、并、转。处理这个问题要十分慎重。

要改革农业资金和物资的管理体制。我们在这方面的现行办法弊病很多，不利于发展生产。按照中央对国家农委机构职能和任务的规定精神，省委决定，在统一计划下，农业的资金、外汇、物资、农业机械等，一律切块归农委统一管理和分配使用。

在国家加强对农业财力、物力支援的同时，必须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要发动群众多种绿肥，大搞土杂肥，提高地力，使农

业生产水平有个新的突破。今年秋冬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冬种绿肥，现在就要做好规划，作好准备，要大搞，多搞，为夺取明年农业丰收打好基础。

要大办沼气。办沼气是科学地有效地利用生物能源，是能源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沼气一能多用，既能解决农村的生活燃料和一部分农用机械动力问题，又能给农作物提供经过加工的有机肥料；还有利于管理污水、粪便，改善环境卫生。沼气池既是生物能源库，又是有机肥料库。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我省有的地方已经办了沼气，效果很好。今年省上拿出三百万元支持各地办沼气，地、市、县、公社和有关部门也应积极抓好这一工作。

（四）加强农科队伍建设。要抓紧恢复和健全农科机构，首先把四级农科网建立和健全起来，把地、县农科所列入事业编制，必需的科研经费要给予安排。要办好农业院校，注意培养科技人才。农科部门的劳动指标和干部指标也要适当给予安排。

三年调整期间，农科工作首先要根据广东灾害多，特别是早造低温阴雨，晚造台风、寒露风危害严重的特点，在趋利避害夺高产方面，尽快作出显著成效来。要大力选育和推广良种，改革耕作制度，提高作物栽培管理水平，为农业的加快发展多作贡献。

（五）要认真抓好两头。一头是商品基地建设，省、地、县都要建立商品生产基地。省上要采取得力措施支持珠江三角洲二十七个县（市）加速商品粮基地建设，同时要抓紧对海南岛的开发。这个问题讲了多年，没有落实。这次会议之

后，由省革命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立即着手研究，今年之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另一头是山区、沿海地区（包括渔盐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潜力很大，但是目前普遍较穷，困难不少。除了动员群众自力更生挖掘潜力外，还要尽量给予帮助，使他们能把生产搞上去。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我省山地面积广阔，很多山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但是现在山区普遍粮食少，分配水平低，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加强山区建设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必须从财力、物力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把林业搞上去，使山区经济繁荣起来。要成立老区建设委员会。省上最近就要召开林区工作会议，首先解决林区的方针、政策、体制和粮食任务的调整等问题。同志们提出的其他许多有关农业的问题，都要抓紧时间解决，由农委负责，组织有关局分别轻重缓急，一个一个落实，决心要大，措施要扎实，步子要迈得快一点。

（六）要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合理调整农业布局，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我省人口众多，今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粮食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解决粮食问题，除了要大力抓好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外，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有计划地开荒、围海造田，以扩大耕地面积。此外，从长远看，应当逐步改变食物构成，增加肉类食品。要大办养猪场、养牛场、养鸡场、养兔场。还可以大量养蜂。要有计划地进口饲料、良种和必要的技术设备。建立畜牧业和渔业基地。要积极发展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业。要搞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完成粮食任务的前提下，合

理安排林、牧、副、渔和经济作物生产，适当调整水稻和旱粮、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除继续抓好甘蔗生产外，还要积极发展热带作物、水果和市郊蔬菜生产。要挖掘土地潜力，向荒山和丘陵进军，多种薯类和木本粮、油等作物。

要积极办好社队企业，从产、供、销、税收、信贷等方面，支援社队企业的发展。要把社队企业主要的产、供、销指标，逐步列入各级计划。

农业机械化问题，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积极搞好试点。要根据我省的特点，摸索农业机械化的道路，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要注意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抓好农机零配件的生产，积极改进提高小农具，并保证供应。农用艇所需的木材、桐油，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也要尽量多安排供应。

关于调整问题，除抓紧解决农业问题外，还要把燃料、电力、交通运输、建材工业和轻纺工业搞上去。我省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是大有作为的。农业要真正搞上去，是离不开工业支援的。

要真抓好农业教育^{*}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实现农业现代化,基础在教育。没有良好的农业教育,就不会有宏大的农业科技队伍,而这恰恰是我们广东省农业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许多科研单位都感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所以培养人才是当前农业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省农业大专院校和中专的学生在校人数,仍然达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半,农业教育正处在极大的困难之中。由于搞农业工作的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不如别的行业,许多人不愿意学农业科学,更不愿意搞农业工作。因此,华南农学院和其他高等农业专科学校都往往招生不足,农业中专问题更是严重。

为了搞好农业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领导。华南农学院和其他农业高等专科学校要坚决办好,只要条件允许,应尽量扩大招生,加速培养人才。华南农学院应积极创造条件,扩大研究生班,继续培训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在有条件时,还要分期分批培训一些高级农业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农业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技术干部，帮助他们掌握农业现代化的知识。

学校的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并且提高科研水平。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但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是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不能脱离教学工作。今后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考核晋升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下去。要尽可能增购必要的图书和实验室设备，把农业院校办好。

我们的老专家都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经验，是国家和人民极宝贵的财富。胡耀邦^[236]同志最近说过，老科学家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带头人，希望大家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现在老科学家、老专家数量并不多，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林彪^[177]、“四人帮”^[176]横行霸道，对老专家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得不少老专家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损伤。但大家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创造了许多重大成果。有的教授为培养下一代，奋不顾身，把一切学识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有的还夜以继日地编写学术著作，促进科学的繁荣。现在有的老专家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给予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照顾和支持，要给他们配备助手，增置图书资料，安排适当的住房。我们热切希望老专家都能在晚年出新成果，将自己多年的经验整理成书，尽量多带一些“得意门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我们一定要虚心地拜老专家为师，认真地学习科学技术，为加快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

彭总在西北战场^{*}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 战斗的情谊

每当想起彭德怀^[95]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远在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不久，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组织工农红军野战军举行西征^[193]。其时，我跟随彭总在戎马倥偬之中度过了好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向他报告工作情况。他虽然长我十五岁，但完全用平等、亲切的态度对待我，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那种诚挚的关切之情，使我深为感动。一九四六年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将近半年，西北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为了备战，彭总和我从延安动身，渡过黄河，赶到晋绥^[58]边区临县的甘泉村，会见了陈赓^[237]将军，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10]。一九四七年初春，边区集团军在甘肃省东部的西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纪念彭德怀写的文章。刊载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华池和胡宗南^[42]部队恶战一场。战后，彭总在富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然予敌人以重创，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总的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

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238]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总身上的硝烟味还未散尽，又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富有历史风采的古城西安和我们热情地话别，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当他们征战数载凯旋归来时，我也调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和他见面。回首当年，正是“创业艰难百战多”。在那漫长而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在收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二 杰出的将帅

在我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彭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地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因而，西北战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人们誉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受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高度的赞扬。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全中国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永不屈服的中国人民，挺起胸膛，奋起抗争。战争打了八个多月，歼敌七十一万，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实行“重点进攻”。这“重点”，一个在陕甘宁边区，一个在山东。当时的西北战场，敌人总兵力有三四十万，放在第一线的兵力二十五万余人。一九四七年三月战斗打响时，我仅有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到了三月十七日，王震⁽²⁰⁰⁾将军率领第二纵队从山西中部日夜兼程赶到延安附近地区之后，我全部兵力也不过两万多人。敌人有飞机、坦克、汽车和现代化装备，而我军就是“小米加步枪”；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敌人占据着拥有好几千万人口的大西北，而我军所凭借的是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一小块贫瘠的山区。

记得三月十六日，西华池战斗打完没有多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发来急电，要我星夜返回延安。此时，北线榆林敌二十二军^[40]等部从北向南进攻；马步芳^[126]、马鸿逵^[127]军从西面和西北面向我陇东分区和三边^[37]分区步步进逼；而在南线进攻的胡宗南部，有十四五万之众，兵分几路直扑延安。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我飞马急驰，两天两夜赶回延安，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住的王家坪。我最担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因此一见面，就劝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赶快离开延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从容不迫地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总交给我一封毛主席亲笔指示。党中央要德怀同志和我指挥西北野战军，并立即成立前委^[83]。还指出：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我们正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商量成立前委的事，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在我们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79]同志和彭总等，大家全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我们注意对那些对撤退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

黄昏后，敌人已经离延安很近了，枪炮声越来越猛烈，在彭总和我们大家再三催促下，毛主席于是日黄昏后才离开了延安。彭总和我们大家送毛主席到延河边，深情依依地望着他们向东驰去。

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撤走之后，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苦战了七天七夜的指挥员，一批又一批挤到了彭总挂满地图的窑洞里。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可是彭总临危受命，镇定自若。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忙碌地调兵遣将；除派一支部队往延安西北的安塞县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统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打击敌人。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延安城东的飞机场，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司令部的好多同志都焦急地催促彭总赶快撤退。彭总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一直到深夜时分，彭总才率领西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离开已是一片火海的延安，从王家坪后沟爬上山，顺小路悄然退去。这条出人意外的小路，平时没有人注意，彭总往日散步时调查过，并踩过好多遍。由此可见，这位久经征战的老军人深谋远虑和军事观察之细密。撤离延安，大家心情激愤而沉重。同时，敌人又这样嚣张，情况这样危急，可是身经百战、独具胆识的彭总，却一边徒步行军，一边轻蔑地嘲笑四面八方摸来的敌人：“同志们，不要看敌人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看嘛，黄河那边的阎锡山^[239]，是瓮中之鳖，眼前的胡宗南，又愚又蠢，是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至于马步芳、马鸿逵之流，小丑跳梁罢了！他们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他望着延安左前方远处山头上敌人烧起的火堆，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在那以后的艰苦岁月里，彭德怀同志总是坚定不移，信心百倍，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彭总精心运筹，在青化砭设下口袋阵，诱敌深入，我军出其不意，以雷霆万钧之势伏击敌人，全歼敌三十一旅共三千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等三名少将和一名上校。当时，前总的指挥所设在青化砭西北的高山头上，枪炮声一响，我们正用望远镜观察时，只见尘土飞扬，战斗却结束了。没有想到结束得这样快，我好像觉得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说：“打了还不到一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将军，这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喜形于色，神采奕奕地打着拍子，哼着歌曲。我军退出延安仅仅六天，就在青化砭初战告捷⁽¹¹⁶⁾，这是何等振奋人心啊！接着，彭总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¹¹⁷⁾，歼敌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部队在距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其后，彭总为迎合敌人主力急于找我军决战的心理，来个投其所好，制造假象，让敌人再犯错误。敌人乖乖地听从彭总指挥，向数百里外的绥德地区扑去。敌人刚

从我们身边过去，彭总即利用敌人后方空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部队突然铁桶似地包围了距延安九十里的有重兵把守的战略补给站蟠龙镇^[118]，强攻两昼夜，歼敌近七千，生擒了因首先率部侵入延安城而被敌人吹嘘为“名将”的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缴获的服装、弹药、武器和面粉堆积如山。这是西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获得的大量物资补充。当敌人主力部队从绥德地区返回蟠龙镇增援时，彭总早已指挥我们机警地跳在一边，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兵，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弹药，穿着敌人送来的夏衣，吃着敌人送来的“洋面”，整整休息了七天。边区人民和全体指战员真是心花怒放，满怀着尊敬的激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赞颂彭德怀将军神奇的军事指挥艺术！

撤离延安以后，四十五天里三战三捷，我军声威大振，敌人连战皆败，损兵折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则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五月中旬，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边区军民五万多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翻山越岭，飞马奔驰而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在激荡群山的欢呼声中，登台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西北军民的战斗功勋；并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与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当时，彭总同战斗英雄、群众代表和游击队好汉们坐在一起，谦逊而深思，毫不引人注目，完全像普通一兵。“元帅兼士兵”，就是他作为无产阶级名将最好的写照。

接着，彭总指挥我军继续转战西北。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又根据党中央新的战略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

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240]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挺进豫西造成良好的战机。果然，敌人上了圈套。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地向榆林方向逼近。此时，不知死亡将至的敌人，还在高喊一战消灭我军。“结束陕北战争”。诚然，我军在长城内外的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数万之众的马鸿逵部队，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我军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119]。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沙家店战斗大获全胜的次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飞马来到前线指挥所里，向指战员热烈祝贺这一伟大胜利。毛主席说：“这一仗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彭总陪同下，还兴致勃勃地登上高山，视察了黄河和无定河之间的我军创奇迹的战场。此时此地，想起“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壮丽诗句，是何等动人心魄啊！

此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在全国各战场密切

配合下，彭总挥师南下，连战皆捷。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我大军离开陕北山区，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在宜川打了第一仗，旗开得胜，一举歼敌五个旅近三万人，击毙敌前线指挥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等。战后数日，毛主席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热情地赞扬了这一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从此以后，渭河两岸，兰州城下，青海高原，嘉峪关外，我军长驱万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彭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无私无畏，智勇兼备，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由防御转入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延安撤退后半年扭转战局；一年一个月又三天收复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延安；两年又八个月，便解放了占祖国面积三分之一的西北五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边疆帕米尔高原上。总计歼敌五十一万多，击毙和生擒的敌人将官数以百计。

最初，党中央根据西北战场兵力小等情况，要求彭总在开头三个月，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目的是把蒋介石几十万机动兵力拖在陕甘宁边区，使这里成为一个战略箝制区。那时预期：如果按最理想的打算，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那么三年可以回到延安。至于全西北的解放，在当时看来还是较遥远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彭总受命之后，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使胜利进程大大提前。记得他刚接受任务时，就语重心长地讲：“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同时，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稍一不慎就要

死人，性命关天呀！”正因为彭总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这样强烈的责任心和革命胆识，所以能做到高瞻远瞩，全局在胸。他讲过：“陕甘宁边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敌人统治的空隙，几个军阀互有矛盾，所以刘志丹^[108]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才能在这里存在。目前，敌人虽然强大，但指挥不统一，我们打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观望；我们打马鸿逵、马步芳，胡宗南不动。这是个很好的条件。但敌我力量悬殊特别大这一点，决定了斗争艰苦，决定了不能速胜，必须谨慎从事。”正因为如此，每次战斗之前，彭总都仔细掌握情况，连任何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制定作战方案时，他不仅反复推敲，还要下级反复提意见，甚至交给全军讨论。特别是对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见，他十分重视，认为这种意见能“医治”主观臆断和片面性的毛病。有时计划等完全搞好了，他还苦苦思索，不能成眠，半夜起来把我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真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我看见他通宵达旦地站在地图下踱步沉思。有时抱着电话机，要前边的侦察员直接给他讲情况。有时参谋人员审问俘虏，他站在一边静听着，观察着。所以，他对我军情况了如指掌，就不用说了。他对敌人的兵力、火器、动向、部队素质以及指挥官的资历、能力、个性，也都非常熟悉。“知己知彼”，因此他多谋善断，作战决心来得快，而且一旦下了决心，就像钢打铁铸一般不可动摇。最使我难忘的是：打青化砭战斗时，埋伏了两天，敌人没来，天寒地冻，大家十分焦灼，说敌人恐怕不一定来吧？彭总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

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顺山沟向安塞方向去了，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之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队，到安塞方向没找到，必然转到这个方向来找。所以说，他一定要来。”接着，我们商量拟了个动员令，在战场上散发，鼓舞指战员必胜的信心。次日，敌人果然来了，确是料敌如神啊！

他能迅速抓住战机。只要发现情况，即使半夜三更他也一跃而起，打电话，查情况，找参谋人员，因而能不失时机。抓住战机，就狠打，猛打，连续打。在这种情况下，谁行动迟缓或畏缩不前，他十分严厉，毫不容情：“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了你。”这一仗还没打完，他就考虑下一仗。而且每战都拟定好几个方案，以便应付种种意外情况。因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沉着镇定，泰然处之。他总是冷静而清醒的，总是机警地让我军处于有利态势，不因为敌人强大而失去主动，不因条件困难而失去信心。他善于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敌人的弱点，使敌人犯错误从而听从他的指挥。对整个敌人他非常轻蔑，但是在实战中对敌人一兵一卒都很重视。他的名言是：“新兵当老兵打，死老虎当活老虎打。”

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他毫不畏惧地冒着炮火、硝烟亲临前线，察看地形和敌情。有时候，敌机狂炸，流弹横飞，情况十分危险，我们不让他到前面去。他说：“同志，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谁也打不了胜仗。”可是，当我

跳出工事要到前面去的时候，他却诙谐地说：“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个人好嘛！”然后他就向炮火激烈的地方走去，在浓烟烈火中指挥那一场恶战，使指战员得到巨大的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力量。在阵地上，各级指挥员强行把他拉下阵地，或者用身体遮掩他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情景，我多次见过。使我永远难忘的是，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中的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周围山头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紧张，人人都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率领我们向蟠龙镇扑去。“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办各的事噢！”正因为他这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正因为他把自己一颗忠贞的心交给了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以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都对他充满尊敬与信任，都深受鼓舞，因而能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战胜强大的敌人。

三 学习的楷模

“胜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胜利。”彭总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彭总的讲话中以及他同我许多次交谈中，我们都对这一根本问题，

感觉得最为深切：西北解放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其根基是很深厚的。首先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下，各个战场配合作战而取得的。我们都清楚记得，早在重庆谈判⁽²⁴¹⁾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边区军民准备打仗。解放战争从中原打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要我边区党政军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备战方面来。所以边区军民从政治、思想、物质上，早就作了准备。何况，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多年来领导人民群众建设边区，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人民丰衣足食，这都为战争胜利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我军只有两万多军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却派来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彭德怀将军和贺龙将军。彭总在前方指挥，贺总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特别是晋绥军区，在贺总领导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时不仅陕甘宁的学校、机关、干部家属和兵工厂等等都搬到了晋绥，而且在兵源、物资、粮食、弹药方面，从晋绥源源不断地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而且这两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名将，不负党中央和毛主席重托，互相支援，共同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至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战略计划，制定作战方针以及亲自指挥战斗的光辉业绩，更是为边区军民所熟知、所称颂和铭记不忘的。

作战过程中，任何一次大的战斗，彭总都要请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战斗中，也不断报告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发来指示，他都和同志们一道反复地逐字逐句地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此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我们跟前，我们能

亲自聆听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和教诲，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幸福。像沙家店战斗，彭总率领部队从榆林地区撤到沙家店周围地区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刻乘马赶到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前东原村，举行一次会议，同彭总和前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确定了作战计划。战斗中，毛主席的电话线就通到彭总的指挥所里。彭总随时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战斗进展情况，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也不断地发出指示，因而才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么机智而巧妙地置敌于死地，获得伟大的胜利。

我军攻击蟠龙镇时，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还有两个指挥部，加上敌工事坚固，我军伤亡大，彭总一面让指挥员出谋献策，研究如何改变打法，一面给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情况。毛主席几分钟后就回了电报，彭总接到电报，大为振奋，立刻改变部署，重新发起攻击，把敌人分割开来打，结果进展迅速，很快取得胜利。彭总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力而及时的指挥，衷心感谢，坚决贯彻。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他经常提起这件事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当彭总在事关革命大业或事关战略部署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时，他也坦率提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记得，关于保卫延安的战略方针，曾有两种设想：一种是把陈赓将军的部队从山西调过来，加强西北的力量，在延安外围地区消灭敌人。后来确定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而延安军民从一九四六年秋天就开始疏散人员、物资，进行紧张的备战。可是在敌人大举进攻前

夕，彭总在南线视察了我军阵地回到延安以后，看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延安大门外斩断魔爪》，社论中讲的和原来的战略设想完全相反。他勃然大怒：“我们有几个兵嘛！王明⁽¹⁸²⁾路线‘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苦头我们还没吃够？”彭总不休息，不吃饭，扔下报纸，翻身上马，到党中央去找毛主席陈明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原来这样打算，现在也没有变，宣传上有错误可以纠正。我们的彭总就是这样一位刚正无私，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

一九四七年冬季的部队整训，曾被中央军委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推广。彭总多次谦虚地指出：“不要因受表扬头脑发胀。这一运动是继续了红四军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和继续。”他曾多少次讲过：“大西北之所以能迅速获得解放，关键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次开会中，一位地方干部讲：“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汗马功劳。”他严肃地纠正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做了一些自己应做的事情。”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深知彭总不顾个人安危的一贯作风，所以除了以中央名义写信之外，他们曾多次谆谆叮咛，要我和别的同志在作战时注意彭总的安全，在平时关心彭总的生活，要他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珍惜自己。而彭总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样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不管在怎样紧急情况下，有人从毛主席身边来，他都要仔细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体怎么样？生活怎样？只要知道中央机关到了什么地方，立刻派出一支部队出去，保

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每一次“野司”转移，他总要电台后走一步，收到中央指示后再动身。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当一九四七年炎热的夏季，我军正在陇东分区与敌激战时，敌刘勘趁我主力部队远离延安地区，便率数万之众向靖边县王家湾一线猛扑，妄图打击我党中央机关。彭总得知这一情况，彻夜不眠，寝食俱废，在枪弹横飞的阵地上同我商量，要我发个电报，让靠近中央机关的地方军队，不计一切危险和牺牲，务必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在行军途中，他不顾敌机轰炸，要电台同志停下来，设法和中央联系。后来，当他得知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时，欢乐之情，溢于言表，高唱《东方红》歌曲，还满怀激情兴奋地向周围同志讲述我党的历史，讲述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走了多少曲折复杂的道路，才有了这样伟大的党中央，才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希望大家深切懂得和万分珍惜这种对中国人民说来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当时彭总讲述这些情况时的动人神态，至今犹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激动。

“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彭总这位劳动人民忠诚的儿子，他总是把胜利和功劳归之于人民群众。延安、陕北，对我们许多老干部来说，是第二故乡，对彭总说来也是如此。他曾说：“这里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方，是党中央居住的老根据地。我们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亲自建设这里的一草一木，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血和汗洒遍了这里的每一个山头 and 每一条山沟。”这就充分表达出彭总对陕北、延安以及这里的人民群众，充满了发自内心的阶级之情。战争开始，形势严重，似乎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他满怀信心地

指出：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就是一百五十万战斗员。敌人看起来强大，可是在人民群众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在会议上，或者在我俩交谈时，他不止一次分析过我军不可战胜这个问题，他总是强调：“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的铁桶江山。”事实确实如此，战争来了，一切都为战争。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部署作战，就是找地方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们了解情况，布置对敌斗争的事情，彭总总是和我一道，非常热情地给他们谈斗争形势，发给他们枪枝弹药，以必胜的信念鼓舞他们坚持斗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赢得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可是，从和平环境转入了战争环境，开始时震动很大，但是仅仅两个月时间，就能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了。当时，所有的党政干部和青年都奔向战场，边区的男女老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我军英勇战斗，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带路，运粮，抬担架，组织游击队，万众一心，以各种各样方式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敌人一动，群众立刻向我们报告，而敌人派出谍报侦察人员侦察，立刻被群众捉住送给我军。这样敌人就成为聋子和瞎子。有的群众被敌人捉住，他逃跑时还要设法打死敌人或者捞一件武器回来。敌人在全边区已占领的地方想成立伪政权，想组织“保警队”之类反动地方武装，以便巩固其统治和配合作战，可是敌人始终未能达到这一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边区人民群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边区，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怀着多么坚强的信念和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无数至为感人的事实，使彭总深有感触，他说：

“几十年来，我们党，我们军队，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建立起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经过长征，我们人数很少了，到了陕北才得到休息和补充，后来打日本，这里成了我们的大后方。所以大家说，这里是我们落脚点和出发点。”青化砭战斗刚打完，敌人的飞机和援兵马上就来了。彭总命令我军立刻撤离公路，迅速转移，准备再战。我们大家站在高山上瞭望，只见每个山头上都有群众和游击队员的监视哨，敌人一动，他们就立刻发出信号，彭总兴奋地说：“这就是天罗地网噢！敌人弄不清我军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就是不懂。”后来他得到报告：有的群众因为不愿意暴露我军任何秘密，而被敌人砍了头。彭总听了这事，凝望着千山万岭，潸然泪下！刚打完蟠龙镇战斗，有几位老乡抬着一个重伤员走到司令部里来了。警卫人员大声喊叫，不让他们进来。彭总听了很气愤：“喊叫什么？这是一种野蛮行为，老乡们不知道冒着多大的生命危险才把伤员救下来，又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走了多艰难的路程才赶到这里。你要是国民党司令部，用绳子捆着他们也拉不进来。”他让担架队员把担架抬到他的窑洞里，看了看伤员的伤势，又给每一位老乡倒一碗水，恭恭敬敬地递到他们手里，说：“老乡，伤员们忘不了你们，我们也忘不了你们。你们为革命立了大功劳。”然后派人把担架队员带到医院去。抬担架的老乡走后，他还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走过的山间小径。一九四七年夏初，某旅一侦察员，因为严重地违犯群众纪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已经决定枪毙。彭总愤怒地说：“从土地革命到现在，群众养活我们，支持我们，恩德如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哪有

什么胜利？可是有人竟然这样对待群众！”但是，他三番五次地看着那个报告，不忍签字。当他签了字后，把那报告摔到地上，跺着脚说：“这个侦察员，才二十三岁，现在犯了杀头罪！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喟然长叹，热泪纵横，周围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无不感慨万端！

“胜利，是战士们的胜利。”彭总这位德威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人民战士。他自己铭刻在心里的座右铭是：“学习劳动人民的正气、坚定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可是一一听到战士们舍身忘我的英雄行为时，就很感动。他曾这样说过：“有些同志为了完成爆破任务，身绑炸药，自身与碉堡同时粉碎。这种英雄壮举，在我军中不是一起而是很多起。他们壮烈牺牲不是由于谁的命令，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行为。这些英雄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这种英勇而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这出自肺腑的话语，最能表达彭总的崇高品德，是令人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得我军刚退出延安在一次会议上，他听到汇报说，各部队的指战员听到放弃延安的消息，大家都哭了，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边区”。彭总深为所动。他说：“我们的战士深明大义，他们知道边区是我们的根本。他们懂得党中央和毛主席要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战争，新华社天天都要在这里广播。所以他们愿意作出一切牺牲。这正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三战三捷”之后，我们刚住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一副担架放在我们窑洞门口，一位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流血很多。

彭总听到以后很激动，他让人把担架抬到窑洞里，抱着伤员的头灌汤灌水。还说：“好同志，你要坚强。群众需要你们噢！”那位伤员挣扎着说：“你是彭老总领导下的好干部，你转告彭老总，我伤好了回来，一定好好作战。”已经把伤员抬走了，彭总还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阶级压迫的痛苦就永远不会结束噢！”西府战役时，彭总看见三五九旅一个战士负了重伤，还爬着去赶部队。彭总问他伤这么重为什么不把机枪撂下走？战士说：我活着枪就不能丢。彭总立即给他洗脸、洗脚、包扎，然后派人把他抬到医院。以后好几年，他还经常给司令部的同志们讲述这个战士的忠诚感人的品德。看来，这些战士的英雄形象，是永远活在彭总心里的。

行军中，彭总有时静静地走在战士的行列里，听着他们的种种议论，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对领导上的意见。不认识的战士，以为他是政治机关的普通干部。在进军陇东的途中，看到战士们过河不方便，他就在水里搬石头垒起石头堆，让战士走过。在通过沙漠渴死人的时日，他把分给他的水让给战士喝。战士们看到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竟这样亲如手足地关怀他们，其激动的情怀是不难想象的。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先看战士住好了没有，有时和参谋长挤到一个房子里，把房子腾出来给战士们住。看到饲养员没有房子住，他把司令部四科长叫来，说：“白天我们骑马走，他走路。晚上我们睡觉，他喂牲口，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他们？眼里只看见首长，那是一种恶劣习气！”他对参谋、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所有在他身边工

作的同志，都平等看待，和蔼可亲，问寒问暖。他不喝酒，不吸烟，除了下两盘象棋，没有任何个人嗜好。他把津贴省下来给小通讯员和警卫员买本子、买钢笔。“这些小同志是来革命的，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这就是出自他内心的朴素诚挚的语言。

四 崇高的品德

彭总出身贫苦，在旧社会，忍受过残酷的压迫、凌辱和饥饿。他的背微微有点驼，那是从幼年起给地主、资本家挖煤、担土压成那个样子的。旧世界的罪恶、不平、虚伪、污秽和尔虞我诈，使彭总心里深深地埋藏着对旧世界和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他喜欢屈原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说 he 自己是：前半生摸索人生道路，后半生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因此他觉得，最大的欢乐和幸福就是为革命献身，为真理献身，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甘愿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彭总对党、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那样尊敬和关切，那样满怀着赤诚与热爱的原因。

可是，彭总丝毫不关心自己，对自己很“苛刻”。他身居高位，但对特权却深恶痛绝，认为那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最丑恶的东西。他常以“不忘本”来告诫自己。他总是拿战士和群众的生活水平来要求自己，觉得在艰苦的战斗中生活特殊是可耻的。的确，从生活方面也是可以充分地看到他赤胆忠心和鞠躬尽瘁的高尚人格。他的旧大衣，是从抗日战争时

期的太行山带来的；他的衣服是补了又补；穿着陕北老乡做的厚布鞋；他的破洗脸盆用了七年还在继续使用；他骑着一头又瘦又乏的老骡子。蟠龙镇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敌人很多高骡大马，同志们挑了一匹好马，要把彭总的“烂骡子”换下来。他断然拒绝：“烂骡子？陕北的贫雇农有几家能养起这样一头骡子？我彭德怀又有骡子，又有警卫员，抬脚动步就有许多银洋落地，拿人民的东西够多啰！”接着他就批评：我们有些同志，不是一打完仗就立刻考虑下一仗怎么打，而是比谁的马好，比谁的望远镜好，这是庸俗作风！然后他让后勤部把缴获的好骡马挑选出几头，驮上缴获的“洋面”，送给中央机关，其余的好马交给通讯员和侦察员去骑。司令部四科的同志们最作难，他们经常为了彭总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向我“诉苦”说：管他吃饭难办，管他穿衣难办。就拿伙食来说，他吃的是小米饭、包米面、土豆丝、酸菜汤，就是这样，吃多少伙食钱，还要查帐，多用公家一分钱也是不行的。要是超支了，他就问管伙食的人：“你家是什么成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吧？要不然你从哪里弄这么多钱来花？”一九四七年夏天，部队通过大沙漠，在长城沿线休整。经过一场苦战和通过沙漠地带的艰苦行军，管理伙食的同志高高兴兴买了一些新上市的黄瓜，结果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那么，我们就应该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群众的负担也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沙家店战斗之前，已是初秋，长城内外夜里相当寒冷。司令部四科的同志看到彭总通夜站在窑洞里的地图下太冷，于是给他缝了个布门帘。彭总说：

“部队有人连干粮袋都没有，还做什么门帘？我们要想着群众和战士正过着苦日子啊！”一九四八年秋季，在黄龙山麓作战，我们俘虏了不少敌人将校官员，彭总找来一个“中将军长”谈话。谈话完毕，警卫员端来一大盆面条，借来老乡的几个大粗瓷碗。彭总拿起个大粗碗舀面条，那位“中将军长”站在一旁不动，他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彭总最厌恶那些拍马谄媚的人，他沉下脸，打量着那位“中将军长”，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饭的人有的是。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证明我高高在上，特殊得很！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这证明你们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真是字字掷地作金石声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彭总光辉的一生就贯穿着这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啊！

他生活方面如此简单，如此“清苦”，可是在思想、精神上，却非常富有。在万里征战中，他酷爱学习，首先是向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个家都离不了它。”这一席话，岂不是彭总全部战斗生活的最真切而深刻的写照吗？那时，我们行军打仗，住在任何一家老乡家里，他都像一个质朴的工人、农民或者老兵一样，和群众自

自然坐到一起交谈，群众哪里能想到他就是横扫千军、威震敌胆的彭大将军？“唯有英雄能本色”的话，说得何等好哇！战斗中，他除了公家发的被子、衣服和鞋袜之外，可以说身无长物。可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总是在铁皮文件中装着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古代和现代的军事学著作、历史学著作、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其他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深山的窑洞里，在平原上的茅舍里，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他常秉烛夜读，手不释卷，“不知东方之既白”。他厌恶那些只会空喊政治口号而忽视提高技术水平的不学无术的人。他说：“鄙人是读了两年半书的‘大学生’，斗争这样艰苦、复杂，党的事业发展得这样快，不学习不行呀！”有时他骑在马上读书，有所领悟，就纵声大笑。有时他深有感触地说：“书上写得明白，不过任何一句话要变成自己的，可不容易啊！”他把从伟大的斗争生活中、从劳动人民身上和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用来自觉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勤务员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说：“我做了些工作，可是也有不少错误、缺点。比如在西北战场，我们两次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人得有自知之明。可不能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我需要帮助，需要改造，因此，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敢于不顾情面地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的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作战过程中，他有些主意出的不对，有些战斗没打好，有些事情你和他争执得脸红脖子粗，以致最后不得不报请党中央和毛主席解决。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就放弃自己的意见。他不仅从善如流，而且有错就改，光明磊落。他说：“‘吾日三省吾身’的老话，

多少有些道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每星期、每个月，至少要拿出一天时间，切切实实反省一下：自己究竟给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理事情极快，解决问题极干脆。今天的事情决不拖到明天。重要电报、文件，他自己动手写。事实上，在他领导下，公文和电报极少。他每晚睡觉时总要坐在炕边沉思默想：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他从来不进医院，不看病，也没有休息过。同志们知道他有胃病，劝他休息。他说：“现在还不到休息的时候，没有完成任务，去了马克思也不要。到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了，这是自然规律。”他就是那种为了党的事业，把自己燃烧净尽、到死方休的人！他对己严，对人也严，特别是对干部，如果工作失职，他毫不客气给予批评甚至处分。他说过：“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是的，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坦率爽直，说话绝不转弯抹角；对那些贪生怕死、工作不负责任的人，文过饰非或耍两面派的人，他严厉批评，毫不容情。正像陈赓将军曾经说过的一样：“彭老总是暖水瓶，对人面冷内热！”是的，他对同志心里充满了阶级之情，充满了阶级之爱，能披肝沥胆，赤诚相见。因而同他一道工作的人，都喜爱他，尊敬他。

由于林彪^[177]、“四人帮”^[176]的疯狂迫害，彭总已含恨而逝。但他严于律己的种种言行，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思潮汹涌，不能自己。一九四八年六月，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在黄龙山麓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敬爱的林伯渠^[204]同志说过：“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啊！”现在当盖棺论定的时候，我

想，他之所以有德可怀，那是因为他无私无畏。他之所以无私无畏，那是因为他像我们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满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啊！在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德。

敬爱的彭总，你是不朽的。你曾经为之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将会世世代代铭记着你的高大形象，传诵着你的战斗业绩，并以你为榜样，奋勇前进。

继续解放思想， 进一步把经济搞活^{*}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经过一年多来的摸索，我们广东省在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思想活跃起来了，经济开始搞活了，情况是好的。在这一点上，同全国形势大体一样，但是同一些先进省、市比较起来，我们还有差距。当前，我们自己也有好的经验，但是，“活”得还不够，或者说很不够。其根本原因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受林彪^[177]、“四人帮”^[176]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很深很广；如果说农业战线极左流毒已经有所肃清的话，那么在工业、财贸、金融领域里的极左流毒，还有待严肃认真地加以清除。所以，要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要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

一、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里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省工交系统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

比如，关于推广清远经验^[242]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这次会议上反映还很强烈。去年八月省工交会议肯定了清远的经验，并提出全省的其他县办工业也可以结合实际进行推广。到今年三月份止，全省将近一千个企业推行了清远经验，都取得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企业和职工从企业经营成果上来关心生产，注意节约，因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当然，清远的做法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奖金多了一些，企业之间也存在苦乐不均的现象。这是必须改进的，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省委肯定了清远经验，没有怀疑、动摇过。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也容易。不要老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也要让墙里也香，家里也香。要重视和珍惜自己实践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同时也要认真学习兄弟省、市的经验。现在，我在这里重申，要认真推广清远经验，并帮助他们总结提高，规定出几条来，使之日益完善。当然，在推广中要结合自己的实际，不能一刀切，要吸取他们好的方面，改进不够完善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各地还应总结推广自己本地行之有效的好经验。我相信，我们广东绝不会只出一个清远经验，只要思想解放，把经济真正搞活，还会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更好的经验。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用群众的话说，叫“国家发大财，企业发中财，职工发小财”。

二、解放思想必须和执行党的政策统一起来。党的政策

是党的生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反映，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要依靠党的政策，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这次会上大家对奖金问题讨论比较多。自恢复奖励政策以来，由于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去年奖金的提成和发放，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有的单位也出现了滥发奖金的倾向，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有的单位没有把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单纯从奖金上考虑问题，放松党的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有的单位在发放奖金中没有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搞平均主义。中央规定的奖励制度今后还要坚决贯彻执行，但要严格按规定的奖金来源提取奖金，坚持国家、企业、个人都有利，而国家得大头的原则。对滥发奖金要进行整顿，坚决制止。只有把奖励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物质奖励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持久地促进生产发展，有利于团结。

这次会上，大家也谈了市场调节的政策问题。去年以来，各地通过市场调节，为企业广开生产门路，对解决任务不足，加强产销结合，提高产品竞争能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只有计划调节，没有市场调节。应该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市场调节进一步搞好。尤其是在国家任务不足的情况下，更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现在我们搞市场调节也只是开头，步子迈得还不大。有的同志担心：搞市场调节，会不会导致

资本主义？搞市场调节，会不会打乱国家计划？搞市场调节带来竞争，会不会滑到邪路上去？等等。所以，要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我们的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不是为资本家谋利益的，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的市场调节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也不会打乱国家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调节带来的竞争与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竞争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的竞争，目的是要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消耗，改善经营服务态度，同时也加快企业自身的发展。商业、外贸、物资、财政、工业等部门，要同心同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把市场调节搞好，把经济搞活。

三、解放思想，把经济搞活，要从我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农业上，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是我省的优势，这里主要是要研究解决同发展粮食相矛盾的问题。我省“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多，发展林业，特别是经济林、畜牧业和中小水电是我们的优势，要研究解决各种有关的政策问题。我省海岸线长，水面多，发展渔业和养殖业也有优势，也要研究解决有关的政策问题。

工业上，我省的轻工业、手工业有着独特的传统技艺，“京广杂货”闻名全国，要发展这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从地理和社会情况来说，广东毗邻港澳，华侨和港澳同胞众多，发展对外经济活动和旅游事业是我们的优势。

现在省里正在开长期计划座谈会，我们要从我省的实际

出发，根据我省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变不利为有利，制订出切合实际、鼓舞人心的发展计划来。我希望我们全省各地、各行业的干部、群众开展一个谈优势、议优势，讨论研究如何发挥我省优势的群众性的大讨论，把我们的经济真正搞活，把我们的建设很快地促上去。

解放思想，要讲求经济效益。不要以为讲解放思想就可以搞高指标，这是有深刻教训的。既要思想解放，又要扎扎实实。要量力而行，计划要留有余地。经济工作要把讲求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过去把讲求经济效益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是错误的。大至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小至某项建设方案的选择，个别企业经营管理的改进，都必须以经济效益的有无、大小来权衡其是否可行。

在新华社建社五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

新华社的五十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奋斗，胜利发展的五十年。

新华社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是国家通讯社，是人民的喉舌。现在正在向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的方向迈进。

这五十年，在党中央领导下，新华社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新华社的全体同志都是努力工作的。新华社在世界通讯社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我代表中央书记处向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帮助新华社工作的所有外国专家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新华社有什么历史经验应该吸取，当前有什么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是要由你们去讨论的，我只提一点希望。

新华社在延安清凉山住了十年，这十年是新华社初具规模，逐步成长的十年。清凉山的老同志现在还在新华社的可能不多了，但是清凉山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即延

* 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安精神，应该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对编辑、记者、技术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对新华社的编辑业务工作我也提几点希望，也就是几个字：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243]，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现在怎么样？还有没有失实的报道？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延安时期，乔木^[102]同志就写了《短些，再短些》的文章，最近又重新发表了，新华社做得怎么样？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比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新的形势。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道，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使人们看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

总之希望新华社越办越好。我相信一定能够越办越好。

最后，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取得更大的成绩。

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提出第一抓经济，第二抓思想。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过去在困难条件下要思想先行，现在条件好了，仍然是要思想先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是已经讲清楚了。

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是和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同时举行的，同志们听了邓小平、胡耀邦^[236]、胡乔木^[102]同志的讲话，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

资本主义国家就那么好吗？美国的经济走下坡路，他们的经济问题比我们大得多。我曾对美国人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我相信我们的制度好，困难会比你们解决得快。”不要光看那些表面现象。在我们国家，十亿人口人人有饭吃，可不简单。这是个大问题，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都要有信念，同时要教育学生有信念，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教育战线的同志确实很辛苦，但是大家能体谅国家的困

* 这是习仲勋同志会见出席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

难，坚持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民办教师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你们肩负着教育青少年的重大历史使命，现在犯罪的很多是青少年，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心里很难过。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四人帮”^[176]造成的恶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估计。经济工作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振奋精神，就可能搞得快一点。但思想工作，要比经济工作费时更多，至少要多一倍的时间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风气搞好。首先是要把党风搞好，这就必须要有个好的党委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中派性严重的人要调整。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是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跟党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

党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党委要做，而且要发动人人去做，特别是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青少年的思想是要引导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把问题看成不能解决。现在的学生，与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与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他们对旧社会一点不了解，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道。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坏的东西，有的人认为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阶层，老家伙都不行，要下台。我们要摸清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到底想些什么，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正确引导。

当然，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与学校教育是互相关连的。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有的地方是邪气上升，正气不能伸张，看到坏人坏事不敢管，家庭教育也有问题。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战线上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完全讲对了。不

仅思想战线存在这个问题，各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学校，无论是党政领导干部，政治工作干部，还是教师，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抓思想政治工作，同歪风邪气进行斗争。要克服软弱无力和涣散状态。过去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缺点，应当改正。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委要深入到教学领域，发动教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学生的心坎上去。

在会见全国故事片 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看的电影不多。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感动。我简单讲几句。

第一，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完全不一样，物质生产，比如生产机器是用一个一个零件组装起来的，电影就好比是用零件装配起来的，但这些零件往往是眼睛看不见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电影，不管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是从艺术上来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我们的电影事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是很好的现象。应该肯定，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

第三，有困难。刚才同志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钱的问题，确实，你们用的那一点点钱，只要把一个大的浪费堵死，就把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做财政工作的同志，对你们的困难不能说不关心，相信他们会关心的。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精神食粮，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群众，影

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能买来的吗？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一部不好的影片，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影响所及，损失也不是几十万、几千万元能够计算的。我觉得，电影局、文化部可以考虑在这方面规定一些制度，立一些规矩。叫立法吧，也要立一点法。现在，这方面不如五十年代。五十年代还有点规矩，比如一个电影剧本，首先得有人去看它，审查它，征求意见。我看，《零点起飞》就缺少了这一点。驾机起义的人很多嘛，找他们先座谈座谈嘛，这样可能会写得更好一点。

第四，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大约占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大约占百分之三十。这个百分之三十里头也不是完全都不好。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还可以再改嘛。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要随随便便把一个影片给“枪毙”了，这样不好。有缺点可以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拍电影也是一样，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拍不出好的片子。所以，有缺点并不可怕，怕的是我们不敢批评，也不敢作自我批评，或者是人家一批评，就害怕，就觉得不得了了，这个不好。现在，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还不是那样浓，很淡薄。有缺点不要紧，关键是看会不会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如果善于使用这个武器，我看这样那样的缺点都是能够克服的。

第五，有希望。电影事业是大有希望的。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的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整个社会生活确实是很复杂，也很矛盾，斗争也很激烈，那还不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吗？拿教育方面来说，我在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曾经讲过，对表现不好的孩子要善于引导，越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你越要热爱他，引导他，因为小孩子还不定型。学校不要搞什么快班慢班。搞快班慢班，快班的老师兴高采烈，学生也觉得他们好得不得了；慢班的老师灰溜溜，学生也觉得不光彩。这个不好。这里面有很多矛盾，很多动人的事迹，这还不可以大做文章？这不就是用武之地？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就讲这五句话。最后希望同志们在明年能出一大批思想性强、艺术水平高的故事片，希望同志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新年快到了，祝同志们新年愉快。

适应新的形势，努力搞好 农村文化艺术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

开大会表彰农村文化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建国以来这是第一次。这说明，党中央重视农村文化艺术工作，这说明同志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这个会，可以说是农村文化艺术工作的群英会，开得很必要，很好，也很成功！

解放前，中国农村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被称为文化沙漠。随着农民政治上的解放，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你们工作的开展和深入，那种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把银幕挂到农民家门口，把戏曲歌舞送到乡下和地头，把图书报刊送到农民手中，你们给八亿农民带去了文化、艺术和科学知识，带去了精神食粮，你们是八亿农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使者。应当说你们的工作很辛苦，也是很有成绩的，是值得表彰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全国农村形势很好，不是少数地方好，而是普遍的好。去年十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从汇报看，各地形势确实都很好，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而且方兴未艾，也就是说还会向更好的方面继续发展。拿粮食来讲，去年粮食的播种面积比前年少了五千万亩，预计产量增加一百四十多亿斤，可以说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经济作物普遍增产，多种经营也有很大发展。这一点你们比我们了解得更真实，因为你们都是来自基层，来自农村。农民的粮食多了，钱也多了，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点，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有些地方的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赌博的多，封建迷信活动多，偷盗行为多，个别地方甚至发生拐卖妇女、抢劫凶杀等犯罪活动。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影响，至今还在起作用，对这一点应当有足够的估计。

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十分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更不用说看电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的经济搞活了，也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项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不少淫秽的、黄色的书刊、图画和录像带等所谓西方文化被带进来了，有些走私贩子乘机而入，乘我们开放之机，就靠这个吃饭，靠这个挣钱，靠这个来腐蚀我们的人民群众。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以后又被辗转流传、复制、印刷，毒

害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般的问题，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也是农村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我们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堵绝那些东西渗入，禁止它在社会上流传。

农村文化工作，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我看我们农村文化工作的主攻方向，就是要努力拿出足够的好的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艺术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在文化生活中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这个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的事，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那个时期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农民写的诗，诗意可能少一点，但是起码感情真实，语言朴素，农民能懂。你说是打油诗也好，顺口溜也好，说的都是他们的事情，本地的事情，抒发的是他们自己的感情，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你们都是搞文化中心、文化馆、文化站、广播站、电影放映队的，还有搞创作的，搞业余剧团的。你们就是宣传教育者、宣传鼓动者，就是思想工作者。要改变目前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这个责任主要在你们肩上。

在这里我附带地说一下，现在，我们的农村经济有了发

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有了发展，在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做出了成绩。但是有些地方现在还有一些过了时的旧标语，特别是那些“左”的标语还在那儿，这就不好了。希望把它去掉，换上一些新的、适合我们当前形势的标语。去旧换新，切记不要浪费，不要搞形式主义。标语口号不要多，能够振奋精神，指出人们前进的方向就好，叫大家一看就看出希望，看出前景。用这样一些新的、鼓舞人心的标语，把农村的外观变一变。现在我们既然经济上出现了新气象，文化上也要有新气象，农村环境也要有新气象。

你们是做农村文化艺术工作的，当然首先要本职工作做好。但是你们也不要局限于只搞农村文化艺术工作，也还要与农村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互相配合，把农村的风气搞好。当然农村风气的好转根本在于搞好党风。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农村治安工作，在这方面，你们是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点，希望你们适应新的形势，把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做得更好。文化艺术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人不仅要吃饭穿衣，而且要看报读书，要有文化娱乐。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人们的两大需要，不可偏废。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特别是吃饱穿暖以后，精神生活更重要，否则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空空”，甚至是头脑肮脏。那就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鼓舞和教育千百万农民，或者说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

贡献。

怎样才能把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做得更好呢？第一，“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毛主席讲过，你要当先生，就要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我们传播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首先自己应该有这种文明。要农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作品就应该表现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要农民敢于向坏人坏事和封建迷信做斗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作品就应该表现出这种斗争的勇气。所以要教育和提高农民，首先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己。第二，要深入生活，向农民学习。毛主席说过，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化艺术的唯一源泉。只有深入生活，熟悉农民，才能创作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才能教育农民。电影《喜盈门》的编剧辛显令同志是山东省平度县文化馆的副馆长，又是业余作者。听说《喜盈门》已经发行了三百多部拷贝。为什么这部影片能够受到这样广泛的欢迎呢？就是因为剧作者工作在基层，长期同农民生活在一起，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因而写出了一部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喜爱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这是一头；还有一头就是学习理论，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第三，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近报纸上发表了陈云^[225]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段，题目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这篇文章很重要。不但领导干部要学，建议同志们也认真地学一学。他的这个讲话，我当时是听过了的，今天重读，还觉得非常亲切。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有个毛病，就是喜欢捂疮疤，实际上是讲面子，不讲真理。疮疤

捂住怎么行呢？有疮疤叫医生来治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文化艺术要繁荣起来也离不开这个武器。但是十年动乱把这个优良传统完全给破坏了，现在还远没有恢复起来。在去年八月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又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情况就好多了，但是要真正搞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他就和你结了疙瘩了。反正是批评不得。有些人也是很不容易作自我批评的：我有什么错误呀？我做得对呀！我一贯正确呀！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世上哪有一贯正确的道理，只有错误大小之分。因此，现在就是要大力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这个风气，我们的许多事情就可以搞得更好。要批评，主要的是要勇于做自我批评。曾子⁽²⁴⁴⁾曰：“吾日三省吾身。”我们是共产党人，是搞社会主义的，更应该有这种精神。

最后，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如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所说的：“一年更比一年好，定叫今年胜去年。”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

这几年，统战部门的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统战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一点要首先肯定。林彪⁽¹⁷⁷⁾、“四人帮”⁽¹⁷⁶⁾当权的那个时候，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上都是一窝“黑帮”，地富反坏右，“臭老九”⁽²⁴⁵⁾，反革命修正主义，连统战部的同志也被当作反革命、叛徒搞，还有什么统战工作可言？没有。当然，这几年的工作也有不足之处，会议上的报告讲到了，但讲得还不够。统战部有自己的困难，不说这一点，也不公道。我历来认为，成绩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过头了，宁可讲得少一点，缺点可以说得多一点，重一点，这对我们有好处。我还认为，一个人头上经常戴个紧箍咒好，在工作顺利的时候，想起会碰钉子，就会谨慎一点。

为什么叫统一战线？大家把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写的文章《〈共产党人〉⁽¹¹³⁾发刊词》看一看，所谓党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第二条是武装斗争，第三条是党的建设。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面临的任务也不同于当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

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三大法宝不能丢。党的领导一定要坚持。四个坚持，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武装斗争，我们早已武装夺取了政权，现在是搞经济建设，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还跟谁斗去？但是，保卫祖国，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天也离不开军队，军队还是我们的一大法宝。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

我头两年出了几次国，也看了一下我们的驻外使馆，感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箍得太紧，不放手，“左”的东西多。一九八〇年十月，我到了澳大利亚新南尔威士州的悉尼市，那里有二十五万华侨，大部分是台湾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听说陈慕华^[246]同志那一年去还有人打旗子反对，我这回去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开始八十几个华人头头搞了一次午餐会，招待我们，接着又举行了一次晚宴，到了三百多华人。我们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在那里做台湾工作，条件是很好的，尽是台湾人。很多人是从香港到台湾，又从台湾到澳大利亚的，有些青年华人常常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到餐馆去刷碗、端盘子，挣下工资在那里上大学。跟我的翻译，是新南尔威士州总理的翻译，是两个广东姑娘，她们都加入了澳大利亚籍，但对中国还是很好的。这就说明，爱国统一战线现在有广阔的天地，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做工作。

今年五月我到北欧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在瑞典的时候，台湾的毛松年正在那里开一个“欧洲华侨代表会议”。毛松年是什么人？他是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我给我们驻瑞典的大使讲，你先把我们联系的华侨请到大使馆来，我先见见他们。他们找了五六十个人来，算个小型招待会，一面喝酒，一面漫谈，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我在那里还见到了不久前从中国出去的几个人。一个是我们首都医院的一位主治大夫，还有他的爱人。他的爱人是跳芭蕾舞的。这个医生到那儿还需要上几年学，取得文凭后才能行医。他们见了我，特别是他的爱人见了我，眼泪都流出来了。人家那里的芭蕾舞演员，三十六岁就要退休，她没有事干，只好到餐厅去端盘刷碗。我说，这儿不好你们再回去嘛。两个原来在新疆的上海女青年，见了我和司马义·艾买提^[247]同志也泪汪汪的，很怀念我们的祖国。她们说她们是在新疆最苦的地方培养出来的，她们对那里很有感情，她们还要回去。后来我跟使馆的同志讲，对这些人我们要正确对待，而且要积极去做工作。搞统一战线工作，要有诚意，说话不要用外交辞令。毛松年开的那个会，开始，使馆只准备去几个爱国华侨参加，我说可以多去一些嘛，也不见得我们联系的都那样爱国，也不见得同我们没有联系的其中就没有人爱国，去去好嘛，后来他们就去的多了。我还让他们捎了个口信，我说这都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情，你们开你们的会，不要打着“青天白日”旗子到这儿来示威，这就好了。人家就没有来。我还说，如果毛松年先生愿意见我，我乐意和他谈。

回头说我们国内，说我们统战部，我看不仅有“左”的

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我们的“左”，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有些地方就“左”，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建国初期，五十年代初期，整个统战工作情况是很好的。那时我接任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207]同志的职务，接着又做国务院的秘书长，周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叫我经常同党外朋友联系。那时党外的部长、副部长可不少，高教部长马叙伦^[209]，教育部长张奚若^[159]，卫生部长李德全^[248]，交通部长章伯钧^[249]，粮食部长章乃器^[215]，水利部长傅作义^[43]，还有罗隆基^[250]等，特别是张治中^[96]先生，还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老同事，还有好多在政协、人大、政府的党外人士，我们不仅同他们在一起很好地合作共事，而且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是李维汉同志讲的，我们统战部的同志，甚至于我们政府的负责同志，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要我们负责同志亲自抓，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好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党外人士学习。今天发了胡厥文^[251]、胡子昂^[252]两老写给耀邦^[236]、紫阳^[253]同志的一封信，信写得非常中肯，也切合当前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们非常谦虚，我们要学他们这个好作风。五十年代初，我们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盛气凌人，总觉得比人高一等，这是不好的。统战工作中所说的党外人士，多数是大知识分子。你不尊重他，他怎能尊重你呢？我接触的所有民主人士，都很好合作，虽然有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有些意见很尖锐，但只要我们的主张对，耐心地讲道理，很多事情都是能够商量好的。他们也有很多好的意见。陈叔通^[254]经常到我

家里来，我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有事，我到你那里去，但他还是经常来。张治中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子就来了。他来一方面了解情况，关心国家大事，同时也提一些意见，而且有些意见是很好的。那时候很多党外人士和我们都是好朋友。可不可以说，建国初期，五十年代，是我们统战关系最好的年代？也是我们统战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年代？我看可以这样说。现在远没有恢复到那个程度。我觉得统战部这方面，局面也没有完全打开。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搞五湖四海。毛主席还讲过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一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我觉得，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那么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花瓶摆设。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个花瓶摆。当花瓶摆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他们的困难，也没有人帮助解决。在过去，这些党外朋友起码是统战部长、副部长经常联系的，经常登门拜访，促膝相谈。过去不仅是李维汉同志、徐冰⁽²⁵⁵⁾同志、平杰三⁽²⁵⁶⁾同志经常做他们的工作，周总理有时还亲自找他们谈谈心。在涉及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过去总是经常和民主人士充分协商的。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了的，效果都好，民主人士也满意。我想今后我们还应该坚持这样做。

对现在的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

出看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你们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这次我看了几位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都非常之好，没有套话，而且意见非常中肯，关于经济方面的意见，其他方面的意见，想得很周到。所以，我提出来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要求加入呢？虽然他们出身不好，但是他们和我们合作已经三四十年了，有些还不止三四十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我今天提一下，这次会议也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李维汉同志讲得很多，廖承志⁽²⁵⁷⁾同志也讲了许多，他们的意见我都完全同意。这里举几个例子。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三年后西北地区就基本上安定了。这当中也出了一些问题，在甘

肃，大规模的回民叛乱有两次，一次占了平凉城，一次我们伤亡将近两千人，最后怎么处理的？武的办法不行，还是由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去出面和平解决。我们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爱国的朋友去交，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至于青海其他地方的大小叛乱，那就不知道有多少次，特别著名的是项谦^[258]，他是有名的千户，游而不定，放牧为生。你队伍开去了，他一下子就散了。因此，我同当时的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26]同志通电话，我说决不能打，请喜饶嘉措^[259]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青海的副省长，是我们的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确实爱国，先信国民党，后信共产党。蒋介石还给他一个银印，一个封号，我们没有给他封号，但他对我们比对国民党好得多。再比如天主教，那一阵通过虔信天主教的爱国教士去做其他教士的工作，效果一般都很好。

还有干部的问题。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现在不管搞经济的也好，搞文化科学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是骨干，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向这个方面扩展。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

常之要紧。

统战部的工作中有一些条条框框，我觉得应该来一个清理，凡是不合适的条条框框，都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理一理。李维汉同志特别强调要总结经验，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经验，改正错误，记取教训，继续肃清在统战工作方面的一切“左”的流毒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才会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打开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民主人士也怕我们今后政策多变。我说统一战线政策不能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多少年的事情，特别是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更增加了它的现实意义。大的政策不变，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具体政策总是要变的，不变就跟不上形势。变与不变要辩证地看，哪些不变，哪些要变，这也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一个问题。

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也有这个工作，商业部也有这个工作，邮电部也有这个工作，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其他各个部门都有这个工作。总之，统战工作，包括对台工作，要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这里边实际上也有一个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统一战线工作要打开局面，条件很好，形势也很好。中央统战部要当好党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各地区的统战部也要当好各地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要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经验，把统战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过去毛主席很强调凡涉及到统一战线、外事、

对敌斗争的事，一定要先请示，不能先斩后奏。因为这些方面的事，政策性都很强，稍有不慎，考虑不周，就会出漏子。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对这方面抓得很紧，我们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最后，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他们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是中国伊斯兰教^[260]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在这个吉庆的日子里，我谨向伊斯兰教界的朋友们和各民族的穆斯林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预祝即将召开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十个兄弟民族的穆斯林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的大团结。三十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了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和教派之间的隔阂，加强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团结；一九五八年进行了宗教制度改革，废除了伊斯兰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彻底完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革命的任务，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团结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开展了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积极支持了各国穆斯林人民的正义斗争。

回顾三十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所走过的道路，应该肯定，是完全正确的。各民族的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绝大多数是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希望伊斯兰教界的朋友们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同时，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进一步做好伊斯兰教的工作。在这里，我提几点意见。

一、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而共同努力。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十个兄弟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团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各民族之间应该彼此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党的十二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进一步加强相互的联系和团结，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继续协助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去年三月，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遵守。宪法的第三十六条，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全面和明确的规定。公民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或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不准强迫别人信教，也不准强迫别人不信教；强迫别人信教或不信教，都是违反法律的。国家保护信教群众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当然，宗教活动也必须符合国家的政策、法令，不得干预行政、教育和婚姻。过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各地方伊斯兰教协会，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恢复和开放清真寺，健全清真寺的民主管理制度，使穆斯林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恢复和开办全国和地方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印制《古兰经》^{〔261〕}及其他宗教书籍；出版发行《中国穆斯林》刊物、画册；收集整理伊斯兰教的文物史料，进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和交流；组织朝觐；组织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学习党的政策，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等等。希望今后伊斯兰教协会继续努力做出新的成绩。应该指出，在十年动乱中，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粉碎“四人帮”^{〔176〕}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抓了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今后要继续克服“左”的思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伊斯兰教协会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什么意见和困难，可以随时向政府反映；主管部门应该认真研究，帮助解决。明天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就要召开。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制定出一个开创新局面的工作规划。

三、继续办好伊斯兰教经学院，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宗教职业人员。要办好进修班，对现有的阿訇⁽²⁶²⁾、毛拉⁽²⁶³⁾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和宗教学识，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伊斯兰教界的朋友们可以积极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政府应该大力支持。

四、进一步开展国际友好往来，坚决支持各国穆斯林人民的正义斗争。伊斯兰教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在亚非几十个国家中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的伊斯兰教界要加强同各国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相互访问和友好往来，开展宗教学术文化交流。这同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交往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插手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坚决同外国敌对势力企图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进行斗争。各民族的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要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侵略、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阿富汗和各国穆斯林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当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团结一致，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加强同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的团结，巩固和扩大同宗教界

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新的领导班子需要充实加强，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必须抓紧抓好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

我于五月二十、二十一日陪同南共联盟代表团到上海参观访问后，在上海又呆了七天。之后，还到了浙江的杭州，江苏的苏州、无锡和南京，山东的济南。

我同沪、苏、浙、鲁四省、市委常委的大部分同志见了面，集体或个别进行了交谈，还征求了一些老同志和下面同志对新班子的看法及意见。总的说，经过一年的考验，四省市调整后的领导班子都是团结的有朝气的好班子，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山东有的同志说，过去一年是最忙碌的一年，也是成绩最大的一年。

但是，新班子也存在不足之处，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的是：(1)有些同志年龄偏大。四省、市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已超过或接近六十五岁，有些常委同志的年龄也已过线。(2)有些新上来的同志缺乏全面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工作感到为难。(3)对有些高级科研人才的任用也不

• 这是习仲勋同志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的一部分。

尽适当。(4)有的班子成员的构成还不够全面、理想。如上海这样一个大市，现就缺主管农业和文教工作的书记。(5)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仍然偏低。此外，有的还存在不够团结，对个别人员的提拔使用不够妥当等问题。

上述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抓紧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有计划地对新班子进行充实、加强，并且帮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提高。经与各地同志交谈，共同认为今后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实现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是根本。领导上对人的选择、任用，一定要公道正派，决不可有亲疏之分。首先要看每个人的思想品德，在这个前提下，注重年龄，注重文化科学知识。只要思想品德不好，不管其他条件如何，都不能提拔重用。

(二)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要注意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至少在这方面要有培养前途。要注重文化，但不能只讲文凭；对于德才兼备、自学成才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同样应予以选拔重用。要强调掌握专业知识，也必须比较熟悉全面工作。有些科学文化水平较高，并且精通某一专业的同志，如本人立志钻研学问，从事科研工作，就要满足其愿望，发挥其专长，而不要轻易地、勉强地让他们担负党政工作的领导职务。

(三)要重视年龄，但也要看知识、能力、身体等条件。有些同志认为，干部到规定的年龄就要离休、退休，指出无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没有绝对地离不开哪一个人的道理是对的，有好处。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个地

方某个时期离开某个人，暂时或在一段时间内，那里的工作就可能受到损失。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就会使人们对某些问题难以解释，难以处理，于工作不利。

(四) 要注意及早选拔年轻优秀的同志到地、县或基层锻炼、学习，掌握全面工作经验，提高组织领导能力。要把这个工作作为建立第三梯队的大事来抓。已经提到领导岗位但又缺乏实践锻炼的，应当补上这一课。

(五) 继续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抓紧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但也不能简单急躁，不能勉强凑数。培养选拔的对象，不到条件成熟，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向外宣布。现在，有些地方在初选过程中就告诉或泄露给本人，甚至在公众场合当面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第三梯队”，是“接班人”。而少数没有选准、本人思想不健康的人，又以“第三梯队”自居，等着“上台”，为自己“接班”创造“条件”。这种做法和表现都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和防止。

(六) 重视和做好安置老同志、正确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工作。陈国栋^[264]同志说，上海有四十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四千多人，三八式的老干部^[265]两三万人。这些老同志逐渐退出一、二线。如果都要安排到市顾委、人大常委和政协，根本不可能，也不宜于形成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各地同志还建议：对进入各级顾委、人大常委和政协的人员，最好也有个一般的年龄标准。对妥善安置老同志的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还有，现在普遍认为，五十五岁左右的同志“退休嫌早，提拔嫌老”。如何安定这些同志的思想情绪，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七）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培养一支精干的、符合“四化”要求的、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和富有创造精神的理论班子，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也可以组织他们协助新上来的同志做好工作。

愿职工读书活动 长久地开展下去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从去年六月以来，在职工中开展的读书活动有了更广泛的发展，现已经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产业系统。几十万、几百万的职工为振兴中华而发奋读书，既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从而在思想政治水平和知识水平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原来比较后进的职工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读书活动中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他们把读书与自己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骨干力量。这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我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力军。我们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目标、总任务，完成四化建设大业，首先要依靠工人阶级；我们进行一系列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依靠工人阶级；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也要依靠工人阶级；因

• 此文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工人日报》。

此，要振兴中华，关键是要不断提高我国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我国工人阶级是一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又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解放初期，全国产业工人不到一千万，现在仅国营企业职工就在八千万以上，增加了将近十倍，其中青年职工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把全体职工，特别是广大青年职工武装起来，使他们肩负起建设四化，振兴中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我们党和工会组织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现在有成千上万的职工参加读书活动，自觉地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互助互勉，来提高觉悟，丰富知识，增长才干，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从实践中找到的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我衷心祝愿它长久地开展下去。

举办知识竞赛，是能推动读书活动不断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深受群众的欢迎。去年，《工人日报》社举办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参加人数达到一百多万，涌现了一大批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的读书积极分子。竞赛期间，书店的好书被购买一空，图书馆的好书被借阅一空，许多职工为寻求知识而废寝忘食，读书答卷成了工厂企业、宿舍家庭、街头巷尾一时间最热烈的话题。这种盛况，是历史上少见的。这说明，读书活动需要有知识竞赛、讲演比赛等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推动。正如有的职工说的：“知识是海洋，知识竞赛是风帆。”现在，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社决定再次举办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这是很有意义的。

总之，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举办知识竞赛，一定要有利于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有利于促进生产和工作，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果只是为读书而读书，为竞赛而竞赛，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是十足不可取的，必须注意防止和纠正。

我预祝职工读书活动和知识竞赛获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党的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

（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

这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座谈会，是建国以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一次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也是统战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统战工作者聚集一堂，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战理论研究的经验和成果，讨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并将正式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次会议。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次会议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收获，对今后开创统战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将起重要作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六年间，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统一战线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我们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人心的。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全国统战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目前，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深入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正在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步骤、措施慎重而稳步地展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统一战线一定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三大任务。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大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如果不紧紧掌握和运用这个法宝，党和国家的大事就办不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是随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我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统一战线工作；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党派团体、哪个机关，也都有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一个总的奋斗目标下，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向前干。由此看来，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不是缩小，而是更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因此，统一战线工作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应当承认，尽管统战工作成绩很大，但是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来衡量，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仍然有不足之处。一是在思想上，“左”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这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最大弊端。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执政党，更应时时事事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的同志包括统战部门的同志不愿同党外人士协商办事，不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或者采取敷衍态度，不谈心，不交心，甚至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压制不同意见，使党外人士在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事业

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充分发挥。二是在落实政策上，还抓得不够得力。有的地方和单位不顾大局，不顾党的纪律，不顾党的利益和影响，对落实政策拖着不办，甚至采取抵触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落实政策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而不是亲自干预，抓住不放，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三是在组织上，统战部门的队伍还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有些不懂统战政策、思想僵化、愚昧无知的人仍然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问题如不认真解决，要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我着重讲一讲关于统一战线理论工作的问题。

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马列主义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在这方面，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我们党在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李维汉^[207]同志，也写了不少的理论著作。但是，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而我们对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跟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大量理论财富比较起来，就显得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提高到理

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现在看来，我们在这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都做得不够，都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这是关系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系到统一战线工作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认真负责地、齐心协力地把这件大事搞好。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点，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经过反复实践不断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当我们党把这两者正确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向前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践证明，理论研究只有结合实际，才会有活力，有创造，有发展，也才会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我们要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往往是理论脱离实践，并把它变成了空洞的、僵死的东西。他们只会机械背诵和简单重复马列主义的原理和字句，并拿来衡量已经发展了的实际，他们“循规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理论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

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我相信，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

第二点，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应当看到，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各个领域里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缚着而不自由。另外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和习惯也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发生作用。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

第三点，要团结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266]，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的同志共同参加，要

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同志们迈开自己的双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增长见识，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四化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第四点，要加强领导和协作。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一定要把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这件事抓紧抓好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三年来，全党全国各地学习、落实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第十九号文件^[267]、贯彻执行国务院一九八三年第六十号文件^[268]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不小。我看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省、区、市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对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做好党对宗教的工作引起了重视。广大宗教工作干部以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有较大的提高，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较大的进步。

二是，宗教界人士中的冤假错案基本上得到平反纠正，并且加强了对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团结工作，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了他们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

三是，爱国宗教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健全，宗教活动场所有了合理的安排，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基本上纳入了正常轨道。

所有这些，都在国内外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它有力地表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是正确的，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全国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执行这一政策是言而有信，说了就办的。

应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阻力还不小。就以对中央十九号文件的学习情况来说，有些同志至今没有真正全面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有的同志甚至连这个文件都没有认真看过。在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有的同志说，落实政策难，落实宗教政策就更难。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央发出十九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六十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我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他们不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和国际性，往往习惯于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不愿意也不会以教育、引导的办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他们不认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做好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而把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误认为是“宣传唯心主义”，“助长宗教发展”；他们不能自觉地按照党的政策对待宗教、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加分析地说他们“迷信”、“落后”，有些人甚至把宗教和宗教活动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害得失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党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按照党的事业的需要，经党和政府明文规定必须办的事情，他们也不积极去办，甚至顶着不办。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该承认，除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加以妥善解决。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就不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规定。

我们的同志要明确，宗教和一部分群众信仰宗教，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地正确对待，决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〇年就讲过：“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回顾历史，无数的事实证明，对待宗教问题，我们的政策越是搞得很紧很死，在实际生活中越是压制它，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引导它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反而会使它的活动脱离正常轨道，甚至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前几年有的地方一度出现的宗教狂热，就是明证。

我们的同志要看到，信教群众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少数，而且有些宗教活动又确实同迷信活动不容易划分清楚，这就在如何正确对待宗教和信教群众，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上，往往会发生一些偏差，容易产生“左”的思想，以至犯错误，造成不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十年，党的宗教政策和党对宗教的工作，是破坏和损失最大的一个方面，积存的问题很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应该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中的一个

重要方面，一定要以很大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要舍得花力量，把这件事抓紧办好。

我们的同志还要认识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争取和团结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关系到提高、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还要针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存在着的各种思想问题，按照中央十九号文件的精神，对他们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和党的宗教政策的教育，充分调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要善于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举办某些社会公益事业，例如修桥补路、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植物、为残疾人谋福利，等等。

我要特别强调指出，中央十九号文件是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集思广益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实践证明，它是十分正确的。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十九号文件指出：“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落实宗教政策不够好，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思想到工

作都离开了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只要认真地按照中央十九号文件的精神，彻底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统一认识，总结经验，从理论和政策上分清是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宗教政策是不难落实的。

为做好秘书工作说几句话^{*}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创办的《秘书工作》出版了，这对广大秘书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趁此机会，我想就如何做好秘书工作说几句话。

秘书工作是党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不可缺少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机密性和专业性。它在机关中起着上承下达、联系协调、沟通信息、参谋咨询的作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有广大的秘书工作人员，还有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很多的心血。秘书工作的效能如何，对领导工作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并且要积极认真、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秘书工作必须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紧紧围绕着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围绕着四化建设这个大局，努力为领导工作服务，为同级和上下级领导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归根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十分明确，并贯彻到各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秘书工作》写的发刊词。

项秘书业务工作中去。

秘书工作就其职责来说，主要应当办好三件事：一是做调查研究，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供领导作决策时参考；二是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检查其落实情况，作出信息反馈；三是做好领导同志指示的检查催办工作。做好这些，就可以更好地发挥秘书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此外，还要做好日常的文件处理和会务工作，等等。这就是说，既要办好大事，又要办好小事，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不可偏废。做好秘书工作，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严格实行责任制，要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有了责任制，有了高效率、高质量，工作才有生气，才会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是一支很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的素质如何是搞好秘书工作的决定因素。目前，各级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人员正处于新老交替的状况，有许多新的、年青的同志刚刚走上秘书工作的岗位，他们一缺业务知识，二缺实践经验。因此，通过培训或其他有效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素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统筹规划，抓紧进行。凡事预则立，如果稍有懈怠，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怎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秘书专业人才呢？我认为，他们应当具有坚强的党性，公正的品德，谦虚的态度，细致的作风；要肯于学习理论和文化，善于总结经验，勤于钻研业务，思想解放开朗，不因循守旧，不故步自封；要说实话，干实事，不尚空谈，不搞形式，有实事求是之意，无虚报浮夸之心；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不图虚名，不谋私利；要有强烈的群众观点，

办事情、处理问题，必须考虑周到，照顾群众利益，不能漠不关心，脱离群众。以上几点如能做到，我想也就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了。广大的秘书工作人员是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无名英雄，他们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勤勤恳恳地工作，非常辛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我希望同志们要认清自己的光荣职责，热爱自己的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努力做一个出色的秘书工作人员，在四化建设中，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衷心祝愿《秘书工作》在各级领导和广大秘书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下，越办越好，并在传播知识、交流经验、培育人才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千方百计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 使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在江西，搞好老区⁽⁴⁹⁾建设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是从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这里的经济建设搞得好坏，群众生活的状况如何，对国内国外都有很大影响。这不单是江西一省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全党全国政治声誉的大问题。这几年全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而江西老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少数群众的生活还相当贫困，我们看了心里很难过。

再从江西本身来说，据省里统计和今天的汇报，全省老区人口一千五百万，面积占全省的三分之二。现在，老区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元以下的连片贫困区还有四十个县，五百多万人口。可以这样说，老区建设上不去，人民富裕不起来，江西省的经济建设也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全省人民生活水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江西省常委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平的提高也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同样是值得江西省委及各级党委同志认真深思和特别重视的。

应该说，近两年来，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已相当重视老区建设问题，建立了专管老区建设的组织，今年省党代会和省老区工作会确定了“三年解决温饱，五年脱离贫困”的奋斗目标，研究了许多治穷致富的办法，总的方向和原则都是对的。但还需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狠抓贯彻落实的工作，使之更加具体，更加切实，更加有效。别人的经验可以学习，但主要还是靠自己创造。我想，你们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工作小组，其中有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有会做群众工作的，也有搞经济和文教工作的，还可以配备几个专业技术人员，蹲到几个不同类型的点上，边调查边实践，探索出几条根据不同情况治穷致富的路子来，就好了。

二、认真总结经验，实行对症下药。全国各个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进步比较快，有的工作做得比较差，进步比较慢。过去，陕北地区很贫困，经过最近几年的大力治理，现在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陕北榆林还有个治沙问题，现在那里草长起来了，树也长起来了，沙漠开始变成一片片绿洲。

我们这次在遂川、瑞金、兴国那一带乡村访问农民家庭，看到群众生活的贫困状态时，有的干部对我们说，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他在农村搞四清⁽²⁶⁹⁾的时期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为什么？很值得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看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要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多。情况不明，决心很大，不但不会有好办法，而且还

要坏事的。我感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西抓老区建设可能晚了一些，有的同志说晚了两年。还有些同志对我们说：领导重视不够，“左”的影响比较深，思想不够解放，许多方针政策问题也解决得不及时、不够好，这是老区建设比较落后的原因。我想这些话是有道理的。还有些什么问题，可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总结经验，找贫困原因，主要应该从近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上去下功夫。我看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护短，不回避矛盾，不怕暴露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情况自然会明，原因自然会找出来。只有情况明了，原因找准了，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志要懂得，总结经验找原因，是为了改进今后的工作，不是追究谁的责任。所以，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回顾过去是为了今后，大家都要向前看。现在，我们的同志一谈起老区建设没搞上去的原因，往往就是说几十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如何残酷镇压苏区^[270]人民，如何实行“三光”政策。这都是事实，但这已是历史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一成立，这段历史就结束了，再讲这些，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不能老说几十年以前的历史，我们要研究解决现实工作中的问题。

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一个现象，就是在赣南时，看到有的干部若是向我们讲个意见，还要看领导同志的脸色。这个不好，这样就把风气败坏了，一定要改过来。不要怕揭露矛盾，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前进的过程。我们就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中前进的。我们共产党

人从来不惧怕任何困难,但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困难,认识困难,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只有这样,才能针对实际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改革,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目前这个大好形势。

三、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制订治穷致富的办法和措施,创造自己的经验,走自己的路。总的原则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本地的优势,挖掘当地的潜力。既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千家万户齐动员,又要分析具体情况,分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稳步前进。每个地区,每个县,每个乡镇和村庄,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出一两项或两三项关键性的、切实可行的生产门路,作为重点,狠抓下去,力争尽快地收到成效。要以治穷致富的生动事实来动员群众,鼓舞群众,引导群众一步一步地战胜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你们提出的“减免、放宽、搞活”的六字方针,还有“一种、二养、三加工”的路子都很好,都对。但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乡镇和村庄如何办,还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进一步具体化。对于这方面的目标和办法,要像胡耀邦^[236]同志给你们讲的那样,要提得简单明了,非常鲜明,使群众一听就懂,一说就能办,一办就能很快见效,而不要搞很多繁琐的条文,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

四、动员和组织老区人民治穷致富,既要看到困难,又要看到有利条件。我这次到赣南的所见所闻,感到那里的困难是暂时的,有利条件是长存的。只要方针政策正确,路子

办法对头，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一个一个困难都能够克服，各种有利条件越来越会发挥作用。我想强调指出以下几点：

要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农业是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有了粮，既有了吃的，又有了饲料。陈云^[225]同志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嘛！所以，对粮食生产千万要抓紧，不可放松。我看老区发展粮食生产还有潜力，这主要还是靠正确的政策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靠科学的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调查研究老区特别是其中的山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例如，家庭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有的缺少劳力，有的劳力有剩余，有的虽有劳力却不愿经营土地，而去搞别的什么了。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既搞好专业生产，又搞好相互协作，使每亩土地和每个劳动力都能充分发挥作用。还有，我沿途看到，过去搞的很多农田水利建设都失修了。对过去搞得好的，对发展农业生产有作用的，还要把它继承下来，维修好，保护好，改造好，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抓紧粮食生产也好，恢复农田水利建设也好，都要按现行的方针政策办事，决不能重复过去“以粮为纲”时的一套老办法。

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粮食生产要抓紧，但单靠粮食生产，农民富不起来，一定要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的许多农村，在这方面搞得比较好。举广东一个例子，那里有些地方养鱼，在鱼池两边栽了桑树，桑叶养蚕，蚕屎用来喂鱼，而且鱼分三层，水面一层，中间一层，底下一层。上面一层鱼拉的屎，下

面的鱼吃，塘泥又是最好的肥料。你们也可以试试看，也可以养蚕、养蜂，都可以搞专业化。发展乡镇企业首先要立足于本地，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发挥本地的优势。同时，按照具体条件，发展与外地的联合和协作。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这两件事办好了，就能把农村的全劳力、半劳力都使用起来，使大家都有活干。这样，生产就会发展，收入就会增加，劳力也会紧张起来。

要抓紧治理荒山，种草种树，种竹子，种柑桔。特别是种草，一年就可以见效。总的说是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相结合，发展多种经营。不同的地方，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以牧或以林为主发展多种经营。最近来江西参加全国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的同志在参观了一些地方后，写了两句话：“江西佳丽地，北国旧风光”；“走尽千里有草场，遍地不见牛和羊。”我看这两句话是符合实际的。我在赣南看到一些山上没有几棵树，有的就是秃头山。至于牛和羊确实极少看得到。据说，江西全省只有八万只羊，而广丰县就有六万只。这说明：一是江西完全可以养羊，二是没有普遍养起来。牛，我们养的也不多，要大养，一个是役牛，一个是肉牛，还有一个是奶牛。猪养的多一些，也还要大发展。还有养鸡、养鸭、养鹅、养狗、养兔。还可以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动员、组织一些人，到适宜的荒山荒坡去专门种饲草，放养牛、羊嘛，这就是专业户、专业组。

要充分利用水面。江西的水源水面也比较多，要大量发展水产养殖业。我在沿途看到，很多地方稍微挖一下，把水放进去就可养鱼。除养当地传统的鱼种外，还可引进、试养

新的更有经济价值的鱼种，如鳊鱼。这种鱼可大量出口，可自己孵化，就是饲料还没有过关。江苏同志给我说，他们已初步搞成功了。这次我们到江苏吃到的螃蟹，据说很多也是人工养殖的，你们这里是否也能这样搞？可不可以试一试。

要狠抓能源建设，举办小水电、小火电。这些你们已经办了，要继续办下去，要多办，办好。我想着重说的是，你们这里煤不多，要大力推广沼气。沼气原料到处有，一年四季可以用，可以照明，可以发电，可以取暖，还可以积蓄有机肥料。南城县委同志告诉我，他们县已有六千户搞了沼气池。抚州地委同志说，临川县已有三万户搞了沼气池。要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现在多是一户一户来搞，将来也可以几家联合起来搞，联合起来搞沼气，联合起来养猪，不用两年，成本就收回来了。你们这里的条件好极了，千家万户搞起来，那就了不起，对群众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都有好处。

要积极办好农科所、试验站和各种技术开发中心。瑞金县委同志让我看了他们在绿草湖办的农林牧渔业开发中心，那里种了柑桔，养了鱼。这个开发中心的同志给我说，他们已得到多少收益，过两年还可以得到多少收益。我给他们说，你们现在办的实际上是个农场，能很快得到收益当然很好，但作为一个农林牧渔业的开发中心，就不能只想到收益，还要想到如何为群众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要和广大农民挂起钩来，同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无论农科所、试验站，或者农林牧渔业开发中心，都要搞多种经营和多种试验，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先进经验，引导群众科学种田。要运用先进技术为当地开辟治

穷致富的道路。

在农村,特别是在老区农村,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乡,运用典型示范的方法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引导群众移风易俗,改变某些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对于加快那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我在赣南看到,村庄比较分散,群众居住条件很差。胡启立^[271]同志说,当地群众的房屋像个仓库,他建议你们组织一些技术力量,设计多种样式的农舍,供那里的农民选择,逐步改造旧房屋,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我很赞成这个意见。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要引导群众学习、推广先进的东西,不要以为过去当地没有的、从来没搞过的东西就不能搞。如果这样想,如何能学习、推广外地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呢?!问题在于,要先搞试验,把外面的先进东西同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当地条件的办法来。推广好的东西,要注意运用典型示范,走群众路线,而决不可以搞强迫命令,强制群众干这干那。否则,好事也可能办成坏事。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要牢牢记取,不能重犯这样的错误。

要积极发展外引内联,向先进地区学习。我来时胡耀邦同志讲得很清楚,他说对江西来说,现在主要不是如何向国外开放,而是如何先向邻近的各省开放,如何向先进地区学习。有条件引进港澳、国外的资金、技术当然很好,但从江西的实际出发,当前主要是积极发展同周围省、市的经济合作和交流。耀邦同志要你们每年都组织一些同志到江苏、浙江等地参观学习。我在井冈山还向吉安地委负责同志建议,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同志到浙江、江苏两省的适当地方,定期兼

职学习。但去的人要少而精，而且要征得那里党委的同意。去的同志要真正学回来东西。

五、正确处理好国家支援同自力更生的关系。国家支援是必要的，中央和省都要拿出一些财物来扶持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但支援的财物总是有限的，一定要统一管理，集中使用，要用在刀刃上。更要明确：发展老区经济的基点是自力更生；国家的支援，是为了培养和增强群众自己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能力。按你们的说法是“造血”，而不是单纯地靠“输血”。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要解决好这个思想问题，决不可养成长期的依赖观念。

除了国家必要的支援，还要十分注意减轻群众的负担，让群众能够休养生息。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和省都发过文件，提出了一些措施，但落实的情况如何？还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我在赣南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情况，总感觉群众的负担还很重。一个乡党委的同志告诉我，他那个乡的干部，在编的三十一个，不在编的二十三个。这还不算民办教师、敬老院等等，这都要群众出钱。总起来算一下，一家一户负担很不轻，要认真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

对老区建设问题，就讲这些，有些想法和意见不一定合乎实际，只供你们研究参考。

克服宗教工作中“左” 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当前，在宗教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也面临不少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首要一环，就是要坚定、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第十九号文件^[267]，在工作中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有“左”的思想的人，往往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际上持怀疑、否定态度，把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对宗教团体、信教群众及他们的正常宗教活动，采取歧视、压制甚至打击的错误做法；处理正常的宗教事务问题时，思想片面急躁，方法简单粗暴，结果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这就是说，在我国现今条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全国宗教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件下，一方面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积极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世界和平服务，这是完全可以协调一致的。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我们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and 由此而产生的强大威力，要坚信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执行这一政策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敢坚持党的正确主张，那就要削弱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也要坚信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也能够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看到甚至过分地强调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存在着差异，而无视或者轻视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不努力加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共同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那就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克服“左”的思想，首先要从我们领导机关做起，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同志不能有“左”的思想，做宗教工作的同志也一样。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这些观点在中央一九八二年第十九号文件里已经作了明确的阐述。

另外，在工作中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右的倾向。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迁就宗教界那些不明道理、不顾大局的少数人的不适当要求，忽视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至对那些

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现象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损失。

不管是“左”，还是右，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其实质都是削弱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妨碍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全面的落实，从而脱离了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并给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人以可乘之机，给外国宗教中的敌对势力的渗透留下空隙。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第十九号文件对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系统的、科学的总结，把我们几十年宗教工作的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纲领性文件，是指导党对宗教工作的思想武器。坚定、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精神，是今后长期的任务。绝不可以为学习几次，开几个会讲一讲，宣传一下，就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我发现有些同志学习这个文件是“一目了然”，有的甚至连中央的批语也没有好好看就过去了。这种态度是很不严肃的。做宗教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经常地、反复地认真学习，要联系实际来学，坚决按照文件的精神办事。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我们既不要采取行政手段，人为地去消灭宗教；也不要采取行政手段，人为地去发展宗教。因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与党的宗教政策所规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也是违反宗教工作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只有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思想，才能使宗教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在纪念五四运动 六十七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我参加这个座谈会，同各界青年代表一起庆祝五四青年节，感到很高兴。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向全国各族青年，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国青年前进。什么是五四革命精神呢？概括起来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倡导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青年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精神。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就是要求广大青年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发扬光大五四革命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为此，我们对广大青年提出几点希望：

第一，要积极参加改革。改革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前，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正在城市和农村深入发展。广大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青年，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改革的目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以主人翁态度参加各项改革。这也是新形势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要求。前几天，《工人日报》发表了鞍钢一位青年工人的万言建议书，就工厂的改革、生产、

经营、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向厂领导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建议。一位普通工人，这样关心改革大局，关心国家富强，关心企业命运，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主人翁精神，应当大力提倡。广大青年职工和青年农民，处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对搞好改革有很高的热情。应当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各级领导者应当重视青年人的改革建议，热情支持各种符合改革要求的创举。在改革的过程中，广大青年还要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自觉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样做，就会有力地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

第二，要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去年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叫做“创四化大业，应当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成绩”。我认为，这句话讲得很好。大家知道，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刚刚通过的“七五”计划，是个很好的计划，但是计划再好，只有经过我们在各自具体岗位上努力实践，才能把它变为现实。所以，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卫生、财贸等各条战线的广大青年，一定要按照“七五”计划的要求，围绕本行业、本单位的奋斗目标，在本职岗位上创造第一流成绩。青年是各条战线建设的生力军，大家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那么，我们在“七五”期间一定会比“六五”干得更好！为完成“七五”计划和实现四化而建功立业，这就是我国当代青年应有的爱国主义壮举。

第三，要踊跃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青年人，富于理想，接受新事物快，对精神生活有多方面的需求，是建

设精神文明最活跃的力量之一。近几年来，广大青年倡风气之先，例如：城市的职工读书讲演活动，农村的帮困扶贫活动，部队的英模报告团活动，学生的街头咨询服务活动等，这些都是首先由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战士、青年学生干起来的，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广大青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也必须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新形势下，青年在理想、纪律、道德等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要认真克服。广大青年要继续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熟练地掌握劳动技能，并且逐步养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要在青年中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做到人人学法、知法和守法；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劳动纪律，纠正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大力加强婚姻家庭道德修养，提倡正确的恋爱观，发展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在农村要注意破除封建迷信、买卖婚姻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我们相信，广大青年，一定会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

第四，青年知识分子要自觉地同工农相结合。青年知识分子有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思想敏锐，创新精神较强，弱点是缺乏实践锻炼，容易脱离实际。一切有作为的青年知识分子，应当自觉地向工农学习，同工农相结合，同实际相结合。既勇于“向上攀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勤于“向下深入”，广泛联系群众和实际。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同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实际问题中去，才能使自

已在更广阔的领域内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成为祖国需要的合格人才。广大团干部担负着带领和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活动的光荣任务，在与工农相结合等方面，都应当走在前头。

最后，我想引用两句古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说的是桐花盛开的时候，小凤凰唱出了比老凤凰更为清亮的歌声。我想借用这两句诗，寄希望于我国的年青一代。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比我们老一辈更加辉煌的业绩！

交朋友的真谛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

交朋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对交朋友的生动描述。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不少交朋友的佳话流传于世，令人景仰。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我们更能不拘一格地广交朋友，为四化建设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交朋友，要交知心朋友。在与朋友交往中，要谦虚诚恳，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如果架子很大，高人一等，不以平等相待，不以真诚相见，就不会得到知心朋友。交朋友，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如果不尊重朋友，也就得不到朋友的尊重，不信任朋友，也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交朋友，既要广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更要深交，做到知人、知心、知音。

交朋友，还要交畏友、诤友。就是要同那些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人做朋友。特别是身居

-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辽宁省本溪市政协选编的《相遇贵相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故事》丛书所写的序言。

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善于辨别是非。

这套丛书如实地反映了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和感人至深的生动事迹。它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我相信在各有关部门、地区和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下，这套丛书一定会精益求精，一本比一本选编得好。

在全国侨联成立 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参加全国侨联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心里十分高兴。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的问候！

侨联成立三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协助党和政府落实侨务政策，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四化建设出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许多爱国华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殚心竭力，任劳任怨，令人敬佩。不少侨联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全心全意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做好侨联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要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也是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侨联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有关地区和部门把侨乡的经济建设搞好。

近几年来,各地侨乡的经济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项公益事业和侨属企业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今后进一步加快侨乡的经济建设,主要是靠侨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继续推动海外侨胞在自愿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支援。侨联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积极扶持归侨和侨眷采取多种形式兴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搞好生产和经营,争取有一个大的发展。同时,根据政策规定,要鼓励归侨和侨眷自筹资金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他们先富起来。侨联要协助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真办好华侨农场,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使归侨和侨眷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侨乡的经济建设搞好了,归侨和侨眷的生活富裕了,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而且有利于扩大我国在海外的影响。海外侨胞过去和现在都为祖国和所在国做过世所公认的贡献。今天,他们在为各所在国的经济繁荣继续努力做出贡献的同时,仍然以热切的心情关注和支持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热烈欢迎海外侨胞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国内进行经济、科技的合作和交流。侨联要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引进工作方面协助政府为他们创造一个彼此互利的、比较优越和合理的投资环境。对华侨投资兴办的企业,要大力扶持,使之兴旺发达;同时,要坚决保护华侨的一切合法权益。要鼓励和支持华侨为祖国、为家乡办一些好事。当然,华侨爱国爱乡要量力而行,能办的就办,不要勉为其难。

二、要认真贯彻执行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努力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侨联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从实际情况出发，把侨乡的精神文明建设抓好，使广大归侨、侨眷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根据不同层次和对象，加强对归侨和侨眷的爱国爱乡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引导和支持他们移风易俗，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要鼓励和帮助他们学文化、学科学。要支持和协助华侨自愿在家乡兴办医院、学校、图书馆、科学馆以及其他文化设施，鼓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介绍和传播当今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祖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合理意见，绝不要强加于人。

三、要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祖国的统一，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心愿。“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确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我们已解决了香港问题。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形势。现在，我们就是要团结海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齐心协力，促进祖国的统一。侨联要通过归侨、侨眷同海外亲友，以及台湾各阶层人士的联系，介绍“一国两制”的方针，介绍这几年祖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介绍海外侨胞和台湾各阶层人士了解我们和平统一政策和四化建设的成就。要充分运用各种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群策群力，促进海峡两岸实现通邮、通航、通商，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学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经过充分酝酿准备，集中全党智慧，同时吸收党外同志的意见，而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工作状况，回答了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提出的新问题，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新的历史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

《决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关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政策，进一步阐明了新的历史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自党的十二大以后的四年来，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全面改革的逐步展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正向深入发展，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

•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习仲勋同志的一篇署名文章。

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等全面改革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正稳步前进，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又提上重要日程。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坚决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获得越来越大的成效。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前进，同样有力地促进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并对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适应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努力促进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积极的深刻的变化，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抵御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造成更为有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决议》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也就是说，在这个总体布局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全面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又互相促进、同步发展，共同决定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这样，就把经济建设同全面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既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充分显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过

去由于长期“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坚持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不但破坏了物质文明建设，也破坏了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族人民饱尝其苦，深受其害。今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决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同我们党的最高理想科学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奋斗。《决议》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也最能够激励和鼓舞越来越多的人立志建设，立志改革，脚踏实地干事业。《决议》同时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经历许多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它的具体的奋斗目标，每一个具体奋斗目标的实现，都是向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前进的实际步骤。在现阶段，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忘记最高理想，就要迷失方向，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觉悟程度，而空谈最高理想，忽视对现实奋斗目标的努力，同样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至思想政治工作方面，长期存在着不从实际出发，违反客观规律，提出过高的、不适当要求的错误，结果反而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指导思想，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非常有害的。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归根结底，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总之，在现阶段，只有把全国各族人民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地建设四化，才是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我们的最高理想最终胜利实现的必由之路。

《决议》还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它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为我们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指明了方向。在整个精神文明的工作中，无论理想建设、道德建设，还是文化建设、民主和法制建设，都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指导作用。《决议》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中央领导同志许多重要报告、讲话，也

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掌握和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全党共同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一个执政党，党风状况如何，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建设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更加优良的党风。在这方面，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作出表率，带领全党同志，团结广大群众，按照《决议》进一步明确的指导方针，做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当懂得，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涉及各个方面，影响极为深远。它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建国以后，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和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更使全党全国对精神文明建设逐步引起重视。随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和全面改革的展开，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总的来说，我

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多，许多同志对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生疏，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方针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今后在经济建设、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更是全党同志、举国上下普遍关切的问题。所以，这次中央会议通过的《决议》，着重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解决全局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并且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和提法上都有新的发展。这是《决议》不同于其他文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认真学好《决议》是创造性地执行《决议》和做好工作的前提。所以，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同志在学习和贯彻《决议》时，一定要首先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好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点，弄清楚《决议》是怎样坚持又怎样发展了十二大的精神，在哪些重要问题上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新的提法，为什么要这样提问题而不那样提问题，等等。要把学习同调查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反复思考，深刻领会，在学好文件和摸准情况的基础上，积极稳步地开展工作。对《决议》的学习，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决不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在似懂非懂、若明若暗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出主意，发号召。否则，不但不能做好工作，甚至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在贯彻执行《决议》中，还要防止各种干扰，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搞花架子。只要经过学习，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决议》上来，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扎扎实实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并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发展。

要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一些少数民族没有商品经济观念，要帮助他们，就是要办些实事。民族地区必须开放，封闭了不行。这对少数民族来说尤为迫切。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还要搞商品经济。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同时，要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主要是从研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方面去进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行，并且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我看至少有这样一些事情可办：（1）组织专家对某一个地方，比如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实施。（2）就某一个地方的单项开发问题，从可行性研究到实施开发的全过程给予帮助。最近甘肃对河西问题，组织了一些专家去进行研究。还有湘西、鄂西问题，都采取了这种办法。可以组织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进来搞。（3）帮助进行各种专业人才的培训。（4）为少数民族地区同先进地区的横向联系搭桥牵线。但是要平等互利，不能你占我一点便宜，我占你一点便宜。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互助，就是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都要平等互助。搞经济、做生意都要订合同。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帐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这只是举些例子。只要开动脑筋，可办的实事是很多的。总之，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功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调查来调查去，材料一大堆，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我看这样的调查不必要，毫无价值。我不是反对调查，我是很注重调查的。我去广东工作时，叶剑英同志⁽²⁰⁶⁾对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要调查研究。

我国还有一千八百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

地党委和政府 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我在一次教育会议上讲过这个问题，对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学校，要给一点偏食。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

发展经济，要贯彻改革和开放的方针。我们实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志们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没有？这是指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 展，必然要求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旧 的观念不适应了，要改变才能顺乎潮流。

沈阳市委扩大会议提出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树立五种新观念。很有道理。一是破除挂帅观念，树立服务观念。我们都是领导，其实领导就是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下级服务。二是破除抽象观念，树立求实观念。三是破除封闭观念，树立开放观念。我看，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很有用处。少数民族太封闭了，他们过去不愿与外边多来往，是有历史原因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去糊弄少数民族，用些假货、不真实的东西，把人家的羊弄走了，牛也弄走了，羊毛也弄走了。我看这些问题要重视。我们要建立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现在的横向

经济联系也要这样。四是破除单纯“破”的观念，树立建设观念。五是破除封建观念，树立时代观念。封建观念主要指汉族，少数民族也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五点讲得比较有道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这些陋习在汉族中也很严重，例如在湖南、福建、广东、河南等地。陕西渭南有个劳动局长给儿子娶媳妇，大搞排场，光车就不知用了多少辆。现在把这个人撤职了。封建迷信不是指的宗教，按教规教义搞的宗教活动是允许的。但现在有些宗教也搞迷信。这些问题由宗教自己去解决。行政上对这些问题不要做硬性规定。《决议》中说：“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这是对全国各族人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要求，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对少数民族地区那些不利于民族兴旺、群众致富，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要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通过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广大群众充分商量后，由他们自觉自愿地加以改革。

古今中外的事情表明，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和进步的。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的好东西是从中东、南亚的文化吸收过来的。在民族工作中，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改变封闭状态，实行开放。这种开放，包含对国外开放和对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开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

放、交流是脱贫致富，吸收先进技术、人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必由之路。这一点要反复地向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讲清楚，做工作。要摆些实际的例子做宣传。说得再多，没有样子看不行。这是个大舞台，就看你咋演，带个好头，群众一看就会认为这样好，进步啊。

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198]五十周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195]、杨虎城^[184]发动西安事变，向国民党领袖、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派几个方面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终于接受了这些正义要求，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时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进而促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但至今仍深刻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西安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形势下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272]，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继之又向华北大举扩张，平津告急，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多次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使一片片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对内与人民为敌，坚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这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

上海、长城各口、察北^[273]、绥东^[274]等地区虽曾有国民党部分军队进行局部抗战，但都因国民党最高当局执行错误的内外政策而不能坚持下去。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的爱国力量，纷纷行动起来，遍及城乡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充分表达了举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强烈愿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剧烈分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官员、将领和有识之士也感奋而起，抗议最高当局所执行的错误政策，要求改弦更张。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和解放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正是这个潮流的突出表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多次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最后迫不得已而进行了“兵谏”。事变发生后，在全国各界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下，张、杨两将军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不惜委曲求全，作出重大的让步。中国共产党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等重要保证。国民党主和派宋美龄^[275]、宋子文^[276]等，力排讨伐派的阻挠，促使和平协议得以达成。蒋介石最终也采取正视现实的态度，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强敌欺凌面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了说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可以将这个事件同红军长征^[181]胜利和一二九运动^[277]联系起来看一看。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始以西北为革命基地，发挥共产党和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的作用，

并且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十二月九日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新高潮，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族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三十年代中期这两年间相继出现的这三个历史事件，都是使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是完成这一历史转变的枢纽。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战争。尽管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国民党没有放弃反共政策，发生了许多矛盾和曲折，但是抗日战争终于坚持八年直至胜利。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起了重要作用，必须予以充分估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关各方照顾大局，共同努力，为民族利益而团结合作，互谅互让的结果。当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能够改变十年的敌对状况，化干戈为玉帛，并肩作战。在今天，为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什么不可以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合作呢？台湾有些人否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把这说成是国民党一切错误之源。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恰恰相反，国民党后来的失败，不是由于同共产党合作，而是背弃了这种合作。历史反复证明：国共两党合作，既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又有利于两党本身的发展。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

的前途至关重要，这个趋向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多次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让步。我们真诚地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能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自身的发展前途为重，作出积极的响应。我们也希望台湾的广大人民和各界有识之士，以及国外的侨胞，共同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我们相信，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通过中华各族儿女的积极努力，一定可以胜利实现。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他们在国家多难之秋，出于一片爱国赤诚，为国家民族不计个人的毁誉安危，英勇举义。张学良将军被长期软禁以至于今，杨虎城将军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光荣的、高尚的。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必能激励中华各族儿女为祖国的统一繁荣、民族的团结进步而努力奋斗。

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月上旬至三月中旬，我到广东走了一个多月。

我在广东期间，各级党组织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向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政治思想领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年初以来下达的一至六号文件；二是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班；三是批判方励之^[278]、王若望^[279]、刘宾雁^[280]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观点。从反映的情况看，广大党员和干部普遍拥护中央的几个文件，拥护中央关于个别人事变动的决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和态度是好的，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能够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办事，发展是健康的。

我在深圳、珠海等地的讲话中，要求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的几个文件的精神，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积极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还要求大家认真结合实际，学习邓小平同志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认清这篇重要讲话对指导

* 这是习仲勋同志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我们工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通过学习这篇讲话，各级党组织要更加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党纪教育；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过好党性关，正确对待名、权、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广大干部要加强团结，搞五湖四海，紧密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艰苦奋斗，努力做好工作。

广东已连续七个月缺雨，旱情比较严重。省里的各级负责同志对抗旱抓得早，也抓得紧，收效较好。我要他们继续抓紧抗旱，抓好粮食生产，并大力培育良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在广东，我首先看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然后看了中山、江门、佛山、广州、东莞、惠阳、肇庆等地方，又北上看了怀集、连县、乳源、仁化、韶关等地方，还考察了大瑶山隧道工地。一共到了二十三个市、县。在这些地方，我见了一些省、市、地、县的负责同志以及一些离休、退休的老同志，看了城镇建设、工厂、农村、学校、旅游设施，还访问了一些农户。同时，还会见了港澳的知名人士霍英东^[281]、马万祺^[282]和胡应湘^[283]等。

我离开广东已整整六年。这次重返故地，看到广东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的变化。突出的印象是：

一、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

深圳一九七八年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一片荒凉。经过短短几年，现在已变成崭新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去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三十五点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目前出口贸易大幅度上升，外向型的经济有较

大的发展。去年全市出口商品总值七点二五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对于外引内联的项目加强了筛选，创办的项目基本都符合外向型经济的要求。蛇口管理区的引进工作做得扎实，累计引进项目已达二百五十二项，效益也比较好。我看了蛇口的太阳油厂，技术很先进，正在兴建的浮法玻璃厂规模较大，工程进展顺利。合资经营的深圳中华自行车厂，应变能力很强，能够生产出上百种型号的自行车，产品畅销欧美市场，供不应求。

在沙头角一看，变化也相当惊人。昔日这里冷冷清清，贫穷落后，现在建成了成片的楼房，有工厂，有宾馆，有宿舍区，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明显胜过“中英街”一侧的香港地域。这个区人均住房二十五平方米，农民个人年平均纯收入已达一千四百多元。

我特意到深圳市宝安县的南岭村看了一下，因为一九七八年五月为了“反外逃”我去过这个村。这个地方原来是个水沟，荒凉得很，现在已变成漂亮的小城镇。那时全村六百来人就跑掉五百多。现在这些外流的人都回来了，还回来了一些华侨。村里办起了内联企业和来料加工厂，产品销往香港。职工的学习气氛很浓，住宿条件和伙食都不错。外省来南岭村搞劳务的有二千五百人，来自全国八十多个市、县。全村搞的是承包责任制，责任到人，坚持集体积累扩大再生产，不是分光吃光。这个村现有固定人口六百多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即一九七八年人均收入只有一百元，而一九八六年人均收入达到五千元，增加到五十倍，其中分配给个人一千五百元，留三千五百元兴办教育、医疗等事业。老年人

每月发给五十元退休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都是百分之百，中学生到镇里上学早晚有汽车接送。村里群众住的都是新房，而且很宽敞。有些房子建得很讲究，环境优美。看到这些变化，我十分高兴。

珠海特区的引进工作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是从办旅游业发展到以办工业、农业为主；二是从港澳地区引进发展到从欧美各国引进；三是从引进单个企业发展到引进跨国公司、跨国财团；四是外商投资额从几万、几十万美元发展到几百万或几千万美元；五是从引进装配工业发展到引进系列化的生产线；六是从引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到引进技术密集型工业。现在珠海已有十多家当代比较先进的厂子。我看到的珠海美达磁碟厂，生产由电脑控制，非常先进，产品全部出口，职工每人每年可创产值十万美元。

目前两个特区正在按照国务院提出的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设外向型经济的要求去奋斗，改革不断深化。

我离京前曾向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报告，这次去广东的目的是一看，二听，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条“四学习”。因为那里确实有许多新事物、新经验值得学习，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办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实践证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小三角”地区的发展令人鼓舞。

这个地区的最大特点，一是积极进行改革，二是大胆进行开放，三是发挥自己的优势。江门市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在城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经济责任制；在农村主要抓了产业调整、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外贸工农经济体系的建立。这个市的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六五”期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将近翻一番，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七十三亿元。佛山市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解决，努力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充分发挥政策威力，积极发展创汇的工业和农业，积极利用外资，使全市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个市的乡镇企业产值，“六五”期间从最初的十亿元增加到五十亿元。全市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一百二十三亿元。东莞市按照发展商品农业、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的要求，在稳定粮食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生产结构，大力发展水果，大搞农业开发；在工业方面，已从前几年的“三来一补”^[284]阶段发展到引进与消化并重、上水平、上规模、上效益的阶段，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轻纺业为主体的外向型工业结构。这个市去年为国家创汇二点二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六，居全国前列；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二十六点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九，约占惠阳地区所辖十二个市、县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总之，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实施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的灵活措施方面，迈出的步子是大，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三、粤北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不少新的起色。

近几年来，山区各县、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大力调整农业生产布局，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山

区各县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大抓林业、牧业等多种经营，努力兴办国营工业和乡镇企业。山区的引进工作在发展，工业基础在壮大。连县引进日本的设备，建立了花岗岩建材厂。怀集县引进西德的技术和设备，并请来西德的专家，建立了“微板粒”工厂。这两个厂利用本地资源，把储量丰富的花岗岩和不成材的木料拿来生产出销路很好的优质产品，我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韶关市目前在建的中外合资合作的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项目有二十四项，外商将投资二千多万美元。肇庆地区去年的工业总产值近十九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工农业总产值四十四亿元，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肇庆、韶关两个地、市的山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尚有五十多万人年平均收入在二百元以下，口粮不足四百斤。省、市积极采取扶贫措施，放宽政策，从财力物力上给予援助，同时有重点地派去一些懂得经营管理的人员和科技人员，工作的进展比较好。

总的来说，广东全省的经济建设由南向北扩展，南北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共同前进的态势是好的。

四、各地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所到之处，各级领导在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各地都在认真贯彻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的活动。广州市有一个卫生处理厂，专管处理死猪死狗死牛一类动物，车间的生产条件艰苦，味道难闻，职工的工资待遇也不算高。工厂党政领导一方面努力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特别重视抓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常常一家一户、一个人一个人

地去进行工作，使全厂职工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神，恶臭熏不走，高薪拉不跑，爱厂如家，为清除环境污染、保证人民健康作出了贡献。这个厂称得上是广州的一枝花，我要广州市的领导同志注意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并以此教育广大干部、职工和青年学生。佛山市在取缔社会丑恶现象方面态度坚决，工作抓得紧。各地社会治安秩序比较好。蛇口管理区建立以来，只发生了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遍重视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江门市几年来从华侨、港澳同胞捐赠给家乡的十三亿港元中，分出一部分兴办医院、少年宫、体育馆和大中小学，修建校舍一千多间。最近还从本市所辖各县集资二千五百万元，创建“五邑大学”。我到这所大学看了一下，他们边建校舍边招生，领导充满信心，决心办成第一流的大学。

五、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状态很好。

“六五”期间，佛山市农民的人均收入从三百七十三元增至九百三十四元，平均每年增加一百一十二元。东莞市农村去年人均收入八百七十六元。珠江三角洲沿途农民几乎都修建了新的住房。惠阳、肇庆、韶关三个地、市农民的平均收入低些，去年人均有的五百一二十元，有的不足五百元，一些县有的人均二三百元，总的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社会安定，人们的精神面貌确实很好。我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都称赞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些人还一再地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富裕不忘邓小平。”见到不少厂长、经理，都很年轻，精力充沛，思

想活跃，联系群众，有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工作搞得很有声色。市、地、县的领导对自己严格要求，有的还制定了端正党风、遵守党纪的一些规定。

沿途所见所闻，我感到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基本政策发生变化。“怕变”的思想原来就有，年初中央个别人事变动后，这样的疑虑增加了。已经富起来的怕变得失掉得到的利益；尚未富起来的怕变得不能再致富。香港的胡应湘在广州当面问我：“政策会不会变，要不要继续改革？”我明确答复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党中央集体决定的，是正确的，不会因为中央个别人事变动而改变。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形势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解决“怕变”的认识问题，除了继续从舆论上公开阐明我们的态度外，主要还是通过实际工作去体现党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

其次，肇庆、韶关、惠阳三个地、市的资源开发工作需要加强。应当首先利用本地资源，就地取材，发展经济。这几个地方的资源都很丰富，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潜力很大。仅建筑石料一项，肇庆地区的花岗岩、大理石藏量在七十亿立方米以上，韶关市的大理石、汉白玉藏量已查明的有十亿多立方米，可供大量开采。惠阳地区还有一千多万亩荒山需要有计划地植树造林。这个地区雨量充足，土地广，滩涂多，海岸线有五百多公里，毗邻广州、深圳和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步子应当走得再快一些。

第三，非生产性的建设搞得多了，重复建设的问题仍需抓紧解决。深圳、珠海、广州等地建了不少高级或比较高级

的宾馆。广州可接待外宾的宾馆、酒家已接近二十家，二万个床位。高级宾馆的开房率比前二年降低了。广州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目前的开房率不足百分之七十，深圳、珠海、中山的高级宾馆开房率更低。游乐设施建得也偏多了。几个地方的同志都谈到，投资结构还不尽合理，重复建设的项目不少，压缩空气后，遗留的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我告诉他们，要认真贯彻全国省长会议的精神，注意加强宏观控制，精心处理好这些问题。

第四，工厂和住宅的占地面积应当严格控制。我看到一些新建的工厂和住宅不适当地占用耕地，多占地，占好地，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越严重。东莞有个新建的保鲜设备厂，空地很大，占去菜地十六亩。广东人多地少，“寸土寸金”，工厂和住宅多占耕地的问题必须认真解决。省里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措施，但问题还不少。我要他们对城镇的建设切实作好规划，充分发挥城镇的经济文化中心作用。另外，还要注意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第五，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防止搞形式主义。我在广州看到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工作非常出色，把本单位、本街道建设得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治安良好、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可是他们把来参观过的领导同志的照片、题字一一不漏地陈列出来，还把一些同志的诗词刻在石碑上，或烧制在磁砖上，立在街道的入口处和中心处供人们观赏。我告诉他们要注意勤俭节约，把钱花在有利于提高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开展建设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活动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搞一个模式，不要互相攀比。否则，不仅会造

成浪费，群众也会有意见。

省、市的同志还反映了有关经济方面的几个政策性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在各族人民喜气洋洋，隆重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同时欢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以乌兰夫^[285]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受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委托，来到大青山下古老的青城，向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农牧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部队和内蒙古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内蒙古地处我们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和其他各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革命传统，对我们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内蒙古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推翻“三座大山”^[286]，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我们党根据我国和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并为我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年来，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建国以前，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为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后，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等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卓有胆识地采取了符合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方针、政策。在牧区民主改革中，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牧主实行赎买政策，在牧区坚持了适当放宽、长期稳定不变的方针；在发展牧区经济中，强调“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成功的，有力地促进了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内蒙古同全国一样，也遭受了极大的灾害。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心向伟大的祖国，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认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真进行改革、开放，在两个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进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最好时期，各民族团结奋发，正以新的风貌踏上新的征途。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内蒙古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南粮北牧，东林西铁，遍地是煤”，发展潜力很大；同东北、华北、西北的八个省区毗邻，紧靠经济比较发达的华北、东北两大平原，同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兰州、银川等大中城市相距不远；又是我国通往苏联、东欧的陆路通道，地理条件相当优越。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必须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内蒙古具体化，变地理、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畜牧业和林业是蒙古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经济，是自治区的两大优势产业，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加快畜牧业和林业的发展，对于内蒙古各民族的繁荣，维护“三北”地区的生态平衡和加速国家的四化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把畜牧业和林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草业先行；林区要坚持以林为主，林业要以营林为基础，实行育、采结合，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畜牧业、林业基地。同时，要根据实际，开展多种经营，实行综合发展。粮食生产制约着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要进一步抓紧抓好，搞好商品粮、油、糖生产基地建设。工业，要立足于本地资源，有计划地发展以林、牧、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积极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和钢铁、稀土等原材料工业。要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注意发挥城市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充分利用与“三北”地区大中城市相邻的有利条件，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搞活自治区的经济。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

事业，加速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之，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确定各自的具体发展方针，并把各种产业合理地组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项建设事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两个“坚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的根本。”“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内蒙古的今天；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改革、开放、搞活，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就是由于坚持了改革、开放、搞活。我们热切地希望内蒙古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已经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结合实际，勇于探索，取

得更加优异的成就。热切地希望内蒙古的蒙古族、汉族和其他民族，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的思想，增强商品经济意识，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和其他优秀的精神财富，充实自己，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开放的民族，不断奋发进取的民族。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让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主，使自治机关真正行使自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自治地方的积极性。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都很关心《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希望内蒙古自治区在这方面能有新的建树。要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与本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特点紧密结合起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认真贯彻实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好经济权益问题。自治区一定要热情支持和帮助中央各部门在本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业，组织有关方面和群众做好服务工作，积极同中央企业发展横向联系，在服务 and 联合中加快自己的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事业单位，都应结合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出切实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办法与措施，处理好同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权益问题，并采取培训人才、技术支援等多种形式，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帮助群众致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培养民族干部，充分发挥民族干部的作用。在坚持干部“四化”^{〔287〕}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养党政管理

干部，又要注意培养多学科、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

不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必须有一个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环境。内蒙古是蒙古族的聚居地区，又是多民族地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内蒙古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过去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们的未来事业，更需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在各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要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认真总结和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要实事求是、慎重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坚持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及时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努力造成一种友爱、信任、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积极性。

推进内蒙古的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全区各族各级干部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干部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希望同志们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最近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的有关文件，增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自觉性。要紧紧掌握“两个基本

点”，不断克服和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僵化的影响和干扰。要发扬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对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合理地加以解决。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各个系统、各个单位都要根据自己的职责制订工作规划。在决策之前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决策之后，要遵守纪律，认真执行。我们的干部要积极发扬党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切实做到“当官不像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为群众办实事，提高办事效率，提高工作质量，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我们要坚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的干部还是外来的干部，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不管是地方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要加强团结。大家办事情，想问题，都要顾大局，讲风格，处处事事要想到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再大的困难、挫折，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和带领群众把自治区的“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搞得更快更好。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正在深入进行。中央希望，内蒙古自治区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族干部和群众、各界爱国人士和部队指战员，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共同奋斗，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内蒙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

（一九八八年四月）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是转战陕北胜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今天，革命圣地延安在被蒋胡军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这一年，是最艰苦、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我西北野战军运用“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以少胜多，创造奇迹的一年。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用血与火写成的战争史诗，将载入中国革命史册，永放光辉。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辛岁月，就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79]、彭德怀^[95]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那些驰骋疆场，无私奉献，长眠在陕北大地的英勇将士，怀念边区勤劳勇敢，信念坚定，忘我支援战争的英雄人民。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纪念转战陕北胜利四十周年所写的文章。

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军遵照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经过八个月的战斗，共歼敌六十一个旅计七十一万人。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计划遭到破产后，又集中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蒋介石先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42]召到南京，又于二月二十八日偕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策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10]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集中了三十四一个旅，共二十五万余人，由胡宗南集团从南线进攻，青（海）宁（夏）二马（马步芳^[126]、马鸿逵^[127]）及邓宝珊^[288]集团分别从西线、北线策应，并调集全国五分之三的空军进行配合，妄图一举占领延安，压迫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以便掩饰其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尔后再抽出胡宗南集团这支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加强华北或其他战场的进攻。

当时，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六个野战旅共二万六千余人和三个地方旅，而且装备极差，面对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把敌人拖在陕北，消灭在陕北，支援其他战场我军作战。

西北野战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同强敌“蘑菇”周旋，艰苦奋斗，一年间，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十五个战役，共歼敌十余万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长、师长七人，少将旅（师）长，参谋长等二十五人。而我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到十一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近八万人。

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的内线防御阶段，由于敌我力量异常悬殊，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尔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等部共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延安进攻，我军节节抵抗，经七天激战，予敌以五千余人的杀伤，胜利完成了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疏散的任务后，于三月十九日晨主动撤出战斗。此后，针对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状态，以独立第一旅一部，诱敌北进安塞，而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先后在青化砭^[116]、羊马河^[117]和蟠龙^[118]三战三捷，全歼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和一六七旅，毙俘敌一万四千三百余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麦宗禹和李昆岗，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五月十四日，在真武洞召开了五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紧接着挥师西进，大战陇东，北进三边^[37]，狠揍宁马，再歼青、宁马家军二千四百余人，生擒敌少将副旅长陈应权、上校团长马奠邦，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定边、安边、盐池等地。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三军（刘邓^[240]、陈谢^[289]、陈粟^[290]）配合，两翼（陕北、胶东）牵制”的战略部署，西野主力于七月三十日挥师榆林，以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迅速渡河，南进豫西。虽两次攻城未克，但却歼守敌邓宝珊部五千二百余人，达到了诱敌董钊、刘戡、钟松

率十个旅北上榆林的目的。五个月的防御作战，共歼敌三个旅部、十一个团，毙伤敌二万五千余人，扭转了困难局势，打开了胜利局面，为以后转入内线反攻，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军转入内线反攻阶段。这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继续牵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逐渐歼灭其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扩大与巩固解放区，为收复延安，转入外线进攻创造条件。

榆林战役后，南北我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南北约四十里，东西约五十里的狭小地区。胡宗南误认为我正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企图以七个旅南北夹击，结束陕北之战。这时，我们抓住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孤军突出的有利战机，以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警备第四、第六团，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持抗击刘戡所部西援；以第一、第二纵队迅速包围并攻击沙家店之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以教导旅、新四旅对西援进至常高山之敌一二三旅发动猛攻。经十个多小时激战，即于八月二十日傍晚，全歼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取得歼敌六千余人的重大胜利，成为我军进入反攻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沙家店战役^[119]结束之第三天，我陈谢兵团即在晋南突破敌三百多里的黄河防线，逼近潼关。胡宗南慌忙令绥德以北八个旅南撤，保卫其西安老巢。西北我军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兵团创建豫西根据地，于九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给南撤之敌以四千余人的杀伤，迫敌不得不将主力暂留延安、富县地区整补。趁此机会，我以

二纵和四纵（九月二十五日由警备第一、第三旅和骑六师编成）南进黄龙山区，发起黄龙战役，先后攻克白水、石堡（今黄龙县）、韩城、宜川等县城，毙、俘敌宜川中将指挥官许用修以下三千三百余人。留在内线的一、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发起了延（延川、延长）清（涧）战役。迅速收复延川、延长县城后，于十月十一日晨，攻克清涧县城，敌整编七十六师被歼，中将师长廖昂被活捉。此后，我西野领导为了巩固后方，保障党中央安全，于十月底，率部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敌城防坚固，我军缺少重火器，加之准备不足，马鸿逵倾巢迅速增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歼敌六千八百余人后撤出战斗，转入新式整军。

一九四八年二月至四月二十一日，是外线进攻阶段。我军的作战方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继向该线以南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拖住胡宗南集团并调回他支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针对胡宗南集团确保延安、洛川、宜川，阻我军南进和防御态势，西野指挥部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认为把突出方向选择在宜川更有利于围城打援，在运动中全歼守敌与援敌。二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共八万余人，分别从保安（今志丹县）、绥德、米脂和晋南曲沃地区向宜川开进；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二、六纵队完成对宜川的包围，并将敌压缩于城内。这时，胡宗南急令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共四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二十八日进入瓦子街至任家湾的一个狭长小川道内。我军从公路两侧高

地对援敌拦头截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三月一日上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全体官兵，斗志昂扬、顶风冒雪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五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随即挥师东进，迅速攻克宜川。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歼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共五个旅二万九千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十一名，同时调回了胡宗南布防在豫西战场的五个整编师，策应了中原我军作战。

宜瓦战役大获全胜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于三月五日分三路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经一个多月作战，连克富县、中部（黄陵）、宜君、白水、澄城、合阳等县城，进逼蒲城、围困洛川。四月六日，正当我军向西府挺进，决心夺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宝鸡的时候，延安守敌整编十七师于四月二十日晚弃城南逃。被敌人侵占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二十一日宣告光复。至此，洛川以北的陕甘宁边区全无敌踪。

在艰难困苦的转战期间，西野广大指战员怀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意志，万众一心，团结奋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许多团营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二十四名团以上干部和一万一千名营以下干部、战士牺牲在这块土地上，而负伤者达三万六千多人。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卓著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二

转战陕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同志英明指挥和领导的结果。在蒋胡军重兵压境，狂横不可一世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留在陕北，胸有成竹，运筹帷幄，指挥陕北和全国解放区的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党中央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在敌人眼皮下转战了十二个县，宿营居住过三十七个村镇，行程二千一百华里。在这三百七十一一个艰难严峻、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胸怀大局，临危不惧，和边区军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历经风险，饱经艰辛，一次次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种胆略和气魄，完全基于对陕甘宁边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了解和无限信赖，基于对客观形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透彻分析。撤出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的驻地就遭敌机扫射，汽车座位被打坏。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角度考虑，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长征⁽¹⁸¹⁾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他还说：“哪里群众拥护

我们，哪里就最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是对人民群众何等真挚的感情。又是何等的信赖！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处处支援和保护下，尽管敌人在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下有重兵搜索，还有美国最新式的电台测向仪昼夜监测，却始终找不到党中央机关的踪迹。有时候彼此仅隔一道小山梁，一条小山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稳如泰山，在小小的窑洞里指挥着举世瞩目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坚持留在陕北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心系人民。在转战期间，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他们总是惦记着群众。党中央在王家湾时，数万敌人扑去。当时彭总和我正率西野主力远在陇东作战，急得坐卧不安，电令三边、绥德分区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顶住敌人。事后才知，敌人已进到距王家湾四五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还镇定自若地询问、指挥群众坚壁、转移，直到群众到达安全地带，才和警卫部队转移。沙家店战役前夕，党中央转移到佳县附近，前是滔滔黄河，后有十万追兵，情况很危急。我们立即命令三纵侧击刘戡，掩护党中央，并劝毛泽东同志暂过黄河。刘少奇、朱老总等也来电坦诚相劝。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大家的心意我完全理解，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失信于民呀！”“现在是历史转折的关头，党中央要为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一仗打得好，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他毅然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由东折向西北前进，到达梁家岔后，亲自用有线电话指挥了沙家店战役。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

为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始终坚持把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帅旗举在陕北，在政治上有其重大的意义。它给全党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对敌人也是当头一棒，彻底打碎了他们企图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妄想。

转战陕北的胜利，还在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陕北战场制定了一条符合实际、克敌制胜的正确作战方针。正像彭总在一次会议上讲的：“这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的胜利；是毛主席‘蘑菇战术’的胜利。”早在蒋介石、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时，毛泽东同志就思考着是坚守延安还是主动放弃延安？以及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重大战略问题。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召集彭总、王震^[200]和我，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我军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分析了敌人的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便于我军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并且研究了兵力的具体部署和在青化砭地区打伏击战的意图。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向西北野战军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要求我们继续过去诱敌“游行”的老办法，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还要求我们向全体指战员说明，“这种办法叫‘蘑

菇’战术”，“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以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作战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敌人尽管骄横一时，侵占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被我军用“蘑菇”战术磨得精疲力竭，断粮绝食，终于丧失大量有生力量而陷于绝境。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员十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甘宁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

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三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后，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立即动员和组织各级党委、政府和一百六十多万群众迅速进入战争状态，一切工作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那时候，所有党、政、企业、学校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处处都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战的繁忙景象。

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十三个月就同敌作战一百二十八次，歼敌七百三十一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九十支（件），击毁汽车两辆，破敌电线二十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地后一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二百七十人，缴获面粉九百九十一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伪保长十八人，完全摧毁了敌人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一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二千人，支援牲畜一百四十七万八千头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余万石，柴草一亿二千多万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了军。

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给毛主席。

边区一百六十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后，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九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岗像放羊似地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的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大国，要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全国的稳定。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稳定的局势，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无从谈起。建国四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安定团结，各项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发生动乱，各项事业就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千方百计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

全国的稳定，以各地方的稳定为基础。保持各级干部之间的团结是稳定的首要条件。我参加革命六十余年来，深深懂得这一点。过去战争游击时期，团结就胜利；不团结就失败，甚至全军覆没。一个省要团结，一个县，一个乡镇，团结都很重要。不团结，优势就从内部抵消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个地方、各种职业，有共产党员、非共产

-
- 这是习仲勋同志在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习仲勋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党员，有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大家都要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要稳定局势，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加强法制建设。这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也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要保证。江泽民^[291]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必然危害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〇年就指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将法制完备起来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向前发展。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国家稳定的物质基础。要把教育这个战略重点搞好，培养“四有”新人，这是国家稳定的思想基础。在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还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也比较突出，还有不学法、不懂法的问题。今后，一定要注意抓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严格按照法制程序行事，全面、坚决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国

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还要进一步制订出一批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要稳定局势，还必须发挥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开得很好，意义重大。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文件，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要把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当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大事来抓，当作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事来抓，这是稳定国家、稳定社会的重要措施。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增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共产党员和干部中要提倡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无往而不胜。焦裕禄^[292]和雷锋^[293]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模范带头、以身作则和无私奉献精神。我们一定要大力发扬延安精神，发扬焦裕禄和雷锋精神，为建设四化和改革开放，为统一祖国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党、政、军、群各方面，社会各部门一切企事业单位，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每一位公民，都应该自觉地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都应该自觉地为稳定作出自己的努力。尽管我们的队伍里还存在着一些腐败现象，但只要大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

广东的改革开放，是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八年末，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又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

•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所写的序言。

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农业各业的发展。我们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好加以解决。我和杨尚昆^[160]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正是带着这个迫切的要求，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和当时一起赴京参加会议的王全国^[294]同志，在小组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的问题；电力、燃料、运输紧张的问题；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的问题。在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我又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我还讲，如果给广东更多一些自主权，可

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我这话，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搞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决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便派谷牧^[295]同志率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广东来，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算账，并帮助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不久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文件，这就是在当年七月下发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这里说说我当时的心情。对广东来说，中央这个决策，是关系重大的事，但毕竟又是全新的责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发挥广东的优势，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因为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省委强调要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大胆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当然，完全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出点问题不要怕，但一定要避免出大乱子；工作中不可能不犯错误，能改正错误就好。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团结战斗，就总会有办法。

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至今整整十三年了。我和尚昆同志离开广东后，以任仲夷^[296]、林若^[297]、谢非^[298]同志为代表的历届广东省委，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决策。当然，“好事多磨”，一个新生事物，在发展成长的过程中，总免不了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会经受这样那样的挫折。十多年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最可贵的是，广东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克服了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并且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建议，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广东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日益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像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南方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广东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求实精神，实践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再次证明了这条路线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事求是。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会从似乎困难重重当中找到战胜困难的办法和力量。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也可以说，广东人民是用顽强的努力和拼搏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三中全会精神在广东人民中深深扎根，改革开放意识在广东人民中深深扎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感在广东人民中深深扎根。

今年一月，小平同志再一次南巡广东，亲自考察了广东的工作，接触了许多干部、群众，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我

相信，这给广东人民的鼓舞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我也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广东一定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这个时候，回顾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并对今后如何继续前进加以思考和探索，无疑很有必要。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讲的以上这番话，就作为本书的序言吧。

注 释

- 1 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同年九月，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33、50页。
- 2 保甲，指保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决定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保甲制度。——第1、53、79、99、145、290页。
- 3 新宁，县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以甘肃宁县杨园子等地为辖区设置新宁县。一九三六年一月后属陕甘边关中特区，一九三七年十月后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一九四九年七月撤销，其辖区复归宁县。——第1、291页。
- 4 三八五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部。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教导团、骑兵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旅部及七七〇团留陕甘宁边区，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下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第1页。
- 5 官膏局，国民党政府以戒毒为名而实际出售毒品的机构。——第2页。
- 6 “点线”，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秘密发展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第2、8页。
- 7 新正县，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以陕西旬邑县北部和甘肃正宁县南部地区为辖区设置新正县。一九三六年一月后属陕甘边关中特区，一九三七年十月后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一九四九年六月撤销，其辖区分别复归原治。——第2、291页。
- 8 赤水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以陕西旬邑县东部的清原、丰泉和淳化县西部的中嘴、赵家等地为辖区设置赤水县。一九三六年一月后属陕甘边关中特区，一九三七年十月后属陕甘宁

- 边区关中分区，一九四九年二月撤销，复称淳化县，原属旬邑地域复归原治。——第2、291页。
- 9 淳耀县，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以陕西淳化县东部的铁王、秦河、鞍子哇、南村和耀县西部的照金、柳林、庙湾、香山等地为辖区设置淳耀县。一九三六年一月后属陕甘边关中特区，一九三七年十月后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一九四三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同宜耀县并入淳耀县，淳耀县原属淳化地域划归赤水县。一九四九年四月淳耀县撤销，其辖区复划归原治。——第2、291页。
- 10 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各一部分地区，人口约一百五十万。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第6、17、22、24、30、35、39、42、46、49、57、89、110、166、286、330、465页。
- 11 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决定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下辖四个支队，随即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重建了新四军，继续坚持抗战。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页。
- 12 友区，指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相邻的国民党统治区。——第7页。
- 13 警备区，指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简称绥德警备区。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侵略军侵入山西柳林一带，并隔河炮击陕北宋家川等地，经国共双方商谈，决定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区。一九四〇年二月，国民党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哗变逃跑后，绥德警备区五县行政事宜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第9、12、26、30、42页。
- 14 六法全书，亦称《六法大全》。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法规汇编。它是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由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六部构成。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发出指示，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第9页。
- 15 包拯即包公（九九九——一〇六二），北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以廉洁奉公、执法严峻、不畏权贵著称。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第11页。

- 16 过阴, 陕西民间有种迷信传说, 说包拯不仅能在白昼秉公断狱平冤案, 而且能在黑夜“过阴”查阅阎王帝君记载人间众生善恶行为的簿记, 并坐堂办案细听屈死鬼呈诉被冤的详情, 依此在“还阳”后严办人世的罪魁祸首。
——第 11 页。
- 17 乔国桢 (一九〇七——一九四五), 陕西佳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回陕后在关中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后曾任中共井陘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多次被捕, 越狱后在去苏联治病途中, 被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投入监狱, 一九四五年逝世。——第 14 页。
- 18 渭华暴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南东南原、华县西南原一带的农民和由中共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陕军一部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工农革命军, 唐澍任总司令, 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了四十八个区、村苏维埃政府。起义军民与冯玉祥部及反动民团激战多次, 在暴动地区坚持武装割据近两个月。起义失败后, 唐澍等英勇牺牲。——第 14 页。
- 19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地方政权都不能完全控制的地区, 群众称为“半红半白”。——第 14 页。
- 20 十月革命节, 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 联合贫苦农民, 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举行的一次武装革命。因其发生在一九一七年俄历十月二十五日 (公历十一月七日), 故名十月革命, 十一月七日为十月革命节。——第 14 页。
- 21 李杰夫, 原名高维翰, 陕西长安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一九三〇年十月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 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 中共渭北特委书记。后叛变。——第 15 页。
- 22 程建文, 陕西三原人。一九三二年十月后曾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干事。后叛变。——第 15 页。
- 23 李豫章, 陕西渭南人。一九三二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政协陕西省渭南市委委员会委员、常委。——第 15 页。
- 24 照金, 是位于陕西耀县西北五十多公里处的小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以照金为中心区域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陇东的南梁地区。——第 15、287 页。
- 25 苗家祥 (一九〇八——一九三三), 陕西泾阳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泾阳石桥镇农民协会副主席、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一九三三年九月被国民党杀害。——第 15 页。
- 26 张仲良 (一九〇七——一九八三), 陕西耀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一团政委、中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 关中分区专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15、302、381页。
- 27 张秀山，一九一一年生，陕西神木人。一九二九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队长、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东北支队政委、中共松江省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15页。
- 28 杜衡，陕西佳县人。曾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二部部长、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第15、287页。
- 29 国内和平，这里指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内出现的一段短时间内的和平局面。——第17页。
- 30 高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长、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到中央工作后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当其罪行被揭露后自杀。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了他的党籍。——第17、314页。
- 31 高干会，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和工作，确定发展生产和教育是边区的基本任务。——第17、298页。
- 32 《边区群众报》，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创刊。先后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一九四八年一月更名为《群众日报》。——第22页。
- 33 中国和平建设时期，这里指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在无外来侵略的情况下所进入的和平建设时期。——第22页。
- 34 外汇，这里指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货币。——第25页。
- 35 光华农场，陕甘宁边区最早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试验农场之一。一九三九年

- 冬筹建于延安近郊，一九四〇年投入生产。原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领导，后改由边区政府建设厅领导。——第25页。
- 36 变工队，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织。在变工队内部主要采用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的办法实行农民间的劳动力互助，农民把这种做法叫“变工”。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畜力，轮流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者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第25、66、196页。
- 37 三边，原是陕北定边、安边、靖边三地的统称。这里是指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当时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安边几县。——第26、42、55、59、333、466页。
- 38 讨伐令，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命令。——第30页。
- 39 中原部队，即中原解放军，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原新四军第五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嵩岳军区部队、晋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组成。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六月二十六日，中原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战略决策，举行震惊全国的中原突围战役，冲破了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完成了战略牵制重任。——第30、295页。
- 40 二十二军，指长期驻守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抗日战争期间，该军的主要领导人受民族大义感召，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建立了友好关系。一九四九年五月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33页。
- 41 指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协会议通过的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第31页。
- 42 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安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介石嫡系。曾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七年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一九五〇年去台湾。——第31、35、296、331、465页。
- 43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曾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

席、第三十五军军长，第八、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第 31、303、378 页。

- 44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第 33 页。
- 45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军新编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在陕西安边（今属定边县）率部起义，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十一旅，曹任旅长。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曹又参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曹又参运动”。——第 33 页。
- 46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三年边区开展学习“吴满有运动”，掀起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第 37 页。
- 47 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第 38 页。
- 48 苏维埃时期，苏维埃是俄文 COBET 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它所管辖的区域称苏维埃区域，把这个时期称苏维埃时期。——第 38 页。
- 49 老区，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所解放的地区。——第 38、44、46、49、58、73、91、100、104、170、221、410 页。
- 50 崔区，指陕西绥德县崔家湾区。——第 39 页。
- 51 绥属，指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所辖的绥德、清涧、米脂、吴堡、佳县、子洲、横山等八县。——第 39 页。
- 52 义合，在陕西绥德县。——第 42 页。
- 53 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重要会议。——第 42 页。

- 54 延家川，在陕西绥德县。——第42页。
- 55 明芳，即马明方（一九〇五——一九七四），陕西米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绥德、横山、米脂等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逝世。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第42、288页。
- 56 文瑞，即马文瑞，一九一二年生，陕西子洲人。一九二八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八路军三五八旅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劳动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42页。
- 57 义合会议，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西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严肃批判了以往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并作出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第43、46、55、57页。
- 58 晋绥，指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西部和绥远西南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领导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九年二月与陕甘宁边区合并，其辖区一部分划归绥远解放区。——第43、51、330页。
- 59 张达志（一九一一——一九九二），陕西佳县人。一九二九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红军八十四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独一师政委，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政委，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四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中将军衔。——第43页。
- 60 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第43页。
- 61 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女为对象而设立的小学。——第43页。

- 62 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第43、46页。
- 63 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过减租减息的地区。——第44页。
- 64 指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44页。
- 65 解放战争初期，陕北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曾提倡地主献交土地，由人民政府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群众把这种做法称“欢迎地”。此处指的是有的中农向政府献交土地，这是在“左”倾政策影响下出现的一种非正常现象，及时得到了纠正。——第47页。
- 66 石，粮食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一百四十五市斤为一市石。——第48、96、141、215页。
- 67 指中共路东工委领导的路东总队第四支队，活动于陕西白水县等地。——第50页。
- 68 泾渭，泾指泾河，发源于宁夏，流经甘肃东部在陕西高陵县注入渭河；渭指渭河，发源于甘肃，流经陕西关中，在潼关县注入黄河。——第50页。
- 69 蒋、马，指蒋介石、马步芳、马鸿逵的国民党部队。马步芳系青海军阀，马鸿逵系宁夏军阀。——第50页。
- 70 麟宝战役，即麟游宝鸡战役，亦称西府战役。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开始，五月中旬结束，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解放了洛川、旬邑，并一度解放长武、彬县、永寿等十四个县城，歼敌二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军需供应基地宝鸡、蔡家坡、虢镇等地的军需工业和大量军火仓库。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沉重打击。——第51页。
- 71 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春就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给邓小平的电报。——第51页。
- 72 敌币，指国民党政府通过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第53、84页。
- 73 农币，指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所发行的货币，简称“农民币”或“农币”。——第53页。
- 74 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欺骗网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第54、83、104、152页。
- 75 半老区，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前人民武装所解放的地区。——第58页。
- 76 党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的指示，即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对土地改革、整党、生产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第58页。

- 77 五四指示，指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第 59 页。
- 78 镇川，位于榆林县与横山县交界处。一九四六年十月镇川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设镇川县，一九四九年撤销。——第 61 页。
- 79 弼时，即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 62、299、333、464 页。
- 80 安庄稼，又称招门客。指出租人将土地、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及窑洞、房屋等出租给承租人，土地上的收获按出租者高于承租者的比例进行分配。——第 62 页。
- 81 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之一，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第 78、168 页。
- 82 指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第 78 页。
- 83 指中共西北野战兵团前线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彭德怀为书记，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的作战。——第 79、168、299、333 页。
- 84 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一九二三年成立于法国。其主要成员是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它标榜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九年该党迁往台湾。——第 83 页。
- 85 民社党，即中国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其主要成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会议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九年该党迁往台湾。——第 83 页。
- 86 一贯道，反动封建迷信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特务机关所利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并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被各地人民政府先后明令取缔。——第 89、152 页。

- 87 榆林方式，指和平解放陕西榆林的方式。一九四七年以后，西北人民解放军几度给榆林国民党驻军第二十二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向他们发出弃暗投明的感召。经多次谈判，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双方达成协议，六月一日榆林和平解放，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第 91 页。
- 88 北平方式，指解决北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指解决绥远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国民党军队的原有编制，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第 91 页。
- 89 指战争年代为逃避革命运动的打击而从解放区潜逃国民党统治区，后来又返回解放区的人员。——第 91 页。
- 90 哨站，指战争年代为防止敌军偷袭或敌特破坏而设置在边境或要道的哨卡。——第 92 页。
- 91 扶眉战役，指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野战军在陕西扶风至眉县间对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发动的战役。歼敌四个军四万余人，为迅速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第 96、168 页。
- 92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第 97 页。
- 93 这里指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第 98 页。
- 94 《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在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 109、114、127、135、157、169、217、302 页。
- 95 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并领导了平江起义。曾任红军第五军军长、第三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元帅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含冤逝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第114、138、168、299、330、464页。

- 96 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一九四五年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一九四六年代表国民党参加由国共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春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他被挽留在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第114、303、378页。
- 97 贾拓夫（一九一二——一九六七），陕西神木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候补执行委员。随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120、196页。
- 98 这里泛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地方干部享受供给制待遇所穿的制服。——第122页。
- 99 四大家族，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官僚买办家族。——第123页。
- 100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第140、185、195、238页。
- 101 帮会，旧中国对封建性的民间团体的总称。此处指旧中国时存在的青帮、红帮、哥老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时还拥有武装。一些帮会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但因其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第152、166页。
- 102 乔木，即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 立后，曾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153、362、363页。
- 103 武坪，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所辖，乡政府所在地。一九五四年六月前为西固县武坪区。——第158页。
- 104 阿拉善旗，国民党时期直属中央蒙藏委员会管辖，宁夏省节制。一九四九年九月该旗和平解放后，于一九五〇年三月成立阿拉善霍硕特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九五一年八月改为阿拉善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九五六年四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六一年四月撤销阿拉善旗，设立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一九六九年七月，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一九七九年五月，阿拉善左旗和右旗复归内蒙古自治区。同年十二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阿拉善盟，阿左旗和右旗归阿盟管辖。——第158、230页。
- 105 额济纳旗，一九五〇年成立额济纳自治旗，属宁夏省。一九五四年划归甘肃省。一九五六年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六九年复划归甘肃省。一九七九年再次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158页。
- 106 大土耳其主义，是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反动的沙文主义。宣扬土耳其应当统治一切操突厥语的人民。形成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广为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法西斯主义在土耳其的变种。——第161页。
- 107 郑州会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及十三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的反共会议。这次会议酝酿了武汉“分共”和宁汉合流（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第165页。
- 108 刘志丹（一九〇三——一九三六），陕西志丹人。一九二五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五月与唐澍等领导由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陕军一部起义，任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秋后曾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陕甘边军委书记、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西北工委委员、红军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第165、287、314、339页。
- 109 谢子长（一八九七——一九三五），陕西子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了渭河起义和渭华起义。曾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第165、287页。
- 110 精山主义，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开展游击战争的蔑称。意思是说

- 红军和游击队不敢同敌军作战，逃跑到梢林（丛林）里面躲起来了。
——第166、287页。
- 111 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他们的待遇与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不同。——第166页。
- 112 指以杨虎城为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起源于西北又多驻守西北，故称“西北军”。——第166页。
- 113 《共产党人》，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不定期。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其撰写发刊词，一九四一年八月停刊，共出十九期。
——第167、375页。
- 114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第167页。
- 115 胡指胡宗南，马指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集结胡宗南部十五个旅，马步芳、马鸿逵部十二个师等部，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一年后败退出边区。
——第168页。
- 116 青化砭战役，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西北野战军于延安东北青化砭，全歼国民党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共三千余人。
——第168、335、466页。
- 117 羊马河战役，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西北野战军于青化砭北之羊马河，全歼国民党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共四千七百余人。
——第168、335、466页。
- 118 蟠龙战役，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至四日，西北野战军攻克蟠龙国民党军补给兵站，全歼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共六千七百多人。
——第168、336、466页。
- 119 沙家店战役，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西北野战军在米脂沙家店地区歼灭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共六千余人。——第168、337、467页。
- 120 清涧战役，一九四七年十月二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延（川）清（涧）战役，收复延长、延川两县城，并在延清公路间十里铺击溃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辐重营，歼灭一千四百余人。十一日歼灭七十六师师部及二十四旅，俘四千余人。——第168页。
- 121 瓦子街战役，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今属黄龙）、宜川，全歼国民党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三万多人。——第168页。

- 122 荔北战役，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三日，西北野战军于大荔以北地区，给国民党整编六十五师、三十八师、第一师之七十八旅以重大杀伤，共歼二万四千六百余人。——第168页。
- 123 兰州战役，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动总攻，二十六日解放兰州，共歼国民党军二万七千余人。——第168页。
- 124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根据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军事原则。即：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④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人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⑧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第168页。
- 125 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提出的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属军属三大号召。——第177页。
- 126 马步芳（一九〇三——一九七五），甘肃临夏人，回族。曾长期统治青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青海省政府主席，率部顽固阻击人民解放军进军甘肃、青海，所部被歼后去台湾。——第178、212、333、465页。
- 127 马鸿逵（一八九二——一九七〇），甘肃临夏人，回族。曾长期统治宁夏。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去台湾。——第178、333、465页。
- 128 成步长，指成柏仁（一八八九——一九五八），陕西耀县人。曾任陕西靖国军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部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185页。
- 129 柯老，即柯仲平（一九〇二——一九六四），云南广南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主任，民众剧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第185页。

- 130 文庙，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以后称为“文庙”。这里指西安文庙。——第188页。
- 131 大雁塔，在陕西西安市城南大慈恩寺内。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玄奘为贮藏从印度取回的经像而建。为西安市著名古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第188页。
- 132 韩起祥，一九一五年生，陕西横山人。陕北说书艺人。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到中共延安地委宣传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延安市曲艺团团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的书目有《翻身记》等。——第189页。
- 133 谢茂基，陕西关中人，民间快板诗人。——第189页。
- 134 王老九（一八九四——一九六九），原名王建禄，陕西临潼人。农民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民间文学协会理事、中国作协理事。——第189页。
- 135 会道门，泛指旧中国带有封建迷信宗教意识的民间组织，大多为地主阶级或其代理人所把持，成为反动统治阶级麻醉、统治人民的工具。此处指一贯道等反动组织。——第193页。
- 136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出走印度。——第200页。
- 137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200、305页。
- 138 “宗”，藏语，意为寨落或城堡，旧籍也作营，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相当于县。设宗本（县官）一至二人，僧俗并用，掌管全宗粮赋差税等行政事务。——第201页。
- 139 后来西藏未成立军政委员会。——第201页。
- 140 拱北，是阿拉伯文Qubbah的音译，意为圆顶建筑。此处指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门宦在其教主的葬地和道堂建造的圆顶建筑物，是门宦的活动中心。——第210页。
- 141 马辅臣（一八八三——一九六八），甘肃临夏人，回族。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任团长。一九四九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西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青海省人民政

府副主席，青海省副省长。——第210页。

- 142 张邦美，一九一〇年生，陕西耀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组织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社会部部长、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中共陕南区委书记、陕南军区和第十九军第一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民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211页。
- 143 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第211、234、237、243页。
- 144 青海黄河南四旗，即青海省东南部南左中旗、前首旗、南右中旗、南前旗。一九五二年八月解放。南左中旗今属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余三旗为海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212页。
- 145 曲麻莱，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一九五二年设区，一九五三年设县。——第212页。
- 146 岗察，即刚察，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第212页。
- 147 朝邑县，旧县名，一九五八年撤销，其辖区并入大荔县。——第215页。
- 148 拉撒合拉撒，陕西方言，不利落、邋邋之意。这里指生产条件差的农民在一起组织互助组。这是一种不利于互助合作运动正常发展的自流现象。
——第216页。
- 149 埃远，原为省治，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第230页。
- 150 米丘林（一八五五——一九三五），苏联植物育种学家、农学家。自幼喜爱农艺，一生致力于果树改良栽培研究工作，培育了三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其科学著作被收入《米丘林全集》。——第233页。
- 151 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第238页。
- 152 一九五一年春，以新疆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抢劫，破坏民族团结。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共新疆第二次代表会议后，实行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上只作防御的方针，把剿匪和安置流亡的群众相结合，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第240页。

- 153 一九五二年四月，甘肃平凉西吉地区（今属宁夏），以某门宦教主杨枝云为首纠集匪徒数千人发动叛乱，在人民解放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八月叛乱平息。——第240页。
- 154 一九五二年四月，设在夏河的拉卜楞寺派往甘南牧区阿木企河部落的代表吉哇煽惑群众起来叛乱，经采取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第240页。
- 155 一九五一年底，青海昂拉地区封建世袭千户项谦网罗匪徒二千多人武装叛乱，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青海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以政治争取为首位，后又经人民解放军清剿，一九五二年五月平息。——第240页。
- 156 马家股匪，此处指马良、马元祥股匪。一九五二年初，国民党台湾当局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〇三路司令”，马元祥为“第一〇二路司令”。该两部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第240页。
- 157 黄正清，一九〇三年生，藏族，四川理塘人。曾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议，一九四九年在甘肃夏河县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畜牧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军分区少将司令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八月甘肃省组织以黄正清为团长的访问团，到甘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对瓦解马良股匪起了一定作用。——第240页。
- 158 傅秉勋股匪，流窜于青海地区的政治土匪，一九五二年五月被剿灭。——第241页。
- 159 张真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陕西大荔人，爱国民主人士。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第242、303、378页。
- 160 杨尚昆，一九〇七年生，四川潼南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三军团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一九八八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第250、481页。

- 161 中央十二条指示，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第255页。
- 162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256、310页。
- 163 指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第256页。
- 164 《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条例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256页。
- 165 三七开，指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分配工资制部分和供给制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占三成，供给部分占七成。——第256页。
- 166 二八开，指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分配工资制部分和供给制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占二成，供给部分占八成。——第256页。
- 167 五保户，即对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和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者，在生活上实行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因此，称“五保户”。这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险。——第258页。
- 168 吴芝圃（一九〇六——一九六七），河南杞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西特委书记、豫皖苏边区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副书记。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中原省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260页。
- 169 三包一奖，指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是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一项基本的生产责任制度。——第260页。
- 170 三定，指国家在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第260页。
- 171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生产需要，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动力、耕畜和大型农具在一定时期相对固定地交给所属生产队使用，称“四固定”。——第262页。
- 172 三权，指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又称产权）、生产经营自主权、收益分配权。——第263页。
- 173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它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一九六〇年四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公布施行。纲要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第 264 页。

- 174 民主补课，即民主革命补课。河南省信阳地区由于三年“大跃进”发生了严重的“五风”，至一九六〇年底，出现了大量死人的严重问题。中共信阳地委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召开会议检查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报告说“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提出“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中央肯定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漏划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民主革命补课工作进行了复查，平反了错误补划的地主、富农成分。——第 265 页。
- 175 两送一插，指职工退休、退职和到农村插队。——第 270 页。
- 176 “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内由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结成的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第 271、274、307、321、329、354、356、364、375、386 页。
- 177 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 272、274、307、321、329、354、356、375 页。
- 178 八字宪法，即农业“八字宪法”。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农民群众生产实际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技术措施的八个方面，即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具）。因地制宜地采取这些措施，对保证农作物的稳产高产是有效的。——第 278 页。
- 179 三 鸟，指鸡、鸭、鹅。——第 280 页。
- 180 三 废，指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气、废渣。——第 281 页。
- 181 长征，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受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

地进行长征。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也分别退出原来的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人间少有的艰难险阻，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十一个省。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第 286、444、470 页。

182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以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 187、344 页。

183 安定，旧县名，即今陕西子长县。——第 287 页。

184 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迫令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辞职，六月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准备参加抗日，不久即被蒋介石逮捕长期监禁，一九四九年九月被杀害。——第 288、302、443 页。

185 保安，旧县名，即今陕西志丹县。——第 289 页。

186 反水，意为叛变。——第 289 页。

187 龚逢春，（一九〇八——一九七八），陕西城固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川西区第三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第 289 页。

188 王首道，一九〇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中央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第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中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和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

- 员。——第 289 页。
- 189 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通称。——第 290 页。
- 190 井岳秀（一八七九——一九三六），陕西蒲城人，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六师师长。——第 290 页。
- 191 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陕西定边人，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第 290 页。
- 192 东征，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头，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和阻拦人民红军抗日去路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第 290 页。
- 193 西征，一九三六年五月，蒋介石调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这种万分危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首先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一万三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西征部队相继出发。至七月底，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陕西西北部和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等地，开辟了纵横四百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作了准备。——第 290、330 页。
- 194 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西、江苏、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红军第三军团政委，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经工作部部长、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 290 页。
- 195 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五年十月起任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在释放蒋介石后送蒋回南京，即被长期囚禁。现在台湾。——第 291、302、443 页。

- 196 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汉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西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中共第三届至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 291 页。
- 197 张闻天（一九〇〇——一九七六），上海南汇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指定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一九三八年后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延安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第 291 页。
- 198 西安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 292、302、443 页。
- 199 李先念（一九〇九——一九九二），湖北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三十军政委，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八三年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在政协七届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第 295 页。
- 200 王秉（一九〇八——一九九三），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游击队支队长兼政委，红军团、师、军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军第六军团政委，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中

- 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军区代司令员和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八年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五五年授予上将军衔。——第 295、332、472 页。
- 201 王世泰，一九一〇年生，陕西洛川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团长、三团团长，陕甘宁边区庆环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旅政委，中共三边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一九三四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甘肃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 296 页。
- 202 秉裕（一九〇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二十军六十四师师长兼政委，红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军第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军第十一军参谋长，红军第七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军第十军团参谋长，闽浙赣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浙区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理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大将军衔。——第 296 页。
- 203 谭震林（一九〇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军第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第六师师长兼政委、第二师政委，中共苏南区委书记、淮南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山东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军区政委。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 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296页。
- 204 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〇），湖南临澧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秘书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297、354页。
- 205 党团，中国共产党为加强领导，贯彻政策，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设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称“党团”，之后称“党组”。——第302页。
- 206 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司令员。长征中任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后方委员会书记，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市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国防部部长。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九五五年授予元帅军衔。——第302、439页。
- 207 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303、378、398页。
- 208 邓力予（一八八一——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主席、驻苏联大使。一九四九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

- 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定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303页。
- 209 马叙伦（一八八四——一九七〇），浙江余杭人。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教部部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303、378页。
- 210 朱学范，一九〇五年生，浙江嘉善（今属上海金山）人。大革命时期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国际劳工局理事院理事、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第303页。
- 211 李烛尘（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永顺人。一九一八年任久大精盐公司厂长、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一九四三年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参加创办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中国工业协进会。抗战胜利后，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303页。
- 212 蒋光鼐（一八八七——一九六七），广东东莞人。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一月率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十九路军调防福建后，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与李济深等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一九四六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303页。
- 213 史良（一九〇〇——一九八五），女，江苏常州人。一九三五年参加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任理事。一九三六年五月任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执行委员，参加赴南京请愿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战爆发后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司法部部长、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

-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第303页。
- 214 许德珩（一八九〇——一九九〇），江西九江人。同盟会会员。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央主席。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03页。
- 215 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一九三五年与沈钧儒等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救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第303、378页。
- 216 刘文辉（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四川大邑人。曾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303页。
- 217 龙云（一八八七——一九六二），彝族，云南昭通人。曾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黔滇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八年八月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第303页。
- 218 屈武（一八九八——一九九二），陕西渭南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新疆省政府委员。一九四九年初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顾问，同年九月参加策划新疆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乌鲁木齐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第303页。
- 219 程砚秋（一九〇四——一九五八），原名荣承麟。满族，京剧艺术家。一九二二年起探索革新京剧，逐渐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程派唱腔，一九二七年后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戏曲表演艺术的基础》等。——第304页。
- 220 杜聿明（一九〇四——一九八一），陕西米脂人。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

- 长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解放战争中被俘。一九五九年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305页。
- 221 陈长捷（一八九二——一九六八），福建闽侯人。曾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在解放战争中被俘。一九五九年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第305页。
- 222 宋希濂（一九〇七——一九九三），湖南湘乡人。曾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在解放战争中被俘。一九五九年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305页。
- 223 黄埔，指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各种职务，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第306页。
- 224 溥仪（一九〇六——一九六七），满族，宣统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一九四五年被苏联红军扣捕，后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九年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第306页。
- 225 陈云，一九〇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第六届、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一九七五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七八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二年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308、373、414页。
- 226 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九月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起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免去一切职务。——第309页。
- 227 十三陵水库，在北京市昌平区境内。以建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故名。一九五八年建成。拦蓄温榆河支流沙河洪水，并供灌溉、养鱼之用。是京郊著名风景区之一。——第310页。

- 228 十大建筑，指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车站、北京饭店、首都体育馆、中国美术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第311页。
- 229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承认了日本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称帝。在云南等许多省反对下，于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第311页。
- 230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一二年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总长，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到一九二六年，他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等职，几度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实行卖国投降的政策。——第311页。
- 231 刘景范（一九一〇——一九九〇），陕西志丹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团长，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央西北局常委，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副主席、代理主席，西北野战军中共前委常委、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314页。
- 232 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市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元帅军衔。——第315页。
- 233 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届一中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第317页。

- 234 江青（一九一五——一九九一），女，山东诸城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时被捕脱党。抗战爆发后到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伙同张春桥等人结成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七七年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第 317 页。
- 235 这里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提出了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会后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试行。——第 322 页。
- 236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因他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上的失误，经中共中央批准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 329、363、378、413 页。
- 237 陈赓（一九〇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起在上海参与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后任红军第四方面军团长、师长，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大将军衔。——第 330 页。
- 238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军第四军军长，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 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恢复名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第331页。
- 239 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山西五台人。辛亥革命后任山西督都，长期盘踞山西。曾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行政院长。一九四九年去台湾。——第334页。
- 240 刘邓大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称中原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改称第二野战军。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第337、466页。
- 241 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国内外和平民主的舆论，用“和谈”烟幕掩盖其内战和独裁行径，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会谈。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并利用适当时机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了长达四十三天的商谈。谈判中，蒋方坚持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拒不承认解放区，力图削弱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了重要让步，但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十月十日双方签订国共《会谈纪要》。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商谈。这次谈判击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揭露了他们假和平的阴谋。——第342页。
- 242 清远经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广东清远县委针对国营企业徘徊不前的问题，在十七个国营企业中大胆推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办法。一年后，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利润增长两倍多，上缴税收增长百分之三十，工人增收百分之十八点三。与此同时，清远县委改革工业领导体制，取消县委工业部、县政府交通局等五个部门，成立县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县工交系统的人、财、物大权。中共广东省委对这一创造性的举措给予了肯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作出推广“清远经验”的决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第357页。

- 243 克里空，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惯于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后来我国新闻界借以泛指那些脱离实际、虚构浮夸、说空话的新闻报道作风。——第 362 页。
- 244 曾子，名参，孔子的学生。这里的引文见《论语·学而》。——第 374 页。
- 245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诬蔑为“臭老九”。——第 375 页。
- 246 陈慕华，一九二一年生，女，浙江青田人。一九三八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人民银行行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 376 页。
- 247 司马义·艾买提，一九三五年生，新疆策勒人，维吾尔族。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现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中共第十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 377 页。
- 248 李德全（一八九六——一九七二），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县）人。冯玉祥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 378 页。
- 249 章伯钧（一八九五——一九六九），安徽桐城人。一九四一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 378 页。
- 250 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一九四一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林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 378 页。
- 251 胡厥文（一八九五——一九八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一九四五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第四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名誉主席。——第 378 页。
- 252 胡子昂（一八九七——一九九一），四川重庆人。一九四五年参与酝酿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

市委副书记，全国政协第五届至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第 378 页。

- 253 紫阳，即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他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第 378 页。
- 254 陈叔通（一八七六——一九六六），浙江杭州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进行民主运动。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第 378 页。
- 255 徐冰（一九〇三——一九七二），河北南宫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济南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部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 379 页。
- 256 平杰三，一九〇三年生，河北人。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 379 页。
- 257 廖承志（一九〇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华侨大学校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 380 页。
- 258 项谦，一九五一年底在青海昂拉地区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向人民政府投诚。后任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
——第 381 页。
- 259 喜饶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青海循化人，藏族。幼年出家，曾在拉卜楞寺、塔尔寺及西藏学经，任达赖十三世经典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第 381 页。
- 260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七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创立。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在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
——第 384 页。
- 261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和最根本的立法依据。——第 386 页。
- 262 阿訇，是伊斯兰教主持教仪、讲授经典的人。——第 387 页。
- 263 毛拉，阿拉伯文 *maula* 的音译，原意为“先生”、“主人”。后来成为一些国家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称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为毛拉。——第 387 页。
- 264 陈国栋，一九一一年生，江西南昌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皖苏边区财政厅副厅长、苏北行政办事处主任、华中行政办事处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 391 页。
- 265 这里泛指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第 391 页。
- 266 三教九流，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第 400 页。
- 267 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第十九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第 402、419 页。
- 268 国务院一九八三年第六十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第 402 页。

- 269 四清，指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城乡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第411页。
- 270 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称苏维埃政权，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第412页。
- 271 胡启立，一九二九年生，陕西榆林人。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固原地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副校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免去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现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第417页。
- 272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第443页。
- 273 察北，即察哈尔北部地区。察哈尔原为省治，一九五二年撤销，其辖区划归河北、山西省。——第444页。
- 274 绥东，即绥远东部。绥远原为省治，一九五四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444页。
- 275 宋美龄，一八九七年生，女，海南文昌人。时为国民党谈判代表。——第444页。
- 276 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海南文昌人。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第444页。
- 277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第444页。
- 278 方励之，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九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学生闹事，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犯有反

- 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第 447 页。
- 279 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 447 页。
- 280 刘宾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 447 页。
- 281 霍英东，一九二三年生，广东番禺人。香港有荣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第 448 页。
- 282 马万祺，一九一九年生，广东南江人。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华教育会名誉顾问、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第 448 页。
- 283 胡应湘，一九三五年生，广东花县人。香港合和实业集团董事部经理。全国政协委员。——第 448 页。
- 284 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第 451 页。
- 285 乌兰夫（一九〇六——一九八八），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蒙旗保安总队政治部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中共内蒙工委书记、内蒙古军政学院院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届、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五年授予上将军衔。——第 457 页。
- 286 毛泽东比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第 457 页。
- 287 千军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 461 页。
- 288 邓宝珊（一八九六——一九六八），甘肃天水人。一九二七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长。——第 465 页。

- 289 陈谢，陈指陈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司令员；谢指谢富治，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副司令员。——第466页。
- 290 陈粟，陈指陈毅，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指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第466页。
- 291 江泽民，一九二六年生，江苏扬州人。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动力分厂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电子工业部部长，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九年在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九九〇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九二年十月在中共第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九三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477页。
- 292 焦裕禄（一九二二——一九六四），山东淄博人，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调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任内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全县人民一起，对该县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身患肝癌，仍坚持工作，被群众誉为“党的好干部”。——第478页。
- 293 雷锋（一九四〇——一九六二），湖南长沙人。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参加农业、工业等各项建设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一九六〇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一九六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班长，并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因公殉职。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第478页。
- 294 王全国，一九一九年生，湖北襄阳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襄樊工委书记、中共洪湖工委书记、营口市公安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桂林市委代书记，桂林市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计委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481页。
- 295 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城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分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

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十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 482 页。

- 296 任仲夷，一九一四年生，河北威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西北区委书记，中共冀南五地委、二地委常委，中共邢台市委书记，邢台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大连市市长，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 483 页。
- 297 林若，一九二五年生，广东潮安人。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粤赣湘边区纵队支队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湛江地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 483 页。
- 298 谢非，一九三二年生，广东陆丰人。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旗》杂志社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 483 页。

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占农村总户口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占土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但广大农村还是在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下。这些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严重地压迫着农民，把许多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并经过种种方式去残酷地掠夺和剥削农民。再是目前战争尚在继续，西北各省全部解放尚需一个时期，以及向西南进军，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是很繁重的。综合这三种情况：工业经济的微弱和商业性的消费城市，面对封建统治的农村，处于战争环境，这就是目前新区情况的基本特点，就是我们决定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所必须依据的出发点。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们在西北广大新区如何正确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92]决议，执行“把工作重心从乡村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总方针呢？这就必须学习华中局实事求是的精神。华中局所提出的如下的工作步骤，即“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间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土匪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成民主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工作重心移向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兼顾农村。在各个时期，都绝不能放松城市工作，更不能放松对战争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忽视了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等等，在我们这里是全部适用的。关中地区，除宝鸡、彬县两个分区解放稍迟外，大部地区，第一步接管城

乡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就要转入第二步，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完成这一阶段的工作，是要几年的时间，实行中又须划分若干具体步骤。依据关中地区实际情况，我们决定从现在起到明年夏收以前近十个月的时间内，首先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打倒农村里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其他一切工作，均围绕在开展这一斗争的群众基础上去进行，以达到削弱农村封建势力的目的，为将来进行土改即彻底实行农村民主改革准备条件。这一时期的几项重要工作，分述如下：

（一）正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用大力继续支援前线。战争越到最后，支援工作越加艰巨，以为战争推远了，支援任务就可减轻或放松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群众，建立各种合理制度与加强领导，以克服困难，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征粮要坚决按《条例》^[93]办事，以前借粮中所发生的不合理现象必须在正式征粮中予以改正。战勤动员应由政府颁布条例遵照执行，力求公平合理，节省民力，尽可能地做到战争和生产两利。

（二）积极建立人民武装，继续肃清反动武装。大量收编敌伪反动武装的时期，在关中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整训改造。像吃饭一样，吃了要消化，光吃不消化，会得胃病，现在已经发生肠胃病象征，要注意治疗。同时光靠改造旧部队还不够，必须在发动群众中建立党直接创造和领导起来的军队。地方部队要在加强剿匪中提高战斗力，首先要成为战斗队，然后再逐渐训练成为工作队。剿匪是当务之